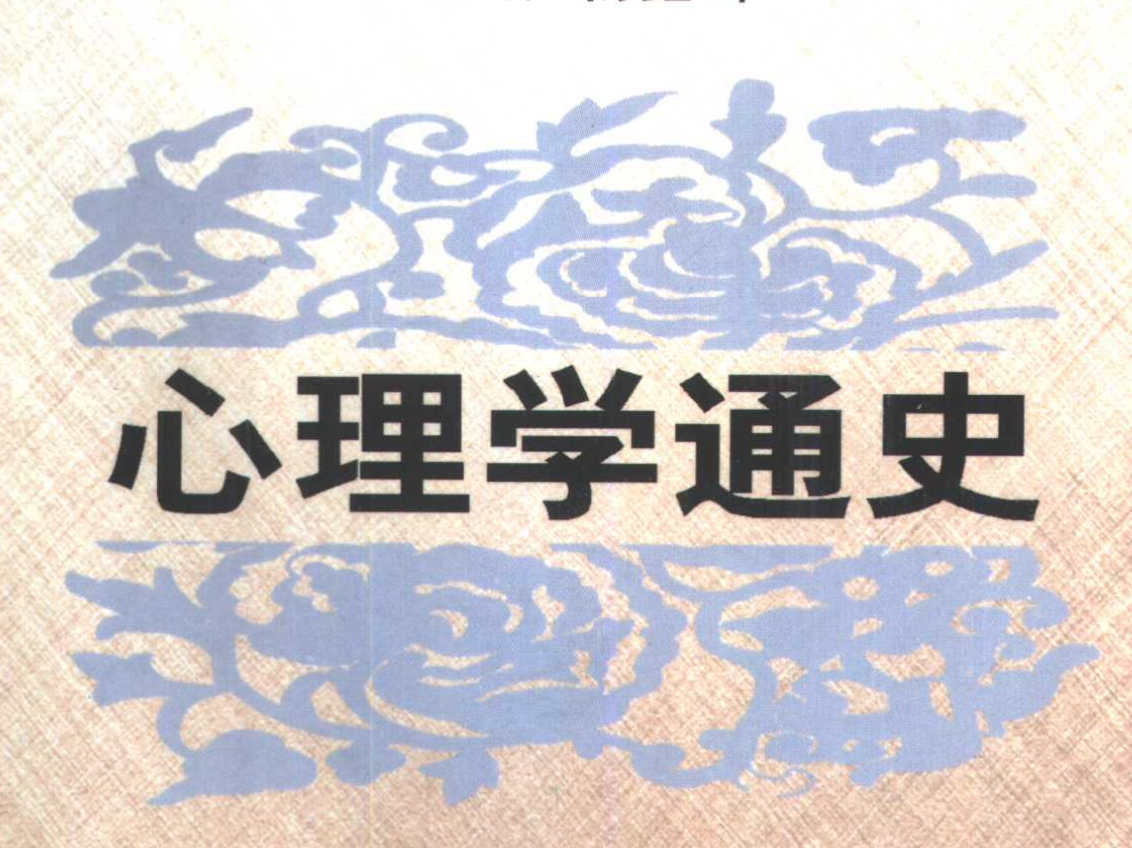

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



主编 杨鑫辉



心理学通史

第二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温玉川　封面设计\高 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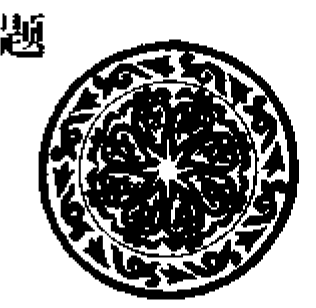
ISBN 7-5328-3015-2/B·5

定价：23.00元



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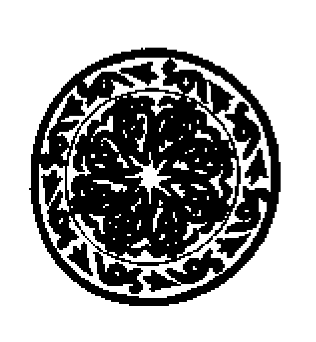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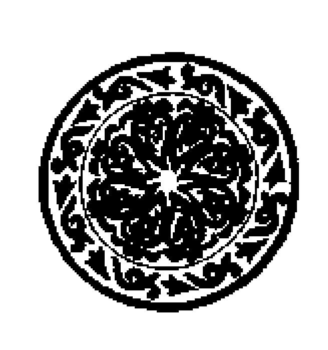
主编 杨鑫辉

心理学通史

第二卷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

主编 杨鑫辉 赵莉如





山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

杨鑫辉 主编

心理学通史

第二卷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

主 编 杨鑫辉 赵莉如

出 版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2023919 传真：(0531)2050104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规 格：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16 印张

插 页：6 插页

字 数：382 千字

书 号：ISBN 7－5328－3015－2/B・5

定 价：23.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简介

杨鑫辉　江西省萍乡市人，1935年生。曾任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兼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主要创建者之一，还首倡现代心理技术学新体系和提出现代大教育观理论建构。主要著作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现代大教育观》等30多种，发表论文《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刍议》、《心理科学应当面向社会生活》、《现代心理技术学的体系建构》等120多篇。招收培养硕士生30人，指导博士生13人，并指导博士后。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一等、二等奖17项次。198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通史　第2卷：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杨鑫辉主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ISBN 7-5328-3015-2

Ⅰ.心…　Ⅱ.杨…　Ⅲ.①心理学史-中国-近代②心理学史-中国-现代　Ⅳ.B8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3990号

《心理学通史》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目　录

Contents

Part Two: Chinese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绪　论

心理学被人们称为有一个长久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这不但适合西方，也合乎中国的情形。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里，形成和发展着源远流长而丰富的心理学思想，第一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已作了系统的论述。人们自然要问：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如何？中国现代心理科学又是怎样形成发展起来的呢？第二卷《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正是要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曾经指出："中国古代虽然有非常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是未能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心理学。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封建礼教束缚了人体解剖生理学的向前发展，没有取得像欧洲19世纪所取得的生理心理学实验的科学成果；另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心理性命之说，又不大受医学界的生理研究的启发和影响。我国近现代心理学是接受西方心理学以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 还有思维方式的原因，中国传统重演绎思维，轻归纳思维，因而也较轻实验方法。西方心理学是在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引进生理学、物理学的实验方法而后发展成为科学心理学的。总的说，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也遵循着这条规律。所不同是：它不是在中国古

① 杨鑫辉：《中国近现代心理学概况》，见《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代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直接形成为一门独立科学，而是以西方心理学的引入传播作为中介的。赵莉如研究员也指出："中国现代心理学不是由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演变来的，而是从西方传入或引进的。它与西方心理学东渐史有连续性。应探其源知其流，了解前因后果，来龙去脉。"① 以上都在于说明中国心理学发展的特殊性。

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心理学史》，是由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演变和近现代心理学的形成发展两大部分构成的。高觉敷教授在绪论中阐述前后两部分的关系时说："编写中国心理学史，为什么要把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史和中国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合冶于一炉呢？这就要涉及心理学思想和心理学的联系了……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虽不就是心理学，但与心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有好几章论述笛卡尔和洛克等人的哲学心理学思想，认为这些思想是实验心理学的源流之一。"② 当然，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更好地联系起来，并冶于一炉的做法是潘菽教授所指出的："等到我们把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可贵可取的部分都吸收到我国自己的心理学中来，成为我国心理学的一部分骨架和血肉的时候，我国心理学史的前后两部分就更连贯起来了。"③ 我们这次编写中外心理学通史，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各列为一卷，不是要把中国心理学史分割开来，而只是作为时期的划分，这两卷还是紧密相连的。

我国心理学界对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较之古代心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自序》，载《心理学动态》1992年专集。本卷的许多材料都得益于本书。

② 高觉敷主编：《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③ 潘菽：《中国心理学史·序言》，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理学思想的研究更要薄弱些，只是到近些年才做了较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张耀翔教授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中提到了西方心理学的传入和发展。80年代起，心理学史的著作、教材中才有关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编、章、节。1986年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中第四编为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刘恩久、马文驹、赵莉如、陈大柔执笔撰写了三章："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解放前的中国心理学"，"解放后的中国心理学"。1985年出版的《心理学简史》中，杨鑫辉执笔撰写了"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和"现代心理学的建立"，后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一书中，撰写了"中国近现代心理学概况"。而当前全面系统研究了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著述是：赵莉如编著的专集《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1992年《心理学动态》专集)，和她编著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1950～1993)》。1997年王甦、林仲贤、荆其诚主编出版的《中国心理科学》里，赵莉如、许其端撰写了"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此外，在心理学刊物和大学学报上，心理学工作者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论文，并参加了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交流。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心理学工作者关心和参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

一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的对象与意义

(一) 研究的对象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

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①] 这一精辟的论断，对于我们确定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顾名思义，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心理学史而非外国的，是中国近现代的而非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史。但是这里又有一些特殊情况，一方面中国现代心理学特别是作为实验心理科学来说，它是由于西方近代心理学的传入，受到西方心理学影响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又必须研究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与广泛传播问题。另方面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丰富而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心理学自身的根基，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又必须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而且这些心理学思想往往既承袭了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又融进了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由此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作如下的界定：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是研究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形成发展和中国现代心理科学形成发展的中国心理学史分支学科。

（二）研究的范围

从上面的界定我们可以推论，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的范围应从三个维度去划定，即近代与现代的时间维度，中外交流融合的地域维度，心理学思想与心理科学的学科性质维度。由于三个维度的交合，为论述方便起见，我们概括成两个方面加以阐明。

1. 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尚未形成实验科学性质的心理学，还只是以哲学心理学思想为主导的，即还是继承和发展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但是在明代，西方传教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P. Matthoeus Ricci)、高一志（P. Alohonsus Vagnon)、毕方济（P.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Franciseus Sambiasi)、艾儒略（Julius Alemi S. J.）等先后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也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初心理学思想传入中国。因此，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主要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家，如龚自珍、王筠、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研究他们承袭和对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发展，研究他们接受西方科学影响的心理学思想。同时也应研究西方传教士和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传播西方心理学思想的情况，和日本向中国间接传播西方心理学的情况，因为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心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2. 中国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

中国现代心理学是接受了西方实验心理科学影响而建立的心理学，因此，中国现代心理学史属于科学史的范畴，这是有别于一般心理学思想史的。其研究的范围，首先应研究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蔡元培、陈大齐等代表人物的心理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心理学是怎样建立起来，它的主要标志有哪些。其次要研究西方心理学和苏俄心理学各流派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情况，这些理论对中国心理学的影响与作用。至于西方心理学和苏俄心理学其他更广泛的内容，则不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史研究的范围。再次，更主要是研究中国心理学发展各时期，我国心理学界对各个心理学分支的主要研究成果，我国心理学界对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心理学史的建树，我国心理学发展的道路。最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为了论述的方便，将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心理学发展状况，列出专节进行阐述。

（三）研究的时限

关于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时限划分，史学一般以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止于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近代史。中国的近代史则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19 年五四运动。世

界现代史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至现代，也有主张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史则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年限，则不完全以中国通史的历史分期为标准来划定，这是由学术思想史、科学史的特殊性而有所差异的。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史的时限，基本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因为我们是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先驱者龚自珍的心理学思想为开端，至孙中山的心理学思想为止。但是，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启蒙时期，则上溯到16、17世纪明朝时西方心理学思想的早期传入，一般说属于古代的历史时期，考虑到它与西方近代心理学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影响而归入近代。中国现代心理学史的开端，则以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的成立为标志，蔡元培、陈大齐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者，一直研究到现在的心理学。这与中国现代史的历史时期划分基本是一致的。这样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形成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哲学历史背景。

(四) 研究的意义

我们在《心理学通史》第一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里曾经指出，在发展我国现代心理科学的同时，应当光大祖国的心理学思想遗产。我们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史，既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具有本土化意义，又具有丰富世界心理学思想的国际性意义，还具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性意义。那么，包括心理学思想史和心理学科学史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我们学习和研究它的意义又何在呢？

1. 掌握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规律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作为一种国别心理学史，它反映心理学这门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心理学跟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哲学、科学

的状况密切相关，受当时的哲学、生理学等所达到的水平所制约，也依赖于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还受到外国心理学传播的影响。这说明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是心理学发展的外在逻辑的历史规律。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在心理学学科内部，"前一时期的心理学思想观点，对后一时期的心理学思想观点有着不同程度的直接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或更替的关系"[①]。在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外国的心理学思想观点对我国的心理学思想，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黑格尔曾把哲学史比做圆圈，列宁对此进一步指出："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②]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上各种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也是如此。这是心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历史规律。

2. 为现代心理学提供历史借鉴

美国心理学史家舒尔茨指出："由于人的极端复杂性，若干世纪之前提出的关于人类本性的许多问题现在仍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提出来。因此，像心理学中那样的问题的连续性是其它各门科学中找不到的。这样，在心理学中存在着一种与过去更加直接和更明确的联系……现代心理学也只有与其过去的发展联系起来时，它才是有意义的。"[③] 过去的发展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为现代心理学提供历史的借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中可以吸取经验教训，预见今后发展。作为一门学科史也是如此。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可以为今天心理学的发展提供借

① 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 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49 页。
③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 页。

鉴。正如徐联仓研究员在赵莉如著《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序》里所说："从解放前三十年来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来看，有不少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可供我们借鉴，如要求心理学的中国化；注重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重视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等。这些仍是我们今天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关键性问题。"①

3. 提高研究心理学的理论素养

高觉敷教授曾经指出："普通心理学所提供的是心理学的现代科学知识的横断面，心理学史所提供的是心理学自古至今或自近代至现代的科学知识发展的全面观。因此，通过学习和研究心理学史，有助于我们提高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水平，克服浮解虚知的现象。"②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提供给我们的是自近代心理学思想至现代心理科学的全面观，当然是有助于研究心理学的理论素养水平的。这种理论素养，既包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研究的理论水平，也包括具体分析解决心理学史问题的鉴别、评价能力。当代国外历史教学强调培养站在历史角度上对历史事实进行综合分析的历史思维（Think Historically）。③ 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也要理清史实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进行不同角度的历史分析，包括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因果分析，对心理学思想理论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既有肯定又指出其历史局限性的评价，无疑有助于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1992年专集。

② 高觉敷：《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6页。

③ 参阅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页。

二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原则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跟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在研究原则上有其基本相同的方面，但也有其差异性或特殊性。掌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对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与学习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心理学史的一般方法论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特点，我们应当掌握以下三条基本研究原则。

（一）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方法论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史，也是遵循一般历史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而言，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也应遵循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近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出现了不那么重视方法论或者避开方法论问题的情况，这是值得引起注意并开展讨论来解决的。著名心理学家潘菽一贯视方法论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研究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他曾经指出："方法论是很重要的，忽视了它就将受到自然惩罚。既花了气力做工作而结果却不好，甚至很不好。""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即指导思想问题。不重视方法论问题，理论研究不好，应用也研究不好。"① 重温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坚持正确指导思想开展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论，也就是要用唯物史观来审视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② 根据这一根本原理，我们叙述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思想观点时，一定要顾及当时的社会历史条

① 潘菽：1984年3月3日致杨鑫辉的信。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7页。

件，分析产生或流行这种心理学思想观点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的影响。例如，解放前我国基本上是学习欧美的心理学，西方心理学的诸流派占支配地位，这跟当时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解放后十多年间，只能学习苏联心理学而一概排斥西方心理学，这与当时中国诸方面紧跟苏联的历史条件有关。

在心理学发展中还必须辩证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我们曾经在总结中国心理学发展六十年的文章里指出："在我国的心理科学发展这个事物中，也存在一系列两个相对的侧面。例如，心理学中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本国与外国，现代与古代，理论研究与应用普及，各分支与科学等等。回顾中国心理学六十周年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历史，要迅速地、健康地发展中国心理科学，我认为必须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辩证法处理好这五个关系。"① 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各个分支领域的发展史时，也应运用辩证法这个武器。

（二）与西方心理学史编纂学的联系与区别

高觉敷教授在主编的《西方心理学史论》② 一书中，对西方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作了详细的论述，这些问题是中国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工作也要碰到的。概括地说西方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的主要问题包括：时代精神说与伟人说；厚古说与厚今说；内在说与外在说；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

在西方心理学史家中，有的主张侧重"文化气氛"或"思想模式"的时代精神，以此解释心理学的发展。有的持伟人说，认

---

① 杨鑫辉：《必须用辩证法指导我国心理学的发展》，见《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 页。

② 参阅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史论》第 6～9 章，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为是某些伟人的成就和贡献推动着心理学的发展，极大多数人主张用时代精神和伟人说相结合的原则来解释心理学的发展动因。其次，在研究和编纂心理学史时，有的偏重过去而排除现在，以过去时空的范畴描述历史。有的主张用现在的标准去处理过去，历史要为现实服务，这就是所谓的厚古说和厚今说。再次，关于心理学发展的动力，有的主张内在说，认为应从心理学内部寻找发展动力，即侧重心理学的技术与思想的发展。有的持外在说，即强调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最后，关于心理学历史编纂中的质与量的关系，有的着重量的研究，即用数字描述过去的历史和用相关分析方法作量的研究。有的着重质的研究，即从理论上追求科学的严密性，把握心理学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的说还是以质的研究为主。上面这些原则的内容，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也是要涉及的，这就是问题的联系性一面。

区别的一面则在于：首先，我们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是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来处理前面所述问题的，吸取其合理的思想，摒弃其中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机械论。例如说，应当批判地看待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来评述心理学的发展，古今兼顾来研究心理学史，将内在说和外在说辩证统一起来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动因，将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结合起来来编纂心理学史。其次，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特定的文化背景来研究和编纂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人们的心理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能动的反映，其心理内容必须与人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一部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除了反映各国心理学发展史的普遍规律外，还要反映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而不能完全照搬外国心理学史的编纂法。这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和编纂，要从国情出发，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例如说，冯特在德国创立实验心理学，是以德国当时的心理生理学和心理物理学为基础发

展起来的，而中国现代心理学是20世纪初在引进西方心理学的基础上，并且逐步中国化而发展起来的，并且正在吸取中国古代丰富的心理学思想的营养。

（三）跟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法的联系与区别

我们在第一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里，提出了“一导多元”的方法学。这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指导思想，采用多元方法研究心理学思想。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六种方法：将零散的心理学思想观点或事实材料分类归纳加以叙述的归类排比法；根据史料的考核和例证归纳，提供可信材料和结论的史料考证法；疏解字义和阐发义理来探索心理学思想微言要旨的义理诠释法；采用古今中外纵横交错比较来评价心理学思想的纵横比较法；采用现代实验、实证来验证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科学性的实证检验法；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进行逻辑思维推理分析和综合归纳，从而得出全面而正确结论的系统分析法。以上方法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尤其是对研究近代心理学思想史，许多方面是可用的。但是，由于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不属科学史的范畴，而近现代心理学史属于科学史的范畴，因而应当予以区分。

这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首先，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从古代文献中挖掘整理出来的，由于古汉语与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差别，要求研究者具有古籍版本学和训诂学的知识，只有掌握这些工具才具有理解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条件，所以义理诠释法显得特别重要。而近现代心理学史的文献资料基本上是现代汉语写成的，没有古代这种字句疏解的必要，当然心理学理论的释义法还是需要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强调“改变世界”，但是也承认“解释世界”，而不是不少人所误解的将两者尖锐对立起来。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和近现代心理学史都有一个解读前人文本

的问题，只是“后人要准确地理解并解释前人留下的观念和文本时，必须先理解前人置身于其中的实践活动”①，同时要赋予价值的解释。

其次，在运用比较法时应当注意：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有一套完整而独特的范畴体系，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特别是现代心理学史，具有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相同的科学概念体系。因此，在作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中外比较研究时，先要找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范畴跟外国心理学相对应的概念，才可能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并着重其独特性。中国现代心理学是跟引进西方现代实验心理学有关，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这里基本上甚至完全在相同的科学概念体系内进行比较研究，会有更多的一致性。但是也要注意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对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影响，要研究心理学中国化的发展方面。

最后，运用系统分析法时，要注意古今不同时空心理学思想与心理学所受哲学思想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分析，主要是儒、墨、道、法、释、医、兵等诸家的不同心理学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思想融合。外来文化的影响虽有但不占重要地位。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则有所不同，它除本国文化传统外，还应分析外国哲学不同流派的影响。意识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完形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流派，无不打上某种西方哲学派别的印记，这是必须注意的。

三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发展脉络

我们在前面提到，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史，是从龚自珍（1792

① 俞吾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释义学》，载《光明日报》1997年7月26日。

～1841）写到孙中山的心理学思想。中国现代心理学史，是从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算起至今的。这样计算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年代跨越是160年左右。由于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启蒙时期可以上溯到16～17世纪的明朝，所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里，所涉及的年代跨度可达400年左右，因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所著的《西国记法》是1595年问世的。

为了认识和掌握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必须理清和把握这个时期心理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趋势。我国这个时期的心理学历史，存在着中外古今心理学思想交错融合的复杂情况，但是通过整理和研究其头绪又是清晰可见的。我们认为概括地说应当抓住两条线索：一条是考察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产生源头，它既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继承发展，又由于西方心理学的传播而形成心理科学。另一条是把握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发展时期的划分，了解从近代心理学思想向现代心理科学发展的过程。

（一）考察产生源头

关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源头问题，不应作简单的回答，那样容易发生偏颇而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有人以为中国的心理学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西方心理学传入后才有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一样都是世界心理学思想的重要策源地，中国有着由心理学思想发展为心理科学的丰富土壤。那种以为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完全是由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发展来的看法也是片面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心理科学与西方心理学的传播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源头问题，应当分开近代与现代并作出客观的具体分析来回答。

就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说，它的源头就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近代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

观点，可以从古代心理学思想家的论述中找到起点和来龙去脉。龚自珍的“知觉论”将“知”与“觉”区别开来，认为“知，就事而言也；觉，就心而言也”[①]。这可以从宋代朱熹下面的话中找到承继之处。朱熹说：“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觉则是自心中有所觉悟。”[②] 龚自珍“无善无不善”的人性论，集中反映在《阐告子》一文里，这更直接告诉人们其思想是告子人性论思想的发扬。王筠在《教童子法》一书中说：“……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讲又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自我口便算了事。”与晋葛洪所强调的“凡学道当阶浅以涉深，由易以及难”[③]，文字上很相近。后一句跟朱熹在《读书之要》一文中主张的“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④]，其主旨也是一脉相承。谭嗣同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语言和智力。他说：“尝论人为万物之灵，所以能著其灵者，于语言声音著之。”[⑤]“人既日趋于灵，亦必集众灵人之灵而化为纯用智。”[⑥] 这很明显来源于《尚书》“惟人，万物之灵”和《孝经》“贵有知（智）也”。至于强调人有语言则是谭氏的发展。

清末民初的梁启超作为变法维新代表人物之一，深受西学的影响。他的心理学思想与西方心理学、日本心理学有直接联系，并专门研究过佛教心理学思想。但是在他的教育心理学思想方面，则仍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有直接承继关系。他在《教育政策私议·教育次序第一》一文中说：“由此观之，教育之次第，其不可以

① 龚自珍：《辨知觉》，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27 页。
② 《朱子语类》卷 58。
③ 《抱朴子内篇·微旨》。
④ 《朱子文集》卷 74，《读书之要》。
⑤ 谭嗣同著：《管音表》自叙，载《谭嗣同全集》，第 253 页。
⑥ 谭嗣同著：《仁学》46，载《谭嗣同全集》，第 365 页。

躐等进也明矣。”[①]这不能说跟《礼记·学记》中的“学不躐等”没有联系。梁启超说：“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②]跟从《学记》开始的历代教育家强调的将记忆与理解结合起来的教育心理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孙中山的心理学思想里，论述精神、心理与物质的关系时，采用了中国古代将“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认为“气”在“理”的唯物论传统思想。在论述智能问题时，更直接引述了孔子的观点。他说：“中国古时学者，亦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说，与此略同。”[③]

就中国现代心理学来说，其源头除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心理学思想的继承，更重要的是西方心理学的传播。而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又可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西方心理学直接传入中国，另一条是西方心理学通过日本的桥梁作用间接传入中国。这两条渠道的结合，增加了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强度，加强了中西心理学思想的融合，对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形成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直接传播是更主要的方面，早在17世纪西方心理学通过传教士已有初步传入。意大利的利玛窦在江西南昌为教巡抚子女学习记忆法，1595年著有《西国记法》。艾儒略于1623年著译《性学觕述》，以问答形式较系统地论述了各种心理现象。1624年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的《灵言蠡勺》，论述了人的灵性问题，这也是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后来清朝的许多教会学校都开设了心理学课程，翻译刊印西方心理学著作，由外国和中国传教牧师任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颜永京（1838～1898），在美国教会学堂读书，1854年赴美留学，学习过心理学。回国后在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四册，第33～36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1896)，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一册，第46～47页。

③ 黄昌谷编：《军人精神教育》，载《孙中山先生演说集》，第124页。

圣约翰书院任院长8年，教过心理学，1889年翻译出版了美国传教士海文的《心理学》，改名《心灵学》，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现代传播西方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则是蔡元培(1868～1940)，他是西方现代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唯一的中国学生，直接聆听冯特讲授的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等课程，后来又专门到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心理实验室参观考察。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于1917年支持陈大齐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任院长，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心理研究所，还提出了一系列心理学思想与主张，在建立中国现代心理学中发挥了先驱作用。①

另一方面是通过日本将西方心理学间接传入中国。"由于清末民初的学制，基本上仿效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学校所用教科书或讲义也多译于日本，所以这个时期的心理学教材大都是翻译日本的(即日本编译的西方心理学)；自编的心理学教材也多出于留日学者，主要参考日本心理学的内容。当时师范馆及师范学堂还聘来教授心理学的日籍教师。因此西方心理学传入我国，日本起了桥梁或媒介的作用。"②服部宇之吉是日本来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教习，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讲授心理学，并且编撰了一部《心理学讲义》。中国早期翻译日本的心理学书现存的有：久保田真则的《心理教育学》(1902年)，大濑甚太郎、立炳教梭合著的《心理学教科书》(1903年张云阁译)，井上圆了的《心理摘要》(1903年沈诵清译)等。中国最早自编的心理学也出自留日学者。1905年出版的《心理易解》，就是留学日本的陈榥编译的，在日本东京印

① 杨鑫辉：《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与贡献》，载《心理科学》1998年第4期。

②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1992年专集。

制，在东京、上海、南京等地发行。

（二）把握发展时期

把握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发展时期的划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向现代心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出，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有与通史的基本一致性又具心理学专门史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心理学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国近代心理学启蒙时期和中国近代心理学发端时期。中国现代心理学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国现代心理学创立时期和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总起来说，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四个历史时期，是前后紧密联系不断推进的，经历了一个中西心理学思想交融、由心理学思想向心理科学发展的过程。

中国近代心理学可以追溯到明代西方心理学的早期传入。前面已经提到意大利传教士的三本有关西方心理学的书，虽然当时流传不广，影响不大，但毕竟对中国近代心理学有某些启蒙作用，他们注意到了与中国儒家心理学思想的结合。例如《西国记法》中的立象篇，就是论述中国文字的“六书”建立形象的方法，即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来传播西方心理学思想。该书认为记忆在脑中的部位是在脑的颅囟后枕骨下，其对记忆生理机制的探讨等，现在看来也基本是正确的。它和我国明代方以智的“资脑髓以藏受”和金正希的“人的记性皆在脑中”观点，一起对明代的心理学思想发生影响。尤其我国清末龚自珍、王筠、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等的心理学思想，既继承古代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科学和西方心理学的影响，更对中国近代心理学有着启蒙作用。至于中国近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端，是清末教会学校心理学的传播和赴美留学生学习了西方心理学。中国学者翻译早期西方心理学书籍，如1889年颜永京译美国海文著《心

理学》，王国维译丹麦海甫定著《心理学概论》等书。梁启超明确区别心理学与哲学的译名，将psychology译为心理学，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

19世纪初至40年代为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创立时期。蔡元培和陈大齐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者。蔡元培虽是清末翰林出身，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亲聆冯特讲授心理学课程，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支持陈大齐建立我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后又在中央研究院内建立我国第一个心理研究所，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扶植者，起了先驱作用。陈大齐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除在北大创建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自己编著的大学心理学教本——《心理学大纲》。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建立则是下面两个标志：一是1921年在南京成立中华心理学会，由张耀翔任会长；一是1922年在上海创办《心理》杂志。从20至40年代，西方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得到广泛传播；苏俄心理学，尤其是巴甫洛夫学说和实业心理学也有初步介绍。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生理心理、比较心理、普通心理、儿童心理、教育心理、变态心理与心理卫生、工业心理、心理测验、社会心理等领域，也开展了自己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时期。它又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学习改造阶段（1950～1956），初步繁荣阶段（1957～1965），停滞不前阶段（1966～1976），重新恢复阶段（1977～1980），稳定发展阶段（1981～现在）。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心理学都有很大发展。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克服了片面向苏俄或西方心理学学习的倾向，探索心理学中国化或本土化，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作出了贡献。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开展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在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教育心理、发

展心理、医学心理与心理卫生、生理心理、体育运动心理、工业心理、法制心理、学校管理心理、社会心理、心理测验等各分支领域都有丰富的实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心理学基本理论与历史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对西方心理学史和苏俄心理学史作了更系统深入的研究，创建了中国心理学史，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史的一项空白。理论心理学在发展，心理学的应用与普及也取得了可喜成绩。整个心理学都在蓬勃向前发展。

第一编　中国近代心理学

第一章　中国近代心理学启蒙时期

第一节　西方心理学思想的早期传入

公元16世纪，由于从欧洲绕过非洲或南美洲到达亚洲的新航路被发现，在西欧殖民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形势下，基督教于明代末期第三次传入中国（在唐代和元代曾传入过两次）。[①] 耶稣会（天主教反动的中心组织，1540年成立）[②] 派遣会士即传教士到远东中国来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带来中世纪封建教会的神学和经院哲学以及一些西方科学，这可说是中国正式接触“西学”的开始。但这种“西学”不是当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新兴的近代科学，而是中世纪的传统科学。有的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后，学会中文，著、译了不少关于神哲学的书籍，这类书中包含了一些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现将利玛窦（1552～1610）、艾儒略（1582～1649）和毕方济（1582～1649）等西方传教士用中文撰写或口授的有关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的书，择其具有代表性的三本：《西国记法》、《性学觕述》和《灵言蠡勺》，详述于后。

一、利玛窦的《西国记法》

1595年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中国江西南昌，用

① 侯外庐主编：《天主教传入的时代背景和耶稣会的作用》，载《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9页。

② 同上书，第1190页。

中文撰写和刊刻了一本西方的记忆方法，书名《西国记法》。他利用西方“记忆术”结合中国古代“六书”的识字特点，介绍怎样识记中国文字、数字和诗文的方法。这本《西国记法》可以说是中国心理学史上，西方心理学思想传入中国的最开端，并与中国心理学思想的初次相交和结合。

利玛窦号西泰、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1552年10月6日出生在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省马塞拉塔城，1561年入该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他16岁时，奉父命到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他在罗马入耶稣会后，即在耶稣会主办的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和一位数学家学习天算。后来，他自愿到远东传教。1578年3月24日从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东航，于同年9月13日到达印度的果阿，四年后到中国来传教。1582年8月，自果阿抵澳门，从此他便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教和生活了28年，足迹从澳门和肇庆到韶州、南昌和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他于1610年5月11日逝世于北京，葬在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①]

利玛窦是耶稣会在中国明代末期进行传教的创始人。他到中国不久，就改穿儒服戴儒冠，学习中国语言，钻研中国典籍，研究中国的宗教习俗。他广为结交中国人士，上自大学士、各部尚书，下至士大夫，其中最著名的有徐光启（1562～1633）和李之藻（1565～1630）等。利玛窦“感觉传道必须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附，信仰必定随

---

① 参考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参考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载《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第73页。

参考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6期，第25页。

之"[①]。因此，他力图把基督教的教理、教义和中国的儒家学说调和起来，进行所谓"合儒"、"补儒"和"超儒"的工作以便开展其传教活动，并且向中国介绍了科学技术知识，主要有西方天文学知识，包括"九重天学说"、"地圆学说"、"日体大于地、地体大于月"等说。此外，他还在各地制作过一些天文仪器，传播天文知识，并使西洋历法在清初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历算方法，成为中国历法计算的基础。由利玛窦向中国输入数学知识，影响最大的是他和徐光启合作首次翻译欧几里得著的《几何原理》；利玛窦的《同文算指》介绍了西方笔算，到今天还一直为我们所应用。利玛窦向中国输入西方地理知识，他曾向当时士大夫介绍西方实地测量经纬度、地名的译定、五大洲的概念、地带的分法等；他编制了中国的第一幅吸收欧洲地理学内容的较为完整的世界地图。西方美术绘画技术也是由利玛窦开始传入的，他带进来西洋圣像油画，并介绍对西洋绘画的透视原理。利玛窦还创造了罗马字注音，给中国音韵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②]还应特别提出的是利玛窦在记忆心理学方面，用中文撰写了《西国记法》，成为中国文字利用"集中识字法"教学的先声。利玛窦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欧洲；同时，他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如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儒家典籍，翻译介绍给西方欧洲人。他成为欧洲汉学的开山鼻祖，就此而言，利玛窦为中西方文化的初次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利玛窦晚年开始撰写他在中国传教的经过，即是后来成为《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著名文献。上面详细记载了他是怎样写出

---

① 冯承钧译：《利玛窦传》，载《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42页。

② 参考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载《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第74页。

《西国记法》这本书的。在1595年7～8月，利玛窦在江西南昌开辟传教活动时，当地许多居民和一些官员对他的广博学识，特别是他的非凡的记忆力，很是惊异。他采用了记忆的技巧和方法，使一些有学识的人非常感兴趣。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头几年的学习，就是不断地用力地把整卷的书都背下来。有几次他当众把很多中国字漫无次序地写下来，而他读上一两遍，再通过记忆就能惊人地背诵出来，更使人莫名其妙的是他可以马上又把整篇文字通过记忆倒背如流，这使在座的人越发惊骇，甚至目瞪口呆。于是大家渴望知道他是怎样做的，央求他把这种神奇记忆的秘诀教给他们。因此，利玛窦每天要接待很多来学习"就地记忆方法"[①]的"好奇者"，要求做他的学生。利玛窦说当时这种"记中国文字的就地记忆方法似乎成了一种正式新发明"，使他的名声大为远扬。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江西巡抚陆万垓那里。利玛窦受到巡抚的热情接见，并和他一起讨论这种记忆方法。巡抚要求利玛窦写出来，以教自己的子女学习。利玛窦立刻写了他用事物和地点作为提示训练记忆的方法，即《西国记法》一书，献给巡抚。后来，这本《西国记法》被流传下来。[②]

《西国记法》全书共35张，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明刊本徐汇书楼藏全书印片35张。[③]现该书载于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天主教东传文献》(1965年）中。此书在正文页首处标明泰西利玛窦诠著、晋绛（今山西绛县）朱鼎澣参定，并在书之首页及终页注明"遵教规凡译经典诸书必三次看详方允付梓"，由"耶稣会中同

---

① 即"地点法"。

②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7、198、295、299、305页。

③ 徐宗泽：《记法》，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208页。

学高一志、毕方济共订，值会阳玛诺准"。书中有朱鼎澣的"记法序"，上面说"今天下无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外父徐方牧有藏先生墓中志云，先生于六经一过，能纵横颠倒背诵，澣未尝洒然异之。外父曰夫有以授之也，其书久在则圣高先生笥中，然出利先生偶然草创，未易了了，高先生再为删润之……"[①]如此看来，1595年利玛窦在南昌撰写的《西国记法》当时即印行，这次再印此"书刊于利子故世后（1610年以后）惜无刊印年月"[②]。现经初步考证，该刊本可能约在1624或1628～1640年间刊印。该书修订者高一志（1566～1640），意大利人，1605年到中国南京传教，初名王丰肃，字一元、泰稳。他精研中国语言文字，撰作很多，颇为中国文士所叹赏。1617年由于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不喜基督教，曾将其逐离南京，后至1624年始重入中国，乃遣至山西绛州（今绛县）传教，始改名高一志，字则圣，一直到1640年（1644年明亡前4年）殁于绛州。[③]又该书另一修订者毕方济（1582～1649），意大利人，1613年入华，他于1628年曾被派往过山西。[④]可能二人有共订该书的机会。另外，阳玛诺（1574～1659），葡萄牙人，1610年入华，1623年被任命为中国教区副区长，才能有权批准付梓。[⑤]故推测《西国记法》可能约在1624或1628～1640年间刊印。

《西国记法》的中心内容是论述人的记忆功能，介绍增强记忆

① 利玛窦：《西国记法》，载《天主教东传文献》，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3～5页。

② 徐宗泽：《记法》，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208页。

③ 冯承钧译：《高一志传》，载《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03、104、107、108页。

④ 冯承钧译：《毕方济传》，载《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4页。

⑤ 冯承钧译：《阳玛诺传》，载《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27页。

的方法。全书 70 页，分为六篇：

原本篇第一（1～16 页），主要讲述记识及其与脑的关系。指出人的记识能力是造物主所赋予神魂的功能，记识的对象是万物，记识的结果是有条理的，记含的地方在脑囊。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脑的不同，记识效果也不同。讲述了天赋气质、记识时间、生活环境、破头伤脑等对记识效果的影响及保持记识的方法。

明用篇第二（17～21 页），讲述如何利用事物图像和地点提示的记忆方法，即名为“象记法”或“心记法”（现称地点法或轨迹法）。介绍地点法的由来及其用法。

设位篇第三（21～28 页），讲述如何在想像中建立事物图像的处所或地方。

立象篇第四（29～45 页），讲述利用中国古代“六书”特点对汉字构造成象的方法和利用各种联想的方法以达到易记不忘的效果。

定识篇第五（45～61 页），讲述记识不同对象（数字、章句、诗文、书札、典故等），尽量把记识的对象联系成整体，要“融会意旨”来记。

广资篇第六（61～70 页），选择一些汉字为例，加以分析讲解，使学者取而推广，熟悉这种记忆方法。

现将《西国记法》的内容与涉及的主要心理学思想分述如下：

第一，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首先介绍了脑的记忆作用，描述了记忆的生理基础。他说“记含有所在脑囊，颅囟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并形容“人追忆所记之事骤不可得，其手不觉搔脑后，若索物令之出者，虽儿童亦如是。或人脑后有患多遗忘”。他的这种观察在现代生理心理学上已有动物实验研究，认为枕叶皮层的毁伤会使已习得的能力丧失，说明枕叶皮层和保持的机能有密切的关系。

利玛窦认为“记识必自耳目口鼻四体而入，当其入也，物必有物之象，事必有事之象，均似以印印脑”。他把事物由五官进入脑的图像比为如印章盖印在脑上，但必须“其脑刚柔得宜，丰润完足，则受印深而明，藏象多而久，其脑反是者，其记亦反是”。因此，他又从脑的发育成熟的不同阶段描述了脑有软硬湿干的不同，而使记忆的痕迹深浅有所差异，则记忆效果也不同。如“幼稚，其大脑大柔，譬若水印之无迹，故难记”。“成童，其脑稍刚，譬若泥印之，虽有迹不能长存，故易记而亦易忘。”“壮年，其脑克实，不刚不柔，譬若褚帛印之，易而迹完，其故易记而难忘。”“衰老，其脑干硬大刚，譬若金石印之，难入，入亦不深，故难记，即强记亦易忘”，“犹图画在壁，其色久而开脱不能完固”，或“少壮难于记忆者，若镌金石，入虽难而久不灭，故记之难，忘之亦不易”。以上这些看法，虽然缺乏科学性，但他的这些具体描述，在当时中国，还是前所未闻的事。

利玛窦还谈到“人赋质不齐”也影响记识效果。他认为因人的天赋气质有清、浊和轻、重的不同，故有善记和善忘之分。如“赋其清而轻者，其人多聪明睿哲，故善记”，“赋其浊而重者，其人多昏蒙卤钝，故善忘”，“赋其清而重者其人多敏达而端严凝固，亦善记”，“赋其浊而轻者，其人多谲诈而浮躁薄劣，亦善记”。同时，他还提出“人能审其所赋之偏，加修摄涵养，则可造于中正而不为方隅所拘”。这是利玛窦根据中国宋代理学家二程和朱熹的“气质之性说”而来的，认为气禀清浊偏正不同，形成人的贤愚柔缓刚急的差异，并且经过学习教育可以使气质变化，有所改正。

利玛窦还叙述了影响脑的记识效果的因素。有关记识时间，他说“人晨旦记识最易者其脑清也”。有关情绪影响，如“应接烦扰或心神劳瘁皆能致脑干不易记”。环境影响，如“邪寒酷炎冷热过宜”。饮食的影响，如“醉饱过度”、“食物难消者（坚韧、油腻、

果实不熟）凡浮涨之物”，“俱能混浊调脑之气，滞塞通脑之脉，故难记易忘”。此“坏脑之故”必须设法加以调正适宜。另外破头伤脑（石击、坠楼、因病等）对记识也有影响。

关于保持记识效果问题，他提出了“养记之法，大略时习而日用之，庶免生疏，但须先其难者，后其易者”。这是符合遗忘规律的，存储的信息由于不使用而随时间的推移逐渐衰退而遗忘，必须及时复习，要“时习而日用之”才能巩固。

第二，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介绍了西方古代的一种记忆术，他称“象记法”或“心记法”，后来称之“地点法”，现在也称“轨迹法”。利玛窦讲述了这种方法的由来，起源于古希腊诗人西末尼德。他说，“古西诗伯西末尼德与亲友聚饮一室，宾主甚众，忽出户外，其堂随为迅风摧崩，饮众悉压而死，其尸齑粉，家人莫能辨识，西末尼德因忆亲友坐次行列，乃一一记而别之”。诗人的这种回忆过程就是运用“象记法”的最早创始，由此，一直流传于后世。

这种记忆方法的原理是利用熟知的地理环境、地点、建筑物的外形或位置等，按顺序在脑中留有深刻印象，把这些已知的地点作为“线索”，然后把所要记住的各项目，按顺序“放置”在已熟悉的地点上，并以丰富的想像力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生动的联想，立即在脑中描绘出一幅幅图画。也许有些联想并不合乎逻辑，甚至荒诞可笑，但这类图像确能加深印象，增强记忆，当新项目（即学习的新内容）按序列呈现时，将它们按顺序与“线索”组成一对一的联系。可利用熟悉的地点“线索”，在回忆时，立即浮现出脑中的图像。也就是当你在脑中“漫步”经过这些地点时，就会出现那一幅幅有趣的图画，“线索”起提示作用，有效地帮助提

示回忆，从而正确地按顺序回忆起要记住的内容。[①]

利玛窦运用“象记法”举例说明如何识记汉字：武、要、利、好四个字。他说：“乃默置一室，室有四隅，为安顿之所。却以东南隅为第一所，东北隅为第二所，西北隅为第三所，西南隅为第四所。即以武字，取勇士戎服，执戈欲斗，而一人扼腕以止之之象，合为武字，安顿于东南隅。以要字，取西夏回回女子之象，合为要字，安顿于东北隅。以利字，取一农夫执镰刀向田间割禾之象，合为利字，安顿西北隅。以好字，取一丫髻女子抱一婴儿戏耍之象，合为好字，安顿西南隅。四字既安顿四所，后欲记忆则默念其室及各隅而寻之，自得其象，因象而忆其字矣。此盖心记法之大都也。”

利玛窦识记这四个字时，就是将每个字想像为一幅图画，并在脑中按序排列成行。再利用他事先安排好的熟悉地点（即一室有四个方位的角落），在脑中沿着浮现的每个方位室角的顺序来“安放”每个字想像的图像。也就是在脑中“漫步”经过这室角时，如在东南第一角、东北第二角……等方位地点上，就想像出一幅画面。这种将字转化为图像的想像技术，使利玛窦从头至尾（或反之）准确地回忆出这四个毫无意义联系的字。

利玛窦认为“象记法”适用于识记无意义的事物，他说“凡用寻常学问，不可概用此法”，“惟切要事宜初无意义可据者，如姓名、爵里之类或暂记以便笔注，或强记以备应对，乃用此法，庶为便当”。

“象记法”的优点，利玛窦认为，“象记者，其象含意浩博，不只一端。其处错综联络，纲举条贯，初则似苦于繁难，不知安顿

① 取自吴振云：《“轨迹法”用于认知心理学研究》，载《心理学动态》1989年第1期，第10页。

得法，井井不混，且取象既真，则记含益坚，布景既熟，则寻索亦易。是以初记似难而追忆则易”。他将此比喻如“负重物用力必艰，若载物于车，引之而行，不因车之益繁而加重，只觉力省而运捷，益有所赖也”。

第三，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专篇讲述关于“象记法”的“设位”问题。他说“凡记法，须预定处所，以安顿所记之象”。他提出处所分大、中、小三等，大者“广宇大第若公府、若皇宫、若寺观、若邸居、若舍馆，自数区至数十百区”。中者“一堂、一轩、一斋、一室”，小者“室之一隅或一神龛或仓柜、座榻”。他还提出“其处所又有实、有虚、有半实半虚”，“实则身目亲习，虚则心念所假设”，半实半虚即实虚兼有。他要求“着意想像，俾其规模境界，罗列目前，而晋识胸中”。“处所既定，爰自入门为始，循右而行，如临书然，通前达后，鱼贯鳞次，罗列胸中，以待记安顿诸象也”，“序成行列，编成字号。如每至十所立一号，记一十字，总记几十几号以便查考，以便联络应用，庶免紊乱”。利玛窦充分地利用想像，把人脑对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新形象，使人对物体或地方的表象具有很鲜明的形象性，好像从内心里面“看”到了这些形象和在脑中顺序“漫步”于设立的处所或位置。他还生动地比喻处所如漆板，说“夫安象于处所，犹书字于漆板，其字有时洗去，而漆板用之无穷，故处所非象可比，最宜坚固稳妥，然后利终身之用”。他所说的“漆板”就是熟知的地理环境、地点、位置等，记得要牢固可以多次使用，用它以起回忆时记住内容的“线索”作用。

利玛窦对设立处所应注意的事项，“有相宜及当忌者十三款”，简括为：

1. 宜舒广，便于“安置大象”，“宜取其盈满而无余隙”。

2. 宜闲静，“凡众聚广会之所，系多来往者，概不可用”。

3. 宜整饬，勿起厌心，“务以开朗心胸，使易记存”。

4. 宜光明，“盖幽隐暗昧之所，临用索象，多迷失不获”，“须明而不露，密而不昏”。

5. 宜贵美，“颜色鲜奇，金彩灿灼者用之为妙”。

6. 宜洁垲，“凡污秽溷浊，湫湿畜水者皆不用”。

7. 宜覆盖，“若敞露无蔽，恐为雨露浸损其象”。

8. 宜平坦，“凡身所易到之处，象亦易取”。

9. 宜定守，“凡各处所要安一物象，永远守定不更移易，用此作号，庶免淆乱”。

10. 宜匀适，“凡布置处所不宜太远”，“不宜太近”，“亦不宜忽低忽高、忽平忽深”。

11. 宜镇定，“安置既定，再不可迁徙别处”。

12. 宜平稳，“凡定处置器皆要方棱平底，取其稳定以便置象”，“若形圆活转……皆不用”。

13. 宜奇异相别，“凡处所相同，则易混，必虚加藻绘，分采异饰，或定置器物以别之”。

从以上可看出利玛窦对“象记法”的“设位”问题，考虑周详，想像丰富，运用也很灵活多样。

第四，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结合中国古代“六书”的识字特点等，介绍了“立象”的方法。利玛窦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对中国古代“六书”很有研究。他说：“盖闻中国文字祖于六书，古之六书以象形为首，其次指事、次会意、次谐声、次假借、终以转注。”中国的文字主要是汉字，它是由一些笔画构成的方块图形，是一种表意性质的音节文字。中国古代六书是中国古人总结出来的汉字的造字和用字的六种方法（见于许慎著《说文解字》等书）：

一是象形，用物体的形象表示物体的名称，如古文日、月。

二是指事，用指示性的符号来表示比较抽象的概念，如古文字中，“上”字是一画之上加一短画以表示在上的方位；“下”字是一画之下加一短画以表示在下的方位。

三是会意，把表示两类事物的两个字组合起来，共同表示一个意义，如“武”用武力止息干戈，保卫和平；又如“信”，从人从言，表示人心以诚信为贵。

四是形声，拿一个表示有关事物的字来说明字的意义范畴，另取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比喻新字的声音，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新字，前者叫意符，后者叫声符，如江、河。

以上四种方法都是就文字结构分析的。

五是假借，在语言中的一个词，本来没有字，依靠一个同音字来寄托这个词的意义，即用一个现成的字表示另一个词，如“令”原是“号令”，后借用“县令”；又如“长”字原是“长久”，后借用为“县长”。

六是转注，同属一个部首，在读音上有联系、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字，如老、考。

这后两种方法是就字与字在使用中的关系分析的。①

这六种方法也是中国古代用以教儿童或初学者的识字法。象形，便是从字的形状去认知其意义的。指事，便是从字的象征去认知其意义的。会意，便是从字的构成去认知其意义的。形声，便是从字的形和声两方面认知其意义的。假借，便是从字的声音去认知其意义的。转注，便是从同类同属的字去认知其意义的。②这也是中国古代根据汉字特点的识字教学心理学思想。

---

① 河北师范学院《语文知识词典》编写组：《语文知识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524、433、446、170、544、177页。

② 潘菽著：《说六书非造字法而是识字法》，载《学识杂志》1947年第1卷第7期，第23～25页。

利玛窦结合中国古代“六书”的识字方法，识记当时所常见的汉字。他以汉字某些象形结构，汉字的偏旁、部首等各组成部分，意义联系，字声同音等方法来“立象”。他说“今之字，由大篆而小篆，小篆而隶，隶而楷，且杂以俗书，去古愈远”，故“兹法取象，以时尚习见之字为本，特略及古书耳”。他认为“凡字实有其形者，则象以实有之物”，“其物之象而记之，系本象”，“无实物者可借象，可作象，亦以虚象记实字，盖用象乃助记，使易而不忘”。利玛窦举例说明：

1. 本象：如“日、月、星斗、山川、冈阜、花果、草木、禽兽、昆虫、宫室、器用、衣服、饮食等字均系实有形体之物，即其物之象而记之系本象，犹所谓象形者也”。

2. 作象：(1)“如本末二字，皆以大木一枝，直立。有一人缘其根而坐，则为本之象。缘其颠而压，则为末之象，是系作象，犹所谓指事者也”。

(2)“如明字以日月并耀，如众字以三人同居，如闻字以大耳悬门中，如见字以支目竖生额上，炯彪四望，如拜字两手齐下，着地恭敬作礼，亦系作象，犹所谓会意者也”。

3. 借象：(1)“如苟字以狗。醇字以鹑。取其同音，以记实象。是系借象，犹所谓假借、谐声之义也”。

(2)“如吏字以一巾衫人，怀挟文卷。如兵字以一甲胄人，起午军械。斯盖用事而会意，因意而成字，犹六书之所谓转注而已”。又“如焉字、犹字皆鸟兽之名，今人多不识其形状，若记焉字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记犹以虏酋牵犬，其余形体之物未曾见者，诸如是推之”。

第五，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广泛利用表象和联想帮助识记文字、数目、章句、诗文等具体方法。关于联想方法如他所说：“因实记虚，或体用相因，或源流相求，或假人而为用，或取

错综而起义，或取譬况以成奇。”具体方法举例：

1. “活象为妙故用人居多”，如记金鼓旗帜以将帅，记甲胄干戈弓矢白刃以士卒，记珠冠金凤翠钿霞披以命妇。

2. “实之实者”，记谷以仓，记酒以樽，记金以囊，记钱以扑满。

3. “以艺业与其器具互相成实者”，记农以耜以耒，记匠以斧以锯，记陶以范以模，记书生以笔墨。

4. “借人之实而记事之虚”，记德则以有德之人，记富则以聚财之人，记善则以乐善好施之人，记走则以健步之人。

5. “因体而识用者”，记视以目，记听以耳，记喜怒以颜，记燃以炬，记焚以薪，记吹以笙簧，记弹以琴阮。

6. “因用而识体者”，记目以采色，记耳以管弦，记鼻以珍香，记口以甘脆，记灯烛以光明，记父以立庭训子，记子以恭愉侍养。

7. “溯流穷源因源求委者”，记雪雨以云，记江湖河泽以泉，云泉其源也。记动以风，风其本也。记果核笋乾以茂林修竹，记谷种以嘉禾，林竹嘉禾其委也。记撮土以大地，记勺水以沧海，以其流放之极也。

8. “因人而借用者”，记官名如尚书、侍郎、都御史、都督、布政司、按察史、留守都指挥，则以所知某人曾登是职。记地名，如府、州、县、驿，则以所知某人，曾任知府、知州、知县、驿丞。记姓氏则以习知之人，而人之姓名字号，皆可取其一字或二字记之为象。

9. “取错综对待以用之”，记父以子，记子以父。记祖以孙，记孙以祖。记师长以弟子，记弟子以师长。如求其异，则记长以短，记大以小，记纤以巨，记寡以多，记妍以媸，记恶以善。

10. “取世之譬况而用之者”，记君以龙，记宰相以鼎鼐，记将士以虎豹熊羆，记父以椿，记母以萱，记夫妇以鸳鸯、以连理

枝。

利玛窦利用对事物间的相似、相近和相反等联系规律结合中国实例，总结了各种各样的灵活生动的联系方法，对他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

关于成象的方法，如利玛窦所说："因实具之物，兼形质以成象，或叠本象以成象，或合数象以成象，或象意而成象。复有难于作象，乃因有形之物，稍损益之以成其象，则知天下无不可象之之字，亦在乎善权巧变也欤。"其具体方法举例说明：

1. "以一物兼形质而成象者"，如玉册为珊，玉豕为琢，犬骨为猾等，册、豕、犬形也，玉、骨质也。又如老女为姥，少女为妙，斗米为料，色丝为绝，舟方为舫等，老、少、斗、方形也，女、米、丝、舟质也。

2. "以重叠本象而成象者"，如两木成林，重山为出，并月为朋，三木为森，三口为品，三耳为聶，三日为晶，三女为姦等等。

3. "合数象而成一象者"，如人犬为伏，人牛为件，鱼羊为鲜，木帛为棉，口耳系为缉，竹门日为简等等。

4. "参象以意而成象者"，如记休以人倚木立，记辇以二夫挽车，记翔以羊生羽，记雷以方田受雨，记解以牛角挂刀，记闯以马立门中等等。

5. "以形与意损益本体而成象者"，如午字牛断其角，亚字恶人割去其心等。

6. "取两象之音韵合为一字之翻（反）切"，此法"乃以两象为一体，取其前半为音，后半为韵，以翻（反）切字法，区而识之，如人首兽身，或虫首禽身，或人与禽兽昆虫，凡一切动植有形物类，交互其体，而各半之，前段之象出切，后段之象行韵，依法翻（反）切成字，记其象则忆其切，忆其切则忆其字矣"。如人羊切攘，鹅龟切巍等。

7. “以人之活象为上，其余物之死象为次，故字字必求死活二象，咸备目中，以应其用”，如记裘，先从所知姓裘之人为活，继以毛裘为死。记算，先以所知善算历法之人为活，继以算盘为死。记剑，先以所知之人好舞剑者为活，继以宝剑出匣为死。

8. “记数目先立活象次立死象”，如记一至十，或百、千、万；以先知行一之人，余类推。或以所知某百户为百，某千户为千，某万户为万，或以所知姓万之人，此为活象之例。记一，以横栓、铁棍、长矛记；记二，以象牙、牛角记；记三，以三眼神枪、鼎足记；记四，以农家四股获叉、方棱记；记五，以掌开五指或五峰笔架；记六，以六合圆帽记；记七，以瑶琴七弦；记八，以鹿角八叉；记九，以斑箫九节；记十，以十字木架。此为死象之例。

记数字于一处，则以字象及意象融化为一，如记十一，则以一人行十者，右手执长戈以象之；又如记三十四，则以一人行十者，左手持三眼神枪，右手持农家四股获叉以象之。

记章句、诗文、书札、典故则可依此类推，一如是例。

利玛窦在《西国记法》的最后一篇中，概括地总结为“作象以人为活、为体；以物为死、为用”的原则，并把“天文、地理、时令、干支、人事、器物等类，标列百数十字以为程式，其用事用意，虚实死活，因可概见，学者取而推广焉，或可为心机之一助”。

利玛窦运用了西方古老的记忆术——象记法和中国古代六书的识字法巧妙地结合起来，可以省力而快速地记住中国的汉字，这在四百多年前确是一大“新发明”。这本《西国记法》在当时虽然轰动一时，但后来却流传不广，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上未见有何影响。直至近年来，中国心理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时，才重新发掘了这本《西国记法》，发现这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方心理学思想并且与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相结合。

这在中国心理学史上是很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件事。

二、艾儒略的《性学觕述》

1623年（明天启甲子仲春）[①]，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用中文撰写《性学觕述》一书。他采取问答和论辩的写法，“此书可谓心理学常识”[②]，还有人认为“是编盖为西方最初输入之心理学”[③]。

艾儒略字思及，1582年生于布里西亚，长于威尼斯。1600年入耶稣会，肄习哲学，教授文学二年，晋为司铎。1609年派赴远东，1610年抵澳门，曾在此教授数学二年，并为修士教习三年。1613年初派至北京，不久偕徐光启赴上海，后奉命至扬州为明代某一大官讲授西学。此大官至陕西任要职时，艾儒略随同居陕，提出试种葡萄成功（酿成葡萄酒，为诵弥撒用）。后赴山西传教未久，1620年赴杭州传教，与当时李之藻等进士常交往，《性学觕述》可能在此时期写成。1623年赴常熟开教，1625年赴福州，为福建开教之第一人，1634年赴泉州、兴化两地传教。1641～1648年任中国教区副区长，在位7年。并前后历任各驻所之道长共23年。1647～1648年间，因清军入关，避至延平僻处山中，艾儒略仍编撰书籍和布道。他是继利玛窦之后，精通儒家经典、熟悉中国风情的耶稣会士之一，有著作三十余种，被认为“贤明温厚”、“语言辩捷”，有“西来孔子”之称。他接见宾客或教徒时，常衣礼服。1649

---

① 此按艾儒略《性学觕述》自序的撰写日期。现经换算1624年为明天启四年甲子仲春。

② 徐宗泽：《性学觕述》，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210页。

③ 王云五主持：《性学觕述》8卷，载《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十一子部第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514页。

年殁于延平，墓葬于福州北门外十字山。[1]

《性学觕述》有1623年杭州刻本，1646年（清顺治三年）刊印本，后来又再版多次，如现有1873年上海慈母堂重刊本；1922年由江苏主教姚重准本和1935年上海主教惠重准本，均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行。该书有艾儒略的自序，开头即说“宇宙受造之物，畸莫畸于人性，廓莫廓于人性”，并认为“性学为天学和人学之总”，引用西方古代著名教父哲学家奥斯定（今译奥古斯丁，354～430）的话：“欲格物者，其要端有二：一为人性之论，一为造物主之论。瞩人性者，俾人认己；瞩造物主者，俾人认己之原始要终。一为性学，一为超性之学。一令人窥见真福，一令人实获真福也。”这就是说论人性的是使人认识自己的学问，称为性学；论造物主的是使人“知己之灵性有由来”的学问，称为超性之学。这也就是耶稣会的观点，认为“科学是所谓性学，性学不能认识宇宙人生的‘本体’，而要认识宇宙人生的‘本体’就必须上升到超性学也就是神学”，必须“由因性以达夫超性”。[2]明确地说即是先通过对性学的阐述，而达到宗教信仰（相信只有天主既是起源又是归宿，灵魂得救，死后到天堂享福）的目的。这也就是艾儒略撰写《性学觕述》的意图，完全为宗教服务的。

在他的自序最后提到“性学深渊广博”是不能详细包括全部内容的，故他称之“觕（粗）述”，也就是“略谈”或“浅说”之意。

《性学觕述》全书8卷，共167页。各卷目录如下：

卷之一：生觉灵三魂总论，魂性诸称异同，灵性必有，灵

① 冯承钧译：《艾儒略传》，载《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52～156页。

② 侯外庐主编：《天主教神学和正统经院哲学的传入》，载《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3页。

性非气，人惟一魂，人物不共一性，人性非造物主之分体，灵性非由天地非由父母所赋，灵性非由外来非由内出，灵性为造物主化生赋畀。

卷之二：灵魂为神与形躯判然为二，灵性身后永在不灭，灵魂不灭善恶同然，灵魂离身自有明觉以受苦乐，灵魂身后不轮回人世。

卷之三：约论生长，论四液。

卷之四：总论知觉外官，目之官，耳之官，鼻之官，口之官，触之官。

卷之五：总论知觉内职，论总知之职，论受相之职，论分别之职，论涉记之职。

卷之六：辨觉性灵性，论嗜欲与爱欲，论运动。

卷之七：记心法，记心辨，论寤寐，论梦，破梦。

卷之八：论嘘吸，论寿夭，论老稚，论生死附诸情论。

《性学觕述》完全出自西方中世纪神学和封建经院哲学的体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把天地万物归之于造物主的创造和主宰，将神秘全能的造物主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归宿。但在这些神学的说教和唯心主义理论之外，其中也含有一些反映现实，具有唯物主义的成分。现将书中内容归纳出几点主要心理学思想分述如下：

（一）对灵魂的看法

艾儒略认为灵魂也称灵性，“西土谓之亚尼玛（Anima）”，“即属活物之性也”。“总归三种：一乃草木花果，各有生死枯荣，四行金石之所绝无者；一乃禽兽虫鱼，生长之外，复有触觉运动之能，又草木所绝无者；一乃吾人，既有生长知觉，复有明理推论之能，为禽兽所绝无者，故魂之所属，分三种焉：一曰生魂，一曰觉魂，一曰灵魂也。”魂分此三等，“盖魂有上下之分，上者能

兼下，下者不能兼上。灵尊于觉，觉贵于生，故灵必有觉，觉必有生，而生未必觉，觉未必灵也”。“故生魂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觉魂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若人则以灵魂为主，而生觉诸能，咸其供役之具，故明达知觉生活，兼而有之，以成其本性也。”“人之灵性随其人之生时，造物主一一化成而赋之也。”艾儒略的生觉灵三魂说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三级灵魂论”。亚里士多德“把生物的灵魂分为三等：植物只有滋长的灵魂，动物有感性的灵魂，人则有理性的灵魂；从植物到人，灵魂的等级越来越高，高级灵魂包括低级灵魂的功能。这三级灵魂从世界开始就有的，这是世界的组织，并不意味着生物在时间上的进化”[①]。显然，这里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唯心主义的因素和冠以“造物主所赋之”，沿袭了托马斯·阿奎那（1227～1274）的思想体系，以达到为其宗教服务的目的。其中也保留了亚里士多德的接近唯物主义的因素，并以当时对生物观察的认识加以解释，从中看出一些心理现象的描述，虽然不是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明人与禽兽的区别，但可看出“人为万物之灵”，突出人为贵的思想。

关于灵魂与身体的关系问题，即神形关系问题，艾儒略在书中卷二有专门论述。他认为灵魂与身体“判然为二”，人的灵魂为造物主所赋予的所谓“无形神体”不与肉躯同者，他说“按格物之学，与诸前圣所论凡九端”：

（1）人的灵魂能“明悟通达”。“禽兽虽有觉魂，仅能触觉有声、有色、有香、有味、有形之物，必不能通于无形之道德义理。”惟独人的灵魂自有神体，超出诸形者始能通达有形无形之物。

① 唐钺著：《亚里士多德》，载《西方心理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2）人的灵魂能“追远穷究”。因“涉形之魂，仅能知觉眉睫粗浅之事，如起居食息等”，独人之灵乃能若是。

（3）“灵魂与身体不同消长”。如少壮之人身虽强健而道德灵明多觉昏懦；到老血气虽衰而德弥高透。

（4）“灵魂肉躯情向相背”。“灵性为用，不惟不与肉身同好恶，且恒有相反之情以御之”，人能“以道驭情，力能控制”。

（5）“灵魂容量无界”。“凡有形体能知觉者，各有定分之界，过分则伤”。如“耳听以声，声太震，耳不胜听，则逾其听界而耳伤”。“灵魂不然，其界无限，愈受而愈适其用，愈适用而愈全体也”。“若灵性则以记含、明悟、爱欲为本用也，愈求愈精，愈多愈妙，不知其尽”。这也是来自奥古斯丁的思想，认为“灵魂具有记忆、理智、意志三种功能，贯穿于一切心理活动之中”。①

（6）“灵魂备有反照之能”。如灵魂“主目之视，而又能达目视之故；主耳之听而又能达耳听之故；推之百体，莫不皆然，且自能明悟爱欲，而又自反其明悟爱欲之所以然”。

（7）“灵魂能察五官迷谬”。如直木在池，其形大小曲直无常，若自目力窥之，将谓木形本然，惟以灵明断之，乃由于池水荡漾而然，非木本形。

（8）“灵魂有憬然悔悟之德”。“人虽有过，能追悟省悔”。

（9）“人之才能，不定于一”。如“蚕之吐丝、蜂之酿蜜、鹊之成巢、蛛之结网也各适其一定之性，未有同类而不同能者，亦未有异类而彼此可以互通其能者。人则不然，国异政、家殊俗，人人自具一能，各营一业，千不同情，万不同好，又俱能相通而相仿效之”。

---

① 唐钺著：《最有影响的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载《西方心理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 页。

艾儒略描述了灵魂的各种功能，但均为证明灵魂是“无形神体”，灵魂于“形体（肉躯）之中，为之主宰，俾生长运动而能言语应诸事也”。此二者关系，“姑以操舟长年者喻之：舟与人虽并载各自一体，及既抵岸，其人登陆而归，而舟不能移也，一灵为主，百体从令，亦略相似也”。“百体者，灵魂之器具也。”这也正是基督教神学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的思想，认为灵魂是生活的动力，是身体的功能；另方面又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工具，灵魂能推动身体发展，灵魂又好像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东西。①艾儒略说：“人之灵魂由天主特赋，另具一体，是为自立之物，非从肉躯而发，非赖肉躯而存”，“灵魂身后永在不灭”。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宗教思想。

（二）对知觉的看法

《性学觕述》有专门两卷论述知觉问题。认为“知觉之性，人物所同，其能有四：一为生长，以养育成就其体者也；二为触觉，觉诸有形之物，而分别其違顺者也；三为嗜欲，爱憎也；四为运动，趋避也。此四者，人与禽兽不甚相远，禽兽第无灵明之一端耳”。艾儒略进而详述知觉之能又分三者：外觉、内觉、发用。外者有五官：目、耳、鼻、口、体；内者有四司（职）：总知（又称公觉）、受相、分别、涉记；至其发而为用，则另有二职：嗜欲、运动。他还将整个知觉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国家，他说“觉体如一国然，有郡国外吏，以遍理天下，又有京师百司，将外事居中酌处，然后内外纲纪，绳井联贯而无滞。人身外备五官随遇而觉，美恶俱受，无所拣择，又内备四司，取五官所进，而区别安置之”。“外五官者，感万象而受之于内，如一城之有五门然；内四司者收

① 唐钺著：《亚里士多德》，载《西方心理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五官所入而观察焉，以定其取舍，如诸司列署，有分职然，合此五官四司共成一觉性。”

1. 对外五官的主要描述

（1）目之官：认为“目为五官之尊，以视为职，其德在明，其色为光”。产生视觉是因“物有形者，皆发本形之象，直射于满空而接于吾目，故其象到眼即见”，如“试观照镜，以己之容发至镜面，镜为坚光之体，既受此象返以所受复映到目，目斯见焉”。“眼见之物象，必须直路而行”，物象“适于透明之体，方能至目”、“能透光，即不碍视”。还对视觉器官有所描述，认为“其视之具有三：目之前后上下，有薄膜层层，包护眸子，如城郭然；脑内有二筋通目，而授知觉之气，与其能视之力；其瞳清如水晶，不染一色，故能照辨万色”。

（2）耳之官：认为耳之闻，“音声是也。此声不寓于出声者，而寓在气中或在水中，而气与水将音到耳；然须有三者，音方可成。譬之于钟，先有撞者为楹（柱子），受撞者为钟，受音者为气，在楹钟之间，楹与钟触击，气必迫出而成音。成音之后，晕开渐大，犹水为物之所动而波纹渐开，愈开愈宽也。声音随晕入人耳内，因有听闻”。基本上说明了产生声音是由声源振动（撞钟），在它周围的介质中（气或水）产生的声波的道理，“音声则非形象，借气以运”，“晕气（即声波）为听之由也”。对耳的结构和机能也有粗略的描述，如“闻之具，人脑中有二细筋，以通觉气至耳；耳内有一小孔，孔口有薄皮，稍如鼓面，上有最小活动骨捶，音声感之，此骨即动，气急来则急动，缓来则缓动，如通报者然。耳外之轮，向前而兜，其故有二：一则音声之来，以耳轮留而驻之，不使经过；一则音声或急，一时骤难直入，必外面层层阻当，以徐其气，可令缓缓而纳，不坏内具”。“又耳有一孔应喉，故喉内之声，亦可以听，以喉通于耳也。”（可能是现在称之耳咽管）

（3）鼻之官：认为"鼻司嗅，受物之臭味，以分其美恶……臭多出于燥与热之所结"，"有香之气，晕开以至于鼻：盖有香之物，自发其气，腾出于本体之外也。然多出热气之所逼，时遇寒冻，香气浸微，若近火焚或遇热气，其香更出"。说明温度与嗅觉感受有关。嗅觉器官"有二细筋之管，以脑至鼻，其筋末有嫩肉，如乳头而多窍"。"嗅之力，备在脑内之前，以二细管带觉气而受物之臭以辨之。"还说"鼻本不为嗅之具而为嗅具之门户，所以护具，而加美于容貌也"。

（4）口之官：认为"口司啖（吃），啖之界味也"。"味类有六焉：顺者甘也，逆者苦也，违顺之间辣也、酸也、涩也、咸也。六种之内，有相和之味如酱，六种之外又有腻味如乳"。还说"味觉必实受物体而后觉焉，故啖之由在于舌，舌柔而多窍，湿而无味，柔而多窍者，便于展转吞咽，又便于掉运，分别诸味也"。至于味觉器官"必须多湿，无湿不滑，不可以啖"、"舌中有多细筋，总会于两筋管，自舌通至脑中公觉之所，是为啖具"。此外，还认为"言口之司，只论啖味，不及语言，因语言之发，以定趋避乃灵明所用以接于外，便于人我之相通，而为耳听之界，非另为一觉也"。

（5）触之官：认为"五官之中，触为至粗，却为至要，觉物者所不能无也"。触觉的用处"虽为粗贱，然于生命最切"。"触觉之用，遍身有之，其触之界，本在寒热燥湿，次乃四者所成者，刚柔滑滞，粗细轻重，长短厚薄之类也。其触之由，则为一身之皮肤。其触之具，则在于肉躯内无算（无数）之筋络，自脑中遍通一身者。而其触之能觉者，赖此无算细筋所通之皮肉；若无皮肉则亦不能触觉"。还提到"触觉为用，人类最精"，"其触觉愈精细，其才能亦愈秀颖"。关于其他觉能，独擅之精者，禽兽反有愈于人者，如鹰之视、犬之鼻。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艾儒略对外五官的描述中，虽然很不科学，但已具有极初步的物理光学和声学知识，解释：视觉是由于光线的结果，以照镜比喻视觉是物体形象的反映；听觉是由于物体振动的声波所产生，并有极粗浅的脑神经生理学的知识和加以推想来描述眼睛、耳朵等的构造和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脑的通路；触觉是由外界物体接触皮肤而引起等等。他对不同感觉通路的相互作用也有所注意，如“问看书默诵与口诵熟愈？曰：默诵止目一路而入，口诵则由目、耳、口三路而纳，是故默看易忘而口诵易记”。对此现在已有心理实验的证实。

2. 对内四司（职）的主要描述

（1）总知，也称公觉。“在脑，为五官之根原，由细细筋管传觉气于五官，又由此细管复纳五官所受之物象而总知之。”并认为“脑自额至脑后，顺次分为四穴，有如四藏，总知在最前近额，密迩五官，以便接受诸官之象。此藏之体，湿而嫩，略如骨髓而物象从此印焉”。总知取五官各自所得加以综合，如“目止能觉乳之白，不知其白中有甘，口能觉乳之甘，不知甘中有白，鼻、耳、体亦然”，如“欲知其目之视，耳之听，鼻之嗅，口之啖，身之触而安定其所属，必由总知之识焉；设无总知之职，则五官各守其职，不相为用，不成其为一体矣”。

（2）受相之职为“收入总知频寄之物象，而保守之，使不至于泯没，故号为物象之府库，而物象至此，亦名之曰物影，亦名之曰现象。其所在脑中之第二穴”。“受相体稍干凝，便于守其所寄，故其职在于存守五官之象也。”

（3）分别之职为“权衡物情”，即“能剖其相合相悖之情”。“在脑中第三穴，头顶之下，受相之后，涉记之前；居中，前后相顾，顾前者，察五官与总知所受之相而区别之，定其合我本体，不合我本体也。”“顾后者，以此畀之涉记，以便于随取而复得也。”

"此职所专，在取五官所进之象，象所韬而配合之、分属之、判定之，自造一合悖、妍媸、友仇、戕益之象为五官与总知、受相所不能定者。""总知者，仅得其声与色，而未知其合我与否。受相暂寄其相，亦无别能，必须有此分别之职，定其合性与否"，"禽兽亦有此职，能觉本情合与不合，以定其趋避"，而"人类则能论其理，分剖孰害孰利，其趋避必由思想而成，故禽兽谓自然之分别，而人类为筹想之分别焉"。

（4）涉记之职"以蓄其象"，其所"在脑中第四穴，故人以脑后广大为贵，取便记蓄之义。第四穴之体比第三穴更为干凝，主久存诸象，故涉记能记以往"。"盖五官纳象总知之所，不过目前现在之迹，如黑白甜苦等类，而涉记之象则为分别所炼过（加工，再造之意）之象，更细更神，不惟目前，千百年以上皆可涉记。"认为"涉记之用有二：一为见记，一为追记。见记者，向所已觉随时记出；追记者，向所含存而今忽忘，则复追思，引其端绪，而后恍然得之"。"见记者人物共备，追记之能，禽兽所无，人类独有，未免略用思想，禽兽素不能思，故鲜追忆。"

上述总知、受相、分别、涉记，此内四司（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的，如说："此四职者一气所感，一念所周，无所等待，然有次第焉。"比喻为"总知之象谷种也；受相田亩也；分别治其田而收五谷也；涉记置谷于仓囷间也"。

3. 对嗜欲和运动的描述

（1）嗜欲：认为"欲由知生，知其美必生欲心；知其不美，必生恶心"。"由五官见闻尝嗅触摸，与其内四职者，此谓知觉之嗜欲也"，"凡禽兽既有知觉，以辨合性与不合性者，必有嗜欲。以爱其所合，憎其所不合者；既有爱憎，自有趋避"，"但禽兽原无思忖斟酌之能，人独有之，而又能以羞耻自持，不肯轻徇所嗜耳"，所以"由理义之明悟，灵性所发"，惟人之所贵，称之"爱

欲”，人与禽兽不同。

对嗜欲的分类，认为“嗜欲先分为二：一为喜欲；一为愤欲，皆兼趋避论之。此喜此愤，从外所感，五官传入，以动内情，而诸情相因而俱来，遂有十一种之不同焉：内有六者属喜，五者属愤。中又分为二：曰趋，曰避。趋中有三：一爱、一慕、一乐，三者觉之所以趋物也。避中亦有三：一憎、一厌、一忧，三者觉之所以避害也。此三趋三避者皆喜之属也。愤中亦分为二：有欲趋而不得趋者，发有二情：一贪、一竞；有欲避而不得避者，发有三情：一闷、二怖、三怒，皆愤之属也”。

关于嗜欲的生理基础，认为“嗜欲之寓在心，犹诸觉之职在脑也，凡人爱乐，则心宽泰而踊跃，忧则其心闭缩，怒则其心烦佛，失望则其心萎翻；以是知情欲之发，在于心也”。其实情欲像其他诸觉一样也是脑的机能，但它的生理机制有其特点，有呼吸、循环系统等的变化。

（2）运动：认为“人于诸知觉中，既为至贵，则其运动情势，自与庶物不同”，“人则能有所思维裁择，定其向往，而动随焉”，“人由五官四职，受象导引而入，更有明悟为之主张，以役使其爱欲之情，而定其所向也”。说明人的运动是有目的性的，是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禽兽则“无拣择之主，不知其然而然”。又“人之动止有二：一由想像所指，而血气从之；二由义理之明悟所指，而百体从之；一为物动，一为理动也。凡由义理主宰者，力能控制众体，不容其抗违，是乃顺理而动，超出万物之表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也”。还提到运动之具“如手之持，足之行，各有专司，不能相借”。“柔脆之肌肉有筋脉焉，为之左右维系，而联络其具，以便利于斡旋；而中则又植之以骨，为其百体之枝干也。”

现据上述知觉的外五官和内四职与脑功能定位的关系综合列

表于下，以便一目了然。

表 1—1

<table>
<tr><th colspan="2">外五官</th><th>目（视）耳（听）鼻（嗅）口（味）体（触）</th><th>脑</th></tr>
<tr><td rowspan="4">内四职</td><td>总知（公觉）</td><td>为五官之根原，由细筋管传气于五官，又由此细管复纳五官所受之物象。体湿嫩，物象从此印。使五官相互为用，成为一体。</td><td>第一穴脑最前近额密迩五官</td></tr>
<tr><td>受相（物影）</td><td>收入总知颁寄之物象而保守之，为物象之府库。体稍干凝。</td><td>第二穴</td></tr>
<tr><td>分别</td><td>取五官所进之象，象所韬而配合之、分属之、判定之，自选一合悖妍媸友仇戕益之象。以思想推理分剖利害，能觉本情合与不合，以定趋避。</td><td>第三穴</td></tr>
<tr><td>涉记</td><td>蓄其象，则为分别所炼过之象。体更为干凝。能记以往。</td><td>第四穴</td></tr>
</table>

（三）对记忆的看法

艾儒略对识记的难易与印象深浅、年龄和脑的成熟不同而有差异，以及认为“人有遗忘不知不觉忽以手搔脑后即探之”的描述，并对记忆术——地点法，他称之为“记心法”（即利玛窦称之为“象记法”），均和《西国记法》中所述相似（此处省略）。但是，他也总结出利用联想方法，以相似、相反和相接近的关系等进行识记，并提出“以易记提难记，以有形通无形”的记法原则。具体记法归纳如下：

（1）记无形之事，如德慝（奸邪）、七情等类，则为特造一象，拟其形容。从无形变为有象之物象。

（2）用相似之情或相似之模者，如良善象鸽，凶暴象虎，污秽象豕等。

（3）记文字，则其字各有意义，如天地椅案等字，皆以本字寓义为象，而各以其物象代焉。

（4）反用其义以记之，如以白记黑，以饱记饥，以火记水等。

(5) 连用其义者，如以雪记冬，以扇记夏，以炮记战等。

(6) 用增字为义记之，如以星记生，以鼎记目，以撒记散等。

(7) 用减字为义记之，如以鱼记鲁，以豕记家，以皿记孟等。

(8) 用拆字为义记之，如以一大记天，以二木记林，以四马记骂等。

(9) 取同音之字记之，如以笋记损，以钱记前等。

(10) 记长篇文字，难以尽托物象，则当摘其议论大旨，分数条，每条为托一象，具一象提起一事，段落绳井，既分有段落，就从每段另起一题，用寄象之法，诵时续短补长，连成一片。

对脑的记忆作用的看法，艾儒略认为"盖人之一身，五脏藏在身内，止为生长之具，惟五官居在身上则为知觉之具，所以耳目口鼻，共聚于首，最显、最高，最便与物相接，耳目口鼻之所导入，最近于脑，必以脑先受其象，而觉之、而寄之、而剖之、而存之也。生长之具如厨房，知觉之具如厅事，生长之贵，在饮食养身，知觉之贵在应酬外物，两相资藉，在下者供给其上，在上者运用审察，以保获其下，故云心之记正记于脑耳"。由于诸子百家从未有言及脑为涉记者，认为心为灵居，万念皆生于此，故云记心不云记脑。他还说尝有记诵过多，思虑过度，而头岑岑痛者，可证明记忆在脑不在心。

(四) 对觉醒、睡眠和梦的看法

《性学觕述》在卷七内设专题讲述寤寐（觉醒和睡眠）和梦的问题。书中描写什么是觉醒："乃觉性解释外官，使能各适其用者也。"睡眠则相反："即觉性之敛束五官，令其宁静休养，聚其既疲之力者也。"有觉性者才有寤有寐。外官有一官能适其用，即称之寤，寐则五官皆似束缚，不能适其用。所以独云五官而不云四职者，内四职之用不必敛束，当其寐中，四职作用不停即是梦了。

关于睡眠的原因，艾儒略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寐乃饮食粗

湿之气，自脾胃腾达脑中，冲塞筋脉，阻其知觉之气，不得通于五官，故五官不能适用，渐成寐也。”艾儒略也说：“既知五官觉气，原出于脑，五官所进，又纳于脑之公觉，则脑中脉络一塞，自尔外无由入，内无由出，寐之所以不觉其来也。”

对睡眠的功能及其与觉醒的周期，艾儒略也有所描述：“寤寐相代，一则使得补聚其力，以保其生命；一则用变换之法，寤而寐，寐而寤，使各协其宜，代谢而不厌也。一于寤者，其精劳，必有寐以养之；一于寐者，其气浊，必有寤以清之，是寤寐之所以各得其理也。”艾儒略还引用都略纳的话进一步描述：“寐为身体之慰，为气力之补，为无恙之验，为作用之逸，为劳苦之医。盖用之以时，则昼夜摄调；昼生万色，显万象，令人寤而观之；夜则万象之色，休归玄然，令人静而息焉。寝息已醒而饮食已化，气血已成，精血已活，五官已爽，可以应接万缘，建立诸用也。若贪寐过多，或不以时，不惟无益而且有损。”

关于梦，艾儒略描述：“梦者，寐中之见闻也，五官之用，虽止不行，然觉气之在四职者，运而不息。”“脑中四职：总知者是前所收外官之象，而聚影像于内焉，分别者察有所变之相而胪列以储焉。一至寐时，脾中火气上蒸，内象忽然转动，如走马灯，纸轮旋转，悉因火动。寐中触动其所涉记如复闻见一番，与昼所历，若无少异，其实虚幻无据，但缘义理不为主张，便至认假作真，从无作有。”“寐时浊气上腾，摇动内象，千奇百怪，世所绝无，而无一不为梦中之所有，断续不一，散漫无章。”

关于梦的成因，艾儒略还介绍了另一种说法，有内生和外来，从内藏而生者：“盖四行之液，遍注一身，而其蒸焰之冲，或根其所禀所养所感者，以各征于梦：水液胜，则多梦江海云雾等；火液胜，则多梦争斗烈火等；土液胜，则多梦圻墓幽暗等；气液胜，则多梦飞游欢笑等。”从外五官所纳而生者：“五官之感，虽历年

已久，而托记尚存，故人之所梦亦由五官所感，大抵一官为主，四官从附，一事有触，余事牵焉。如梦色，而声臭亦并随之；如梦悦色而气脉亦与俱动，盖记存习熟而同类者，自挟以俱来也。且其习之所沿，喜恶爱憎，各于其党：如士则科名之梦居多，农则庾廪之梦居多，工则斧斤之梦居多，商则出纳之梦居多。"

艾儒略还认为梦不可信，具体分析梦的内容，是可以"破梦"的。如说："试细观其所梦为何等人，为何等事，为何等效，则其虚妄之隙可立破也。"但却又相信有"圣梦"，就是迷信荒谬的了。

以上看法，虽然认为觉醒、睡眠和梦都是脑的作用，但对其具体产生原因的描述，仅是一种臆想的推测，并以神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可见我国明末时期，所知从西方传入的对人脑的知识还是极其粗浅和非科学的。

除上面归纳了《性学觕述》中的四点主要心理学思想之外，艾儒略还对人的生长、四液（血液等）、嘘吸（呼吸）、寿夭（寿命）、老稚（老、壮、少年）和生死作了专题讲述和问答。他的解释多是不可取的，他把许多认识都和宗教混在一起，不仅是非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和迷信的了。

三、毕方济的《灵言蠡勺》

1624 年（明天启四年甲子七月），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灵言蠡勺》一书。该书名是"灵魂学浅测"的意思。在毕方济所写的引言中，提到该书是论述亚尼玛（Anima）之学，也就是研究灵魂（或灵性）的学问。它也是最早传入我国的有关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心理学思想的书。

毕方济字今梁，1582 年生于拿波利国之科森查。1603 年入耶稣会，曾在会中做各科教习。于 1609 年赴印度，1610 年抵澳门，

在此教数学一年，1613年到北京。因1616年南京教案事起，被逐出北京，南去杭州并至嘉定开教。约1618年至1620年间，他又潜回北京，躲居在徐光启家中，可能在此期间，二人合作编写《灵言蠡勺》初稿。1622年至上海松江管理教务。1628年在松江患病后，遣赴山西。道经河南开封，留此传教数年，旋赴山东，复至南京。由于毕方济"精通文学数理，善于诱导人心"，恢复了南京教区的工作。后有朝旨至，命其测量北极高度，观察日蚀，改良历法。有一次，他测准某日某时有日蚀，使人对他愈发敬重。1638年，毕方济赴淮安，嗣此迄1644年往来苏州、扬州、宁波等地传教。1644年清军入北京，崇祯帝死后，立弘光帝于南京，不久被害；立隆武帝于福州，也遭不幸；永历帝即位。毕方济曾任此三帝使臣或授朝中官职。他自1647年永历元年三月以洋兵三百，拒清军于桂林后二年，于1649年卒于广州，墓在省城北门外金坑。①

毕方济初到北京后，即学习中文，与士大夫结交。《灵言蠡勺》一书是他来华后十一年刊印出版的。笔录者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出身小地主兼商人家庭。他幼年参加过生产劳动，中年中进士，做过翰林院庶吉士，晚年入阁做到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由于他处在当时朝廷党争之中，自身政治软弱，没有何政绩可言。② 但他是我国明代杰出的科学家，他从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等。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德《几

① 分别参见冯承钧译：《毕方济传》，载《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3～167页；徐宗泽：《毕方济》，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366～367页；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八卷二号抽印本，1934年，第10页。

② 何兆武：《略论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7期，第54页。

何原本》（前六卷），编纂《泰西水法》、《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测量异同》等书。晚年负责修订历法，集为《崇祯历法》，为我国历法参用西法之始。他去世后，由他人编辑《农政全书》刊行。徐光启晚年 63 岁时，为毕方济笔录了《灵言蠡勺》。有人认为该书“是哲学之一部分思想，非常玄奥，有其意而未能以言达之者矣”。认为徐光启“竟能以其玄妙之笔，清晰之思，将种种抽象之理达之于书；而文字又雅、又达、又信，诚非有哲学明悟者不能译一字，著一语。至术语选择之切确，用字之的当，犹其余事。徐子录此书时年已 63 岁，学精道萃，宜此书之为一杰作也”[①]。在 1919 年重刊本中，陈垣作序也提到《天学初函》诸篇中，《灵言蠡勺》“说理最精”。徐光启还早在 1603 年在南京，从罗如望传教士受洗，入了天主教。这件事为当时他想学习西洋的科学并翻译有关书籍，提供了方便，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不可能正确识别传统天主教教义的本质和正在步入近代的西方社会的历史现实，更不会知道当时来华的耶稣会士是属于欧洲保守反动的势力集团的。[②]这点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关于毕方济和徐光启共同合作编写《灵言蠡勺》的时间，根据原书卷首有毕方济自书的引，为天启甲子七月（1624 年）。但有人估计“时间未必是在此时，毕方济在南京教案以后，大概在 1618 年至 1620 年（万历四十六至四十八年）间，就藏在徐光启的家里，我们猜想在那段时间，他翻译过一次初稿是有可能的，而 1623 至 1624 年（天启三至四年）间，毕方济在上海，徐光启在天津，两人并没有在一起合作译书的机会”[③]。

---

① 徐宗泽：《灵言蠡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中华书局 1949 年版，第 201 页。

② 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25 页。

③ 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4 页。

《灵言蠡勺》全书共二卷。1624年在上海或嘉定刻本，后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存目二，并曾录入李之藻辑《天学初函》中。1919年陈垣重校刊印，1921年再版。该书卷首刊有泰西毕方济口授、吴淞徐光启笔录。卷前有1919年陈垣重刊序和马良重刊序；有1624年毕方济所写的引言。在此引中，他认为灵魂学在哲学中是最有益最重要的学问，研究它是为了“认己”。他说：“谓认己者，是世人百千万种学问根宗，人人所当先务也。”他认为研究灵魂的理论“必然明达万事”，“推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凡为人师牧者”和“医者”都应学习。由“本己之性”通达“天主之性”，也就是由本性的学问（性学），而获得超性的学问（神学）。毕方济也和艾儒略在《性学觕述》上引用公元5世纪著名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同样内容的话，说哲学分为两大端：其一论灵魂，其一论天主；论灵魂者令人认己，论天主者令人认其源；论灵魂者使人可受福，论天主者使人享福。总之，他论述灵魂的目的，最终是以天主为灵魂的归宿。显然，《灵言蠡勺》就是为宣传宗教所用。

《灵言蠡勺》二卷目录：

一论性相似

二论模相似

三论行相似

第四篇　论亚尼玛所向至美好之情

现仅将该书中涉及心理学思想较多的第二篇作重点叙述：

主要述及关于“魂三品说”和灵魂的三种官能。毕方济的《灵言蠡勺》和艾儒略的《性学觕述》对魂三品说有同样的论述。他认为生魂的功能有三：一为“育养之能”；二为“长大之能”；三为“传生之能，如草木”。人亦有生魂。觉魂的功能有二：一为动能，一为觉能，鸟兽等生而能动，草木无之，人亦生而能动，是有觉魂之动能也。觉能又有二，一为外觉，一为内觉，行外觉以外能，外能有五司：耳、目、口、鼻、体。行内觉以内能，内能有二司、有四职，一共司，主受五司所收声色臭味等，受而能分别之。二思司，思司有三职，其一主藏，五司所收，皆受而藏之，如仓库然。其二主收觉物自然晓达之意。其三主藏所收诸物之意。内二司之外，别有一能曰嗜司，凡外五司内二司所收之物，可嗜之、可弃之此为嗜司。嗜司之能又分有二，一者欲能，二者怒能，凡所嗜所弃，于己相宜则欲求之，不相宜则欲去之，此为欲能。所嗜所弃于己相宜则敢求之，不相宜则敢去之，此为怒欲。或嗜或弃，各兼二者，然欲能柔，怒能刚，怒能欲能之敌也。以上内外诸司，人与鸟兽等无异，是觉魂所有之能。人的灵魂，除生魂、觉魂均与草木禽兽等无以大异，但其“超轶万类，卓然首出”。灵魂具有内三司：一为记含，二为明悟，三为爱欲。

（一）记含（记忆）

它分管的职责是“藏物之象以时而用”。毕方济认为“凡外五司所收之物，皆有形质，不能入于内司，则取其象入于共司。此象甚粗，既从思司分别取细，入于记含之司，待至欲用，随时取

之。若无形之物，不属外司，为内二司所收，亦入共司。本无粗象，不必细取，经从思司藏于记含之司，以时取之。取之者所藏之物，种种不一。若随时欲取一物，则记含之司，悉呈诸物，任所欲得，如库司主藏，待命出之也。是知记含之藏物，甚多无数，故奥吾斯丁[①]曰：记含之容，大哉玄哉，记含之窍，微而密哉，曲而深哉，无物不登其门，无物不入其藏，非收物之体也，收物之象也，久收之以听用”。

毕方济提到“记含之职”，不仅“记有形之物，故禽兽皆有之”，惟有人“能记无形象之物”，“人能记物之专（指具体），又能记物之总（指抽象），总者无形之物也”。他举例：“如乙能记甲为兄，丙为弟，又记甲丙总为同生，又记同生之甲丙总为人。兄弟为专，同生为总，人为大总，同生与人无形之物也。”

毕方济认为“司记含之所在脑囊，居顱囟之后”，但又说记有形之物在“有形之所则脑囊”，记无形之物在“无形之所则亚尼玛”。

毕方济还提到记含的功能“有二，一为忆记，二为推记”。“忆记者，惟先所知者，今一念及，宛然如见，此谓如前所知，复向而知之。亚利斯多[②]曰：凡经过之事，属于记含，见前之事，属于所司，将来之事，属于欲望。推记者，从此一物而记他物，如从记莺而推记其黄，又因而推记黄金之黄。盖记含无他，止于先所藏者今复觅之，觅未得时，设遇与此相似之物，或与此相连贯之物，乘其机缘，展转相关，因而得所欲得，此为推记也。推记须因众物而得一物；忆记者不须众物，直记此物。此两所记，总皆经历之事，物象犹在，故可忆可推，其实一也，若本无知者，知而悉忘者，无此物象，莫可忆矣，莫可推矣。”又推记惟人类所有，

① 今译奥古斯丁。

② 今译亚里士多德。

“凡推记之节次有三：一者须记他物，二者由他物而推寻此物，三者因而得遇此物。皆缘人灵能推理以致其然，此中包含明悟。能推记者，则是睿哲之征，非物类无灵所能与也”。记含用处之大“凡人诵读谈讲，思维学习，诸凡所得，赖此而得久存，赖此而得应用”。并提到提高记忆效率有“西国记含之法”。

（二）明悟（理智或理性）

毕方济解释何为明悟，他说“凡明悟者非明悟其物之体物之质，必将弃其体质，精识其微通者焉。体质者为专属（具体之意），微通者为公共（抽象之意），如遇一有形之物，彼先出其象，入于我之目司，此时物去则象隐，其象全系物之体质，是为至粗，非可明之物，能被明悟者也，既而入于共司。共司者，五司之共所也。此象既离于此物，然物之专象无所不收，象与物各系属，是在精粗之间，亦未为可明之物也。既从共司入于思司，而分别之，则此物咸别于他物。既不能无分彼此，即象与物微有系属，不能化于大通，亦未为可明之物也。既而归于作明悟者，不惟尽脱于物之体质，并悉捐弃其为彼为此，但留物之精微，众物所公共者，则可得而明悟之矣。譬一尺度于此，木为体质，尺为其全，寸为其分，所当明悟者其全大于分也。目司所收，有形之度，载尺与寸，未离体质也。共司所收，脱去木体，止有体之形象，载尺与寸，即与他物，总受总藏，未能分别也。思司所收，则已从他物而分别之，脱去形象，独留其分与寸矣。作明悟所为，则全脱于度并其尺寸，但留微妙玄通。至公大总者，为全与分，是则为可明之物，足以被明悟者也。既为可明，则受明悟者加之光而遂明之，明之全大于分矣”。毕方济对事物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作了一些推测，并举例说明。

（三）爱欲（意志行动）

毕方济认为爱欲者分之有三，其一性欲，其二司欲，其三灵

欲。性欲者，万物所公共，生觉灵之类皆有之。司欲者，生物所无，觉类人类则有之，其在人为下欲。下欲者，令人屈下近于禽兽之情，令人失于大公，专暱己私也。灵欲者，生觉物所无，惟灵才之人则有之，其在人为上欲、为爱欲（灵欲为诸爱欲中之至尊至贵者故可独名爱欲）。司欲与灵欲的不同，在于"灵欲随理义所引，司欲随思司所引，随思者不论义否，惟所乐从也。灵欲所行，皆得自制。司欲所行，不由自制，为外物所使，随性不随义，其在禽兽，绝不自制，一见可欲，无能不从。其在于人，一见可欲，或直从之，或择去之，或从否之间，虚悬未定。如是者稍似自制，实则禀于灵欲，以使其然，非由本质，盖乃自制之影耳"。此三者"依其本情虽有三向，如性欲本向者是利美好，司欲本向者是乐美好，灵欲本向者是义美好，而归于一总美好"。

记含、明悟和爱欲是灵魂的三种主要官能，它们虽各自独立，但其活动是统一的。这是来自奥古斯丁的官能心理学思想。

对以上三本书作以下简要评述：

第一，《西国记法》、《性学觕述》和《灵言蠡勺》等是我国最早接触到的西方心理学思想，也是异邦文化的一次传入，它首次与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相交和结合。利玛窦等传教士于明末入华传教活动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在欧洲新航线被发现以后，西欧殖民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形势下，他们以科学为手段，传教为目的，企图以西方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这在客观上起了西学与中学交流的作用。利玛窦等传教士向我国介绍了西方宗教神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包括心理学），并且也把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首次介绍给了西方。如利玛窦曾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把孔子介绍给欧洲人。他尽量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如附会中国儒家学说，企图

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学调和起来，又如把上帝称为天主，就是他选用了中国古代“天”的概念。他撰写的《西国记法》即是利用中国古代“六书”识字特点与西方古代记忆术——象记法相结合的识记中国文字的方法，成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和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心理学思想相交和结合的最开端。稍后的艾儒略和毕方济等传教士也和利玛窦一样，在《性学牖述》和《灵言蠡勺》中结合中国实例，引用孔孟语录，《大学》、《论语》的词句，以及明代理学的概念，如气、理、体用说等等，使来自西方的心理学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在此发生了初次的相交与结合。有人说“发掘的早自明代刊印的《西国记法》、《性学牖述》、《灵言蠡勺》等书中传播的西方心理学思想，使我们大开眼界，把过去对西方心理学思想传入中国的时间概念向前推了两个多世纪”[①]。这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第二，对利玛窦等传教士输进的《西国记法》、《性学牖述》和《灵言蠡勺》等西方心理学思想应作具体分析，弃其“神学糟粕”，取其“科学精华”。列宁曾说：“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学之类的幻想有一种联系。而今天呢？同样还有那种联系，只是科学和神话间的比例却不同了。”[②]《西国记法》等三书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的神学理论体系，书中引用他们的心理学思想、言论，如亚里士多德的“三级灵魂论”，“回想利用相似、相近和相反的联系”等。在《性学牖述》一书中引其言论就有十数处之多，包括亚里士多德对“人声”、“爱欲”、“睡眠”、“梦”、“嘘吸”、“记含”、“心”等各方面。《性学牖述》和《灵言蠡勺》中，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

②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5页。

皆有奥古斯丁的心理学思想，如人的灵魂有记忆、理智和意志三种官能，“论亚尼玛令人认己”以及有关“记含”的言论。也引用阿奎那认为灵魂独立于身体之外，人死而灵魂不灭等思想。亚里士多德著有《灵魂论》，是一本心理学专著，由于他的思想是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二元论者，他的一些唯心主义思想曾被阿奎那为了适合教会的需要而被利用，并加以发展。书中反映出心理学已成为“神学的奴婢”，为维护神学宗教服务。可是在他们的描述中有许多心理事实本身是有意义的，如感官接触事物留有形象，注意脑的作用等。但都冠以“造物主所赋予”，附以宗教神秘的色彩，荒谬地把认识和宗教混在一起。我们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具体分析，了解其在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

第三，利玛窦所著《西国记法》与其他二书《性学觕述》和《灵言蠡勺》有所不同。虽然他认为“人受造物主所赋之神魂，视万物最为灵悟，故遇万类悉能记识”，是“造物主显露秘密”等，但他不像《性学觕述》和《灵言蠡勺》二书是为“由因性以达夫超性”或“本己之性”通达“天主之性”；也不像此二书对所描述的各种心理现象：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思维、情欲、意志，以及人的生长、睡眠、梦和死等，都赋予了许多神学的说教和宗教唯心主义的解释。《西国记法》只是专门论述记忆方法问题的，可说是最早从西方传来的一本记忆术，也可说是利玛窦学习中国语文时，利用西方的记忆原则总结出的一本“识字法”。其中不少记忆方法是可取的，也是现今大家常用的。他在书中介绍的古典象记法或称地点法，流传至今，越来越被人重视，应用得很多，一般是用在提高记忆效率、增强学习或教学效果。在“象记法”的基本原理上，现已发展了不少“变式”，如现在流行的奇幻联想记忆法，即人为地对识记材料赋予奇幻的想像和联想，作为“挂

钩”来记住要记的材料。具体的方法：有连锁法，把无关的字、事、物用奇幻形象、谐音联想串连起来识记；有数序形象挂钩法，先找出和数字形状相近似的物象，并将物象和数字形状紧密结合，以之为一套数序形象挂钩，再用它和要识记的材料进行奇幻联想；还有熟语挂钩法，选择一组和识记材料的要点相等并是自己熟记的词语，将它赋予形象后，再和识记材料进行奇幻联想。除此一般应用外，现今已把这个古老的记忆方法称轨迹法，作为研究心理学的一种实验研究方法，尤其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面。如研究记忆的年龄差异，即研究青年和老年时期记忆的发展变化特点和规律。此法能全面探讨记忆过程，老年人学会使用此种记忆法，在回忆时提取较易，也就是利用线索回忆作补偿，使被选择的认知活动——回忆得以最佳化，可认为是一种适应机制。此法能增加记忆量，且非常生动有趣。又如研究老年认知功能的可塑性，老年智力和记忆具有一定可塑性，如经短期使用轨迹法进行认知训练，智力和记忆均有所改善。还有研究认知功能的后备能量（潜能）的限度，不同年龄人的认知潜能究竟有多大？是否有一定限度？老年人的潜能是否减少？对“限度测定”用轨迹法最宜。这古老的方法获得了新发展。①

第四，《西国记法》、《性学觕述》和《灵言蠡勺》都肯定了记忆作用在于脑。这在我国当时还是鲜为人知的事。我国古代认为人的精神作用的中枢在心脏，如孟子的“心之官则思”，荀子的“心居中虚，以治五官”，以至后来均言“灵机在于心”。这是由于凭直觉了解到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人的生命和感知活动也就不存在了，因而认为心是最重要的心理器官。这种传统看法，基本上

① 吴振云：《“轨迹法”用于认知心理学研究》，载《心理学动态》1989年第1期，第10～11页。

无视于脑的作用。

在《西国记法》中，利玛窦提出记忆在“脑囊”，并确定记忆在脑的颅囟后枕骨下的部位，他还把从五官而入脑的物象比为“以印印脑”。由于年龄不同则脑的刚柔和干湿不同，并与记忆痕迹的深浅有关。《性学觕述》中，对脑的机能定位思想，有较全面的描述。艾儒略也强调“记存”在于脑，认为“心之记，正记于脑”。《灵言蠡勺》中，也提到“司记含之所在者脑囊，居颅囟之后”。在此三书的同时期，甚至还早一些，我国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于1590年（或1596年）刊出的《本草纲目》上即提出“脑为元神之府”[①]（即脑为高级中枢神经活动的地方）的思想。在《性学觕述》中，艾儒略也曾提到：“脑为泥丸宫，元神居焉，是必有本，何惑之有？”他们对脑的看法，虽然多出自臆想推测，是很粗劣和不科学的，却开始动摇了我国传统的心理活动的“心脏说”。可是当时这种“脑髓说”流传并不广，还不为人所重视。

第二节　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时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根据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要时期，在鸦片战争时期、戊戌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有关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或学者，在其改革社会和文化教育的主张及其哲学观点中，都涉及到一些心理学思想，有的还直接引用或应用了当时外国心理学。中国近代心理学的特点是：一方面保留着中国古代的心理

① 陕西省中医研究院：《医林改错》注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0页。

学思想，采用经验的描述或思辨的论谈；另一方面也包含有西方近代心理学的个别领域的内容。现选择了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他的生年虽不在近代，但他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从这个意义上把他列入近代人物来叙述。他反对先验的人性论，继续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还有鸦片战争初期的王筠，他是一位文字学家和教育家，反对当时读书竟"以功名为学问"的学风和教育中的形式主义。他重视学生的心理特点，对儿童教育心理颇有见解。戊戌变法时期，有谭嗣同和梁启超，他二人皆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要人物。谭嗣同掌握有初步的生理学知识和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用来说明有关的心理现象，具有一定科学性，包含了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因素。梁启超自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游历国外，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同时也掌握和应用西方的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日本的佛学心理学。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为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著有《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倡导"知难行易说"等。现将以上他们在其著作中有关的心理学思想分述如下：

一、龚自珍的心理学思想

龚自珍（1792～1841）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具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他原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龚自珍生于一个三世京官的家庭，他11岁随父到北京，在家塾中学习。因他是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外孙，从小就受严格的汉学训练。21岁考任武英殿校录。1816年，他25岁时随父去江南，曾到上海，博览群书，贯通百家，研究"经世之学"，并著文发表政见。1818年，他27岁参加浙江乡试中举人，作《阐告子》，主张性无善恶论，到42岁才定稿。自1819

至1829年间，他曾参加会试四次均未取，38岁时才中进士，仕途很不得志。这时，他与魏源（1794～1857）、林则徐（1785～1850）等人经常在京聚会。他接受了今文经学派的观点，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学术观点与现实联系；反对古文经学派的埋头故纸堆进行脱离实际的烦琐考证。他通过对古代典籍的解释，评论时政，为当时“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开了新风。1837年任礼部主事。1838年，他积极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由于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濒于解体前夕，国内农民起义高涨，国外资本主义入侵，目睹清朝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使他政治上受压抑，精神上极为苦闷，晚年皈依佛门，崇信天台宗。48岁时，辞官南下讲学，两年后于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以暴疾卒于丹阳云阳书院。[①]他一生著作颇多，现已编成《龚自珍全集》。其著作中涉及的一些心理学思想主要有：

（一）认识过程中的知觉论

龚自珍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其形神观是一种神不灭论的思想。他在《辩知觉》这一短文中，提出了“知”与“觉”的区别。他说：“知，就事而言也；觉，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觉无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觉，兼天事言矣。知者，圣人可与凡民共之；觉，则先圣必俟后圣矣。”[②]看来，知是指它所接触的对象是具体可见的；觉是指它所接触的对象是抽象无形不可见的。这样把知和觉分别开，还是可以的，但“知”又指圣人和凡民所共同具有的认识能力，而“觉”则只是圣人才具有的天赋能力，靠圣人的“神悟”“心通”来相传。他还说：“夫可知者，圣人之知

① 参见孙叔平：《龚自珍的生平和著作》，载《中国哲学史稿》（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8页；邹大炎：《龚自珍的心理学思想述评》，载《心理学报》1984年第2期，第121页。

② 龚自珍：《辩知觉》，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7页。

也；不可知者，圣人之觉也。”① 这样就把“觉”神秘化了，离开知，“圣人”又何从去觉呢？他这样把知和觉割裂开来，显然是不对的。

（二）情意活动中的“宥情”说

龚自珍反对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主张对情感采取宽宥的态度。他认为情感乃是心体与外境接触后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人为地铲除。他说：“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矣。”② 并且认为“情”在“一切境未起时，一切哀乐未中时，一切语言未造时，当彼之时，亦尝阴气沉沉而来袭心”③。这就是说人只要有饮食的需要，就会产生情感。情感是人的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即使在最平静的状态下，它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因此，龚自珍主张，对于人的情感与意欲，我们不能采取粗暴的压抑态度，不能像程朱理学那样，对人的情欲采取铲除态度。又如龚自珍曾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写道：“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④ 这是说人的情感是真实存在的，是与人的需要紧密相连的，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强行锄灭或抑制它。可见龚自珍论述情意活动方面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的“宥情”说，含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因素。⑤

（三）“无善无不善”的人性论

① 龚自珍：《辨知觉》，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7页。

② 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页。

③ 龚自珍：《宥情》，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0页。

④ 龚自珍：《长短言自序》，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2页。

⑤ 此段取自邹大炎：《龚自珍的心理学思想述评》，载《心理学报》1984年第2期，第121页。

龚自珍反对先验的人性论，他认为善恶的观念都是后起的，否认人性中有任何先验的善恶道德观念，反对孟子性善和荀子性恶的人性论。龚自珍写的一篇专门论述人性的著作《阐告子》一文中，明确表示赞同告子的"生之谓性"，性"无善无不善"的思想。告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名不害，曾在孟子门下学习，并与孟子辩论过人性问题，因没有著作传于后世，只有告子的思想片断记录在《孟子·告子上》。在此书中，由于告子讲人的生性，即先天具有的本性，未涉及人的习性，即后天获得的社会本性，而孟子则只讲社会本性，不讲自然本性，所以告子和孟子在辩论人性问题时，因概念不一，论题相乖，谁也没有驳倒谁。但当孟子攻击告子时，却得以保存了告子的一些光辉思想。龚自珍的这篇《阐告子》，使得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蔑视、贬抑和攻击的告子的光辉的人性论思想，第一次得到了宣扬和推崇，这是龚自珍的一大功绩。

告子的人性论的主要论点是："生之谓性"，即天生的资质叫性，"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1] 告子把性比喻为湍急的流水，东方决了口便向东流，西方决了口就向西流，性是天生的资质，像水不分东西一样，也谈不到善与不善的问题。告子还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2]告子又把人性比做杞柳之类的木材，把义理比做杯盘之类的容器，说人性是仁义的，就好比把杞柳木材当成杯盘。意思是说，性只是一种可以雕琢、塑造、加工的素材，它本身无所谓有无仁义道德观念。仁义、善恶的道德观念都是后来产生的，好比是素材加工制成的杯盘。告子的这种性"无善无不善"的理论，完全驳倒了孟子先天道德的性善说，当然也驳倒了荀子的性恶说。龚

①② 朱熹注：《四书五经》（上册），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84页。

自珍特别推崇告子这一光辉的人性论思想。他自己说:"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①]他又说:"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很(恨)忌非固有。"[②] 龚自珍抓住了告子人性说的核心,认为善和恶都是后天养成发展的结果。

龚自珍提出了告子关于人性学说是正确的,但认为只是开了一个端,尚未发挥详尽。如说"告子知性,发端未竟"[③],于是龚自珍对告子的人性思想进行了发挥,不过只是沿用告子的杞柳作比喻,增加一些例子而已。由于他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来阐发告子的学说,反而得出一些相互矛盾和混乱的思想。性究竟是什么,他也是"发端未竟",这可能也是他写《阐告子》推迟多年,迟迟不能定稿的原因吧。

"人性无善恶,善恶皆后起"的思想也体现在他晚年辞官还乡后写的一篇著名的杂文——《病梅馆记》[④]的内容中。他认为梅天生是自由生长,无"曲"、无"疏"的,本来不是"病梅",由于后天人工才弄成"曲"、"疏"的"病梅",只有把"病梅"再栽到田中,才能使其恢复自由生长。这是龚自珍以此寓意人的天生个性是应自由正常发展的,本来不是"病人",由于后天封建礼教的束缚,使人成为"病人",只有打破封建桎梏,才能解放个性任其发展。龚自珍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善恶如受社会、环境、教育的影响是可以变化的,但在这篇杂文中可以看到这点。

---

①③ 龚自珍:《阐告子》,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29 页。

②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七》,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8 页。

④ 龚自珍:《病梅馆记》,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86 页。

二、王筠的心理学思想

王筠（1783～1854），清代文字学家、教育家。字贯山，号篆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中举，曾任山西宁乡知县。他性情孤僻，为人重节义，“未尝登显者之门”。“少喜篆籀，及长博涉经史，擅长于说文。”他对说文研究颇深，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等，综合分析各家学说，订正前人之谬误，为后人指出门径。他反对当时读书人竞“以功名为学问”的学风，对于当时教育中，无视受教育者的情况，尤感深恶痛绝。反对教育中的形式主义，重视学生的心理特点，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突出地表现在他所著的《教童子法》[①]一书。该书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当时的小学教育，揭露了当时教育中的重大流弊，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后人认为其见解新颖、深刻，具有创见的观点，并与心理学的某些原理颇多不谋而合之处。他在儿童教育心理和语文教学心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将其《教童子法》中有关的教育心理学思想[②]分述如下：

（一）识字教学心理思想

王筠是文字学家，对文字很有研究，所以他对识字教学的见解有极深厚的理论基础。他的主张有：

1．先集中识字，后进行阅读

他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如弟子钝，则识

① 王筠：《教童子法》（此据《灵鹣阁丛书》1895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1～10页。

② 取自杨鸿昌：《王筠〈教童子法〉一书中的心理学思想》，载《河北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第125～134页；燕国材：《我国古代一部语文教学心理思想专著——王筠〈教童子法〉》，载《明清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430页。

千余字后，乃为之讲，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又说“识字时，专心致志于识字，不可打算读经”。识字教学历来有两种做法，一是儿童入学后，先集中学一些汉字，然后再教诵读课文。二是开始即诵读课文，让其边读边识字。过去私塾学童先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是属前一种做法；而一开始就读“四书”、“五经”，则是后一种做法。看来，王筠是主张前者的。他的主张曾得到后来的实验所证实，1960 年前后，曾经有人做过集中识字的教学实验，对低年级语文教学，采取集中归类的办法，让儿童掌握汉字的结构规律。实验结果，识字数量大为增加，同时掌握规律后，识字能力也有明显提高，这为阅读以及写作都打了良好的基础。可见王筠的先识字后阅读的识字原则和方法是符合科学性的。

2. 先教纯体字，后教合体字

这是集中识字的一种方法。王筠说：“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字教之……纯体字既识，乃教合体字。”纯体字或称独体字是指笔画较少、结构简单的字；合体字是由偏旁、部首和纯（独）体字所构成。先掌握一些偏旁、部首和纯体字，为便于进一步掌握大量的汉字奠定了基础。这种识字方法是符合由易到难、由简而繁的认识规律的。这点也已得到了识字教学实验的事实证明。

3. 利用直观形象教学

王筠认为“先取象形、指示之纯体字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他利用中国古代“六书”的象形、指事的识字方法，象形是借形为象而成字体，指事是以符代形，为象形之简化。充分利用直观形象，便于儿童记忆字形，理解字义。他还用类似现在的“看图识字”卡片的方法，如他说“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即采用在方块卡片上，一面写正

楷字，一面写篆体，因篆体基本是象形的，有如图画或图形。这说明他很注重识字教学的直观性和形象化。

4. 理解、复习与熟记

王筠十分重视理解，他说“……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讲又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自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钝，则识千余字后乃为之讲”。怎样及时复习与熟记，他说“既背一授，即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此无上下文，必须逐字解则茁实……既能解，则为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引申，或假借，使之分别划然，即使之展转流通也”。可见，王筠是主张意义识记，反对机械识记的，在开始识字时即要求讲解，而且要讲深讲透，必须理解（入童子之耳）。但他还主张，一般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识记。如在“弟子钝”的情况下，也可先行识记而后求理解。理解有助于识记，熟记对理解也有一定积极作用。他对这种理解与识记关系的看法是很辩证的。他还提出部分学习与整体学习相结合的复习识字法，先学第一部分（识一授之字），记住后，再学第二部分（识二授之字），记住后，再学第三部分（识三授之字），最后将三部分合在一起全部学习、识记（合读三授又总识之）。

（二）阅读教学心理思想

在识字教学的基础上，开展阅读教学。王筠要求：

1. 理解思考

必须始终贯穿讲解，使儿童积极思考，理解意义。他说“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封建时代蒙塾的阅读教学，一般是

先读后讲。学童并不懂所学，在背诵四书五经时，就像和尚念经一样。正如王筠所说“读书而不讲”，一个劲地死记硬背，他是极不赞成这种违反学习规律和儿童心理的方法。因此，他强调指出“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解，或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但又不能只是一律由“先生讲，学生听”，还必须采取多样的讲解方式，启发儿童自己思考，因而他说“故为弟子讲授，必时时诘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师为之讲书数行，辄请曰，如此，则举某章反背，师令退思之而复讲”。

2. 精读强记

为了保证阅读的效率和质量，王筠主张“精读强记，约取实得”。他提出精读方法有二：

（1）札录法：“……每读一书，遇意有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朗读十余遍，粘之壁间，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闲步，即就壁间观所粘录，日三五次以为常，务期精熟，一字不遗，粘壁既满，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读有所录，补粘其处，随收随补，岁无旷日……每见务为泛览者，略得影响而止，稍经时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约取而实得也”。

（2）圈点法：“入学后，每科必买直省乡墨，篇篇皆使学子圈之抹之，乃是切实工夫。工夫有进步，不妨圈其所抹，抹其所圈，不是圈他抹他，乃是圈我抹我也。即读经书，一有所见，即写之书眉，以便他日涂改。若所读书，都是干干净净，绝无一字，可知是不用心也。”

使用这两种方法可以提高阅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这种活动是主动思维的结果，更有助于理解和识记。

关于强记方法也有二：

（1）连号法：“其师教之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纸，次

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亦无不烂熟矣。”这种方法是采用平均分配和逐日累进的“循环记忆法”，其特点是复习的次数先密后疏，这正好与遗忘的速度先快后慢的规律相对应。

（2）暗诵法：“吾乡有秀才，家贫，须躬亲田事，暇即好樗蒲，然其作文则似手不释卷者，或问其故，则曰我有二十篇熟文，每日必从心里过一两遍。不可出声，若只是从唇边过，则不济事。”这是采用默读，“心里过”、“不出声”，通过“重现”来巩固记忆的。

（三）写作教学心理思想

写作教学也就是作文教学，它是封建时代蒙学最主要的教学科目。教识字和阅读的目的，就是为了能作文，以便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是影响“前途”的大事。王筠关于怎样作文的主张有：

1. 命题切合学童实际

王筠认为学童练习写作文，最好自拟题目，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如他说：“……我见何子贞太史，教其侄作诗，题目皆自撰，以目前所遇之事为题，是可法也。”这样使学童有话可写，有事可叙，文章会生动有情趣。他还反对作文言之无物，说空话。如他说：“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他也反对写作中只讲形式，不求实用。如他说“吾乡非无高才，然作诗必律，律又多七言，七言又多咏物，通人见之，一开卷便是春草秋花等题目，知其外道也，掩卷不观矣”。

2. 先放后收，多圈少抹

王筠说“即令作论……以放为主，愈多愈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还说“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其俯首乐从”。因学生初学作文时主要问题是写不出来，写得

少。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放”，提倡放开了写，突破“数量”关。写多以后，又发生新问题，内容庞杂，文笔不简练，在这种情况下，又必须“收”，使其注意安排内容和遣词造句，以提高写作水平，突破“质量”关。这个“先放后收”的原则，在现在某些学校的作文教学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应用。

多圈少抹原则是指批改作文时以鼓励为主，“少改易之，以圈为主”，使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强写作的信心，调动其写作的积极性。如果少圈多抹，把学童好不容易写出的作文，无情地抹去，岂不打击了学童的情绪？王筠对此是深知儿童心理的。

3. 根据写作练习进程规律及时指导

王筠发现学童在写作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前进，即前进—停滞—再前进的现象。他指出当学童的写作处于停滞不前甚至退步的情况，即“高原现象”时，老师不能操之过急“而夭阏之”。他说：“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譬如蚕然，其初一卵而已，渐而有首有身，蠕蠕然动，此时胜于卵也；至于作茧而蛹，又复块然，此时不如蚕也；徐俟其化而为蛾则成矣，作文而不脱换，终是无用才也；屡次脱换，必能成家者也。若遇钝师，当其脱换而夭阏之，则戚矣。”“脱换”是指学习进程中因新因素的加入（如要求的提高、方法的改变等）而发生的具有转折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初发生时，学习的进展一般是放慢，停滞不前，甚至出现暂时退步现象，这叫高原现象。此时，如指导得法，过此“关”后学习会有长足的进步，即王筠所说“文境必大进”。如遇到不了解此种规律的“钝师”的横加“督责”就会使学生失去自信心，自暴自弃，亦即王筠所说的“当其脱换而夭阏之”。

（四）写字教学心理思想

王筠关于写字教学的言论不多，他对何时开始学写字的年龄

和写多大的字问题，在《教童子法》中有一段论述："学字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拨镫法，八九岁不晚，学则学元秘塔、臧公碑之类。不可学小字，大有三分好，缩小，便五分好也。"写字是一种肌肉活动，开始得早晚应根据学童手和腕部的骨骼和小肌肉群发育的水平。现在小学中年级即王筠所说八九岁时才用毛笔写字，看来是符合儿童年龄特点的。关于写多大字的问题，由于"小儿手小骨弱"，"不可学小字"，看来开始学写字时以学写大字（比小字大一些，若按大、中、小三级来分，应叫"中"字）为宜。现在小学中年级开始用毛笔写字时也是先写大字。

王筠的语文教学的心理学思想，是极为深刻和丰富多彩的。时间虽说已相隔百数十年了，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的这些心理学思想，现在看来仍具有参考价值，非常值得珍视。

三、谭嗣同的心理学思想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家。他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官至湖北巡抚。他幼时丧母，受庶母歧视虐待。少年时，从欧阳中鹄学习，鄙视科举，好今文经学，颇欣赏颜元、龚自珍、魏源的著作，也喜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还学习了一点自然科学知识。

1883年，谭嗣同随父做官赴任兰州。次年，入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府，时值中法战争起，对清政府乞降求和极为愤恨，开始有变法思想。后来，他多次往来于新疆、陕西、河南、直隶、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省近十年，熟悉当地山川风土和民情疾苦，感到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1893年，谭嗣同28岁，旅行中经过上海，认识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购买了很多江南制造局所译自然科学书籍

和广学会所译西洋史地、政治书籍。读了以后，受到很大影响。

1894年，甲午战争起，中国惨败于日本，激起谭嗣同的强烈的爱国思想，更发奋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在其师欧阳中鹄、友人唐才常的赞助下，在浏阳创建算学会。是年7月，在北京会见梁启超，听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极为赞服，对其思想影响变化很大。

1896年，谭嗣同随父到北京，曾与翁同龢畅谈洋务。后奉父命赴南京做后补知县，分司浙江。在此期间，他致力于政治、哲学，并精研基督教教义、神学、佛学等，著成《仁学》一书。

1897年5月，他倡设金陵测量学会，筹置仪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往返沪、宁与梁启超等商讨学术和国家大事。还发起成立不缠足会。是年9月，他在长沙，与梁启超、唐才常等倡论变法，擘画新政。冬，设立南学会，每7日集会讲学，积极宣传组织维新活动。

1898年2月，他先后在南学会讲了《论中国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论全体学》、《论学者不当骄人》等报告。3月，《湘报》创刊，他担任编务，撰写《湘报》后叙，大声疾呼要创学堂、设学会、办报刊。同时，在长沙组织延年会，在浏阳倡建群萌学会等。4月，光绪下诏变法，谭嗣同被召进京，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但不久，西太后反对新法，夺取光绪政权。1898年8月6日谭嗣同被捕，13日被害牺牲，时年33岁。①

谭嗣同的著作大都收入《谭嗣同全集》。其代表作《仁学》（五十篇，分二卷。首界说二十七条），内容庞杂，观点前后自相矛盾，且富主观幻想。他把宗教、哲学以及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都糅合在一起。书中重点反映了他企图变法维新、救国救民的社会政治思想。同时，联系了不少近代自然科学知识，

---

① 孙叔平：《谭嗣同的生平和著作》，载《中国哲学史稿》（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9～471页。

从天体演变到生物进化，从机械力学到声、光、化、电以至人体生理学等，并试图用以解释自然现象（包括心理现象），表现有某种唯物主义的进步倾向。

在谭嗣同的著作中，《仁学》、《以太说》、《论全体学》等涉及了有关心理学思想，表现在他对人、心的看法上。对感觉、知觉、思维、语言、睡眠和梦、精神病以及知行、善恶等方面均有所述。现将其主要心理学思想分述如下：

（一）对“人为万物之灵”的看法

1. 认为人是由物质进化而产生的

谭嗣同借用当时“以太”这个物理学上的名词作为他表达世界本体的概念，认为以太是形成宇宙的物质（“以太”也叫“媒能”，是过去科学家假定的一种光、热、电、磁的介质，后来发现是不正确的，并不存在这种物质）。他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佛教语，即从宇宙到人类社会）。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名‘以太’。”[①] 他描述了“以太”形成天体、生化万物、生出人类的状况：“天地万物之始，一泡焉耳，泡分万泡，如溶金汁，因风旋转，卒成圆体，日又再分，遂得此土，遇冷而缩，由缩而干，缩不齐度，凸凹其状，枣暴果暵，或乃有纹，纹亦有理，如山如河，缩疾干迟，溢为洪水，干更加缩，水始归墟，沮洳郁蒸，草蕃虫蛹，璧他利亚（细菌 bacteria），微植微生，螺蛤蛇龟，渐具禽形，禽至猩猿，得人七八，人之聪秀，后亦胜前。”[②] 就这样，由物质的进化产生了人，人是最高级的动物。

①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著：《仁学》一，载《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以下引用该书版本同此），第 293 页。

② 谭嗣同：《仁学》二十五，载《谭嗣同全集》，第 330 页。

2. 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语言和智力

谭嗣同说："尝论人为万物之灵，所以能著其灵者，于语言声音著之。"①"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方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耳。"②他还认为人为世界万物中的最"灵物"，能起最大的作用，还在于有"智"。他说："犹太古初生，先有蠢物，后有灵物，物既日趋于灵，然后集众灵物之灵而为人。今人灵于古人，人既日趋于灵，亦必集众灵人之灵而化为纯用智，纯用灵魂之人。"③他又说："'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是则但为人之智力所能为而禽兽所不能为者，无不可以学而学会而会且通为一学一会也。"④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智力"，可以学习通晓知识。谭嗣同的心理学思想中，在"人为万物之灵"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唯物主义成分。

（二）对人的感知觉、思维认识过程的看法

1. 重视研究人体

谭嗣同掌握一些生理学知识，很重视对人体的研究。在他的《论全体学》(即生理学）中说："人在世界上，有几件事不可不知，一曰天，二曰地，斯二者前已言之详矣。今日所讲，更有切要者，则为全体学。在天地之间不知天地，已为可耻，若并自己之身体不知，不更可笑乎？"⑤如他对人脑及神经系统如何产生感知觉的描述："'以太'之用之至灵而可征者，于人身为脑，其别有六：曰大脑、曰小脑、曰脑蒂、曰脑桥、曰脊脑；其分布于四肢及周

---

① 谭嗣同：《管音表》自叙，载《谭嗣同全集》，第253页。
② 谭嗣同：《湘报》后叙下，载《谭嗣同全集》，第418页。
③ 谭嗣同：《仁学》四十六，载《谭嗣同全集》，第365页。
④ 谭嗣同：《治事篇第九群学》，载《谭嗣同全集》，第443页。
⑤ 谭嗣同：《论全体学》，载《谭嗣同全集》，第403页。

身之皮肤曰‘脑气筋’（神经）。”[①] 他还把脑和电联系起来，“脑气筋”遍布全体，比之“电线之四达”，以说明人能感觉、知觉：“有物骤而与吾身相切，吾知为触，重焉，吾知为痒为痛。熟知之？脑知之。所切因手足之末，非脑也，脑何由知也？夫固言脑即电矣，则脑气筋之周布即电线之四达，大脑小脑之盘结即电线之总汇。一有所切，电线即传信于脑而知为触，为痒、为痛，其在极灵，其行极速，惟病麻木痿痹，则不知之。由电线已摧坏，不复能传信至脑，虽一身如异域然，故医家谓麻木痿痹为不仁。”[②] 他还说：“任举万事中之一事，如一言，如一动，如一歌泣，如一思念其为事亦至庸无奇矣，而要皆合全体之脑气筋而显，以我之脑气筋感我之脑气筋，于是乎有知觉……以我之脑气筋感人之脑气筋，于是乎有感应。”[③] 人有知觉，能感应，“大抵全体竟是一付绝妙精巧之机器”[④]。在这些论述中，谭嗣同认为“歌泣”、“思念”是脑气筋发动，他把高级的人类思维、情感描绘为低级的物质的机械运动。知觉、感应也是脑气筋之间的动作，他把脑比作电，把脑气筋比作电线，把人看成一架绝妙精巧的机器等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解释。

2. 认为思维的器官是人脑

他说：“抑尝有悟于思，谓思在脑，脑之形有量而思无量，或一世界或数世界，或恒河沙数世界，莫不朗悬目前，了了可辨。”[⑤]“西国则谓心不能思而思特在脑。脑分大小，大脑主悟，小脑主记及视听之属，脑气筋布满四肢百体，则主四肢百体之知觉运动。所谓心

① 谭嗣同：《仁学》二，载《谭嗣同全集》，第295页。
② 谭嗣同：《仁学》三，载《谭嗣同全集》，第295页。
③ 谭嗣同：《以太说》，载《谭嗣同全集》，第432页。
④ 谭嗣同：《论全体学》，载《谭嗣同全集》，第403页。
⑤ 谭嗣同：《仁学》十六，载《谭嗣同全集》，第314页。

者，亦徒主变血之事而已。夫中西论心，不同如此，愚谓其理实亦相通。思固专在脑，而脑之所以能思者，全赖心能变血以养脑，是心与脑交相为用也，故思字从囟，从心。脑之主思，古人盖已知之矣。"①他虽认为大脑管思维，但他认为只要凭空"冥思苦想"就能"顿悟"出一切。他还用佛教法相宗的语言描述人的认识过程。他认为人有八识：第一眼识，第二耳识，第三鼻识，第四舌识，第五身识，前五识管理视、听、嗅、味、触；第六识为意识，管思维也管感觉；第七识为执识，联系第八识与前六识，为第六识之根；第八识为藏识，总管一切。可见他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

（三）对意识、睡梦、疯癫的看法

谭嗣同认为意识是"大脑之用也"，由"脑气之动"而产生。他说："脑气之动法各异也，吾每于静中自观，见脑气之动，其色甚白，其光灿烂，其微如丝，其体行曲缭绕。其动法，长短多寡有无，屡变不定，而疾速不可名言，如云中之电，无几微之不肖。信乎脑即电也，吾初意以为无法之动，继乃知不然，当其万念澄澈，静伏而不可见，偶萌一念，电象即呈，念念不息，其动不止……"②这完全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主观臆想。他还说："脑气之动者，意识也，大脑之用也。为大脑之体者，藏识也。其使有法之动者，执识也，小脑之体也。为小脑之用者，前五识也。惟睡梦、疯癫，辄无法之动，意识未断，执识先断也……"③他把高级的意识现象等同于低级的机械物理运动，把大脑的活动等同于电的活动，把睡梦、疯癫说成是"脑气之动"出了问题，是"断识本有定序……今全倒其序，是以成为无法之动也"。④还说："睡梦者，

① 谭嗣同：《论全体学》，载《谭嗣同全集》，第403页。

②③ 谭嗣同：《仁学》四十五，载《谭嗣同全集》，第363页。

④ 谭嗣同：《仁学》四十五，载《谭嗣同全集》，第363页。

乃其平时前五识所受之染……孩提无梦，智识未盛也，愚人无梦，藏识不灵也，至人亦无梦，前五识不受染也。此睡梦之脑气动法也，推之疯癫亦应如是，惟前五识未断耳。"[①] 这都是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

（四）对心、心灵学的看法

谭嗣同对"人"的研究，包括对人的全体学（即生理学）和心灵学（即心理学）都很重视。他认为有关天、地、人的知识，天文学、地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四种学问是"群学群教之门径"。如在他的《仁学界说》二十七条上说："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②]

关于对"心"的看法，由于他弄不清物质和精神二者的关系，谁是第一性的这个根本问题，他的论述也就不会是正确的。如他借用物理学的名词"以太"，本来是个物质的概念，可他又经常给"以太"许多精神性的解释，和"仁"、"性"、"灵魂"等同起来，甚至认为"仁"比"以太"更根本，并提出一个精神性的概念"心力"来代替它，这样把物质等同于精神，精神成为本源，第一性的，也就是说"心力"可以决定一切、主宰一切，是唯心主义观点。他还用"心力"去解释社会现象，认为社会的"劫运"和"治化"都是"心力"造成的。他说："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③]；"缘劫既由心造，亦可由心解之"[④]。他认为"人为至灵，岂有人所做不到之事？何况其为圣人？因念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④]。他还认为"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

① 谭嗣同：《仁学》四十五，载《谭嗣同全集》，第363页。

② 谭嗣同：《仁学界说》二十七，载《谭嗣同全集》，第293页。

③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十，载《谭嗣同全集》，第460页。

④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十，载《谭嗣同全集》，第460页。

慈悲”[①]，研究心力以“慈悲之念”能使“天下之机心皆可泯也”[②]。所以谭嗣同提倡“开一学派，合同志以讲明心学，心之用莫良于慈悲，慈悲者，尤化机心之妙药”。他过于夸大了“心”的作用，并将“心”神秘化了，显然是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从以上来看，谭嗣同具有一些生理学的基本知识（在其著作中专门写有《论全体学》，并在南学会作过该题目的演讲），也有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和天文学上的一些科学概念。他用来说明有关心理现象时，包含了一定科学真理的因素，具有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成分。但他随后又用佛教、基督教或孔孟儒学的概念去解释，就完全变成了宗教唯心主义的了。对有一些心理学问题的论断，由于科学知识的贫乏，当时生理学水平发展的限制，多是主观臆想、牵强附会，是不科学的，有的竟达到庸俗荒谬的地步。

四、梁启超的心理学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典型代表之一，戊戌变法时期的组织宣传家，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祖父为教谕（过去县学或府学中的教官），父为私塾先生。他早期受传统的儒家教育。11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人，18岁接触西学。1891～1894年，就学于康有为主持的万木草堂，深受变法思想影响。甲午战争后，忧愤时危，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从事变法维新的组织和宣传活动。1895年4月，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当时在北京进行举人

① 谭嗣同：《仁学》四十三，载《谭嗣同全集》，第357页。

②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十，载《谭嗣同全集》，第467页。

会试，梁启超联合广东、湖南举人上书都察院要求拒签对日和约，这在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参与“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为《中外纪闻》撰稿。1896 年任《时务报》主笔，撰《变法通议》。1897 年在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和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湘学新报》，倡新学、批旧学，鼓吹变法维新。1898 年 3 月，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到北京，与谭嗣同等维新派积极投入变法运动。6 月，梁启超奉命在总理衙门查看奏章，参加新政筹划。7 月，光绪亲自召见梁启超，谈论提倡西学和设立学校问题，并对他的才华和识见大加奖励，赏他六品衔，专办大学堂、译书局等事务。不久，变法失败，9 月他出逃日本。他和康有为初到日本时，坚持改良主义立场，拒绝孙中山主动提出联合共同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11 月在横滨办《清议报》（后来为《新民丛报》），梁启超任主笔，写文章鼓吹保皇，反对革命。1899～1904 年间，梁启超参与策划“庚子之役”（1899 年，与唐才常等决议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袭取武汉作为根据地，武装勤王，拥立光绪皇帝复辟，后被张之洞所镇压）。他还到南洋、加拿大、澳洲、美洲游历。1906 年梁启超又投入清朝的立宪活动中，1901～1911 年，他发表了大量谈宪政的文章和论述清朝财政改革和外交政策文章。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以立宪党人为基础，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1916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又与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后又与段祺瑞合作曾任财政总长。1918 年离开政界，游历欧洲一年多。在欧期间，国内爆发五四运动，他反对打倒孔家店。1920 年春回国，开始集中精力和时间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担任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并兼做南开几所大学的教授。1929 年 1 月 19 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 56 岁。

梁启超兴趣广泛，知识渊博，著作繁多。在 1920 年以前，他

结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写了大量的介绍外国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文章和不少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法学、文学等文章，具有一定学术价值。1920年以后，他集中精力从事著作和学术活动，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系统研读佛经，编著《中国佛教史》等；从事先秦社会史研究和先秦思想史研究；1922年出版专著《先秦政治思想史》；1924年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6年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两书。晚年，他又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提倡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是"新文体"的创造者，开启了近代中国白话文。把文体从古文中解放出来，是他一大功劳。他的作品大部分编纂为《饮冰室合集》，内分《文集》和《专集》两部分，共40册。

梁启超对西方心理学是很重视的。在戊戌政变后，东居日本，游历澳、美等地，接触了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读了不少西方的政、经、史、地、文、哲之类的书籍，使他的学识和思想大为开阔而驳杂。他自述："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①] 从他的《饮冰室藏书目录》中，可以看到他有我国早期的法国心理学译本和日本心理学书籍11种之多，其中大多为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个别为教育心理学和佛学心理学方面的。从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掌握一些外国心理学，并力图加以应用。梁启超的心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教育心理

梁启超力主变法。法从何变？他认为在于"育人才"、"开民

①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1903）附录《夏维夷游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第五册，第186页。

智”，要废科举、兴学堂。戊戌政变后，他东居日本，于1902年写有《教育政策私议》一文。文中主要议及“教育次第”问题，即应按青少年儿童的生理、心理的年龄特点划分教育期。他说：“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今试取日本人所论教育次第，撮为一表以明之。”[①] 这个“教育期区分表”中，划分了四个教育期：(1)“5岁以下家庭教育期，幼稚园期（幼儿期)”；(2)“6～13岁小学校期（儿童期)”；(3)“14～21岁中学校期（少年期)”；(4)“22～25岁大学校期（成人期)”。并从身体发育生理特点，特别从知、情、意三方面和“自观力”（人我相）心理特点加以分期比较。虽然对知、情、意以及“自观力”的描述有不够确切处，但是具有一定科学性。他认为这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依据，应依此结合当时中国教育实际情况提出改革意见。他说：“由此观之，教育之次第，其不可以躐等进也明矣。夫在教育已兴之国其就学之级，自能与其年相应；若我国今日之学童，则其前此及年之日，未获受相当之教育。其德、知、情、意之发达，自比文明之学童低下数级，而欲骤然授之，乌见其何？然则中国最速非五年后不可开大学。虽其已及大学之年者，宁减缩中学之期限而使之兼程以进，而决不可放弃中学之程度而使之躐级以求也。”他还说：“求学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认为“教育之次第”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之次第。

梁启超在教学心理方面，主张教学必须记忆与理解相结合。他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指出：“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何以故？悟性主往(以锐入为主)，其事顺，其道通，通

①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教育次序第一》(1902)，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四册，第33～36页。

故灵。记性主回（如返照然），其事逆，其道塞，塞故钝。是故生而二性备者上也，若不得兼，则与其强记，不如其善悟。何以故？人之所以异于物者，为其有大脑也，故能悟为人道之极。凡有记忆也，亦求悟也，为其无所记，则无以为悟也。悟赢而记绌者，其所记恒足以佐其所悟之用（吾之所谓善悟者指此非尽弃记性也，然其所记者实多从求悟得来耳，不可误会）。记赢而悟绌者，蓄积虽多，皆为弃材。惟其顺也，通也，灵也，故专以悟性导人者，其记性亦必随之而增。惟其逆也，塞也，钝也，故专以记性强人者，其悟性亦必随之而减。"[①]在他看来，"记性与悟性（记忆与理解）是教学过程中两个重要的心理因素，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②]。

（二）对心理学和哲学译名和分类的看法

我国1902年出版的《新世界学报》上分有经学、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地理学、物理学、理财学、农学、工学、兵学、商学、医学、算学、辞学、教育学、宗教学等18门，介绍思想界、文化界的"新说名论"[③]。梁启超对此分类，在《新民丛报》上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其分类颇欠妥惬者，如其中心理学一门，最为鄙意所不敢苟同，统观三号，其心理学门皆论哲学也"[④]。因为当时心理学和哲学的译名混淆，还没有统一的译法。梁启超对此明确地加以区分。他说："日人译英文psychology为心理学，译英文之philosophy为哲学。两者范围截然不同，虽我辈译名不必盲从日人，然日人之译此，实颇经意匠，适西方之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1896)，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一册，第46～47页。

② 朱永新：《中国近代教育心理学思想研究》，载《心理学报》1990年第3期，第334页。

③ 《新世界学报》第1号至第3号，1902年，第95页、35页、47页。

④ 《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第3页。

语源相吻合。”[①] 他不同意《新世界学报》把“心理学皆论哲学”。他说：“且既以 philosophy 冒此名，则于 psychology 又将以何语译之。此吾所不敢苟同也。psychology 与 ethics 即伦理学皆为 philosophy 中之一门，吾以为宜立哲学一门，而以心理伦理皆入之，似为得体矣。”[①]梁启超在心理学和哲学的译名的区分和统一译法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仍把心理学归入哲学一门，却未能提出独立列为一门。

（三）社会心理

梁启超在 20 世纪 20 年代整理出版的几部著名的史学著作中经常应用“心理”、“社会心理”、“国民心理”、“群众心理”、“个性”、“人格”等概念，并用以说明和解释史实或作为史料的研究分析方法。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困难及其研究资料的复杂有所论述，他认为“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各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又如心理学等，其资料虽俯拾皆是，无所谓散失不散失，然而无具体的物象所指，且其态稍纵即逝，非有极强敏之观察力不能提取，故学者以为难焉。”[②] 他还说：“吾前言人类活动相而注重其情态，夫摹体尚易，描态实难，态也者，从时间方面论，过而不留，后刹那之态方呈，前刹那之态已失；从空间方面论，则凡人作一态，实其全身心理生理的各部分协同动作之结果，且又与环境为缘，若仅为局部的观察，睹其一而遗其他，则真态终未由见。”[③] 他能提出观察心理学资料，以及由于各种因

① 《新民丛报》第 18 号，1902 年，第 3 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第 7 版，第 54 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第 7 版，第 49 页。

素的复杂性，仅从局部观察的方法是不能揭露出心理现象的“真态”，这是很可贵的。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对社会心理的论述很多。当时的西方史学家以社会心理、民族心理作为研究历史的方法很盛行。梁启超说：“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①] 他是非常赞扬社会心理学的。但在他的史学著作中把心理的作用过分夸大，貌似有理，实为历史的唯心主义，主要表现在：

1. 用心理去解释政治

他说：“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治，总是国民心理积极的或消极的表现”，因而“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②] 我们知道政治、心理都属上层建筑的东西，都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某一社会的政治形式和心理状态之间虽自然存在相互影响，但所有这些，都要从某一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去解释，而不能仅用心理去解释。

2. 用心理去研究历史

他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理之发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③]，“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③]。因此，他研究历史或史迹的方法是只有“深入心理之奥”才能发现历史的真相，并且应以“伟大人物的心理”作为核心研究，就抓住了历史的全部本质。完全是“英雄传即历史”的史观，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7版，第173页。

②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附录先秦政治思想，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五十》第十三册，第185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7版，第167、180页。

理论。

（四）佛学心理

所谓“佛学心理学”是不科学的，而梁启超却说佛学对心理的分析“是极科学的”。在1923年6月，在向中华心理学会作的题为《佛教心理学浅测》[①]（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的讲演中，他把佛学对于人类主观意识的歪曲分析，完全附会成西方心理学，反映了他的宗教唯心主义观点。他说：“我确信：研究佛学，应该从经典中所说心理学入手；我确信：研究心理学，应该以佛教教义为重要研究作品。”认为“佛家所说的叫做‘法’……就是心理学”。如小乘俱舍家说的七十五法，大乘瑜珈家说的百法，五蕴、十二因缘、十二处十八界、八识、四圣谛八正道等种种法门所说修养工夫，都是说明心理现象的，都是心理学。他还说就学问大概的分类说佛学所讲“心识之相”的学问就是现代欧美所谓的心理学。

梁启超还认为佛教经典全藏八千卷能用一句话包括：“无我无所”，再省略可用两个字“无我”。他说佛学为什么这样注重心理学呢？因为把心理状态研究得真确，便可以证明“无我”的道理，也就是“五蕴皆空”的道理。这个道理的实质就是客观世界的一切，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我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忘掉自己和一切，在自我意识中幻化成“无”或“空”，尘世间的“无限苦恼”就会统统不存在了。

他在这篇“佛教心理学”中，主要对佛学“五蕴”的内容性质，引用佛语加以附会心理学的分析，他认为“五蕴”即是色、受、想、行、识，佛家以为皆是心理的表象。简单地说，色蕴是有客

---

① 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载《心理杂志选存》，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586～601页。

观性的事物，是客观性较强的现象，有实形实象，可以说属于所谓物的方面。受蕴是感觉，想蕴是记忆，行蕴是作意及行为，识蕴是心理活动之统一状态；此四蕴都是内界心理活动现象，像是离外缘而独立，靠名词来表其性质，这类心理现象，佛家称非色，也叫名，属所谓心的方面。梁启超对佛学“五蕴”作了一一的解释。为了说明“五蕴之无常相无实体”，他将其比为“某处森林虽历久尚存，那组织成林的树已不知多少回新陈代谢，五蕴的相正复如此，渐次集积，渐次散坏，无一常住”。他的最后结论是：“所谓人生，所谓宇宙只是事情和事情的交互，状态和状态的衔接，随生、随住、随变、随灭复随生，便是五蕴皆空的道理，也便是无我的道理。”他说：“佛家讲‘无我’的好处就是教人脱离无常苦恼的生活状态，归到清净轻安的生活状态。”要怎样明白“五蕴皆空”的道理或“无我”的道理呢？他说关键是“转识成智”。又怎样“转识成智”呢？“用佛家所施设的方法虚心努力研究这种高深精密的心理学”。

从梁启超这篇演讲稿，可以看出佛教经典中如何利用人类的意识活动论证物质世界全是人的主观意识的虚幻的唯心主义本质。

五、孙中山的心理学思想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山是他革命初期，在日本用过的化名“中山樵”的简称。出身于农民家庭。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少年时，先后到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读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学到了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1892 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

孙中山很早就有革命觉悟。1885 年中法战争失败，他即认识到清朝的腐败，决心倾覆。1894 年他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的建

议，未被采纳，遂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并在香港成立总会，立志推翻清朝。1895 年 10 月，在广州筹备武装起义未成，被迫流亡日本，转赴欧美，考察政治。1898 年国内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仍组织保皇，当时孙中山和他们都在日本，对他们争取无效。1900 年孙中山派郑士良等在广东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失败。孙中山再游欧美。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1912 年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为总理，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创办《民报》宣传革命，批判康、梁等改良派。从 1905 年至 1911 年，孙中山组织了八次起义，都归于失败。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帝被迫逊位。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由于反革命军阀窃取了领导权，革命遭到失败。他继续向军阀开展革命斗争。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于 1917～1919 年，在上海完成《建国方略》一书。后来，他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革命。由于积劳病剧，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

他的著作主要有《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涉及有关心理学思想，尤其在《建国方略》中“心理建设”部分较多。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对人的心理的看法

孙中山学习了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由于他曾学医，特别是掌握了生理学的知识，并对人的心理以及心理学都有所了解。他还以此作为他革命理论思想的依据，以概括自己的革命实践，所以他的看法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孙中山认为自然界是由“以太”物质进化来的。同时，他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的说法，“气”在“理”先，把“太极”

这个物质概念作为宇宙的本源；在论证物质与精神二者关系上，他认为是"体"与"用"的关系。他说："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①"地球本来是气体……日久就凝结液体，再由液体固结成石头……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可以推究人类的来源，地质学家考得人类初生在二百万年以内，人类初生以后到距今二十万年，才生文化。二十万年前，人和野兽没有什么大分别，所以哲学家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渐进化才成今日世界"。②他认为地球形成后，又产生了"生元"（即细胞），进而有了动物、植物，再由动物（猩猩）进化成人，即"由生元之始而至于成人"。③"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生元之构造人类及万物也……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④他还说："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⑤孙中山接受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肯定了人是动物长期进化发展来的。但他把人所特有的性能"知觉灵明"、"动作思为"、"主意计划"、"良知良能"都归之于细胞，错误地把"生元"看成具有"知觉灵明"等作用。在

---

①③⑤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以下引用该书版本同此），第156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载《孙中山选集》，第694页。

④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载《孙中山选集》，第121页。

这里他忽视了人和一般生物的本质区别。

当孙中山在其他地方谈到人的精神时，他认为即使科学发达“有制造之人”同真人一样，也不会有真人的精神。他说，“人的精神不能创造”，所以“不得谓之人”，“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① 在这里他肯定了精神是人类所特有的，从而说明了人与生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克服了上面提到的错误。他也认为人的精神产生于客观存在。他说：“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②“事实”即客观存在，“言论”即属精神、思想。孙中山指出了人类心理的产生对客观事物的依赖性。

但是孙中山过于夸大了人的心理作用，如他说：“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③ 他用“心理”来解释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认为政治、经济、革命、建设、文化和道德、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等等一切社会事物和现象都是人类“心理之现象”的表现。他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④ 孙中山看到了社会心理和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于“万众之心理”上，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在此同时，却又夸大、突出了心理、精神作用。人心、万众心理、社会心理虽有一定重要作用，都是构成“万事”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不能说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全部力量。

---

① 黄昌穀编：《军人精神教育》，载《孙中山先生演说集》，民智书局1926年版，第118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载《孙中山选集》，第703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载《孙中山选集》，第169页。

④ 同上书，第116页。

（二）知难行易说

知行问题是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孙中山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原因在于受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思想的毒害。他说：“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传之数千年，习之全国四万万人心理中，久已认为天经地义而不可移易者矣。”“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①] 他十分重视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他认为这种“知易行难”的说法是“心理之大敌”，是实现革命的最大障碍。因此，孙中山为了改变“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①]的“知易行难”说，自己创立了“知难行易”说，并称之为“心理建设”，作为建国方略之一。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企图说明革命理论和建设知识的极大重要性，号召革命党人都来重视，并下苦功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不要畏难，敢于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知难行易”说的道理，对当时革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也是对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知行关系问题的一种重要贡献。

其实，“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知”和“行”都各有“难”、“易”，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虽然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中，讲知行的难易似乎多于知行的先后，这在他当时的处境中是对的，但他还是以“行先知后”为基础的。他认为人类很早就会做很多事情，但就是一直不知会做的道理，只有经过数百上千年的“行”后，才逐渐“知”道的。就此而言，“知”和“行”相比，“知”是难的，而“行”是易的。这是他的“知难行易”说的实质所在。从作为认识基础来说，孙中山认为人

---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载《孙中山选集》，第116页。

们是"先行后知"的。因此，他的"知难行易"说也包含了知行学说的唯物主义重要思想。如他在《心理建设》中，举例饮食、用钱、作文、建筑、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和进化论等十件事详细分析和证明"知难行易"说。同时，说明人类的认识是在行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行"才能"知"。"知"是从"行"中产生的，并作用于"行"，而且"行"可以证明"知"是否有用。他说："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① 孙中山阐述了自己的"行先知后"的观点。他还说："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而后人之受前人也，似乎无意中得之。"② 这段话表达了"行先知后"的思想，同时说明间接经验中包括前人实践的道理。他在《三民主义》讲演里，提出了"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③ 这个见解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实践为主"的原理的。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试验"作为"行"的内容。孙中山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行先知后"的见解，并进一步提出注重"实行"、"试验"等新观点，这种以"实践为主"的思想是对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知行关系问题的又一种贡献。知行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心理与实践关系问题，心理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人的心理产生于实践，发展于实践，这一重要心理学思想，可以说在孙中山的知行观中是极有意义的。

孙中山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也有不合乎科学的看法。他把人类认识进化过程以不同的知行关系先后划为三个时期："第一由草昧

① 黄昌毅编：《对桂林学界欢迎会演说词》，载《孙中山先生演说集》，第251页。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载《孙中山选集》，第160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载《孙中山选集》，第703页。

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然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1] 他这种机械地划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的先后不同时期，割裂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是不科学的。因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知"随"行"的发展而发展，"行"也随"知"的发展而发展。知与行，理论与实践是反复结合的长期过程，并不因历史阶段不同而有实质性的不同。

（三）对"智"的看法

智力问题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孙中山在《军人精神教育》里说："智何自生？有其来源，约言之厥有三种：一由天生者，二由于力学者，三由于经验者。中国古时学者，亦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说，与此略同。凡人之聪明，惟各因其得之厚薄不同，稍生差别，得多者为大聪明，得少者为小聪明，其为智则一，此由于天生也。"[2] 看来，孙中山是受了孔子的影响。在《论语·季氏》上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3] 孔子指出"生而知之者上也"，紧接着就说"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学习的结果，是后天的。孔子还说："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也就是说，这些"下等人"之所以不知，也是由于不学的结果，这里后三种人显然是大多数，都是由于后天学或不学的缘故。所谓"生而知之者"，孔子也认为他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应该说"生而知之者"是没有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智力的先天因素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载《孙中山选集》，第161页。
② 黄昌穀编：《军人精神教育》，载《孙中山先生演说集》，第124页。
③ 朱熹注：《四书五经》（上册），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70页。

和后天因素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承认先天因素是有的，并有个别差异，可是聪明才智的大小，主要还看所受后天生活条件的实际影响如何，个人主观努力如何，特别是有关教育的影响如何，聪明的大小主要不取决于“得天之厚薄”。孙中山在其他地方也曾明确地说：“夫人不能生而知之，必待学而后知。”① 认为人的聪明才智是后天学习的结果。

孙中山还根据“得天之厚薄不同”即根据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把人划分为三种：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他举一盖大洋楼的实例：“以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是后知后觉，砌砖盖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② 这只能说明人的“知觉”有先后，并不能认为这是区分人的差别，这种划分是不正确的。

①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载《孙中山选集》，第2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载《孙中山选集》，第767页。

第二章　中国近代心理学发端时期

本章主要论述：中国清代末期西方心理学的初步传播，最早西方心理学的译书及西方心理学以日本为桥梁的间接传播。

第一节　西方心理学的初步传播

一、早期教会学校与心理学的传播

心理学在我国最初的传播与外国传教士及其设立的教会学校分不开。早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沿海地区开始设立为教育中国儿童的学校。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权，其中包括了在中国传教和建学校的特权。教会学校随着传教活动的发展而逐渐扩充和增多起来。

（一）中国最早学习心理学课程的人

1839 年，美国传教士布朗（1810～1880）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为纪念 1807 年由英国传道会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道士马礼逊。他于 1834 年卒于中国）。该校于 1842 年迁至香港，1850 年解散。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传播西学的“洋学堂”。当时容闳、黄胜、黄宽等六人入此校学习初等算术、英文、国文等课。1846 年 12 月，学校主持者布朗因妻子生病请假回国。容闳、黄胜、黄宽三名学生亦随布朗赴美留学，他们于 1847 年 4 月到达美国纽约。在布朗和其他美国友人的帮助下，他们三人进马萨诸

塞省芒松学校读书。[1]当时美国尚无高等中学，仅有预备学校，芒松即预备学校中最著名的，他们肄业此校，为入大学做准备。芒松学校校长海门对校内惟有的三个中国学生较好，将他们列入英文班，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其中生理和心理两科是由一位女教师 Rehekan Brown 所教。容闳等三人是我国最早学习心理学课程的人。

容闳（1828～1912）号纯甫，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1835 年，他 7 岁时随父至澳门，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之夫人所设“西塾”，此塾为马礼逊学堂之前身。1939 年 11 月马礼逊学堂正式成立，他在该校学习至 1847 年赴美留学，入芒松学校。1850 年考取耶鲁大学学文，1854 年毕业。他是我国最早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之一。回国后，以教育后进为己任，他有一个愿望，欲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他同样的教育，那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可以革新，成为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因他看到清政府的昏聩腐败，镇压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他曾希望通过太平军实现他“为中国谋福利”的理想。1860 年，他亲赴太平军中考察，并向洪仁玕提出新政建议七条，但由于失败，在此不能施展他的抱负而拒绝留在太平天国工作。1864 年，容闳受曾国藩委派建成我国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并赴美国购买机器。1872 年，容闳先后组织了四批（每批 30 人）官费留学生，这是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之始。他曾任留美学生监督和驻美副使。1898 年，容闳参加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避居上海租界，1900 年参加了唐才常等组织的上海“张园会议”（为拥护光绪帝当政），他被推为会长，被清政府指名通缉，1902 年再度去美避难。1912 年病逝于美康州

① 顾长声：《布朗带容闳等赴美留学》，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9～100 页。

哈特福德城，葬于西带山。[①]

黄宽（1828～1878）又名黄绰卿，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他与容闳同学十年，与他一起赴美留学，在马省芒松学校毕业后，1850年赴英，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1855年毕业后，继续攻读病理学和解剖学课程，并获得硕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个毕业于英国大学的硕士留学生。1857年，黄宽回国行医，1858年回广州，在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1824～1901）所管的伦敦传教会（后交给广州中华医药传教会）开办的金利埠仁济医局当医生；1859年广州博济医院开业，黄宽协助该院院长嘉约翰工作。1862年起，黄宽参加培养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的教学工作，他一直在该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兼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这是我国最早系统地培养西医的教会医学校。此外，黄宽还在海关兼医官。嘉约翰编译医药词汇，许多译名是同黄宽研究确定的。黄宽一生从事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直至1878年10月15日逝世。[②]

黄胜比容闳和黄宽年长，1847年抵美后，他因病于次年秋即回国，未能完成学业。他回国后在一家英商报馆工作。从1861年至1886年的25年间，他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1815～1897）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理雅各是早期著名汉学家，他在中国著名学者和改革家王韬协助下，把中国经典的儒家书籍，如《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名著译成英文，向西方传播介绍，对西方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文学思想都产生一定影响。黄胜对理雅各译书的印刷出版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7页。

② 顾长声：《嘉约翰》，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79页；金林祥：《近代中国第一个留英学生——黄宽》，载《百科知识》1984年第11期，第11页。

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共有28卷之巨。由于采用英、汉对照和详加注释，在排版印刷方面，黄胜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为中学西传作出了贡献。①

以上所述容闳、黄宽和黄胜三人都是从幼年时就到外国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上学，后由教会资助，随传教士去美国留学的，并有机会初次接触了心理学课程。他们三人同班同时听同一位教师讲授心理学课。当时的情景，在1909年容闳用英文写的回忆录 *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1915年由恽铁樵和徐凤石译成中文本名为《西学东渐记》中，叙述了一段：“在芒松学校之第一年（1847年），予等列英文班中，所习者为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其生理、心理两科，则为布朗女师所授。”容闳对布朗女师还有专门的描述：她“毕业于霍来克玉山女校之第一人也，后与医学博士麦克林结婚，遂寓于斯丕林费尔。布朗女师之为人，操行既端正，心术仁慈，尤勇于为善，热心于教育。夫妇二人待予感极诚挚，每值假期，必邀予过其家，及予入耶鲁大学肄业，处境甚窘，赖渠夫妇资助之力尤多……”容闳与布朗女师一直有往来联系，成为良师益友。容闳、黄宽和黄胜在芒松学校只是学习了心理学知识，日后并未专门从事心理学工作。不过他们三人确是最早学习到了心理学课程的人，这在我国的心理学史上，应是值得记叙的一件事。

（二）中国早期开设心理学课程的教会学校

在我国最先开设心理学课程的学校是清末在华北的著名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英文校名 Teng Choa College（登州书院）。校址在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创办者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

狄考文（1836～1908），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兹波格人。

① 顾长声：《理雅各》，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30页。

他1854年中学毕业，为基督教徒。1858年毕业于杰佛逊大学，他立志要成为一名牧师，进美西神学院，1862年毕业后即当牧师。1863年受美国长老会差会的派遣于7月带妻子从纽约来中国。1864年1月到达山东登州开始进行传教，并于同年8月开始招收贫困孩子开办蒙养学堂。1873年狄考文扩充蒙养学堂，添办相当于中学程度的"正斋"，使之成为包括中学和小学"备斋"两级制的学堂。至1876年正式定名为文会馆，一直到1904年文会馆与英国浸礼会设在山东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迁至潍县（今山东潍坊），改名为广文学堂（1917年，逐步扩展为设在济南的齐鲁大学）。狄考文在校外还负责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1908年患急病去世，葬于烟台山上。①

狄考文从1876年起，把蒙养学堂改称文会馆，由一般小学升格为书院，分备斋（三年）和正斋（六年）两个学部，这一共九年的课程。狄考文要求学生首要学习的是宗教教育，其次为儒家经典，再次为西学。西学中除自然科学外，还学一些社会科学，包括世界历史和地理以及最后一年（即正斋第六年）要学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后三门课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课程。"② 由于现在掌握的材料仅看到1891年公布的山东登州文会馆正斋、备斋分年课程表，正斋第六年课程有："心灵学（即心理学），是非学（即逻辑学），讲易经全，讲系辞，读文，作文七日二课，微积学，化学辨质，天文揭要，富国策（即政治经济学）。"③

---

① 顾长声：《狄考文》，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81页；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② 顾长声：《山东文会馆的情况及其影响》，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89页。

③ 陈学恂：《王元德、刘玉峰：山东登州文会馆正斋备斋分年课程表（1891年）》，载《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尚未见 1876 年公布的课程表，故对现称的心理学一词，当时是否已译称“心灵学”（*Mental philosophy*），又何人教授，用何教本，均未能查考。

狄考文于 1877 年 5 月，被推选为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全体大会上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对外称益智书会）委员之一，并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决定编写初、高级两套中文教科书，初级教科书由傅兰雅负责，高级教科书由林乐知负责，并审定编辑方针和出版计划，在两套教科书中所列科目包括编写心理学[①]（当时对 *Mental philosophy* 的译称不详）。

狄考文在 1881 年 2 月 14 日向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正式提出把文会馆改为大学的计划书中，有八条具体计划，其中第三条为学制六年课程，包括学习心理学（当时对 Mental philosophy 的译称不详）。美国长老会差会批准了狄考文的这个计划，但校名暂不变仍称文会馆。[②]

稍晚于山东登州文会馆开设心理学课的是上海圣约翰书院，它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若瑟将圣公会早年设立的培雅和度恩两校合并，在上海梵皇渡成立的。于 1879 年 9 月开学，由圣公会会长、中国牧师颜永京主持教务，并讲授心理学课。他边教边译了美国 Haven 著 *Mental philosophy* 一书，书名译为《心灵学》，于 1889 年出版上本，为我国第一部汉译心理学书（将在本节下一部分详述）。圣约翰书院先后设立文理学部、神学部、医学部和预科。“1904 年后，改组为完全大学，该校重视心理学教学的传统一直保持着。西学斋正馆普通科规定第三年开设心理学课程。1911

① 陈学恂：《韦廉臣：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载《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第 86 页。

② 顾长声：《山东文会馆的情况及其影响》，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291 页。

年进一步规定文艺科和医学科均开设实验心理学。""在该校1912年招生简章中，关于应用心理学一项有如下说明：高级生上下两学期读教员宣讲以及练习试验方法、问题应对，每礼拜三小时。课本用铁去纳所编之实验心理学，史乞登所编之实验心理学及其进化参考书则用孟斯德堡所编之心理与生命，麦歇而所编之审美学要旨，路史所编之社会心理学，少恩大爱克所编之教育心理学及心理学比较，孟斯德堡所编之治心术，老治所编之生命与物质，勃欧拿生所编之天演进化，路司所编之中国改革等书。是课之所需者学生须能独出心裁作长篇论说关于中国教育或社会之心理学者。""从1904到1913这十年间，在圣约翰大学列为教材的西方心理学专著尚有：哈拉格心理学，雅各心理学，乾姆司心理学概要，墨道格生理的心理学，梅亚实验心理学。"①

此外，早期的教会学校还有1893年成立的通县潞河书院，它是由1868年开办的潞河男塾，1886年改为潞河中学，1893年升格为书院的。美国传教士谢卫楼（1841～1931）任校长。当该校第一批六名学生于1892年毕业时，他们已学过心理学（*Mental philosophy*）。② 谢卫楼用中文编写过不少教科书，其中1907年出版《心灵学》③（即心理学），1911年又再版。1904年潞河书院改为华北通州协和大学，1918年该校与北京汇文大学等校合并，于1919年改称燕京大学。

从上述三所早期教会学校可以看到西方心理学在我国的最初传播。在当时，心理学一般被视为必修课和神学的预科，为其宗

① 马文驹：《清末民初心理学译著出版中的若干问题》，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第42页。

② 曾钜生译，（美）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③ 顾长声：《潞河书院的建立》，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12页。

教服务的，是很受重视的一门课程。

二、早期西方心理学译书

（一）颜永京译《心灵学》

从西方心理学发展史来看，自古代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心理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混在一起，相互交织而难分。所有心理学问题都是由哲学家附带研究，并且是用思辩的方法加以论述的。特别是西欧封建社会，整个学术都打上了基督教、神学的烙印，成为教父哲学的一部分内容。及至17世纪中叶文艺复兴以后，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直至19世纪属哲学中一部分的心理学（即哲学心理学）具有显著的发展。这时期虽然没有专业的心理学家，许多哲学家却都有论心理学的专著。有的哲学家本身是牧师，从事神学研究，所撰写的心理学专著还带有宗教的色彩。中国第一部汉译心理学书就是由颜永京牧师翻译的美国神教学士约瑟·海文著的 *Mental philosophy*（《精神哲学》），[①] 中译本名为《心灵学》。

颜永京（1839～1898）字拥经，原籍山东，后由北方迁至福建厦门，其父在沪经商，母为上海崇明岛人。他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2月22日出生在上海县城小东门附近王家码头。幼年时入私塾，受过诵读《三字经》、《四书》的传统教育。1848年进入由美国圣教会主教度恩开办的教会学校，即是后来圣约翰大学的前身。1854年他年满15岁，与其英文教师波因斯和一学友结伴赴美留学。他先寄宿在一位牧师家，作了两年左右的入学准备后，考入哥仑比亚语言学校。1857年又升入俄亥俄州甘比尔镇建阳学院（又译称凯尼恩学院 Kenyon college）继续学习，并于1861年毕

① 西方过去常将哲学分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 和“精神（心理或心灵）哲学”Mental philosophy 两类。后者是指心理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的哲学心理学。

业。在颜永京毕业前。1860年秋或1861年春，他学习了J. Haven的 *Mental philosophy* 课程。1862年回国，先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任翻译。不久，在同文书局工作，后改为上海租界工部局的通事。同时，他研究神学，参加"基督教日校"和虹口救主堂的工作。1868年5月去武昌。1871年他正式任牧师，在武昌筹建文华学堂，后来扩充成文华书院、文华大学，嗣后称华中大学，为长江中流的有名学府。他在武汉一带兴学布道，先后历时12年之久。1878年，颜永京回上海，与圣公会主教施若瑟一起改建圣约翰书院，它是由度恩学堂和培雅学堂合并于1879年9月正式成立的。颜永京任院长八年，主持院务并兼授课程，教过心理学。他边教边译了美国海文著 *Mental philosophy* 一书，并于1889年出版，译名《心灵学》（上本，下本未付印）。这是我国最早汉译的一本哲学心理学书。

颜永京还翻译了英国斯宾塞的《肄业要览》(*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1882年（光绪八年）由上海格致书院发行。还提要译纂过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和《科学导源》等书。在上海同仁医院教授生理学时，还订正过赫胥黎的生理学中文译本。1885年他从圣约翰书院退职，担任虹口圣公会救主堂的牧师，同时主持"祈祷圣书委员会"工作，编辑了不少中文宗教书籍。1886年他参加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即益智书会）的编辑工作，并为该会委员。1893年3月，颜永京在《万国公报》第五十期上刊载了由他最初翻译的日本驻美公使森有礼编之 *Education in Japan*，汉文称《文学兴国策》，又称《日使文学汇集》。① 这是森有礼为兴建日本教育问题向美国各界13位著名人士书信讨教

① 该集后来（1896年）由林乐知和任廷旭完成全文译稿，并以二人共同翻译的名义出版发行单行本。

后，将各位的回信编辑成文而发表的。由此可见颜永京十分注意效仿国外教育改革的成果，并为西学东渐作出贡献。同时，颜永京也很重视儿童教育，如他1894年编写出版的《知识五门》，1897年编写出版的《史略便蒙》。《史略便蒙》即为学童授读，使其“稍长识见以渐启聪明”的一本自汉迄明简而精的历史书。他晚年曾到国外进行过短期访问，约1888年访问日本，1894年访英国和美国，这时他因患高血压症，身体已不太好。访英是为参加反鸦片贸易活动，他拖着病躯在大小城市巡回讲演，站在街头向人们陈述多年来鸦片在中国造成的危害。此外，他反对中国妇女“缠足”，推行“天足会”的工作，为清除“缠足”的恶习作出了努力。他还抗议和试图改变上海“外滩公园”禁止华人入内的规定。颜永京很爱国，但他的思想行为受其社会历史的局限，更遗憾的是他对心理学本身没有进行过研究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太少，这不能苛求于他了。1898年6月20日，颜永京因肾炎病逝，葬于上海县城西门外。[①]

颜永京所译之原著全称为：*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原著者约瑟·海文（1816～1874）是一位牧师、教师和学者。他出生在1816年1月4日，美国马萨诸塞州丹尼斯镇的一个牧师家庭。幼年时，随父迁居到阿姆赫斯特城。海文在当地专科学校准备后，1831年考入阿姆赫斯特学院，他主要集中学习古典语言和历史；同时分散地进行数学、科学和哲学的学习。1835年他毕业时，成绩优秀，在班上发表演说“迷信的起源”。他到纽约一个聋哑人的慈善机构教书两年，同

---

① 曹舒丽安：《我的外祖父颜永京牧师》，载颜惠庆著《颜惠庆自传》，（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91～296页；谢洪赉：《颜永京先生事略》，同上书，第297～300页；儿玉齐二：《颜永京牧师——将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载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第37号，1989年日文版第234、235页。

时他在联合神学院开始研究神学。1837 年他到了安多弗神学院，两年后在这里获得神教学士学位。1839 年至 1846 年，海文在马省阿施兰基督教公理会任牧师；1846 年至 1850 年在马省布罗克林基督教公理会任牧师；同时他还在这个教区的公理会从事编辑工作。1850 年是他一生经历的转机，他被聘为阿姆赫斯特学院心理和伦理哲学系的主任，并在第二年担任教授职务。他放弃了牧师职务，从此以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858 年 8 月他辞职，接受聘请到芝加哥神学院任教，教“系统神学”课程。直到 1870 年，由于健康原因而辞退。回家后，他继续传教和讲演，1874 年 5 月 23 日因患伤寒病逝。

对于海文早年在阿姆赫斯特学院时的教学，有人评论说他“教苏格兰哲学，逻辑清楚、系统有力、例证恰当、风趣幽默”，这是他独有的特点。他在壮年时期，素有“能把极枯燥的课题讲得生动有趣”的声誉。人们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做出许多实事的实干家，而且在雄辩口才方面是富有情感热情的人。海文的主要著作有《精神哲学》(1857)、《道德哲学》(1859)、《哲学与神学的研究》(1869) 和一本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史》(1876)。这些著作在国内外被广泛阅读。①

在西方 19 世纪中叶，有些哲学家就开始重视心理学，在当时还没有广泛应用“psychology”这一名称，而有人已经开始写心理学的书籍，常用“Mental philosophy”这一名称。海文的 *Mental philosophy* 第一版出版于 1857 年，以后又再版多次（据现在所知有 1872 年、1873 年、1876 年和 1879 年版本）。这本书约有 600 页，

① 约瑟·海文，载《美国人传记词典》英文版，第 409～410 页；儿玉齐二：《奚般氏心理学》原作者海文传记，载《日本文化的原点的综合探究》，日本评论社刊 1984 年日文版，第 109～110 页。

内容比较全面。西方早期的心理学书只注意认识方面，海文的书则涉及本能、情感、意志、社会等方面，书中有许多德国哲学的影响。在美国当时有两本比较出名的教科书：一本就是约瑟·海文的《精神哲学》；另一本是弗朗西斯·魏兰德的书，他的书比较枯燥，影响不大，没有海文的书有较大影响。① 海文的这本书是根据平时授课，边教边积累而写成的，用词通俗，论述完备，能够启发读者。

全书内容分绪言和三篇。绪言有两章讲心理学的性质及其重要性与心理能力的分析和分类。第一篇智能，首先分三章讲意识、注意和概念，然后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感知能力，主要论述感觉、知觉；第二部分表征能力，分两章论述记忆和想像；第三部分反省（或思考）能力，分两章论述综合过程——概括化和分析过程——推理；第四部分直觉能力，又分四章论述直觉的性质、直觉提供的真理和概念、美的概念和认识与正确的概念和认识。在这篇后有两章补充，分别叙述人的智慧超越于动物的智慧和脑与神经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对心理的影响。讲了睡眠、梦、梦游症和精神病。第二篇感受性，首先分两章主要讲感受性的本质和感受性的分析和分类，然后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简单情绪，又分两章讲本能的情绪和理性的情绪；第二部分论述情感，分两章讲，仁慈的情感，包括对亲戚、朋友、家乡、祖国的爱；怨恨的情感，包括妒忌、报复等；第三部分欲望，分四章讲各类欲望：如幸福、知识、权力、占有、社会（交际）等欲望以及希望和恐惧等。第三篇意志，共分七章，论述了意志的性质、促成行为的要素、意志与其他官能的关系、意志自由、动机和意志力量等。最后提到上

① 罗培克著：《美国心理学史》，1952 年英文版，第 72～75 页。

帝的权力超越人们的心理和意志。[1]

距今140年前，海文沿用了康德（1724～1804）的知、情、意三分法论述了心理现象。它和我们现今所说的心理学大体相当，尽管当时在西方，心理学还不是独立的科学。从内容看，其中有不少基本见解都是可取的，显出哲学心理学的进步趋势。但也看出身为牧师的海文，没有脱离宗教神学的羁绊，他的心理学思想观点是与当时基督教传播、宣讲的教理、教义是一致的。

颜永京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以海文心理学为教本开设了心理学课（1879年），并汉译出海文原著，出版《心灵学》一书（1889年，上本）。他在该书序中，曾提到其选择海文著作的原因。他说："西国论心灵学者，不一其人，而论法各异，予独爱名儒海文氏之作，议论风生，考据精详，窃取以为程式，而译言之……"在此序中，颜永京首先介绍了什么是心理和心理学（他译称心灵和心灵学）。他说："盖人为万物之灵，有情欲、有志意，故西士云人皆有心灵也。人有心灵而能知、能思、能因端而启悟、能喜忧、能爱恶、能立志以行事，夫心灵学者，专论心灵为何及其诸作用。"他还在序中说明学习心理学的重要性和译书经过："夫固备详其义，学者当以之为根本也，西国书院之例，童生肄业凡四年，至季年知识宏开，然后从事于此。余昔游学美国曾读之，而知其书之裨益良多，前在圣约翰书院曾逐日将大略翻译汉文教授后学，而学者似乎得其益处，予以为凡肄业者欲立为学之本，不可不读是书，爰将前译者，选词考义，补辑成书，颜曰心灵学。"

他为什么译"*Mental philosophy*"为心灵学呢？分析有如下可能：（1）当时颜永京还不知道有"心理学"这个名称，他译为心灵学乃源于希腊文"心理学"原意，即"灵魂学"之意；（2）颜

① 约瑟·海文著，《精神哲学：包括智、情、意》，1873年英文版目录。

永京译的《心灵学》，开头即讲“人为万物之灵”和“人有心灵”之意，故译称“心灵学”；（3）颜永京按照我国古籍中，对“心”、“性”精神的东西统称“心灵”，而译称“心灵学”。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早于颜永京在1879年圣约翰书院教授心理学课的是山东登州文会馆，它于1876年升格为书院时，在正斋第六年即讲心理学课了，但尚不知何人讲授，有无译书，亦未见当时所列课程表（只见1891年课程表已译称心灵学）译何名称。还有1877年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计划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教科书的决议中，也列有心理学科目，但是均未见当时对“Mental philosophy”的汉译名称是否已称“心灵学”。这样看来，如果还未译出此名称，颜永京有可能即是“心灵学”名称的创译者。

颜永京翻译海文著作时是极为困难的，不仅“心灵学”一个名称的译法，还涉及到许多心理学用语如何翻译的问题。正如他在序中说：“……其中许多心思，中国从未论及，亦无各项名目，故无称谓以达之，予姑将无可称谓之字，勉为联结，以创新称谓。读是书者，从外面以窥，似属模糊莫辨，而精心以究，不难贯彻由来，庶其谅之……其间文气或不雅驯，所创之称谓或不的确，实由创译之故。后有博学君子，将是书精益求精，译文进于美备，是则予之所深望也夫。”① 由于他新创的译词和全书译文均为古文言，内容十分艰涩难懂。因此，他新创的“称谓”，即心理学用语的译词，也未能沿袭下来使用。

《心灵学》译书只出版上本，共有276页。1983年有人发现在其家藏之《心灵学》上本书中，夹有一铅印卡片。文曰：“近因身体违和不能校辑自如，所以下本未及同时刊刻，然断不至久延时

① 颜永京译：《心灵学》，益智书会，1889年（光绪十五年）出版，第1页。

日，愿诸君共谅之。颜永京具。”卡片背面用英文印有同样内容。[1]关于下本手译稿存否，尚无从查考。该译书由益智书会校订刊行，它是专为各教会学校编审教科书的委员会，该会规定以“宣扬宗教”为编书原则。显然，《心灵学》仅在教会学校有所影响。长期以来，在我国心理学界，对此书鲜为人知。尽管如此，颜永京翻译的《心灵学》，虽是一本哲学心理学，但从时间顺序来讲，它应是我国的第一部汉译心理学书，在我国心理学史上是一件珍贵的重要史实。

此外，在颜永京译海文原著称为《心灵学》的同一时期，日本最早的心理学译书也是从海文原著 *Mental philosophy* 译成日文的，但比我国出版要早 14 年。日本译者西周把 Haven 译为奚般，*Mental philosophy* 译为《心理学》。现在日本心理学界一般认为西周译的《奚般氏心理学》是日本第一本心理学译书，而且“心理学”名称是在该书首次使用，是由西周所命名。这是他沿用中国古书中属于心理的研究称之为“性理”的概念，从“性理学”的名称改译为“心理学”这个名称的。我国和日本现在都使用“心理学”同一汉译名称，在心理学译语方面彼此都有相互影响和吸收（将在下节第二部分详述）。

（二）王国维译《心理学概论》和《教育心理学》

心理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是通过 17～19 世纪哲学心理学的研究和 19 世纪生理心理学的研究，心理学得到了它的体系、科学事实和研究方法才有条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国际心理学界公认 1879 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创建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作为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标志，成为“科学心理学”的开始。我

---

[1] 马文驹：《清末民初心理学译著出版中的若干问题》，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 年第 1 期，第 41 页。

国著名学者王国维于1907年重译丹麦海甫定原著、英国龙特原译的《心理学概论》(*Outlines of Psychology*)。这本原著出版于1882年，是一本科学心理学。王国维所译的这本《心理学概论》曾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汉译心理学书”①。更确切地说应是我国“从西方心理学直接译过来的第一部科学心理学书”②。另外，王国维于1910年还从日文重译了一本美国禄尔克著的《教育心理学》。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家境贫寒，7岁入私塾，16岁考取秀才，18岁以前接受旧教育。18岁这年（1894）发生中日甲午之战，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22岁离家至上海追求新学。一面在《时务报》任书记校对，一面进罗振玉（1866～1940）所办的东文学社读书。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日文和英文，并受到罗振玉的赏识。此后，长期受其援引推荐。在学社中有日本教师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均是研究哲学的。王国维偶然得见田冈在文章中引述康德和叔本华的学说片断，开始引起了他对哲学的志趣。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东文学社解散，王国维提前毕业，这时他已在学社学习了两年半，学习英文也有一年半，并且仍继续自学英文。1901年他到武昌农学校从事译述讲义和书籍。这一年教育世界出版所印之《教育丛书》初集中，王国维译有《教育学》（日本立花铣三郎讲述）和《算学条目及教授法》（日本藤泽利喜太郎著）。二集中译有《教育学教科书》（日本牧濑五一郎著）；三集中译有《西洋伦理学史要》（英国西额惟克著）。这些译文都多少联系到心理学的内容。1901年秋，罗振玉资助王国维赴日留学。在东京白天学习英文，晚

①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略》，载《教育心理研究》1941年第1卷第3期，第26页。

② 我国当时还有从日本心理学间接转译过来的西方科学心理学，并且比之更早。

间到物理学校学数学。1902年夏，因患足疾回国，在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堂任执事，暇时仍从藤田学英文，兼编译《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从这时起他开始决心研读哲学。1903年因南洋公学文科停办，罗振玉又推荐王国维到通州（即南通）师范当教员，担任心理学、伦理学诸课程。这时他27岁就已读过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西书，并且以日文译本参照阅读，收效很大，特别好读康德和叔本华的书。1904年秋，罗振玉任苏州师范学校监督，王国维亦自南通往苏州，在苏州师范学校主讲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这时藤田也在苏州，王国维仍向其学习和钻研叔本华的著作，并撰文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这一时期王国维已写有：《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红楼梦评论》、《释理》和《叔本华与尼采》等文。1905年王国维仍在苏州讲学，并对康德哲学进行第二次研究，重读康德的书，并决心以后数年专力研究；除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外，还读康德的伦理学和美学著作。继续撰文有：《书叔本华遗传说后》、《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学家之天职》、《论平凡之教育主义》等，并将前数年间所刊之文汇集重刊名为《静安文集》。这年冬天辞职返里。1906年王国维到北京，对康德哲学进行第三次研究。1907年他任清廷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局编辑，主管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他重译的丹麦海甫定著《心理学概论》即在这年首次出版。这一年他对康德哲学进行了第四次研究，但他发现康德哲学有“不可恃处”，不可信。他说：“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其理而又爱其误谬。”这个矛盾使他感到“烦闷”，觉得哲学高深莫测，自己“知力苦寡”，因而放弃哲学转向于文学研究了。这两年来，他还撰写了不少有关西方哲学、教育学等研究的文章。如：《原命》、《教育小言十则》、《教育小言十三则》、《古

雅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嗜好之研究》、《论小学唱歌之材料》等等，刊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后来汇集重刊为《静安文集续编》。1908年以后，王国维就与哲学分手了，但他所受西方的“先验论”、“唯意志论”等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却永远不曾消除。康德、叔本华、尼采唯心主义哲学构成了王国维思想体系的核心，对他一生的评文、论学、为人、处事都有重要影响。[①] 王国维对教育学是有研究的，他发表了不少关于教育的言论和主张，多为教育行政制度课程设置的意见，也受到当时社会上的相当重视。他把教育分为体育与心育。心育则从心理的三分法（知、情、意）出发，相应地提倡智、德、美三育。他认为心育和体育全面调和发展就是完人教育。[②] 在1910年王国维还翻译出版了一本美国禄尔克著、日本柿山蕃雄和松田茂合译的《教育心理学》。1911年他因逃避辛亥革命，随罗振玉再次东渡日本后，就一心一意去搞国学了。他晚年于1923年被召为故宫“南书房行走”，成为废帝溥仪的老师，并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和清华研究院教授。1927年他畏惧进步潮流，在北京颐和园投湖自尽，终年50岁。

从以上王国维早年至30岁前后的履历来看，他从事心理学的时间并不长。他阅读心理学是在他专力研究哲学期间断续插入进行的。如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次岁春（1903年）始读翻尔彭（Fairbanks）之社会学、器文（Jevans）之名学，海甫定（Höffding）之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Paulsen）之哲学概论，特尔彭（Windelband）之哲学史。”1903～1905年冬，他先后在江苏通州和苏州两师范任教心理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19～20页。

② 王国维：《论教育宗旨》，载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720页。

学课（同时还任社会学、论理学课）。可能《心理学概论》翻译成稿亦在此期间。这样累计来看，他仅有三年左右的时间是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但他对我国的早期西方心理学的引进介绍和启蒙作出了贡献。在他30岁以后和他晚年均从事文学和史学等其他工作了。[①] 他在“文学、戏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等学科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盛誉”[②]。

现将王国维重译的两本心理学书主要内容体系分述如下：

1.《心理学概论》

王国维译之《心理学概论》的原著者海甫定（1843～1931）是丹麦的哲学家，哥本哈根大学哲学教授。他的著作除1882年出版《心理学概论》外，还著有《近代哲学史》（1895～1896）、《宗教哲学》（1902）和《近代哲学家》（1912）等。他的哲学思想是受康德、叔本华和英国实证论和进化论的影响。[③]《心理学概论》原著是用丹麦文写的，1886年被译成德文，1891年又从德文译成英文 *Outlines psychology*（《心理学大纲》），英文版的译者为 Mary E. Loundes（龙特）。英文版曾经原作者校对和加注，补充了当时新的科学发现（见英译者注）。[④] 英文版从1891年至1919年曾再版八次，可见此书很有国际影响，并且行销很广。王国维是根据英国龙特译本重译成中文的，书的译名为《心理学概论》。

全书共有七篇，百余章节，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心理学理论专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20页。

② 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前言，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③ 陈元晖：《王国维与海甫定的心理学》，载《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④ 海甫定著，龙特译：《心理学概论》，1919年英文版。

著。该书体系结构：前四篇为心理学之对象及方法，精神及身体之关系，意识与无意识之关系，心理的原质之分类；后三篇为海甫定根据康德的知、情、意三分法为知识之心理学，感情之心理学，意志之心理学。①

该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它吸取了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化学、物理学和生理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取得的飞跃进展的新成果。书中明确提出“心理学必须为一门独立之学，而不可为哲学之一部分”，“心理学全具博物学之性质”。海甫定为心理学下了“暂时之定义”：“心理学者精神之科学”，“心理学为论思、感且欲之科学”，“心理学为纯粹经验之一科学”；他还说：“吾人所谓精神者，不外意识之义，即内界经验（感觉、思想、感情、决断等）之总名。”他用意识概括了人的全部心理活动。海甫定论述“心理学之方法”说，“一学之对象离他学而独立者，其方法亦不可不独立乎”，介绍了“以实验法研究之，于是生理学与心理学之间，生一种之新科学，所谓精神物理学或实验心理学”。该书阐述应用主观方法必伴以客观方法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心理的生理机制，“各心理上之作用必伴以生理上之作用，而努力发见之，又说明之”。该书还介绍了大脑、神经系统、反射运动等生理学知识。

海甫定认为知、情、意三部分是相互关联的。他论述了“无无感情之知识”、“无无意志之知识”、“无无知识之感情”、“感情与意志之联络”。知识、感情、意志三者之中起中心作用的是意志。海甫定认为意志是人的心理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中的最始者，也是最终者。意志在人的心理活动中是贯彻始

① 海甫定著，王国维重译：《心理学概论》目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0页。

终的本质东西。人的全部意识生活都是通过意志来表现的。他在书中的第七篇专论意志心理学。他首先就讲到意志是最始的而又是最终的心理现象，贯彻到心理活动的全过程。这反映了海甫定的唯意志论的思想。

王国维译海甫定的《心理学概论》的原因，有人认为海甫定是唯意志论的哲学家，其思想来源于康德和叔本华。而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也是来自康德和叔本华，与海甫定是同一来源，所以海甫定的心理学著作受到了王国维的重视。[①]这固然是一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当时清末兴办新教育制度，于1903年颁布推行了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师范学堂规定了设立心理学课程。王国维1903～1905年正在江苏通州师范和苏州师范教心理学，为了教学工作的需要，他阅读和翻译了当时畅销的《心理学概论》作为师范学堂用书。该书1907年首次翻译出版（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版），后又再版约有十次。现查到的版本有：1915年（民国四年十一月）6版（分上、下二册）；1926年（民国十五年九月）8版；1931年（民国二十年六月）9版；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国难后第1版，均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列为《哲学丛书》发行。从发行年限之长、出版次数之多，可见这本译书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也是我国早期心理学书籍中水平较高的一本。

2.《教育心理学》

美国禄尔克著《教育心理学》，由日本柿山蕃雄与松田茂合译，王国维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夏四月）重译出版，清学部图书局印行。原著 *Psychology in Education* 于1895年由美国图书公司出版。原著者禄尔克是肯托克学院教育学系主任，对其生平以及日

① 陈元晖：《王国维与海甫定心理学》，载《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译本出版日期和日译者情况均不详。

从该书之绪言中，得知禄尔克“久当教育教师”，“此书为普通教师而作”。他著书时以他多年的教育工作经验，深知心理学对学校教育应用上的重要。他说：“心理学之对教育学，与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之对医学无异。教师须知精神之活动，视医生之须知身体之官能及功用，与其通常及变常之状态，无以异也。”“教师须能言所以教算术或历史之故，及其所以如是教授之故。与医生之须能言用此药饵于此病或用彼药饵于彼病之故无以异。医生须知某药之及于身体之特效。故教师亦须知学校之某练习或课程及于精神之某能力之特效也。故教育学除原本于心理学外，不能成一科学。而自幼稚园至大学校之教师，其教授之价值，实与其心理学之知识相比例也。”“教师欲善用心理学之知识以指导其职业”。这也是他所以著《教育心理学》的原因。

全译书共有226页，分21篇。除绪言一篇外，有四篇分别论述精神现象之分类，精神之物质基础，精神、意识，精神活动之条件；有七篇论述知力（包括感觉、记忆、判断、想像），感情（包括情绪、感应、欲望），意志等。各篇均先阐述心理学原理，然后联系“教授上之应用”，以便于教师实践。有六篇论述领受力、推理力、表出力、创造想像和意志之修养等。最后三篇：一篇为心理学之于形式教育上之应用，形式教育问题包括教育机关制度、学校制度及其行政，对学生贯彻体育、智育、德育以及学校管理法；另两篇为方法论和精神研究之方法及记述。

禄尔克著书时说：“力避形而上学之思辩”，“所用之语大抵据著名心理学家之著述”。书中有专门一篇“精神之物质基础”，介绍了神经系统大脑的生理学知识。他特别重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讲到具体的记述方法（示范出表格、观察问题、如何记录等）。介绍研究心理现象时，认为除内观法外，用外观法矫正其

偏，以“比较法、试验法与教室所用之方法”，“补足其所不能供给之材料”。介绍试验室法时，评论了精神物理学。

此书内容较通俗，力求结合教育实际需要，适合清末新学制建立后师范生和教师使用。虽然未见再版本，但在当时对我国师范教育有所贡献。书中某些课堂教学的心理学基本原则至今尚用。

从王国维重译的两本心理学书中所用的心理学名称及词汇来看，不少已接近现在应用的心理学基本词汇。他采用的心理学译词是从日本译词沿用过来的。因王国维既会英文也会日文，日文中的译词又多为汉语，更便于使用。他看英文书籍时，常以日文译本参照。海甫定的《心理学概论》，日本于1895年由石田新太郎已从英文译成日文，书名译为《心理学》，有可能王国维会以此日译本作为参照。禄尔克的《教育心理学》即是从日译本重译过来的。在王国维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谈到西方新的学术思想的传入，认为中国言语不足，不得不造新名，主张沿用日本已定之译语。他说：“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学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①] “且日人之定名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两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①]王国维还认为日本之译语较自己创造的中国古语词义精密，他解释说：“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①]在此文中他“试以吾心之现象言之如 Idea 为观念，Intuition 之为直观，其

① 王国维著：《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遗书》（五），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第 99～101 页。

一例也夫……"[①]举例详释其译法，他对译词是颇有研究的，对后世的心理学译词是有影响的。

第二节 西方心理学的间接传播

一、日本在传播西方心理学中的桥梁作用

我国传播西方"科学心理学"是从20世纪初，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改革旧教育开始的。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京师大学堂办的师范馆（后由大学分出称优级师范学堂，即今日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在通习科目中即设有心理学。[②]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又重订颁布并推行了《奏定学堂章程》，在这个新学制中师范教育分为优、初两级。优级师范学堂公共科和分类科（民国元年改为预科和本科）的必修课程中都设有心理学，加习科（民国元年改为研究科）设有实验心理学。[③] 由于清末民初的学制，基本上仿效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学校所用教科书或讲义也多译于日本，所以这个时期的心理学教材大都是转译日本心理学（即日本编译的西方心理学）。自编的心理学教材也多出于留日学者，主要参考日本心理学的内容。当时师范馆和师范学堂还聘来教授心理学的日籍教师。此时西方心理学是以日本作为间接渠道进行传播，日本起了桥梁或媒介的作用。

---

① 王国维著：《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遗书》（五），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99～101页。

② 北师大编写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优级师范科》，载《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第5页。

③ 陈景盘编：《师范教育》，载《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页。

（一）最早来自日本的心理学教师及其《心理学讲义》

最早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心理学的“正教习”是日籍教师服部宇之吉。现存有他讲述的一本《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中文本。此讲义的内容为当时西方“心理学之最新者”。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可算我国最早来自日本的心理学著述。

服部宇之吉（1867～1939）生于日本福岛县二本松。青年时就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后曾在第三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以后曾任文部大臣的秘书官、视学官等职。1899年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助教授。为研究汉学来到中国留学，时值义和团反帝运动，北京围城九周，服部居住公使馆区曾记录情况，后来写成《北京笼城记》（1926年刊）。1900年秋回国，曾一度去德国莱比锡大学及柏林大学讲授汉学及调查有关研究方法。此后又来中国，已提升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并获文学博士学位。1902年9月，服部赴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他到任即着手制定京师大学堂师范和仕学两馆的学科课程和各种规则、入学考试手续等；同时，建立教室、实验室、宿舍，并购进机械标本、图书等。师范馆于1902年12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阴历十一月十八日）正式开学。服部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创办出了力。服部本人除担任师范馆的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和伦理学的教学外，还以“正教习”的身份对师范馆的其他日本教习进行监督指导，并就有关师范馆全面管理情况向中国当局提出建议。服部在师范馆执教六年，于1909年归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研究中国哲学，曾长期任东京帝大文科大学教授及该校文学部部长、京城帝国大学总长、对华文化事业调查委员、东方文化学院理事长等职。此外，他曾任过一年美国哈佛大学日本讲座教授，讲授过有关儒教问题。他的代表作有《清国通考》（1905年刊）、《东洋伦理学纲要》（1916年刊）、《儒教与现代思潮》（1918年刊）、《孔子

教大义》(1939年刊）等。[①]

服部宇之吉是清末由日本人任教习的第一人，他也是师范馆教授心理学课的第一个心理学教师。当时由他的翻译助教（称东文分教习）范源廉（后曾为校长）译述他的讲义。服部讲授心理学课时，还发生过一个故事："有一天服部宇之吉讲心理学，恰巧张之洞（当时为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来查学。服部正在讲人的记忆力，说是中年的时候记不起少年或幼年的事情，因中年事多，把少年所经过的事遮盖了，等到老年的时候，往往把中年的事忘了，于是少年及幼年的事，反而浮现出来，所以人到老年，往往可以想得幼年的事了。这一段关于记忆力问题的讲述，竟然触怒了张之洞，他以为服部是讥笑他的。后来，商定学堂课程时，曾经一度要想取消心理学，不过因为服部是外国人，张之洞对他也就无可奈何了。"[②]

关于服部宇之吉所授之心理学讲义，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一本线装本（原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此书为京师大学堂讲义一套四本书的第二本（书套中第一本为京师大学堂伦理学、经学讲义，由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讲述；第三本为京师大学堂中国史、万国史讲义，由大学堂教习屠寄撰；第四本为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经济学讲义，由大学堂教习邹代钧撰）。全套书均无具体出版日期和单位，仅在第一本上注有"庚子辛丑间"字样，这有可能是全套书的出版日期，也可能只是第一本书的出版日期。该线装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也只有提要部分和第一篇知之作用及

① 阿部洋著：《京师大学堂与服部宇之吉》，载《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日本福村1990年日文版，第155～160页。

② 北师大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其理法部分的三章内容。[①]关于该书出版单位，在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上，載有“心理学讲义　卷（未注明几卷）商务印书馆京师大学堂讲义本，日本服部宇之吉讲述”。此处也无出版日期。对该讲义内容有一简介：“第一篇凡四章，首曰感觉之作用及理法凡七节，发明味、嗅、触、听、视、筋肉感觉之主观性及发达；二曰知觉之作用及理法，发明触知、时间、幻觉、融会之作用；三曰想像作用及理法；四曰思想作用及理法。二篇凡五章，言情之作用及理法；提要全书大旨以心与神经系统相关切而以感觉各理发明之，盖言心理学之最新者。”[②] 看来，也不是全卷书的内容。

现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一本全书内容的洋装铅印本，也无出版日期和单位。线装本心理学讲义的出版日期，推论应比庚子辛丑间（1900～1901）稍迟，可能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2年开办至1903年。洋装本心理学讲义出版日期稍后，可能在1904～1906年。

《心理学讲义》全书239页，约7万字，分四部分。首先为提要即绪论又分七节：心理学释义、心之发动、心身之关系、心之发动与心识、心理学与他学之关系及异同、心理学之门类、心理学研究法。然后依心理活动的知、情、意三分法，分三篇论述：第一篇知之作用及其理法，分四章：感觉、知觉、想像、思想；第二篇情之作用及其理法，分九章：恐怖及忿怒、同情及爱情、自我之情、异性相爱之情、情之简单者进而成复杂者之理、社会的情及道德的情、宗教的情、悦美的情、知的情。第三篇意之作用及其理法（不分章）。[③]

---

① 服部宇之吉讲述：《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

②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石印本，亥四月（1935年）卷5，第11页。

③ 服部宇之吉撰：《心理学讲义》（洋装本），无出版单位日期，第1～5页。

该讲义体现了科学心理学的特点，认为科学在于寻找客观规律。服部宇之吉在提要的第一节心理学释义中，开头即讲："学也者，就一类之事物，必考求其理法，且将所求而得之理法，循一定之次序而排列之，使该类之事物，悉为理法所统，且能致一切理法各得其处，于是知识皆有秩序，有统一，然后谓之学。"他给心理学下的定义是"心理学者，就心之发动作用，考求其理法者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研究心理活动作用的发展规律。当其论述心身关系时，强调"心之作用与神经系统之关系甚切也"，"今心理学者以脑髓为心之所在，更析言之，则以脑髓中之大脑为心之所在也"。凡论心之作用"又以生理的作用之变化言之"。讲义中还介绍了心理学"最新之学"：有比较心理学"由进化之说观之"，"比较人与禽兽之心，以考求其作用发达之次第与理法"；有实验心理学"此仿化学、物理、生理等诸学之法，专用实验法，以研究心之作用"；有儿童心理学"此就初生至四五岁之儿童，视其心之作用，以考求其发达之次第及理法"；还有民族心理学"考求民族之心之作用者"。此外，在书中有关章节中还例举了心理学的实验，如讲到刺激与感觉的关系时介绍了韦伯定律："心理学者用实验法，以考求其理法，遂知刺激强弱之增减，据几何级数，而感觉强弱之增减，据算术级数，是所谓卫尔巴氏理法者也。"又如测感觉粗精的实验法："用二针，同时触指头之二地，此时二针相距甚近，尚能生二压感觉，然至于脊，则二针相距稍远时，方能生二感觉，即指头之感觉力精于脊也。"讲义中均引用中国古籍上的实例说明心理现象，如"乐记曰，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大学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孟子曰心之官则思"等。又如讲性格时，联系中国古代说性：有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等。由此亦可看出服部宇之吉著此书是以中国学生和读者为其主要对象的。该讲义

"由简单者讲起，而渐至于复杂者，即由下等作用，渐近于高等作用"，从心理发展观点进行讲述。从这本讲义可以看到我国当时，心理学从日本输入后，西方心理学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融合和初步传播情况。

《心理学讲义》除作为师范学堂的心理学课程教本，为每个师范生的必读课本外，也是当时在中国和日本行销的新书。我国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1882～1913)，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曾读过这本《心理学讲义》。他评论说："观服部宇之吉心理学讲义，服部博士现充北京大学堂教习者也，书中言心理分知、情、意三者，三者又分条析缕，甚为了明透彻，余始知心上之发动作用皆有理法，不容紊也。"① 并有联系实际的学习体会，他说："见美色而爱之，此为心理上自然的本能，即据服部氏心理学说言人之心理有知、情、意三者，见而辨其美，知的作用也。辨之为美而爱之，情之作用也。此二者皆为生物的本能，即生之谓，性之谓。若因爱之即欲得之，而遂动念，而遂决志，此则属于意的作用，而善恶、是非、利害之别矣。故爱色而至于意（志念）的作用，则须审慎矣。"②宋教仁对《心理学讲义》粗读后又精读一遍，并"撮其要作表以记之"③，他以列表的方法加强记忆，从始至终作了读书札记。可见这本《心理学讲义》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

（二）早期译自日本的心理学书

清政府仿效日本的新学制，把心理学列为师范馆和师范学堂的教学课程，译自日本的心理学书日益多起来。除了上述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外，在1902年和1903年翻译出版的中译本日本

①②③　陈旭麓主编：《我之历史（宋教仁日记）》，载《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5、588、631页。

心理学书，现存的还有四本：1902年有日本久保田贞则著《心理教育学》；1903年有张云阁译日本大濑甚太郎、立柄教俊合著《心理学教科书》；上海时中书局编译所译心理学讲义，名为《心界文明灯》；沈诵清译日本井上圆了著《心理摘要》。

由于19世纪末，许多西方国家都重视运用心理学去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日本移植过来的西方心理学中，也是用心理学的原理去解释一些教育问题。当时日本的《普通百科全书》里，教育学中包含有心理学的内容，"以心理学为教育学之扶助学"①。我国清末开办师范学堂，习修心理学，也是把心理学知识应用在教育上，使心理学为教育服务。因此，当时所译之心理学教科书或讲义，内容大都是与教育密切相关。如最早的一本久保田贞则所著书名即称《心理教育学》，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出版。该书正文126页，书序和目录20页，共146页，约5万字。译者未署名，作为教育丛书，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该书局为当时香港文化商人冯镜如开设，有一批翻译人员出版外文书籍，其出版权益得到当时英国领事的备案合法庇护。② 著者日本久保田贞则生平不详，也不知原著出版日期。原著内容"参合东西之群说"，力图用心理学的原则原理解释教育、教学上的问题。顾燮光在《译书经眼录》中有一简介："是书集东西学说以感觉心意为智育之本原，以记忆观念为教育之精神，使其灵魂强固而备人圆主义（即完全无缺点之国民资格），盖言心理学之书也。计十二章冠以总义演明教育之意义，区分一曰心意总论，二曰心身关系论，三曰心意发育论，四至十一则言感觉、知觉、记忆、想像、概念、断

① 范迪吉：新译日本《普通百科全书》，上海会文学社1902年版，第47页。

② 孙昌龄：《清末到解放前的我国教育心理学学科性质演变史略》，载《心理学报》1988年第1期，第86页。

定、推理各力。十二章则言客观、主观教授法之功用，附以系论足扼全书之要。”①

《心理教育学》列为“教育丛书第一种”，该书目录前，有一“教育丛书序”，是由“长至武陵赵必振曰生父叙”。此序说：“生存竞争，风潮烈哉；何以生存，曰惟教育；何以竞争，曰惟教育；弗能生存，弗能竞争；弗能竞争，弗能生存；相循环也，教育其生存竞争之枢纽哉。”“立于生存竞争之世，教育尤不可缓矣，群雄眈眈，万国聘逐，有教育者存，无教育者亡，教育而完全者强，教育而不完全者弱，世界之觇国者所公认也。”作序者认为“吾国于实际上，从未有完全之教育非过言矣，庚子以后，创钜痛深，爱国者鉴于泰西之所以强，翻然而悟……知生存竞争之要矣，然无所取则，是越裳之车而无指南也。东西大家，言教育者夥矣，茫乎无涘，焉往从之，用是搜百家言，汇而集之以成一家言，俾言教育者有所择也”。由此可见，当时为教育兴国，把《心理教育学》列为第一种教育丛书，以供教育者选用。

在《心理教育学》的总义中，久保田贞则认为，狭义教育就是“教育少年之心身，以诱导其智力，以启发其性灵”。“人者，由心身之两部而成，其心意作用，又分为知与行之二种，若以教育学论之，则画为三大部分，即德育、智育及体育是也”。全书除总义外，共分十二章：心意总论、心身关系论、心意发育论、注意力、感觉力、知觉力、记忆力、想像力、概念力、断定力、推理力、教授法。在心意总论中，认为心理学之定义为“研究心意之现象，即知、情、意之三相是也。心意者即由知、情、意三种之官能所合而成者也”。介绍心意研究方法有主观之方法即自省法，客观之方法即他省法，强调二者同时使用。还论及心理的二分法

①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石印本，乙亥四月（1935年）卷5，第11～12页。

和三分法问题："三分法为近世学者一般所公认，即知、情、意之分类是也。"并论述了知、情、意"三相者有互相容合之趣，而复有互相亲密之关系者，故一相发时，每与他之二相无不交相发动"。在论述心身关系时，该书介绍神经系统和大脑的生理学知识，"心意一切之作用皆此（指大脑）中枢之所掌"。在该书最后系论中强调教育与心理学关系的重要，认为"究一国之关系在国民，国民之智愚在一心，古人谓强国者先强其魂，救人者先救其心。苟心理之不明，则智慧无生根之地。如是而欲言教育之精神，不啻使盲牛就道，跛者学步，欲求其一日千里也，岂可得哉，岂可得哉"。由于全书内容包括了心理学、逻辑学和教学论三方面的基本知识，显得十分庞杂。[①] 此书为洋装铅印本，学术用语注有英文，译语与现今所用心理学用语接近。

另一本是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经直隶学务处鉴定，由直隶学校司编译局印行的《心理学教科书》。著作者为大濑甚太郎、立柄教俊；译述者为张云阁，校修者为李景濂。著、译、校者的生平均不详，也不知原著出版日期。

《心理学教科书》共有 66 页，其简要目录是：绪论；第一篇心象泛论；第二篇知识（上，直观；中，观念；下，思考）；第三篇感情；第四篇意志；第五篇个性及自我；结论。该书有一短序："西国著名教育家最重心理学，心理学精深奥博，吾国人士多未之讲。此书日本教科所用，吾读其书虽未谙极要，足裨益教育非浅鲜矣。他日吾国教育之盛行殆必自能明心理学，始今粗为删取其要，贻吾国读是书者。"从序中可知，当时我国教育不发达，还不知心理学的重要。从该书经直隶学务处鉴定，并由直隶学校司编

① 孙昌龄：《清末到解放前的我国教育心理学学科性质演变史略》，载《心理学报》1988 年第 1 期，第 86 页。

译局译行来看，当时的教育部门开始注意心理学了。

该书内容较浅显，在绪论中阐述了心理学定义："心理学者，研究心象之科学也。"提出心理学研究方法"并用主观客观二法"，认为内省法固然必要，亦应重视观察、实验法和神经系统知识。如说："辨别皮肤上二点间之距离，其最少限为几许，或区别二重量之差，其最少限为如何，皆实验法。欲行此实验，非独用各种器械，又不可缺生理学知识，而生理学中之神经系统，尤为至要云。"关于心理学分类，认为"研究人人共有之心象，为普通心理学；研究心象之特殊者为特殊心理学。特殊心理学派别至多，举其重要厥有数端：儿童心理学，以研究儿童之心状；动物心理学，以研究动物之心状；病症心理学，以研究有病者之心状；民族心理学，以研究民族团结之心状；本实验法以研究心象者，谓之实验心理学，又谓之精神物理学；由生理学以研究心象者谓为生理心理学"。还引用西方教育家的话，说明心理学与教育的相关，强调"儿童心理学，尤为教育家所宜究"。绪论最后谈到"本书大旨，在举示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要法及其他事类，俾教育儿童者，知所从事而已"。看来，该书适合作为师范教本。

《心理学教科书》在清末还有一本中译本，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由江苏通州师范学堂出版的，译者是南通顾绳祖。江苏通州师范学堂是1902年由张謇（1853～1926）所创办，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师范学堂。1903年王国维曾在此校任心理学课。顾绳祖在书中译例上说："我国稍稍知有教育矣，而求得一、二心理学完善之教科书则仅也，本校东教员西谷先生之言曰'是书为我邦教育教科教育学全书之一部，诚最新最良之教本也'。而译者乃于是乎事此。"由此可见当时在江苏通州师范学堂也聘用了日籍教师；同时也可看出这本《心理学教科书》，河北（直隶）和江苏先后同译，作为师范学堂教本广为销行。

再有一本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月）出版，由上海时中书局（以出版教科书为专业的书局）所译之心理学讲义，书名为《心界文明灯》。为何起此书名呢？在该书出版提要中介绍："是书为心理学讲义，凡分十回本，泰西学者之哲理，推阐尽致，与吾国先哲性理之说，并行不悖，至其引喻真切，剖析精审，洵足使人心界放一大光明。"读者受益有如心界大放光明之意，故命名为《心界文明灯》。该书著作者为上海时中书局编译所，没有具体著、译者署名，也不知原作出版日期。全书十回（章），洋装本，共126页，约5.6万字。简单目次：第一回心理研究之材料；第二回意识及注意；第三回就精神现象之要素及其分类；第四回就精神现象之总合及分解；第五回论认识作用；第六回论认识作用（续）；第七回论感情之现象；第八回欲望及意思（志）；第九回人格论；第十回社会心理及结论。该书有如下特点：

（1）内容较丰富，汇集了当时欧美等国的心理学材料，介绍了各国学派和论说。如在第二回中论述识域问题，有关差别域和绝对域的区别，介绍赫若巴耳① 之思想，维伯耳②之发现及费息特③之推论。第四回，论及古来所行之观念联合说即亚里斯度德尔④之法则，阐述英国之联想学派及其发展。第六回中论认识作用，阐述英国之经验论、德国之合理论、康德之调和说等。第八回有关知行合一论，介绍欧洲索格拉底和东洋欧阳明主张此说之看法。第九回人格论中提到我国孟子性善说等。

（2）注重心理研究的材料来源和研究方法。如第一回中即讲动物之观察、比较之心理、多数人之观察、社会上之观察、变体之观察、催眠术、精神病、罪人心理学等。

（3）对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意识问题，知、情、意三

①②③④　今译分别为赫尔巴特、韦伯、费希纳、亚里士多德。

分法和知、意二分法的问题，均有系统专门阐述。如第二回中讲“意识者何耶，意识与自识之别，意识与记忆，与注意的关系，意识与无意识之关系，论半识之状态，论识域，意识的统一性、关系性”等。第三回中讲精神现象之要素及其分类，从历史上分析了三分法的由来，认为二分法比三分法适于科学精神，并将“西洋知、情、意之三分法”对比联系我国“儒教之心理学”研究的“性情心意”，认为有符合之处，“唯性与知不同耳”。

（4）注重生理基础和哲学基础。如第三回中“自心理活动之方面论之则不可不依进化论”，“自心理学形式之方面研究之不可不依所谓认识论之法则”的章节。书中凡叙述心理活动时必言生理。如讲感觉发生，“通于身体之各部分有神经，外来之刺激触于身体则其神经受之，神经传之于脑髓，而始生感觉也”。又如讲“感情基于生理的活动，则不可不有其生理的基础，如怀耻辱则面呈红色，怀忿怒则血管呈异状，心中喜悦则眉欣眼开。若就内部言之，则愉快之时血液之循环佳良；反之，不快之时血液之循环恶劣”。

（5）该书编写体系未完全按知、情、意三分法。书中也依次讲了三种心理活动，第五、六回讲认知作用；第七回讲感情之现象；第八回讲欲望及意思（即意志）。此外，在第九回讲人格论。

（6）强调社会心理的重要。第十回作为专门章节论述。

（7）该译书虽为文言，但词句较流畅，一些心理学名词术语已接近现在用法，个别译语加注英文。

（8）该书最后结论中提到心理学之将来、心理学之分科和心理学的应用问题。如认为心理学“所行之三分法既属陈套，其不可者虽被一般学者认出，然代此不可之定说，尚未发见。又彼三分法之可者以及其方法，虽说明于前，然心理学者全体，尚不能一定其方向，故心理学之前途犹有所望”。希望有如“生物学之达

尔文其人出则心理学必为一科学”。

还有一本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发行，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三月）初版，也是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由沈诵清译，井上圆了著之《心理摘要》。该书正文45页，3万多字。不知原著出版日期。译者番禺（今广州）沈诵清，其生平不详。著者日本井上圆了（1859～1919），生于新泻县三岛郡。青年时，就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885年毕业后，研究印度哲学。以后从事办学、宗教、教育工作，参加各种实际活动，著有《佛教哲学系统论》巨作，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来为根除民间迷信，创立妖怪研究会，自己开设讲坛，刊行《妖怪学讲义》，大力从事启蒙工作；因此，他有“妖怪博士”之称。1906年他在江古田村建立哲学堂，作为教育的园地。他半生献身于通俗教育事业。他曾遍游日本、朝鲜、中国东北各地宣传教化。1919年漫游中国经北京、天津，由营口到大连，因突发急病去世。他是个多产作家，遗著大小共130余部，其中关于心理学方面的即有25部，包括有关妖怪学方面的13部。[1] 其中《妖怪学讲义》，全书分为总论、理学部门、医学部门、纯正哲学部门、心理学部门、宗教学部门、教育学部门等。[2] 我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也是我国心理科学积极倡导者与扶植者蔡元培（1868～1940）已译出该书6册，由亚泉学馆购印，因该馆失火，此书的译稿五册被焚毁，仅余《总论》1册，由商务印书馆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印行。现收录于《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内。[3]

---

① 《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51页。

② 高叔平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页。

③ 高叔平编：《妖怪学讲义》总论，载《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4～389页。

井上圆了著之《心理摘要》，全书分十章包含八十九节，附有图表。十章目录为：绪论、种类论、发达论、感觉论、知觉论、实想论、虚想论、情绪论、意志论、结论。著者认为"论究心性作用之学谓之心理学"。心性之现象为心象，"可分三大种，即情感、智力、意志是也"，或言"心理学为心象之学"。并提出"心性之实体名为心体"，而"心体如何，非但不可知而已，其果存与否，犹难判定"等语。书中所述多为臆想、推测，缺乏科学性，仅个别之处提及神经脑髓和一般的生理学知识。此书为"摘要"，所述各节不相连贯，译文虽不深，但有些心理学译语很艰涩，没有联系教育问题。

（三）早期自编的心理学书

我国最早自编的心理学书，出自留日学者陈榥，由他编辑的《心理易解》，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正月）出版。该书在日本东京印刷，总发行所设在日本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内的教科书译辑社。该社为我国留学日本生员所创设，编译东西教科书，以备各省学堂采用。其国内发行所为上海会文馆和南京启新书局。

作者陈榥，字乐书，义乌（今属浙江金华）人，是浙江求是中西书院的高材生，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由浙江省官费首派赴日本入帝国大学校工科，肄习专门学问——兵工。1902年陈榥曾著有《物理易解》。他在日留学时，对心理学没有专门研究，因病休学时，以心理学自娱而编成《心理易解》一书。

该书序文很长，陈榥自叙。他用很大篇幅议论了我国学者从神农、周、汉、魏、唐、宋、明至清的学术研究情况。他认为"我国学者之积习，尚文之心重而尚理之心微也"，"……是以神州有四千载明了立国之历史，至今日仍不免以无学见羞于五洲"。虽然人所共称文明古国，但无其他科学。序文最后提到："甲辰（1904

年）秋，予因病辍学一年，养病日本相州之平冢，海滨孤寄，药炉茗碗，相对无聊，以心理书自娱，非素所治者也。稍辑译之，积日而成秩，遂以付梓。”

陈榥还在他写的“辑言十则”中说，他主要是根据东文书编辑的，西文书中仅参考英文 Michael Maher，S. J. 所著心理学。由于心理学中诸说纷繁，或无定论，编辑时只采取一说，对学说的辩论均未写入。此书适于做中等师范教科书，故对心理学历史及分科之研究未能采用。书中多用东文名词，并说明使用东文名词中有“略改者，如观念改为念端，概念改为浑念，思想改为思虑，把住改为蕴积，本能改为良能”。从现在来看，未改的东文名词已沿袭应用至今，略改者之中文名词反而难懂了。书中引用了中国典故和联系了很多中国实例。书中“判断及推理二者所采多为论理学，因东文心理学教科书多系如此，故亦然”。还提到“心理书中，以知识、情感、意志分三大门类，实则驳论甚多，有谓不应如此分类者，而三大门类中之分类，亦各人不同。今惟采取最普通之分类而已”。最后还说：“书中往往以鄙见所及者略为释明，凡涉于谐者皆是也。”从上述陈榥所识各点，此书系出于他自己编辑而成。

全书 219 页，附正误一页共 220 页，约 6 万字。简略目录为总论有四章：心理学、心理研究法、意识、神经系统；分论：第一篇知识有三章：觉性、念端、悟性；第二篇感情有五章：总觉、感情及感觉、记忆想像及悟性所结合之感情、感情之相对律、感情及于知识之影响；第三篇意志有四章：总论、意志之原始、知识感情发达后联结之意志、意志实验法；决论人格论。所述内容比较通俗易懂，故其书名为《心理易解》，想也有此意。

书中明确提出“精神界科学中，人心之研究，遂卓然自立一帜于学界之林，而心理于以成专科之学”，“心理学虽晚出，而经

学者阐明考察既别于他科学而自成专科”。“近来心理学进步，学者以实验物理之法研究心理，而心理学与物理学几无所殊，如精神物理学是也。至于脑髓之研究，本在生理学中而处处与心理相影响，故一切生理上之实验实得，皆可引为心理之证据焉。”关于心理研究法，他介绍有主观研究法（内省法）和客观研究法，又分为生理研究法、试验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包括儿童与大人比较（儿童心理学）、精神病与常人比较（精神病心理学）、罪人与常人比较（罪人心理学）、人种与人种比较（人种心理学）、社会与个人比较（社会心理学）〕。书中还引用当时盛行的丹麦海甫定著《心理学概论》中的观点，如“海孚亭（即海甫定）以知识、情感、意志三者为心之三大要质”，“海孚亭云意志者最原始而最终者也”，并介绍了爱宾克好斯（今译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等。此书的编辑内容，可以反映出20世纪初我国接受和传播西方心理学的水平，也是我国第一部汉文写的西方心理学书。

与此同时期，还有两本汉文写的西方心理学：一本是1905年由湖北师范生编辑，湖北学务处发行的《心理学》（又名《教育的心理学》）；① 另一本为1906年由江苏师范编，江苏学务处出版的《心理学》。② 但此二书并非独立著述（或称自编），也与译书不同，系由师范学校学生将日本教员口授笔记整理编纂而成。

综上所述，中国通过日本引进和传播了西方心理学，主要手段是：

1. 采取聘请日籍教员来我国讲学。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第

① 马文驹：《清末民初心理学译著出版中的若干问题》，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39～40页。

②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载《教育心理研究》第1卷第3期，1941年，第26页；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236页。

一个心理学正教习服部，以及各师范学堂如最早的江苏通州师范的西谷等。他们讲授的心理学讲义或教科书，主要移植于西方心理学，并联系了日本实例和中国古典性理学说，起到东西初步融合的作用，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师范人才，使他们懂得了教育与心理学的关系及心理学的重要性。

2. 大量翻译日本心理学书。由于中日"同文"的便利，翻译日本心理学是引进和传播西方心理学的唯一捷径。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创设的译书局等编译机构和教育部门开始注重翻译出版心理学书，如上海广智书局、时中书局的编译所，直隶学校司编辑处，江苏宁属学务处等，均译行心理学讲义或教科书。

3. 留日学者编著心理学书和师范生整理编纂日本教员口授笔记。中国最早留日学者之一陈榥，留日期间虽非专攻心理学，但由自学而自编了中国第一本汉文心理学书，湖北、江苏的师范生均曾就当时日本教习讲授笔记编纂成书。从聘请日籍教习讲学、翻译和留学等手段可以看出，西方心理学在我国是以日本为桥梁进行间接传播的。

二、汉译"心理学"名称的由来

中国古代没有"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名称，"心理学"三字在古书上从未在一起排列过，就是"心理"二字相连的时候也极少。最早的联缀是我国东晋陶渊明（365～427）的诗句："养色含精气，粲然有心理。"[①] 与此稍后，是南北朝齐梁之际出现的头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作者刘勰（465～532）在该书卷七

①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略》，载《教育心理研究》第1卷第3期，1941年，第16页。

情采第三十一篇中，有“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①]的词句。直至明代王守仁（1472～1528）也接连用过“心理”二字，他曾说：“心即理，心理是一个。”[②]上述用法和现在的解释并不相同；古籍中属心理学研究的内容称之“性理”或“心学”。[③]

汉译“心理学”名称的创译和使用也始于日本。日本先借用中国古汉语作为西方近代学术用语的意译语，而后又被中国从日本借用回来的，至今中国和日本同用“心理学”这一汉译名称。“心理学”名称的创译者是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西周（1829～1897），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官僚学者、启蒙思想家。西周名时懋、鱼人，又称修亮、周助。1829年出生于石见国（今岛根县的一部分）津和野藩，藩医之家。初学朱子学，18岁研究徂徕学（日本儒学家荻生徂徕的学说思想）。1853年学习“洋学”，1857年任“蕃书调所”（翻译欧美科技书籍，输入科技和培养技术人才的机关。后改称洋书调所、开成所、开成学校及东京大学）助教，1862年留学荷兰，1865年回国后，任开成所教授。1870年应明治新政府之招聘，历任兵部少丞、大丞，参谋部、文部省高级官员等职。这期间他和十余位学者组成一学术团体“明六社”，并在该社刊物《明六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启蒙活动。1890年成为贵族院敕选议员，1897年受封男爵，获勋一等瑞宝章。同年逝世。[④]

西周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作出了贡献，他是“哲学”一词的创译者，并研译过许多学术用语。在他的哲学著作中

---

①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注十卷，台北市世界书局1958年版，第118页。

②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略》，载《教育心理研究》第1卷第3期，1941年，第16页。

③ 有关“心理”二字联缀的问题详见第1卷第一章第一节。

④ 贾纯：《试论近代日本哲学家西周》，载《外国哲学》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8页。

有很多心理学思想，并有心理学专著，如《生性札记》(1872 年)、《人智论》(1872～1873 年)、《情智关系论》(1872～1873 年)、《知说》(1874 年)、《心理说之一斑》(1886 年) 等。其中《生性札记》是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用汉文写的。[①] 1875 年（明治八年）西周受当时文部省的委托翻译出版了美国 J. Haven *Mental philosophy* (1869 年版本)，[②] 他把著者 Haven 译为奚般，书名 *Mental philosophy* 译为《心理学》。日本心理学界公认西周是日本最早介绍西方心理学的人。日译本《心理学》是日本第一本心理学译书，并由他首创译称《心理学》，他是第一个使用心理学名称的人。[③] Haven 的 *Mental philosophy* 在日本 1875 年翻译出版后 14 年，于 1889 年我国颜永京也翻译出版中译本，著者译为海文，书名译为《心灵学》，成为中国第一本汉译心理学书。中国和日本同译了同一本美国的原著 *Mental philosophy*。这也是中国和日本心理学发展史上一件重要史实。

心理学未脱离哲学之前和脱离出来的初期，我国对现在的“哲学”和“心理学”名称没有统一的译法，并且有相互混淆的现象。中国最早把现在的“哲学”和“心理学”名称，谓之“穷理之学”和“性学”，这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 1623 年用中文撰写的《性学觕述》中提出的。同年，他在《西学凡》一书中，据 1610 年罗马教皇送给中国的 7000 部书（其中有哲学类书），略述了西方学科分类的概况，把 philosophy 一词音译为“斐录所费

① 麻生义辉编：《西周哲学著作集》，岩波书店 1933 年日文版，第 84、106、110、230、320 页。

② 日本心理学会编：《日本心理学会五十年史》〔第一部〕，金子书房 1980 年日文版，第 5 页。

③ 日本野岛忠太郎著：《心理学发达史》，1937 年日文版，第 206 页。

亚”，有时简称“裴录”，意译为“理学”即“义理之大学”，[①] 并多处提及“性理”。[②] 艾儒略对儒学修养很深，他是借用宋明理学和性理之说的概念而作此称的。与艾儒略同时另一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在1624年口授由徐光启笔录的《灵言蠡勺》引中，把philosophy译音“费录苏非亚”意言“格物穷理学”，义取“格物致知”。把Anima译音亚尼玛之学，意称“灵魂学”或“灵性学”。[③] 由于清代曾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西学一度中断，直到后来清代末期，颜永京于1879年开始在圣约翰书院教授心理学课时，边教边译了美国Haven的*Mental philosophy*，并于1889年出版，书名译称《心灵学》。1891年山东登州文会馆正斋、备斋分年课程表上，明文规定了正斋第六年开设心理学课，译名为“心灵学”[④]（此校于1876升格为书院，改称文会馆时即开心理学课，但不知当时是否已译称“心灵学”）。1896年，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家谭嗣同著之《仁学界说》二十七条中，提到心理学也称为“心灵学”（因他曾精研基督教义和神学）。1898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以问答法撰写一本心理学书，取名《性学举隅》，于1904年出版，他因袭了艾儒略早年的“性学”名称。1907年出版（1911年再版）华北公理会协和大学校长美国传教士谢卫楼著、管国全译的心理学，书名译称《心灵学》。从以上我国在17世纪初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心理学译名的使用来看，凡由传教士教会学校所著、译或教授的心理学多称“心灵学”、“灵性学”以及“性学”一类的名称。

---

① 鲁军：《“哲学”译名演变》，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11期，第77页。

② 艾儒略撰：《西学凡》一卷，载《天学初函》理编，1623年，第1792页。

③ 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灵言蠡勺》，北京公记印书局1921年重刊本，第1页。

④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中国清代来华的传教士，对 philosophy 大多因袭艾儒略"理学"的名称。这个译名随着汉译西籍也传到日本。[1] 在日本最早对"哲学"和"性理学"（即心理学）译名是由西周所著《百一新论》（约1866～1867年开始起草，1874年3月出版）首先提出。西周最初对 philosophy 这个词使用过"性理学"、"理学"、"穷理学"等译名，但他都感到不够确切，直到他把希腊语"φιλο Σοφια"一词确认为与中国北宋哲学家周敦颐（1017～1073）所著《太极图说》中讲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句话中的"士希贤"（求贤德也）的意思相仿之后，便把"philosophy"直译为"希贤学"。后经反复思考和进一步推敲，把"求贤德"和"哲智"联系起来，又将"philosophy"试译为"希哲学"（即希求哲智之学），最后在《百一新论》中，定译为"哲学"。[2] 西周是"哲学"一词的创译者。同时，在《百一新论》中，出现他使用"心理"以及"性理学"的词。[3] 比《百一新论》稍迟出版的西周著《致知启蒙》（1874年9月出版）也使用"性理之学"或"性理学"。西周其他早期著作如：《百学连环》、《生性发蕴》、《生性札记》、《知说》等均借用了中国古籍中"性理"的概念及使用"性理学"的名称，还出现使用"心理上学"、"心理之学"等词。[3]1875年出版奚般氏《心理学》，他在凡例中仍用"性理"一词，而书名译称《心理学》，书内使用了"哲学"和"心理学"（但有时仍用性理学）两词。因此，日本心理学界公认西周译的奚般氏《心理学》是日本最早的心理学译书，该书首次使用"心理学"名称，"心理学"是西周从"性理

① 鲁军：《"哲学"译名演变》，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11期，第77页。

② 贾纯：《试论近代日本哲学家西周》，载《外国哲学》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9页。

③ 儿玉齐二：《奚般氏心理学》的研究（1），日本大学人文科研究所（研究纪要）第26号，1982年日文版，第107页。

学”改译而来，由他所首创和命名。西周也是“心理学”一词的创译者。[①]

在中国开始刊出使用“心理学”名称，约在1896年或1897年。这时期在清光绪维新变法和改革旧教育的背景下，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同时，聘请日本教师来中国，并且积极主张翻译日书。在此过程中“心理学”的名称也随之传入我国。当时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十分重视译书，认为“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②]，康有为“大收日本之书，作为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②]。他编的《日本书目志》中，总目分15门，在第二理学门中，即见有“哲学”和“心理学”名称，列有哲学书22种，心理学书25种。心理学书中已列出西周译之奚般氏《心理学》。[③]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在《读〈日本书目志〉后》一文中也提到“……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④] 在此亦见“心理”、“哲学”名称。在《日本书目志》上，可能是我国最早开始刊出的汉译“心理学”名称。康有为编之《日本书目志》，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但未见刊出日期。从梁启超1897年发表《读〈日本书目志〉后》一文的时间推论《日本书目志》可能在1896年刊出。[⑤] 也有人说：“康有为搜集日本书目，让女儿康

---

① 儿玉齐二在《奚般氏心理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使用“心理学”名称更早。

②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后》，载《饮冰室文集之二》第二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2页。

③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上海大同译书局，未见刊出日期。

④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后》，载《饮冰室文集之二》第二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4页。

⑤ 鲁军在《“哲学”译名演变》（《哲学研究》1983年第11期，第78页）中提及《日本书目志》于1896年刊出。

同薇译出，于1897年完成《日本书目志》的编纂，同年冬天刊行。"①

关于"哲学"名称从日本传入我国要比"心理学"名称早一些，最早使用"哲学"名称是黄遵宪（1848～1909），他于1881年写出《日本国志》定稿，1890年刊出。书中介绍东京大学校，在文学部有哲学科，并注明"谓讲明道义"②。1899年，梁启超在《论学日文之益》一文讲到，"智学——日本谓之哲学"③。1898年，浙江省首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陈榥，他在留日期间，编辑了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心理易解》(1905年出版)。还有最早聘请来我国讲心理学的日本服部宇之吉和他讲述的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1900～1901年或稍迟1902～1903年）。他们均已使用了"哲学"和"心理学"名称。1902年以后，我国译自日本的心理学书日益多起来，"心理学"和"哲学"名称在中国已普遍使用。又如1902年梁启超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上写有"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无以逊于欧西"④，已经使用"哲学"和"心理学"名称。可是当时的一些学者对philosophy和psychology两词没有明确区分和统一译法。根据philosophy的意义有人译为格致学与当时科学(Science）译名相混，有人译为"智学"、"心智之学"、"心学"、

① 马金科、洪京陵编：《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②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之三十二，学术志一，光绪十六年（1890年）羊城富文斋刊版，第17页。

③ 梁启超：《论学日文之益》，载《饮冰室文集之四》第二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0页。

④ 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载《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四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

"心理学"与"psychology"相淆，甚至还有译为"神学"[①]的。当时，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东居日本，已接触了日本的心理学，他对"心理学"与"哲学"译名已有明确区分。他1902年在《新民丛报》18号"新书介绍"一文中，对《新世界学报》上介绍当时"新说名论"的各学科分类，把心理学和哲学混淆提出看法。他说："……其分类颇欠妥惬者，如其中心理学一门，最为鄙意所不敢苟同，统观三号，其心理学门皆论哲学也。"梁启超认为："日人译英文psychology为心理学，译英文之philosophy为哲学，两者范围截然不同，虽我辈译名不必盲从日人，然日人之译此，实颇经意匠，适西方之语源相吻合……吾度著者……以为一切哲学，皆心识之现象也，故吾不从东译（哲学）而定此名（心理学），鄙人窃以为误矣。哲学之大别，有唯心与唯物之两派，'物'者，正'心'之对待也。今惟以心学名之，不几将唯物论全行抹杀乎？若以为所研究之客体虽有心物之殊，而能研究之主体惟在人心，故定以此名。然则宗教学、政治学、法律学乃至一切无形有形之学，何一非以吾心研究之？然则并此诸学而名心理学可乎？且既以philosophy冒此名，则于psychology又将以何语译之。此吾所不敢苟同也。psychology与ethics即伦理学皆为philosophy中之一门，吾以为宜立哲学一门，而以心理伦理皆入之，似为得体矣。"[②]梁启超对"心理学"与"哲学"译名的区分起了一定的作用，从此以后逐渐趋于一致。1911年初，由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黄摩西编的《普通百科全书大辞典》，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百科全书型的工具书，它上面的分类里，已具有哲学条目82条，心理学条目41条。"心灵学"一词，后来在教会大学里也改称"心理学"。

---

① 鲁军：《"哲学"译名演变》，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11期，第78页。

② 《新民丛报》18号《介绍新著》，1902年，第3页。

第二编　中国现代心理学

第三章　中国现代心理学创立时期（上）

第一节　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

一、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这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是中国新文化科学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心理科学的先驱者、倡导者与扶植者。他曾两次赴德国留学，研习实验心理学等多种学科，担任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所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是当时的13个研究所之一，这一切为他在中国现代心理学上的先驱地位奠定了基础。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创立上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下述六个方面：

（一）现代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唯一的中国留学生

在留学德国以前，蔡元培就对西方的文化科学有所涉猎，包括文史、政经及自然科学；而且曾试译日文著作《生理学》、《妖怪学》[①] 等。蔡元培曾于1907～1913年间两次赴德国留学，其中

---

* 关于蔡元培的心理学思想，详见杨鑫辉：《蔡元培在现代中国心理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与贡献》，载《心理科学》1998年第4期。

① 蔡元培：《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22页。其中《妖怪学》全书八大卷已译出六册，因书店失火，仅印出《总论》一册。

三年在莱比锡大学，先后选修哲学、文学、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等40门课程，现在仍然保存有这方面的学籍档案资料。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亲聆现代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讲授的三门心理学课程：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民族心理学。还有利普斯（Lipps）讲授的心理学原理，勃朗（Brahon）讲授的儿童心理学与试验教育学，威斯（Wirth）讲授的心理学实验方法，底特里侄（Dittrich）讲授的语言心理学、现代德语语法与心理学基础。正如蔡元培自己所说：在所选课程中，"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①]。在《民族学之进化观》一文中还写道："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的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心理学。"[②]以上心理学的研习活动，对蔡元培心理学思想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先驱者的专业基础。尤其是冯特在实验心理学上的开创性工作，影响了蔡元培回国以后，也积极在我国创建心理实验室和心理学研究所，在教育领域中推进心理学的应用。

（二）扶持创建中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和第一个心理研究所[③]

蔡元培采取的两个重大措施对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一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于1917年支持陈大齐在哲学系内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后又成立心理学系；二是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于1929年倡导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研究所。这样，既有培养心理学人才的教学机构，又有专门研究心理的科研机构，为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建立奠定了人才与组织基础。蔡

① 《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7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55页。

③ 参阅赵莉如著：《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版。

元培非常重视心理学实验，从他与心理学系主任陈大齐书信来往的密切工作关系，也可推断其必然直接过问心理实验室的建设问题。1921年他到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科研机构时，曾专门参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实验室演示试验感觉（包括色盲）的仪器设备，以及生物学实验室和动物心理实验所，便可作为佐证。1929年5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心理研究所，聘任唐钺为所长，聘请汪敬熙、朱鹤年、蔡乐生、卢于道等一批专家开展研究。蔡元培对心理所的工作很重视，他在《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和《中央研究院之过去与将来》等报告里，都对心理所的工作有总结和未来计划。当时主要进行了大声惊扰对习惯行为之影响，修订比纳智力测验，汉字横直写速率之比较，幼儿遗忘曲线，工业心理，大脑皮层等研究。心理所曾出版心理学专刊和丛刊。此外，还派人参加美国之第九届国际心理学会，第十三届国际心理学会等，以加强心理学的国际学术交流。

（三）关于心理学性质与方法之思想

实验心理学的奠基者冯特指出："自然科学史从各方面使我们铭记在心的一个通则是：科学的进展是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密切相关联的。近年来，整个自然科学的起源都来自方法学上的革命，而在取得了巨大结果的地方，我们可以确信，它们都是以先前方法上的改进或者以新的方法的发展为前奏的。"[①] 蔡元培承继了冯特强调科学方法有其决定性意义的思想，认为"从前有许多不是科学的，如心理学从前附属于哲学，现在应用物理的方法、生理的方法来研究它，便成为科学了"[②]。这就是说心理学的实验科学

---

① 引自张述祖等审校：《西方心理学家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1页。

性质是由它采用实验科学的方法来决定的。以前只是内省和思辩，所以那时的心理学属于哲学的范围。蔡元培认为学科性质是比较难以划定的，不能简单地归属。“例如，心理学向来被认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是，自从科学家通过实验研究，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表达了人类心理状况以后，他们又认为心理学应属于理科。”① 他还认为精神科学、社会科学都可以用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心理学（他当时具体指民族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性质的方面，又有社会科学性质的方面。以上为当时中国心理学怎样发展提供了方法学方面的基础。潘菽教授总结50年代我国关于心理学的性质问题时说：“我长期以来倾向于认为心理学是中间科学，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也有社会科学的性质。”② 而20年代，蔡元培关于心理学性质的认识，便与50年代学术讨论的结论相近，可见其见解的难能可贵。

（四）重视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

蔡元培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非常重视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并有其理论建构。首先强调必须在实验心理学的基础上建构实验教育学。他说：“实验教育学者，欧美最新之科学，自实验心理学出，而尤与实验儿童心理学相关……其试验之也，或以仪器，或以图画，或以言语，或以文字，其所为比较者，或以年龄，或男女之别，或以外界一切之关系，或以祖先之遗传性，因而得种种普通之例，亦即因而及种种差别之点。”③ 其次，重视教育对人格的养成。蔡元培多次强调说：“所谓健全人格，分为德育、体育、知（智）育、美育四项。”④ 并主张把智育、德育、美育作为

① 同上书，第10页。
② 《潘菽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③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页。
④ 《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5页。

心育。再次，强调按照儿童发展进程进行教育，要求新教育“在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①]。并且要求教育者重视个性的发展，“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②]。以上思想无一不是以心理学原理为指导的，对当时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起了一种推动作用。

（五）文艺与美育心理之思想

蔡元培从心理学的视角论述过文艺、美育方面的问题，因而他的文艺与美育心理之思想，是他的心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文艺看作是人一种直观的充满想像力的意志活动。还举例论述文学与科学的差别说：“同一自然景物，在科学上为形体解剖，生理实验，用途改造等等，而文学家乃注意于色、声、香、味之观赏的描写与印证，完全为超实用的。”[③] 美育更是他非常关注的问题，最早译出美育一词，也就是美感教育。认为“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是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为厚，有待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育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④]。他还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提倡美育破除迷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昌明，“在宗教的仪式中，就丢掉了智德体三育，剩下的只有美育，成为宗教的唯一原素”[⑤]。而美育与宗教有分合两种情况，“应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⑥]。从心理学看，人总是受某种信念、信仰支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是积极的。蔡元培的文艺与美育心理之思想，开了我

---

① 《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② 同上书，第208页。

③ 《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1页。

④ 《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页。

⑤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见《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80页。

⑥ 同上书，第163页。

国现代文艺心理与美育心理学之先河。

（六）主张将西方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蔡元培直接论述西方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文字极少，但从一份讲演要点可知有此方面的思想。1927年他在《真善美》的讲演提纲中写道："心理学（性理，唯识，□□之轮回说）。"[①]很显然，这里的"性理"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唯识"指唐玄奘创立的"万法唯识"宗的思想，"轮回说"是印度佛教思想。从这个要点中我们不难看出，所列"心理学"当然主要是他在德国留学时学习的西方心理科学，括号里面的文字则表示他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佛教中的"性理"、"唯识"、"轮回说"等思想纳入其中，并结合起来。蔡元培是清朝翰林出身，又留学西方学习现代科学，主张中西文化结合是一种必然的思想。而且认为"必须首先领会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②]。这也可以作为诠释他主张将西方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思想的根据与佐证。蔡元培这方面的思想对今天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仍有指导意义。

二、陈大齐*

陈大齐（1886～1983），字百年，浙江省海盐县人。中国现代心理学家。17岁就读于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门学习，主攻心理学，毕业时获文学士学位。1912年返回国内，担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翌年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心理学教授。1914年至北京大学任哲学门心理学、哲学教授，后兼任哲

---

① 《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4页。

② 转引自孙常炜著：《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68～69页。

*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陈大柔先生的有关（陈大齐先生的）文章，特示谢意。

学系主任、心理系主任、教务长，并兼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29年初，北京大学改称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陈大齐任院长。同年8月，北京大学恢复原校名，任代理校长。1931年1月至南京任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直至1948年去职。1949年去台后，担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教授，主讲理则学并有较丰富著述。1954年出任政治大学校长，1959年7月辞去校长职务，改任政大专任教授。1960年4月在台北当选为“中华民国孔孟学会”首届理事长。1961年，香港大学赠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68年被选为台湾“中华学术院哲学协会”会长。1983年1月8日在台北逝世。[①] 他在心理科学建设上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1917年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北京大学心理学实验室。

第二，1918年他所著的《心理学大纲》——中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陈大齐利用多年教学的讲义修订而成的，在10年间出12版。它以浅近通俗的文言文和新式标点符号，较准确而全面地概括介绍了当时西方科学心理学的丰富内容和最新成就，包括着各经典实验的数据、图表以及假说、学说、原理和定律。全书共15章216页。该书有较明显的四个特点：

一是该书当中的感觉知觉部分占了一半的章节和篇幅，反映了科学心理学早期在感知觉领域中开展科学实验取得的巨大成果。

二是突出阐明了心理学的科学定义，以及哲学、其他物质科

① 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62页。

学和常识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心理学乃研究心作用之科学，即研究精神作用之科学”。他指出：

> 精神作用无形无声，不可以目见，不可以耳闻；故心理学之规定研究对象也，非若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可以指实物以示人之明且便也。虽然，精神作用乃人人所同具，学者试内求诸心，当无恍然悟者。构思作画，凝神学书，吾之精神作用也；喜极则笑，悲极则啼，吾之精神作用也；临财思得，临难思危，亦吾之精神作用也，凡此构思凝神喜笑悲啼思得思免皆吾精神作用之一端，合其他诸作用，汇而成吾精神作用之全部。心理学即就精神作用，研究其结构之状况、活动之功用、发达之程序，而为之立普遍法则者也。①

由此可见，他认为心理学是研究心理作用的结构、功能、发展过程和普遍法则的科学。“心理学特定义为科学者，明其非常识，非哲学也。”②书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开展心理学科研必需的“假定事项”③：心理学研究对象（精神作用）是起初常住之事实，而决不是幻妄虚无的；这种精神作用更是可以用我们的精神作用进行观察而研究的；精神作用教师是遵循一定法则的，决不是庞杂纷乱，无法则可言的。

三是强调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心理学和其他科学略同，以归纳法为主，但也有自己特异之处，主要有三种方法。（1）内省(Introspection)。（2）外观（observation)。专恃内省或偏重外观，都有弊病，“并用二法，短长相辅，利害相救，其庶几可以弊乎”④。

①②③ 陈大齐：《心理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国难后第1版，第4、5、7页。

④ 陈大齐：《心理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国难后第1版，第9、10页。

(3) 实验 (Experiment)。实验法是当代心理学的普遍研究方法，“故广义言之，一切心理学莫非实验的心理学 (Experimental psychology)”。[①]

四是博取众长。全书主要采用德国冯特和美国詹姆士的研究资料和学说，还直接提及构造心理学和机能心理学两派的短长；在探讨心理学的定义时，实际上也已触及心理分析的对象——无意识，认为“盖无意识的精神作用亦当为心理学所研究”；并且还提到行为学派，认为“行动学之定义，为近时一派学者所主张；但此义过泛，易一与生理学之对象相混淆，故亦未待一般学者之称许”。[②]

第三，五四运动时期，他在科学与灵学的斗争中，率先用心理学中的相互唯物论观点及有关意识与无意识的理论和事实，反对中外灵学派宣扬神灵迷信等思想。《辟“灵学”》[③] 和《心灵现象论》[④] 两文，是试以科学心理学理论反对审发迷信思想的战斗檄文。《辟“灵学”》力图依据心理学的原理，对当时扶乩之风加以剖析，指出沙盘中所书，若非有意作为，则是出于扶乩者意识 (Subconsciousness) 的自动作，是不自觉，并非真有“贤仙佛”的降临。而《心灵现象论》评析西方心灵研究会搜集的三类材料及其实验情况：(1) 自动作用 (Automatic action)，包括魔摆、占棒、测思术；(2) 远隔知觉 (telepathy) 或“思想传达”，“精神感应” (thought transference)；(3) 远隔移动 (telekinesis)。在评析这些心灵现象的同时，指出其中有真有假，有的实验不严密，有的是灵媒 (medium) 的诈术，都不能作神秘力的证明，不能作鬼神的

① 陈大齐：《心理学大纲》，商务印书馆 1933 年国难后第 1 版，第 9、10 页。
② 同上书，第 3 页。
③ 载《新青年》，1918 年，4 卷 5 号。
④ 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 年。

凭据。这两篇文章对于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发扬唯物思想，在当时影响巨大。

第四，陈大齐以特有身份评价了当时心理学发展状况，并在理论上对心理科学进行了分类，有力地促进了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现代心理学》一文是他当时所作的著名学术讲演。① 它简要评介了心理学七大领域的新进展：普通心理、生理心理、实验心理、变态心理、差异心理、儿童心理、动物心理。其中，曾简述了新心理学不同于古心理学的三个特色：

（1）脱离哲学的束缚，努力成为精确的科学；（2）说明心的作用时必须推究相关联的身体作用，加以生理学的说明；（3）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它还根据当时新的实验资料对心理学历来的知、情、意三分法提出异议，阐明了生理作用与心理作用的相互关系，区分了动物心理与人类心理的差别，并且开始具体介绍了华生应用"迷路盘"（即迷津）进行的动物实验。全书中所举的实验结果，也是偏重感觉作用方面的，它表明：老鼠走迷津似与视学、嗅觉无关，而是借皮肤关节肌肉及中耳的半规管的感觉以记忆通往食物的道路的。

在《哲学概论》中有"心理学"一专章以阐述科学心理学是哲学的基础。其中认为"生理的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为一切心理的研究应取之态度"，并以精神作用的"或常或变"为标准，把心理科学分为两个部类：常态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常态心理学又分为个体心理学和团体心理学两大类。两大类下面又各自分为普通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生心理学三个亚类。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体的发生心理学中又细分为："（1）个体发生心理学。研究婴

① 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

孩之精神作用渐次发达，以底于成人，及成人之精神作用渐次衰退，以底于老耄。（2）种族发生心理学。研究最下等动物之精神作用逐渐发达，以底于最高等动物之人类。”在团体心理学的差异心理学中，又细分为：“（1）人种心理学。研究各人种精神现象之差异。（2）阶级心理学。研究各种阶级各种职业精神现象之差异。”①

第五，陈大齐还率先在我国进行了心理调查研究，可视为心理学联系实际之先声。他采用问卷法于1918～1919年间开展过关于“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② 的研究。另外，他在民族心理、审判心理、儿童心理方面也曾进行过有关的译述和介绍工作。20年代后期，他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理则学。尤其至晚年转治先秦名学诸事，就理则学、心理学范畴研究《荀子》、《墨子》、《孟子》，进而从事孔子学说研究，共出版专著20余种。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主要著述除《心理学大纲》外，还有《迷信与心理》（1920年出版，1972年在台湾再版时改名为《迷信与现代心理》）、《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说的比较研究》（1953年）、《荀子研究》（1954年），翻译有《审判心理学大意》（1922年）等。

综观陈大齐的心理学研究与实践历程，他对我国早期心理学工作具有开创性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先驱。

---

① 陈大齐：《哲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18年初版，1928年六版。

② 载《北大同刊》，1919年，1卷4号。

第二节　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建立

一、心理学系的创建

（一）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①

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成立，1920年在其教育科中设立了心理系，②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心理系。陈鹤琴、廖世承在此首次开设测验学课程并以心理测验试验学生。不久高等师范改为东南大学，1920年秋，东南大学成立心理学系，并仍属教育科。当时教育科除心理学系外，还有一教育学系。那时中国的大学有独立心理学系的只有东南大学。③陈鹤琴曾任该校教务长，廖世承任教育科教授，心理学系在陆志韦的指导下发展得较快。1927年时东南大学心理学系已拥有普通应用的实验仪器；在图书方面有两整部德文杂志和四部较完整的英文杂志，还有一些比较心理学方面的设备。这时东南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程分为两类，即普通心理学类和应用心理学类。普通心理学类的重要学程有：

1. 试验心理学；2. 动物心理学；3. 儿童心理学；4. 变态心理学；5. 社会心理学；6. 心理学之生物基本；7. 儿童心理学研究法；8. 动物心理学研究法；9. 宗教心理学；10. 中国人之美术观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23页。

② 肖孝嵘：《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概况》，载《教育心理研究》第1卷第3期，1941年，第1页。

③ 潘菽：《本校的心理学系》，载《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29年，第139～141页。

念；11. 系统心理学；12. 问题研究。

应用心理学类的重要学程有：

1. 教育心理学；2. 心理测验与教育测验；3. 智力测验；4. 变态儿童之研究；5. 应用心理学之入门；6. 商业心理学。

在当时来说，学程不算少了，这时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和艾伟都授课，所以东南大学心理学系有国内最完备的心理学系之誉。那时心理学系学生在学程上还似有两组趋向：一组注重教育之学科；一组注重理科之学科。①后陆志韦离开南京去北平燕京大学，不久东南大学也被改组。②

（二）中央大学③

1927年中央大学成立，它是由江苏的几个高等学校合并起来的，该校在心理学方面承袭了东南大学心理学系的仪器图书，并由原注重理科之学科组成心理学系，隶属于理学院。原注重教育之学科组成教育心理组，隶属于教育学系，1929年改为教育心理系。①当时认为心理系属理学院是较进步的和得当的，而且可算是居世界风气之先，但也有不足之处，学生却因此而减少。中央大学的心理系位于校内新落成的科学馆的一角三间房，两大间一小间，大间为实验室，小间为仪器室和预备室，另一大间隔成小小间为实验室、暗室和阅读室。此外还有平房三间作饲养动物和比较心理学实验室之用。1929年时，心理系在仪器书籍方面均略有增加，添置了新出版而比较重要的书籍、杂志，除把东

① 肖孝嵘：《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概况》，载《教育心理研究》第1卷第3期，1941年，第1页。

② 潘菽：《本校的心理学系》，载《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29年，第139～141页。

③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23页。

南大学原有而残缺的补齐外，又添购英文、德文的一、二部，还添置了一批德国仪器。[1] 列为系内的基本学程必修的有：1. 普通心理学；2. 实验心理学；3. 应用心理学；4. 比较心理学；5. 变态心理学；6. 生理心理学；7. 知觉心理学；8. 学习与工作；9. 心理测验；10. 系统心理学；11. 问题研究。此外尚有选修学程十余种。心理系开始收受研究生。各学程由潘菽、艾伟、郭一岑等任教，潘菽任系主任。还计划开展研究工作，如郭一岑研究中国烹饪的味觉分析；潘菽研究白鼠的选择行为；王素贞研究动物年龄和交替反应的养成；吴绍熙研究音的余像和音的高低强弱关系；于心佐研究图案横列和直列的知觉；雷肇唐研究猫的形体知觉等。[2]

1932 年 9 月，理学院之心理系与教育心理系合并为一系称为心理学系，隶属于教育学院。[3] 1933 年 4 月修订教育学院心理学系的课程分普通心理、教育心理两组。前者注重纯粹心理，后者注重应用心理。普通心理学组的课程有：普通心理学、教育统计学、试验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实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教育心理组的课程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统计学、试实心理学、心理测量、儿童心理学（正常、异常）、儿童心理卫生、学科心理学、实验心理学、青年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研究。此外，选修课程有：近代心理学史、理论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实验社会心理学、艺

---

① 潘菽：《本校的心理学系》，载《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29 年，第 139～141 页。

② 同上文，第 150～152 页。

③ 肖孝嵘：《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概况》，载《教育心理研究》第 1 卷第 3 期，1941 年，第 1 页。

术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智力论、新法考试等。[①] 此时肖孝嵘任心理学系主任（1931 年），艾伟为教育学院院长（1933 年），潘菽任心理学教授。

中央大学心理学系至 1936 年，抗战前夕，为推进心理学的应用已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有：（1）各种量表的修订及编选。如编有初中和高中英文测验，中学文白测验，小学学科测验（包括语顺、国语默读、自然、算术、历史、地理、常识及算术诊断八种），小学至大学各种个别与团体智慧测验及军队测验。此外还有各种人格测验的修订等。（2）统计原理的研究。如机率与机误之实验研究，均差之研究，对减错计算法之研究，曲线适合之研究，及均差中的差数之研究。（3）学习心理方面的研究。属于基本原则方面的有学习定律之分析，桑代克相属原则之解剖，知觉单元之研究，繁简对象之知觉时间，部分刺激之效果及对象行列与知觉之关系。属于特殊教材方面的，有初中国文成绩之实验研究，中学国文理解程度之研究，国文横直读之比较研究，中学英文教学之初步考察，英语教学问题，初中英语文法错误之心理，初中英语拼字错误之心理，错字之分析，汉字测量，中学文白测验结果比较，数学成绩与他科成绩之相关研究，小学各科教科书内容之分析研究。（4）儿童心理方面的研究。有记忆形式发展之初步研究，目手相应运动之研究，手部动作之研究，四种手部运动之研究，手部准确性与性别之关系，位置知觉之研究，时间知觉发展之研究，内外倾品质与年龄及性别之关系，暗示感受性与年龄及性别之关系。（5）变态心理方面的研究。有小学儿童色盲之研究，抑郁儿童个案之研究及犯罪情绪态度和个性倾向之研究。

---

① 《教育学院心理学系选课指导》，载《心理半年刊》第 1 卷第 1 期，1934 年，第 229～233 页。

(6) 实业心理方面的研究。有疲劳之研究，辨别反应之研究，手指与手臂准确性之研究，及明内所达（Minnesota）机械能力测验之标准化。①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沙坪坝，心理学系迁重庆柏溪。1939 年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改组，师范学院成立，于是心理学系改属理学院。艾伟辞去师范学院院长职务，专任中央师范科学研究部主任和研究院教育心理部主任，并创办教育、心理研究所，任所长。他还招收研究生，开办教育心理实验班进行实验研究。1940～1945 年，由艾伟主编《教育心理研究》杂志，在重庆出版。肖孝嵘任心理系主任，他除教学外，还致力于心理学的实验应用研究。开展人事研究，编制了“军队智慧测验”，对警察和警官进行测试。潘菽在心理系任教讲授理论心理学等。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心理系迁回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潘菽任校长兼任心理学系主任。1956 年南京大学心理学系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合并。

（三）北京大学②

1926 年北京大学建立心理学系。早在 1919 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将学门改为学系，并实行选科制时，对大学本科各学系分置为五个学组，第三学组即为心理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但当时第三学组中只有原哲学门改为哲学系，其他两学系未能成立，直到 1926 年心理学系才成立。在此以前，有关心理学的课程都附设在哲学门（系）。1917 年初由陈大齐筹建了一个仅有一间房子的简单实验室，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面的一个房间，门上有块标有心

① 樊际昌：《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研究工作最近概况》，载《中国心理学报》第 1 卷第 1 期，1936 年，第 82～83 页。

②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年，第 24 页。

理仪器标本室的牌子。第二年陈大齐便开一个短的名为心理学实验的课程，并另辟一个房间专供学生实验之用（潘菽当时是哲学门的学生，即曾在此作实验）。所以讲到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就以 1917 年北京大学为始祖。[①] 担任实验心理学课程的先后有唐钺和樊际昌。1926 年心理学独立成系，陆续添置实验仪器，心理实验室始初具规模。1931 年实验室迁入理学院，有大教室一个，办公室一个，仪器室两个，大实验室两个，暗室一个，个别实验室三个。自 1932 年起，每年购置仪器和图书费均有增加，最初的设备限于少数学生实习之用，这时有一部分基本实验仪器，可供学生 30 人同时实验而教授也可进行专门的研究了。1934 年因心理学系学生人数过少，由校务会议决议归并于教育学系，成立心理学组。历年担任各种课程者有陈大齐、唐钺、樊际昌、汪敬熙、陈雪屏、潘渊、刘廷芳、陆志韦、孙国华、周先庚、叶麟等人。1936 年，教育学系心理学组所设课程为：普通心理学、心理实验、社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精神卫生、情绪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等。由樊际昌、陈雪屏、潘渊三人分别担任，普通心理和心理实验为教育系和哲学系的必修课程，每年修习人数各在 40 人以上。当时已具有不少实验仪器，杂志 19 种，书籍择优购置新出版的名著，足供参考研究之用，并已系统地研究有关学习问题和几种仪器装置的改进方法。[②]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撤离平津，联系在湖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因战局影响又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改为哲学心理学系，当时由周先庚负责该系心理

---

① 潘菽：《本校的心理学系》，载《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29 年，第 140 页。

② 樊际昌：《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学系心理学组概况》，载《中国心理学报》第 1 卷第 1 期，1936 年，第 84～85 页。

学组工作。抗战胜利后，1946 年联大北迁，北京大学返回北平，解放后 1952 年院系调整与清华、燕京两大学心理学系合并为哲学系心理学专业。

（四）清华大学[①]

1926 年清华大学建立了教育心理系，后改为理学院心理学系。唐钺为筹办该系积极出力，并为其确定了教育与研究工作的方向，规定必修的课程有心理概念、初级实验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心理学史。此外，为研究生设置的进修课程有高级实验心理学、新意思讨论和心理学问题讨论。1928 年，由教育心理系师生合编刊物《教育与心理》半年刊（现仅见第一卷第一期），主任编辑朱君毅（时任系主任兼教育学教授），编辑牟作祚、傅任敢。该刊首期目录共载文 9 篇，其中心理学文章只有 2 篇：《论嗅觉》（张耀翔），《完形的假定》（牟乃祚）。当时除唐钺任心理学教授外，还有心理助教臧玉洤。1930 年孙国华任心理学系主任，1931 年他领导心理学系及心理学会全体师生编译中国心理学字典。[②]1932 年以后该系课程增设理论心理学、心理实验设备、生理心理、心理学观点等较专门的选修课程。1935～1936 年还开设了心理测验和心理生物学必修课，工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法律心理学等选修课，臧玉洤担任行为的生理基础、生理心理学及变态心理学等课。[③]陈立为实业心理学教授（兼中央研究院心理所专任研究员），在南通大生纱厂进行实验研究，集中于测验择工与训练两个问题。[④] 1937 年抗日战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年，第 24 页。

②③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 1 卷第 2 期，1936 年，第 178、180 页。

④ 《陈立博士进行工业心理之研究》，载《心理季刊》第 2 卷第 1 期，1937 年，第 12 页。

争爆发，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为西南联大，成立哲学心理学系，周先庚负责该系心理学组，至抗战胜利北返，1946年周先庚任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主任至1948年，清华大学研究院设心理学研究所。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

（五）燕京大学①

1927年燕京大学开始设立心理学系，属理学院，陆志韦任系主任。后来改属文学院。此时主修的学生不多，开设的普通心理学、心理卫生学、社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来选修的学生较多。此外，还有变态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工业心理等方面的课程。教授有夏仁德（美基督教传教士）讲授心理卫生、变态心理学；夏云讲授社会心理学、工业心理学等课；刘廷芳任系主任。1937年时系内有一间较好的阅书室，藏书近千册，杂志十余种，有大实验室一间，小实验室五间，仪器可供普通实验用。主要的研究工作有中国语言在思想上的影响，由陆志韦领导，考察儿童的语言构造和语言习惯对于联想的影响等。还有研究儿童行为的观察，考察幼儿社会行为的发展。②此外，陆志韦和吴天敏曾两次修订比纳西蒙智力测验。③七七事变，北平沦陷，燕京大学因是外国教会所办未被日伪接管，1941年冬才被迫停办，抗战胜利后恢复，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

（六）辅仁大学①

1925年辅仁大学创建，1929年6月在教育学院中建立心理学系，设有心理实验室及儿童心理研究室，具有一切实验应用仪器。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25页。

② 《燕京大学心理学系近况》，载《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36年，第177页。

③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3期，1937年，第274页。

1931年心理学系分为普通心理学组、教育心理学组及儿童心理学组。至1937年心理学分组办法逐渐被取消，只以教育心理及应用心理为重点而不再分组。这时改为哲学心理学系，分为哲学组和心理学组。七七事变后辅仁大学也因是教会大学继续开办，当时留在北平的不少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哲心系有沈乃璋等。沦陷期间，该系无多大变化。抗战胜利后该系研究生和校友多人组织心理学会，增进校外活动及学术研究。① 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

（七）北京师范大学②

192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其前身为北京高等师范，于1920年请张耀翔到校讲授心理学课。他讲授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并创建了一个心理学实验室。③ 北高师改为北师大后，张耀翔曾任教育研究科（相当于现今的研究院）主任，他一直在此任教八年之久。这时增办了教育系。在1933年8月，北平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教育系的课程中分设有教育心理组，其课程有心理学、教育心理、教育和心理测验、儿童及青年心理、学科心理、社会心理、变态心理、动物心理、实验心理、生理心理。④ 1934年朱希亮曾在此任教。1936年蔡乐生曾应聘讲授高等实验心理、动物心理、学科心理等，并担任四年级教育心理组论文指导。⑤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师大转移到西北大后方去，并一再迁徙，校名屡易。抗战期间为西北师院

① 吴宝兰：《心理学系系史》，载《辅大年刊》，1949年。

②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25页。

③ 张耀翔：《我的教学生活》，载《心理季刊》第2卷第2期，1937年，第110页。

④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1～62、95、97～98页。

⑤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36年，第179页。

时，教育系开设的公共必修科中有教育心理学课，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复员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

（八）大夏大学①

上海大夏大学创办于1924年9月，最初在文科设哲学心理系，教育科有教育心理组，并有心理实验室。1936年时，已扩充为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系，章颐年为系主任。当时该系办得较好，教育部特拨款添置设备，扩充实验室，增设动物心理实验室。在动物心理研究方面有"声浪对于白鼠学习能力的影响"、"食物（素食、荤食、杂食）对于白鼠学习能力的影响"和"性生活对白鼠学习能力的影响"试验，并造有特制迷津。其他方面有"中国成人自由联想的调查研究"，并在各地进行测验工作。该系还自制仪器，由助教设计，指导工人制作，或将国外所购仪器交由校理工院工场仿制。所制仪器坚固耐用，价格低廉，并为其他大学心理系代制心理仪器。该系师生组织的大夏心理学学会，十分活跃，如附设心理诊察所，重视儿童心理行为的个案检查，开展儿童心理卫生方面的工作。大夏心理学会编辑出版《心理季刊》杂志。该刊以"应用心理学改进日常生活"为口号，还印制世界著名心理学家相片和情绪判断测验用相片，供设有心理学课的大中学校及研究心理学的工作者备用。该心理学会还经常召开会员大会开展学术演讲等。② 1937年抗战开始，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迁往重庆，胜利后迁回上海，后并入他校。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25页。

②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2期、第1期，第177、89页；《最近心理学界消息》，载《心理季刊》1936年第1期、第2期，第141页，第3期、第4期，第17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设有心理学系或教育心理系的大学还有：上海复旦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上海沪江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协和学院、东北大学、武昌中华大学等。另外，湖南大学、河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大学等教育系或教育研究所也均建立实验室开展心理学研究。①

二、心理学会的成立

（一）中华心理学会（1921年）②

1920年是我国心理学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年份。留美专攻心理学的学者张耀翔、唐钺、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都刚回国不久，已分别在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开始任教心理学课。1920年9月，北京高等师范筹建了心理学实验室，这是由张耀翔到校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在其教育科中设立了一个心理系，并且也筹建了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是中国最早的心理学会诞生的条件准备。

在1921年8月，当时南京高等师范组织暑期教育讲习会，临结束之前，有许多学员认为心理学与教育有莫大重要关系，因而签名发起组织"中华心理学会"，并且征求了好多位心理学教授参加。在南京高等师范临时大礼堂举行了中华心理学会成立大会，通过中华心理学会简章（附后），推选了张耀翔为会长兼编辑股主任；陈鹤琴为总务股主任；陆志韦为研究股主任；廖世承、刘廷芳、凌冰、唐钺为指导员；邵爽秋、吴定良、戴应观、胡昌才为干事。会上决议总务股和研究股的办事处设在南京高等师范。中华心理学

①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3期，1937年，第273页；《最近心理学界消息》，载《心理季刊》第4期，第176、177页；1937年第2卷第1期。

②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31～32页。

会总会和编辑股办事处设在北京高等师范。当时，中华心理学会就在北京高等师范的心理学实验室办公，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也在这里编辑。①

1921年9月，张耀翔在北平，一方面开始组织学会会刊编辑部（其成员主要为教育研究科的学生，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年龄较大，具有一定教学经验与办事能力）；一方面联系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经过四个月的筹备于1922年1月，我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心理》出版问世，这也是东方的第一种心理学杂志，日本过了一年以后才有这种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出版。①

中华心理学会自成立后，开展活动不多。1922年冬，总会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过一次会议，到会者200余人，曾决议在各省成立分会。此外，还举行过学术演讲，如1922年6月曾请梁启超演讲《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又如1923年曾有苏联心理学者叶勒索夫（Erchoff）介绍"俄国心理学最近之发展"。

中华心理学会会员每年都有增加，最盛时达235人，其中大学教授20人，中学教职员工52人，其余皆为专科及大学学员。会员每人每年交会费2元，会刊《心理》杂志主要靠会费和私人捐款，维持数年，由于经济困难，时局不宁，书局营业受影响，刊物不能按期排印，终不得不在1927年停刊。①中华心理学会随着《心理》杂志的停刊也没有任何活动了。

1931年暑假，有好几位心理学界人士又曾经发起组织中华心理学会，并在上海开了一次筹备会，出席者有郭一岑、艾伟、郭任远、沈有乾、吴南轩、陈鹤琴、陈选善、董任坚等，大家拍照

① 张耀翔：《我的教学生活》，载《心理季刊》第2卷第2期，1937年，第110、115～116、123页。

留念。后因“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负责筹备的几位人士都无暇顾及而将此事搁置下来，中华心理学会就再没有恢复了。

附：中华心理学会简章①

1. 宗旨　　本会以研究各种心理问题为宗旨

2. 会员　　凡对于心理学有特别兴趣或研究确有心得及贡献者经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并审查及格方为本会会员

3. 会务　　本会会务暂分下列三项

（1）总务　　文牍　　会计　　审查　　通讯

（2）研究　　除会员互相通讯研究外本股得设问题或将会员提出有价值之问题征求各会员之意见将来扩充时得分股研究

（3）编译　　汇集会员之著作每季出《心理》一册（编译办法另定）会员有译作短篇选登季刊长篇得由本会代刊专书（办法另定）

4. 职员及职务

（1）会长　　设会长一人总理本会一切事务

（2）主任及干事

A 总务股设主任一人总理本股事务设干事二人佐理之

B 研究股设主任一人总理本股事务并答复会员研究之问题设干事二人佐理之

C 编译股设主任一人司编辑审查出版事宜设干事二人佐理之

（3）通讯指导委员　　除研究股设主任干事外更推专门名家为通讯指导委员会委员有重要研究问题得通函请教但回信邮费需随函付足空函概不答复

5. 职员任期及选举　　本会职员均一年一任于大会时选举之连举得连任

① 《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之情形》，载《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7期，1922年。

6. 会员之义务　　会员有交费投稿之义务若一年不交费或未投稿一次者得由职员会取消其会员资格

7. 会员之权利　　会员有通讯研究及领受本会定期出版物之权利

8. 会费　　会员每年应交常年费二元定期收集特别费无定额临时募集

9. 会期　　每年在暑假期内开大会一次每半年开职员会一次日期均临时通知

10. 会址　　会址暂设在南京东南大学高等师范内

11. 附则　　本简章有未尽善得随时修改

(二) 中国心理学会 (1937年)①

在30年代我国心理学已有一定发展。全国大约已有十几所大学设有心理系、教育心理系或心理学组，并相继建立心理学实验室。由蔡元培创建的中央研究院中设立了心理研究所（1929年在北京成立），先后由唐钺、汪敬熙任所长，这是中国有专门心理学研究机构的开始。该所印行了心理学专刊和丛刊，当时有的大学心理系的师生组织自己的心理学会，办刊物，编丛书，开展各种心理学学术活动。如南京中央大学心理学会定有简章，言明该会宗旨为促进心理学之研究，会员资格规定为本校心理系师生和毕业同学及本校其他系师生和毕业同学对心理学具有研究者；学会会务设干事会处理，由七人组成（常务、文书各一人，事务二人，研究三人），由会员票选产生；会员每学期交会费五角等条目。该学会在1934年～1937年编辑刊物有《心理半年刊》和《心理副刊》两种。又如上海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办有《心理季刊》（1936年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33～35页。

～1937年)，还附设心理诊察所（1935年9月成立）进行儿童心理行为的个案检查工作。该所在我国亦是首创。还有北平清华大学心理学会，在1931年曾组织编译中国心理学字典，并经常举行学术演讲等活动。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心理学组织先后成立并开展一些学术活动。如1931年中国测验学会在南京成立，1932年出版会刊《测验》杂志，1935年10月由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些心理学者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卫生协会，1936年4月该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后来1939年“旅沪西人”成立过一个上海心理卫生协会，讲授精神病理并设问题儿童诊察所，中国心理学者也有参加此会的。[①]

从1934年至1936年期间，北平和上海各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及专门研究心理学或担任心理学教课的同志，即有非正式组织，他们采取聚餐会方式或举行谈话会方式，讨论中国心理学的现状和将来的出路问题或研究心理学方面的各种问题以及商讨编译心理学书籍和审查心理学名词等事宜。例如上海各大学心理学教授张耀翔、郭一岑、陈鹤琴、何清儒、陈选善、廖世承、杜佐周、章益、曾作忠、董任坚、黄觉民、陈一百、章颐年等13人经常举行谈话会，研究出版心理学小丛书、双月刊，组织讲演、讲座和校际心理学辩论会，参加者有暨南、大夏、光华、复旦、沪江等五大学。上海的心理学界人士，从1936年上学期开始起，即有一非正式组织，每月聚餐一次，商讨推进心理学学术的各项问题，该团体开展活动半年之后感到无正式组织，亦无固定负责人，对于召集开会、会场记录及对外接洽均有不便，故在10月份聚餐会上推定何清儒起草会章，决定组织一正式团体，定名为“上海心理

①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载《教育心理研究》第1卷第3期，1941年，第27页。

学会”。该会于1937年1月10日正式成立(此上海心理学会成立比中国心理学会早14天),会上通过简章并选举出章颐年、张耀翔、章益三人为干事,分任事务、文书、会计事宜。该会会员,计有吴南轩、杜佐周、何清儒、陈一百、陈选善、陈鹤年、章益、章颐年、张耀翔、郭一岑、黄觉民、曾作忠、董任坚、廖世承等14人。该会成立后举行通俗讲座,定名为“心理与人生”,由各会员分别担任,在青年会大礼堂每周讲演一次。讲题有:(1)如何认识我们的环境(章益);(2)儿童心理与家庭教育(陈鹤琴);(3)如何实施性的指导(杜佐周);(4)青年情绪卫生(吴南轩);(5)爱时髦的心理(曾作忠);(6)人生活动的动机是什么(张耀翔);(7)如何谋求职业成功(何清儒);(8)如何提高工商界工作效率(黄觉民);(9)天才心理(陈选善);(10)人们的发育(董任坚)共十讲。听众始终踊跃参加。

从1934年7月开始,北平各大学:清华、北大、师大、燕京和辅仁的一些心理学者,每月第一周举行聚餐会。最初参加的有樊际昌、陈雪屏、潘企莘、程克敬、朱希亮、王徵葵、高文源、刘廷芳、陆志韦、孙国华、叶石子、周先庚等。此外,尚有包志立及瞿容二女士,其后又有陈立加入。在各次聚餐会上,参加者都开诚交换意见,毫无顾忌地讨论中国心理学的现状及将来出路等问题,“均承认应用方面之提倡,实为当今急务”。在1935年11月份的聚餐会上,陆志韦发动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公推北大樊际昌、清华孙国华、燕京陆志韦负责起草章程。三人于11月3日在燕大拟定“中国心理学会章程草案”,经过几次集会征求意见讨论修改后,将该“草案”向南方的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的心理学者用通信方式征求意见,复信均表赞同,认为建立“中国心理学会”是当今急务,毫无异议。当时各地复信赞同加入合作者,有艾伟、朱希亮、汪敬熙、何清儒、沈有乾、陈

剑修、陈礼江、章颐年、张耀翔、肖孝嵘、瞿容、左任侠、赵演、吴定良、张肖松、陈选善、廖茂如、黄觉民、胡毅、高觉敷、倪中方、段铮、谢循初、叶麟、黄钰生、孙贵定等人。①

1936年10月份的聚餐会，讨论学会章程草案，改会长制为理事监事制以求与当时现行组织法一致，并公推陈雪屏起草发起学会组织启事。11月心理学界人士32人发出通知正式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发起人为：王徵葵、包志立、艾伟、朱希亮、汪敬熙、何清儒、吴南轩、沈有乾、周先庚、陈志韦、陈雪屏、陈立、陈礼江、高文源、高翰、倪亮、孙国华、郭一岑、唐钺、章益、章颐年、张耀翔、黄翼、程克敬、程乃颐、蔡乐生、樊际昌、刘廷芳、刘绍禹、潘渊、潘菽、肖孝嵘。②

在启事中，首先提出"现在有重新组织心理学会的必要"。启事中说："同志们在国内外曾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研究作品，曾先后为提倡心理学的效用而努力，但中国的心理研究在国际上还没有达到相当的地位，心理学系在国内各大学中且有日趋没落之势，一般人对于心理学应用的价值更是漠不关心。我们的失败，正因为过去缺乏合作，社会上流行的成见，障碍心理研究的发展，本是普遍现象，在我国这样的情形尤见严重。我们更需要坚强的合作，来排除这个障碍。"信中号召大家"各尽其责，用热心与毅力，共同奠定中国心理学会的基础，发扬中国的心理学"。②

1937年1月，当时教育部召开心理学名词审查会议，适在寒假期间许多心理学者都集合在南京，于是中国心理学会趁此机会而再次组成，1月24日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大礼堂举行中国心理学会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有：陆志韦、肖孝嵘、刘廷芳、艾伟、赵

①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1期，1936年，第84、89页。
②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36年，第174页。

演、陈礼江、谢循初、高翰、章颐年、潘菽、郭一岑、章益、胡寄南、欧阳翥、吴定良、吴南轩、蔡乐生、樊际昌、王风喈、唐钺、张肖松、张君俊、卢于道、杜元载、陈立、程乃颐、王书林、汪敬熙、孙贵定等三十余人。公推陆志韦为主席。会上票选理事七人：陆志韦、肖孝嵘、周先庚、艾伟、汪敬熙、刘廷芳、唐钺当选。并推选出版委员五人，再由委员会另推一人共同担任学报及其他学术著作的出版事务，即推定陆志韦、肖孝嵘、蔡乐生、沈有乾、孙国华、周先庚六人。《中国心理学报》的编辑及筹款事项，移归学会管理，正式作为学会刊物。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并决定当年暑假在北平举行第一届年会。还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和出版委员会。理事会推举刘廷芳、汪敬熙、肖孝嵘为常务理事；汪敬熙为书记兼会计；章颐年、樊际昌、陈礼江为第一届年会委员。①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原订于8月26～28日3天在北平举行第一届年会，由学会书记汪敬熙发出通知，但因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心理学会的活动和刊物出版都被迫停止。抗战期间，只有少数学校迁至内地维持教学和研究，直至解放后1950年才又筹备重组中国心理学会。

附：发起人通函②

××先生：

我们觉得现在有重新组织心理学会必要。

同志们在国内外曾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研究作品，曾先后为提倡心理学会的效用而努力，但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在国际上还没有达到相当的地位。心理学系在国内各大学中且有

①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3期，1937年，第270～272页。

②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36年，第174页。

日趋没落之势，一般人对于心理学应用的价值更是漠不关心。我们的失败，正因为过去缺乏合作，社会上流行的成见，障碍心理研究的发展，本是普遍的现象，在我国这样的情形尤见严重。我们更需要坚强的合作，来排除这个障碍。

过去心理学会的组织不幸都中途夭折，那是最可惜的，我们看到各种科学学会相继成立，自己不免觉得惭愧。心理学在科学中原是一个后辈，我们现在来开始进行，也还不晚，也许截长补短，能获得更健全的组织。

在一年前北平的同志们全体感到这个需要，经过几番慎重的讨论，拟了一个会章草案，征求京、沪、杭、广等地同志们的意见，一致表示同意，而且踊跃地给予很多的修正。这一次寄上的会章可以说是修正的定案。现在不能再迟延了！让我们各尽其责，用热心与毅力，共同奠定中国心理学会的基础，发扬中国的心理学。如蒙赞同，愿加入合作，请于12月10日前答复，信寄北平、清华、师范与燕京四个心理学实验室转。关于会务进行事项，当再随时奉达，此请

教安

发起人

王徵葵　汪敬熙　周先庚　陈礼江　孙国华　章颐年
程乃颐　刘绍禹　包志立　何清儒　陆志韦　高文源
郭一岑　张耀翔　蔡乐生　潘　渊　艾　伟　吴南轩
陈雪屏　高　翰　唐　钺　黄　翼　樊际昌　潘　菽
朱希亮　沈有乾　陈　立　倪　亮　章　益　程克敬
刘廷芳　肖孝嵘

中华心理学会章程①

①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3期，1937年，第270～272页。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国心理学会。

第二条　本会以促进心理学之研究及应用为宗旨。

第三条　本会由会员及会友组织之。会员以专门研究及促进心理科学之研究及应用者为合格，会友以对于心理学有兴趣者为合格。

第四条　本会会员会友须经会员二人之介绍，交由理事会付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之，得投票人五分之四之同意者为会员。遇有会友改为会员时其手续同。

第五条　本会会员会友有出席年会宣读论文并得免费享受本会刊物之权利，会员并有选举、被选举权及提案表决权。

第六条　本会设理事会理事七人，由全体会员于年会前通信选举之，任期两年，第一年改选四人，第二年改选三人，此后类推，连选得连任。

第七条　本会理事会设常务理事三人，执行本会会务，由理事会公推之，任期一年。

第八条　本会设年会委员会委员三人，每年由理事会公举之。

第九条　本会设出版委员会委员五人，由全体会员于年会前通信选举之，任期三年，第一年改选一人，第二年第三年各改选二人，连选得连任。

第十条　本会会员遇五人以上同在一地者，得组织分会。

第十一条　本会会员会费每年六元，会友会员每人三元。

第十二条　本会章得由本会会员十人以上连名提议，交由理事会提出年会，经出席会员三分之二以上之通过修改之。

(三) 中国测验学会*

* 参见赵莉如先生 1992 年《心理学动态》（专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 历史背景

心理测验有关思想和措施在我国由来已久，古代孔子就把人的智力分为上、中、下三等；孟子认为物和心皆有一种可测量的品性。汉代盛行选荐制，魏晋时期推行九品方正制，隋唐至清末实行科举制，都为教育考试选士登庸所用，但评判结果均欠科学标准。民国以后，西方心理测验逐渐传入，并曾在国内极为盛行，这与我国历来重视考试铨选相沿有关。那时的教育部门极力提倡利用测验，实施新法考试；同时，测验也作为心理学者进行心理学问题研究的方法。

心理测验最早传入我国，是在1915年克雷顿在广州用机械记忆、条理记忆、交替、比喻等项的心理测验，试验500人；1918年瓦尔科特在清华学校用推孟修正智力量表试验该校学生。此两项测验历史虽早，尚非为有意的正式介绍。1920年廖世承和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开设测验学程，以心理测验试验学生，这才算在我国正式开始采用科学的心理测验。1921年廖、陈出版《心理测验法》；比纳（Binet）量表也在这时由费培杰译成中文《儿童心智发达测量法》（1922年4月出版）；这年张耀翔也在《教育丛刊》上发表心理测量和新法考试的文章，并在北京高等师范首先将心理测验列为入学考试科目之一。1922年以后，张耀翔主编的《心理》杂志以及教育杂志上，均刊登有关测验的文章。

由于当时教育部门的重视和提倡，一些教育机构纷纷成立心理教育测验组织，大力宣传和推行测验工作。如：（1）中华教育改进社，1922年聘请麦柯来华主持编制测验约五十余种，1923年～1925年先后在北京、南京、太原集合全国教育家讨论推广教育心理测验；（2）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于1926年设教育心理讲座于东南大学，聘艾伟担任测验研究工作；（3）1928年江西省儿童智力测验局成立，由杜佐周任局长，开展大规模的测验；（4）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科学测验部由陈选善主持，进行职业指导研

究。这时期我国测验工作的特点是只采用T量表去编造各种测验，认为T量表具有等距单位的优点，全国量表可以一致，便于比较。但T量表的编制颇费手续并有解释不易通俗化等弊病，后来也开始编制他种量表。

此时期所编制的测验分为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两类。智力测验类有：(1) 陆志韦订正比纳西蒙智力测验；(2) 廖世承团体智力测验；(3) 德尔满调查用非文字智力测验；(4) 刘廷芳中学智慧测验；(5) 刘湛恩非文字智力测验；(6) 陈鹤琴图形智力测验等。教育测验类有：(1) 俞子夷的小学书法测验，正书小字量表，行书小字量表，小学缀法量表，小学算术应用题测验，小学算术混合四则测验，初小算术四则测验，算术练习测验，小学社会自然科测验等；(2) 陈鹤琴的初小默读测验，小学默读测验，小学文法测验，小学默字测验，中学默读测验，小学常识测验等；(3) 廖世承的中学文学常识测验，中学文法测验；(4) 德尔满的算术四则测验，学校自用普通教育测验；(5) 周学章国文作文量表；(6) 张耀翔识字测验；(7) 华超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阅读测验；(8) 汪桂荣、廖世承中学混合数学测验；(9) 陈兆鹏等混合理科测验；(10) 杨国荃本国地理测验；(11) 韦润珊、廖世承中学混合地理测验；(12) 徐则陵本国历史测验；(13) 苏毓芬、廖世承中学混合历史测验；(14) 安德生混合英文测验；(15) 祁司英文测验；(16) 艾伟中学英文测验；(17) 麦克乐体育测验；(18) 查良钊调查用教育测验等。

此时期对测验的大规模应用主要有五次：

(1) 1922年春，廖世承、陈鹤琴将比纳西蒙智力测验说明书译成中文后，并加入数项新测验，在京沪一带各公、私立学校试验学生（3～13岁，自幼稚园至高小、初中）达1400余人。

(2) 麦柯来华后，1923年开始进行普通的智力与教育测验，

在华北（平、津、徐州、济南、泰安、开封、太原、保定）测 31000 人；在华东、华中（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南昌、武汉、汉口、长沙）测 50000 人；在华南（福州、厦门、广州）测 21000 人。求出了三年级至八年级学童的年龄与班级常模及其他统计数字。

（3）1926 年艾伟在南京、苏州、无锡、上海、常州、昆山、杭州、镇江等地进行国文测验，调查中学生的白话与文言的理解力及其速度。后经修正分甲乙二量表另举行两次调查，所至之处为平、津、南通、北通、扬州、镇江、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处。

（4）1928 年春，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杜佐周在南昌九江等地举行测验共测儿童 4000 余人。制定教师评判智力标准表用以考察智力测验之成绩与教员评判的相关。还制有学业成绩调查表，用以考察智力与学力相关。

（5）1924～1925 年，北平协和医学院许文生在南苑军营设一人体测量实验室，测军人（体高、体重、头部、脸部、鼻部指数）1200 人；另测北师大、清华学生 471 人。

2. 成立缘起

我国测验工作在 1923～1924 年间曾风行一时，到 1927～1928 年仍然盛况不衰，但到了 1929～1930 年时竟“一蹶不振”，社会上对测验有“淡然弃置之势”。有人分析当时的原因，一是为赶时髦，认为测验是时髦的，所以东也测西也测，实际弄得非驴非马，把测验的本义反因此而愈晦。另一则是由于测验的滥用与若干所谓的学者的夸大，每以不正确的结果夸示于人致使社会发生反感。当此时，有一些心理学者如艾伟、肖孝嵘、吴南轩、陆志韦、陈鹤琴等人感到过去只知采用其方法，而未能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研究其原理，改进其技术，推广其用途，故提倡组织中国测验学会。该会于 1930 年冬开始筹备，1931 年 6 月 21 日在北

平举行第一次年会并宣告正式成立。

3. 学会活动

中国测验学会宗旨为研究各种测验学术，推行测验方法。主要工作为：(1) 编造及修订各种测验；(2) 编译及刊印关于测验及教育统计之书报；(3) 调查各地实施测验状况；(4) 办理各机关委托研究事项；(5) 宣传测验之功用。

该会办有会刊《测验》，会员间的各种测验研究均登载于此刊。自 1932 年 5 月创刊至 1937 年 1 月停止，共出版九期（详见《我国抗战前的心理学刊物》）。

该学会举行过三次年会[①]：

第一次年会 1931 年 6 月 21 日在北平举行，宣告中国测验学会正式成立。全体会员大会通过《中国测验学会简章》(附后)，选出理事会（名单附后）。

第二次年会 1933 年 12 月 29 日在南京中央大学致知堂举行，主席为肖孝嵘，出席会议者有陈大齐、沈有乾、陈选善、陈鹤琴、艾伟、陈剑修、赵演等共计 200 余人。年会论文 19 篇。进行论文宣读三次：第一次（29 日下午）主读者艾伟、章润之、周先庚（肖孝嵘代），多为教育测验方面的论文；第二次（30 日上午）主读者陈礼江、左任侠（艾伟代）、陈鹤琴等，多为关于心理测验的论文；第三次（30 日下午）主读者朱君毅、吴南轩、王书林等，为关于测验问题的论文，每一论文宣读后进行讨论。会议期间还进行会章修正和理事选举（名单附后）。

第三次年会 1936 年 5 月 2 日在江苏无锡省立教育学院举行，

① 年会活动仅根据现在查到的材料《中国心理学报》(1937)，曾报道“中国测验学会已订于 6 月 27 日起在南京召开年会，并宣读论文，前已通知会员届时出席。至论文题目应于 6 月 15 日以前寄交该会云”。恐此次年会因“七七”事变未能开成。

到会的有沈有乾、艾伟、俞子夷、刘廷芳、陈选善、俞庆棠等。2日上午大会开幕，主席陈礼江，刘廷芳、艾伟演讲。下午会议主席陈剑修，讨论会务和讨论测验译名复审问题，并推沈有乾、庄泽宣、俞子夷三人加以审查。3日开会宣读论文，有陈鹤琴的一个机遇公式的商榷；陈礼江的成人用非文字团体智力测验编测经过及其初步结果；艾伟的文白测验结果之比较研究；肖孝嵘的墨跋量表之修订及其应用，军队测验编造的经过和罪犯情绪态度及人格倾向之实验研究；李清悚的中学会考问题之调查研究；宗亮东的机械能力测验标准化初步报告；沈有乾的标准之常性误差及其校正方法；蔡乐生之汉字部首的学习迁移和国防教育与心理测验；陈选善的测验运动前瞻；王书林的编制中小学校用各种教育测验工作的经过等十数篇。

4. 测验工作

中国测验学会发展至1940年，有基本会员160人[①]，已形成中国测验界之总汇。自学会成立后针对过去“效用还不十分显著，方法也还不很精确”和“极希望有一种最可靠的考试方法和标准”[②]的要求，重视对测验的研究，进行测验学理的探讨，如左任侠、艾伟提出对我国采用T量表的批评，王书林、陈立、左任侠对智力是由两种因子还是由多种因子构成作了论述等。编订新法试卷或非标准测验20余种，并新编有标准测验多种。如肖孝嵘修订的墨跋量表，黄觉民订正的宾堪幼童智力测验，艾伟主编的小学教育测验全套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测验》停刊。抗战期间亦未见以测验学会名义开展活动，但测验工作仍继续进行，并

① 根据左任侠《最近中国科学测验之发展趋势》（《学林》第1辑1940.11）一文中提到基本会员160人。但在《测验》上报道《中国测验学会年会记盛》中提到“截至1933年12月止该会会员共178人”。

② 《中国测验学会年会记盛》中陈大齐的发言。

且实施测验的范围逐渐扩展。如最初各种测验量表只试用于小学生，后来逐渐向上扩展至大学，同时也向下扩展到用于幼稚儿童智力测定的编定。除在教育上的应用外，也伸展至实业界和当时国民党的党政部门，并注重品性测验的应用。一些教育心理学者利用测验进行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如关于教法问题、汉字问题。民族心理的比较等均用测验方法。总之，在解放前，心理测验在我国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已获取了相当的地位和发展。

附：

中国测验学会职员名录（1932. 5）

理　　事：　艾　伟　易克櫄　陈鹤琴　顾克彬
　　　　　　廖世承　彭百川　史维焕
候补理事：　吴南轩　王书林　陈志韦
编译委员会委员：　艾　伟　吴南轩　肖孝嵘　陆志韦
　　　　　　陈选善　刘乃敬　王书林　潘　菽
　　　　　　彭百川
研究部主任：　艾　伟
事务部主任：　易克櫄
干　　事：　黄龙先　徐心荃　王素贞　郑大源
　　　　　　汤鸿翥　严铭吉

中国测验学会职员名录（1937. 1）

理　　事：　肖孝嵘　易克櫄　艾　伟
　　　　　　（以上常任理事）陈鹤琴　王书林
　　　　　　吴南轩　陆志韦
候补理事：　廖世承　黄龙先　陈剑修
研究部主任：　肖孝嵘

事务部主任：　易克㰖

编译委员会委员：　肖孝嵘（主任常务委员）　沈有乾
陈礼江　陈鹤琴　周先庚　程乃颐
郝耀东　吴南轩　艾　伟
（以上常务委员）　熊文敏　朱君毅
陈剑修　赵乃传　杜佐周　庄泽宣
汪懋祖　黄敬思　章　益　许恪士
郑宗海　倪　亮　邬振甫　蔡乐生
郃爽秋　唐　钺　罗廷光　周邦道
黄龙先　左任侠　张士一　常道直
郭一岑　王书林　刘乃敬　彭百川
陆志韦　周学章　刘廷芳　廖世承
陈选善　俞子夷　黄　翼　张耀翔
顾克彬　潘　菽　肖承慎　史美煊
李清悚　马客谈　童润之　杜元载
黄建中　杨敏祺　任培道　章颐年
张肖松　高觉敷　钟鲁斋　吴定良
卢于道　欧阳翥　易克㰖　陈一百

经济委员会委员：　陈大齐　吴南轩　陈剑修
（以上常务委员）　彭百川　马超俊
苗培成　梁寒操　史维焕　吴大钧
赖　琏　顾树森　朱君毅　陈礼江

驻平干事：　周先庚

驻沪干事：　廖世承

驻杭干事：　沈有乾

驻锡干事：　童润之

测验译名委员会委员：朱君毅　吴南轩（召集人）　王书林

刘乃敬　艾　伟　肖孝嵘　陈鹤琴
俞子夷　沈有乾　庄泽宣
编造中小学标准测验：王书林(召集人)　陈礼江　陈鹤琴
刘乃敬　艾　伟　廖世承
设计委员会委员：　肖孝嵘
干　　事：　曹　飞　杨时雨　张达善
(以上研究部兼编译委员会干事)
黄龙先　郑大源　徐心荃　朱元俊
吴鼎培（以上事务部干事）

中国测验学会简章

(中华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大会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国测验学会

第二条　本会以研究各种测验学术推行测验方法为宗旨

第三条　本会会务暂定于下：

1. 编造及修订各种测验
2. 编译并刊行关于测验及教育统计之书报
3. 调查各地实施测验状况
4. 办理各机关委托之研究事项
5. 宣传测验之功用
6. 其他

第四条　本会会所设于首都遇必要时得设分所于各地

第二章　会　　员

第五条　本会会员资格规定如下：

1. 普通会员

甲、个人会员

子、对于测验或教育统计有专门学识者
丑、对于测验或教育统计有相当基础而有研究兴趣者
寅、其学业事业与测验有关系者
乙、团体会员
子、各机关各团体有测验统计工作者
丑、各机关各团体有应用测验统计工作者
2. 特别会员　对于本会经费及事业发展负赞助责任之个人或团体

第六条　会员入会须有本会会员两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通过方得为本会会员

第三章　组　织

第七条　本会设理事会七人后补理事三人由全体会员公选之

第八条　本会理事之选举由会员于常年会员大会期前用记名连选法通信选举密封送交理事会汇齐于常年大会中开票以得票最多数七人为理事次多数之三人为后补理事如有得票同数不能决选者由常年大会决选之

前项选举其选举票由理事会制定于常年大会期前一月送交各会员

第九条　本会理事后补理事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

第十条　理事会职权如下

一、代表本会对外关系
二、规定进行方针
三、规定进行计划
四、支配本会经费
五、筹划经费

六、组织各部

七、核定各部办事细则

八、审定会员资格

第十一条　理事会由理事互推三人为常务理事处理日常会务

第十二条　本会设研究事务两部，每部设主任一人主管各部一切事务由常务理事互推兼任之

各部设干事若干人处理各部事务，由常务理事提请理事会通过聘任之但为名誉职

各部于必要时得设事务员书记若干人，由常务理事请理事会任用之

第十三条　本会于必要时得设特种委员会其组织另定之

第四章　会　议

第十四条　会员大会每年开会一次由理事会召集，共地点及日期由前一次大会决定之理事认为有必要或由会员十五人以上之提议经理事会之通过时得召集临时会员大会

第十五条　理事会至少每三月开会一次，由常务理事会召集之

第十六条　会员大会以到会会员（无论其本人或委托本会会员代表——每人以代表一人为限）过全体会员三分之一以上为法定人数，理事会以该会人数过半数以上为法定人数

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应取决于到会人数之过半数理事会应取决于到会人数三分之二

第五章　经　费

第十八条　本会经费以下列各项充之

一、会费

二、会员特别捐

三、党部及政府之补助费

四、社会上团体或个人之捐助

五、各机关委托研究事项时所出之事业费

第十九条　本会会费分入会费常年费两种，团体普通会员入会费十元，常年费每年四元，个人普通会员入会费五元（学生二元），常年费二元，个人特别会员入会费一百元或以上，常年费十元团体特别会员费五百元或以上，常年费一百元

第二十条　关于本会研究及订购书籍仪器等费除在预定范围内支配外其不足之数由本会临时募集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简章如有未尽事宜得由理事五人以上或会员十人以上之提议提出大会修改之

第二十二条　本简章由会员大会通过呈奉南京特别市党部南京市政府核准施行

（四）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1. 历史背景

我国古代先哲即注重治心养性之学，但未能自成系统和科学化，遂散轶失传。心理卫生是20世纪初在欧美各国开始盛兴起来的一种科学健心术。它本来是属于医学范围的，最初从事这项工作的大都是医生，后来医学由治疗转移至预防，以后心理卫生和教育发生密切关系，注重儿童行为的训导健全人格的培养等。在30年代初我国从美国开始引进了心理卫生。

西方各国开展心理卫生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到家庭、教育、医药、法律、工商、军事等部门，曾作了大规模的宣传和创立大规模的组织，形成所谓“心理卫生运动”。这个运动是由一个康复的

* 参见赵莉如先生1992年《心理学动态》（专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精神病患者——比尔斯（美国人）于1908年3月出版他写的《自觉的心》这本书发源的，书中呼吁改善精神病患者的待遇和从事预防精神病的活动。此书感动了当时的一些名人，赞助和推动比尔斯开展提出的心理卫生运动计划。同年5月成立康奈惕克州心理卫生协会，这是全世界心理卫生运动的第一个组织，也可说是心理卫生运动的正式开始。1909年又成立了美国心理卫生委员会。在美国心理卫生活动的推动下，世界许多国家纷纷成立各国的心理卫生组织，如加拿大（1918）、法国（1920）、比利时（1921）、英国和巴西（1923）、匈牙利（1924）、德国和日本（1925）、意大利（1926）以及阿根廷、奥地利、古巴、捷克、芬兰、印度、新西兰、南非联邦、西班牙、瑞士、苏联、土耳其、智利、挪威、瑞典等国都成立了心理卫生组织。在1919年以后，以比尔斯为主的心理卫生事业的推行者，积极酝酿成立一个心理卫生的国际组织。起初，先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至1927年这段时期内，此委员会共召开过四次会议。经反复磋商终于1930年5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第一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并正式成立国际心理卫生委员会。有53个国家参加了会议。我国有五位代表参加，由汪敬熙在大会中报告我国心理卫生的情况。

国际心理卫生委员会的组织宗旨是："完全从事于慈善的、科学的、文化的和教育的活动，尤其关于世界人民心理健康的保持和增进，心理疾病心理缺陷的研究、治疗和防止，以及全体人类幸福的增进。"比尔斯任该会秘书长，有会长1人，名誉会长6人，名誉副会长53人。我国刘瑞恒（当时是我国卫生署长）也被推为名誉副会长之一。可是这时中国还没有心理卫生的组织，当时我国对于心理卫生这个重要的问题还很淡漠，缺乏认识；精神病患者还很受歧视和讥讽甚至戏弄。当时精神病院极少，而且都是监狱式的拘留所，全靠锁链桎梏，根本谈不上治疗，在乡村内地一般认为精神病

有恶鬼附身，须用桃枝毒打，以驱鬼治病。还有的地方，对待精神病人更有种种陋俗，如杭州东岳庙每逢旧历七月，有一个“审疯子”的风俗，届时如节日赛会一样，把疯人当作罪犯看待，由“东岳大帝”审讯，对被审疯子严刑拷打，还认为打得愈厉害则愈有“治愈”的希望，认为鬼也是怕刑罚的，真是愚昧无知至极。精神病人如此，那时一般民众身体孱弱，精神萎靡甚至坠落，亦缺乏身心健康。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和社会其他人士在30年代初，始注意心理卫生问题，当时有些大学开设心理卫生课程。如，较早的有燕京大学心理系的夏仁德（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1932年时讲授心理卫生课，颇有声望。1935年他出版一本 *Personality and Everyday Behavoir*，是他担任心理卫生课程的讲义。

2. 发起经过

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其他人士，一方面在国际心理卫生运动日趋发展的形势下，日益认识到此项运动的意义及重要性，另一方面国内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人们对“担负解纾国难与恢复国家地位之人民宜如何身心健全，以肩荷大任”① 深感焦虑，认为心理卫生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工作。如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缘起》中开头即说：“国于大地，必有兴立，立国基之道为何？民心或民族之精神而已。无论任何国家，其民心健全者国必强盛，民心堕落者国必衰微，民心者实一国国力兴衰升降之寒暑计也。故先哲皆以心地为本，治学者以治心为先，治军者以攻心为上，治国平天下者以诚意正心为主。心之为用大矣哉，操则存，舍则亡，个人如此，一国民族尤然。”为了“保持与促进国民之精神健康及防止国民之心理失常与疾病”，“研究心理卫生学术及推进心理卫生事业”，由南京中央

①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缘起》，载《心理卫生概况》附录，1936。

大学教育学院同人特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于1935年10月开始筹备，先由基本发起人32位向全国心理学界征求意见，经过教育家、心理学工作者、医生、社会学者及其他社会人士共231人的酝酿和发起，并得到146位知名人士的赞助，于1936年4月19日在南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发起人除国内多数心理学家而外，尚有学界何炳松、李建勋、李书田、吴南轩、郜爽秋、徐诵明、孙国封、陶孟和、黄建中、梅贻琦、程其保、杨亮功、黎照寰、龚贡泉等；医界戈绍龙、刘瑞恒、颜福庆等；政界方颐积、何浩若、何思源、吴大钧、许世英、陈大齐等。赞助人中有王世杰、王云五、王星拱、石瑛、朱经农、朱培德、朱家骅、何应钦、吴铁城、吴敬恒、汪兆铭、邵力子、孙科、唐孽黄、陈果夫、陆志韦、郭任远、钮永建、曾仲鸣、邹鲁、叶楚伧、刘纪文、刘崎、蒋梦麟、蔡元培及罗家伦等。

3. 组织活动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理监事是用书面投票选举的，由司选委员会杨亮功等七人办理选举事宜，1936年5月2日通讯选举，6月1日开票，整理后于6月17日发表选举结果：艾伟、吴南轩、肖孝嵘、陈剑修、陈鹤琴等35人当选为理事；周先庚、方治、高阳等15人当选为候补理事；陈大齐、陈礼江、杨亮功、刘廷芳、廖世承等21人当选为监事；梅贻琦、章益、郑洪年等9人当选为候补监事。(全体理监事名单附后)

该届理事于6月19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举行就职典礼，并分别召开理事监事会议，讨论会务进行方针。该日的第一次理事会议，出席30人，临时主席为吴南轩。首先推举吴南轩(总干事)、肖孝嵘、艾伟、陈剑修、朱章赓五人为常务理事；又推定熊文敏、易克櫄为总务部正副主任；汪敬熙、卢于道为研究部正副主任；吴贻芳、张肖松为社会服务部正副主任；谢循初、章

颐年、戚寿南为编译委员会委员；王志莘、金宝善、霍宝树为经济委员会常委。并确定各理事的任期为一年或两年。在此次会上还通过了1936年度的工作计划，主要为：征求会员；编印杂志、丛刊；介绍书报，举行演讲；举办儿童幸福讨论会；推广心理医学教育；征集材料；调查精神病院低能儿童；实施测验；培养人才（考选留学生）；筹办精神健康咨询处、儿童指导所及参加第二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等十五项工作。（详见工作计划大纲，附后）该日的第一次监事会议，出席17人，临时主席为黄建中，决议聘定许澄远、孙蕙如为干事；许本震、常道直、黄建中为常务监事，并确定各监事的任期为一年或两年。

该会会址在南京山西路105号，于7月1日迁入办公，积极致力于准备工作。因第二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心理卫生协会活动被迫停顿。直至抗战胜利后，1948年[①]曾在南京开过一次局部的心理卫生代表会议。

4. 心理卫生工作

我国的心理卫生工作，在1935～1937年间，即建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前后的三年时间，较为发展。这个时期，心理卫生已引起国内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的重视。关于心理卫生的文章，散见于各种杂志很多，在专门的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心理卫生的文章也有相当数量（见《中国抗战前的心理学刊物》中心理卫生部分）。并且在1936年有了系统的专著即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心理系章颐年（系主任）所著《心理卫生概论》（1936年10月出版）。这是他在上海各大学担任心理卫生课多年，将平日所用之教材加以整理而成。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泛论心理卫生的基本

① 唐自杰写《心理卫生运动简史》言：1947年11月21日才在南京举行第二届年会，到会员一百多人。

原则，以及破坏人格的几种主要势力（怕惧、失败、冲突）；下编讲及心理卫生的应用（医学、父母、教育、法律、实业）。此书是我国在此方面的第一本教科书，可作大学教材以及师范和家庭参考。另外，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于1935年9月即创建问题儿童诊察所，推进儿童心理卫生，力图补救不能适应的问题儿童。这是我国第一个诊察儿童心理的机关。1936年秋，上海中华慈幼协会也添设儿童心理诊察所，进行儿童心理治疗工作。该所由李卓依主持。她从事儿童诊疗的实际工作，曾将八十余份儿童个案写成报告，择要在《现代父母》月刊上发表。

附：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选举第一届理监事名单

理　　事：艾　伟　吴南轩　肖孝嵘　陈剑修　陈鹤琴
高君珊　王书林　潘　菽　熊文敏　朱章赓
郭一岑　沈有乾　汪敬熙　谢循初　张耀翔
戚寿南　金宝善　章颐年　张士一　王风喈
俞子夷　李廷安　颜福庆　胡定安　马客谈
吴俊升　沈蕃斋　李建勋　袁敦礼　马宗荣
翁之龙　董任坚　何思源　黄觉民　张　炯

候补理事：周先庚　方　治　高　阳　徐悲鸿　蔡乐生
吴蕴瑞　黄　翼　陈选善　叶溯中　赵　演
易克櫄　陈科美　高觉敷　郝耀东　周学章

监　　事：陈大齐　陈礼江　杨亮功　刘廷芳　廖世承
黄建中　顾树森　程其保　褚民谊　邰爽秋
吴贻芳　刘湛恩　何炳松　雷　震　钟道赞
许本震　孙本文　赵乃传　郑通和　常导之
刘瑞恒

候补监事：梅贻琦 章 益 郑洪年 姜 琦 杨 杰
陈石珍 陶孟和 黎照寰 徐诵明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1936年度工作计划大纲

一、关于会务方面的

（一）广征会员

（二）聘请专任总干事和干事

（三）聘请技术人员

（四）筹备基金

（五）捐建会所

二、关于宣传方面的

（一）编印心理卫生杂志

（二）编印心理卫生丛册

（三）介绍心理卫生书报：1. 编印书目，2. 翻译书籍

（四）举行心理卫生讲演：1. 普通讲演，2. 图表讲演，3. 幻灯讲演，4. 播音讲演

（五）举行心理卫生展览会编制和征集以下诸种有关心理卫生资料：1. 书籍，2. 图表，3. 工具，4. 照片，5. 模型，6. 幻灯，7. 影片

（六）编演心理卫生戏剧或电影

（七）设立心理卫生图书室

（八）设立心理卫生资料交换所

三、关于调查方面的

（一）调查全国精神病人

（二）调查全国学校低能儿童

（三）调查全国现有精神病院概况

四、关于研究方面的

（一）编订并实施心理健康测验

（二）研究心理疾病的原因性质疗治及预防方法

五、关于教育或人才训练方面的

（一）推广心理医学教育

（二）设立心理卫生学院训练下列各种人才：1. 精神病医学士，2. 心理卫生工作人员，3. 精神病学看护，4. 精神病学社会服务员，5. 访问教师，6. 其他

（三）考选合格青年资送国外留学专习精神病学心理卫生等

六、关于一般救济和治疗方面的

（一）协助现有精神病院改善内容及病人待遇

（二）协助政府或私人机关筹设精神病院

（三）协助普通医院添设精神病科或精神病治疗部

（四）协助精神病院或普通医院添设心理诊疗所。1. 示范式，2. 巡回式

（五）协助政府筹设低能院或就学校成立低能儿童班

七、关于一般预防方面的

（一）提倡精神病与低能之优生的控制（如德国颁行之优生律）

（二）提倡为父母的教育（如苏俄设立之父母的大学）

（三）举办儿童幸福讨论会

（四）设立婴儿习惯诊察所（为学龄前儿童用）

（五）设立儿童指导所（为学龄儿童用）

（六）设立成人精神健康咨询处.

（七）设立婚姻指导部

（八）设立职业指导部

八、关于特种救济及预防方面的

（一）提倡举行罪犯之心理及神经检查

（二）提倡举办青年法院青年感化院等

（三）提倡举行士兵之心理及神经检查

（四）提倡推行工商企业科学家的人事管理

九、关于国际联络方面的

（一）派遣代表参加第二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

（二）派员考察各国心理卫生事业之实施概况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简章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成立大会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第二条　本会以保持并促进精神健康防止心理的神经的缺陷与疾病为宗旨

第三条　本会工作为研究有关心理卫生之科学学术倡办并促进有关心理卫生之公共事业其范围暂定如次

一、探讨关于保持并促进精神健康之方法及其原理

二、编译并刊行关于心理卫生书报

三、调查并统计各地实施心理卫生之状况

四、征集国内外有关心理卫生实施之材料

五、训练推行心理卫生事业之人才

六、普及心理卫生之知识

七、推行并协助各方办理关于保持精神健康及防止心理的神经的缺陷疾病之实施事项

八、促进对于精神疾病者之医疗与待遇方法之改善事项

九、推行并协助各方对于低能者特殊教育与管理之设施事项

十、建设有关心理卫生之事项于中央或地方政府

十一、联络国内外心理卫生机关并与其他有关系的团体合作

以利心理卫生运动之推进

十二、其他

第四条　本会设于首都

第五条　本会为谋会务推行顺利起见得在各地设立分会其章程另订之

第二章　会　员

第六条　本会会员资格规定如次

一、普通会员

甲、个人会员

子、对于心理卫生有专门学识者

丑、对于心理卫生学术有研究兴趣者

寅、其研究学科及事业与心理卫生有关系者

卯、志愿推行有关心理卫生之事业者

乙、团体会员

子、有关于心理卫生设施之各机关各团体各工商企业组织

丑、有实施心理卫生需要之各机关各团体各工商企业组织

二、赞助会员　对于本会经费及事业发展负赞助责任之个人或机关团体与工商业组织

三、永久会员　个人普通会员一次交纳会费二十元者或团体普通会员一次交纳会费二百元者

第七条　会员入会时须有本会会员二人之介绍经理事会通过方得为本会会员

第八条　本会会员之义务规定如次

一、遵守本会规章及决议案

二、接受本会之委托办理会务或调查及研究事宜

三、贡献研究心得于本会

四、按期交纳会费

五、维持并协助本会事业之发展

第九条　本会会员之权利规定如次

一、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二、向本会建议关于发展会务之事项

三、向本会申请协助有关心理卫生之研究或设计事宜

四、免费或优待取得本会刊物之一部分

五、享受本会图书及各项设备之便利

第三章　组织及职权

第十条　本会最高权力机关为会员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理事会

第十一条　本会设理事会及监事会

理事会设理事三十五人候补理事十五人

监事会设监事二十一人候补监事九人

第十二条　本会理事及候补理事监事及候补监事由全体会员公选之任期定为二年每年改选半数得连选连任第一届选出之理事及候补理事监事及候补监事应以半数（理事十七人候补理事八人监事十人候补监事五人）之任期为一年用抽签法决定之

第十三条　本会理事监事之选举除第一次由会员于成立大会中推举司选委员七人举办选举外此后由会员于理事及监事任期届满一个月前用记名连选法通信分别选举密封送交理事会汇齐于会员大会开票

前项选举应有会员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始得开票其选举结果以得票最多数者分别当选为理事或监事得票次多数者分别当选为候补理事或候补监事前项选举票由理事会制就连同会员名单寄交各会员

第十四条　理事会之职权如次

一、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代表大会行使职权

二、执行会员大会决议案

三、规定本会工作计划并推进会务

四、筹措并支配本会经费

五、审查会员资格

六、组织各部会

七、召开会员大会

八、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

第十五条　理事会设常务理事五人由理事互推任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第十六条　理事会之下设总干事一人由理事会聘任之秉承常务理事处理会务

第十七条　理事会分设下列各部会

一、总务部

二、研究部

三、社会服务部

四、编译委员会

五、经济委员会

各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各委员会设常务委员各三人商承理事会主持各该部会事务由理事会聘任之各委员会各设委员若干人由理事会聘任之

总干事及各部会正副主任或常务委员之下设干事若干人襄理各项事务由常务理事提请理事会聘任之理事会于必要时得设事务员书记各若干人由常务理事任用之

第十八条　监事会之职权如次

一、监察会务之进行

二、审查财务报告

三、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

第十九条 监事会设常务监事三人由监视互推任之处理监事会日常事务监事会设干事若干人由监事会聘任之

第二十条 本会得设名誉理事若干人由理事会敦聘之

第二十一条 本会于必要时得设各项特种委员会其组织章程另订之

第四章 会 议

第二十二条 会员大会每年开会一次由理事会召集其地点及日期由前一次大会决定之理事会认为有必要或由会员二十人以上之提议经理事会之通过得召集临时会员大会

第二十三条 理事会及监事会至少每半年开会一次由常务理事及常务监事分别召集之

第二十四条 常务理事每月至少集议一次由常务理事轮流召集之

第二十五条 会员大会以到会会员过全体会员三分之一以上为法定人数因事不能到会者应出具正式委托书委托出席会员代理理事会或监事会以该会人数过半以上为法定人数常务理事会议以常务理事过半数之出席为法定人数

第二十六条 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及常务理事会议之事项应取决于到会人数之过半数可否同数时应取决于主席

第五章 经 费

第二十七条 本会经费以下列各项充之

一、会费

二、会员特别捐

三、党部及政府之补助

四、各机关各团体或各工商企业组织及个人之捐助

五、出版书报之收入

六、各机关各团体或各工商企业组织委托研究或办理实施心理卫生事项时所出之事业费

七、其他

第二十八条　本会普通会员会费规定如次

一、个人普通会员　入会费二元常年费二元

二、团体普通会员　入会费三十元常年费二十元

第二十九条　本会每年经费之支配应由理事会由每届会计年度结束一个月前制定预算书送监事会审查通过后公告全体会员

第三十条　本会经费收支情形应由理事会按期编造决算书送监事会审核后报告于会员大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简章如有未尽事宜得由理事会或会员二十人以上之提议提出会员大会修改之

第三十二条　本简章由会员大会通过呈请中央民众训练部核准并呈报教育部备案

（五）重庆心理卫生协会*

重庆心理卫生协会是继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后成立的第一个地方性的心理卫生协会。它成立于1948年11月21日。首先由唐自杰提出组织心理卫生协会的想法，并得到数人的赞同。“当初只是希望组织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重庆分会，于是印好会章，向总会索取申请书……后因重庆方面参加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为会员的太少，才放弃成立分会的计划，决定单独成立重庆心理卫生协会，将来再以团体会员名义加入总会以资联络。”该会自1948年9月12日召开发起

* 参见赵莉如先生1992年《心理学动态》（专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人会议后经过三次筹备会而正式成立。当时重庆《北碚日报》(1948.11.21)上登载"重庆心理卫生协会成立大会特刊",介绍成立大会宣言,心理卫生运动简史及重庆心理卫生协会的筹备经过。该会制定有工作计划大纲(附后),成立后首先在《北碚日报》上编辑心理卫生专刊,宣传一般心理卫生知识。1949 年 2 月 12 日《心理卫生》创刊号,登有唐自杰代写的发刊词,说它"希望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而能增进个人的快乐,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安宁,以及人类的进步"。重庆心理卫生协会还与北碚儿童福利站合办"儿童行为指导室"。该室于 1949 年 4 月 4 日正式开办,主要对行为上有问题的儿童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合适处理方法。还编有重庆心理卫生协会发行、唐自杰编著、潘菽校阅的《儿童心理卫生》丛书。[①]

附:重庆心理卫生协会工作计划大纲

总务方面

(一) 聘请本会名誉理事及职员
(二) 以团体会员名义加入"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三) 出版心理卫生方面的书刊
(四) 经常征求会员,并加强会员联络
(五) 经常与国内外心理卫生专家及有关学者联络
(六) 经常与国内外心理卫生机关及有关机关联络
(七) 经常向国内外征集有关心理卫生之书报杂志
(八) 经常搜集各种有关心理卫生之原始资料
(九) 建议各图书馆充实心理卫生方面的图书
(十) 筹设心理卫生图书室

研究方面

① 感谢唐自杰先生提供资料。

（一）编制心理健康的标准

（二）研究心理卫生运动的发展经过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三）研究我国心理卫生运动发展经过及其在新中国中可能的发展趋势

（四）调查统计重庆市精神病的人数

（五）调查一般人对于精神病者的待遇

（六）调查一般医生对于心理卫生的态度

（七）研究问题儿童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八）研究一般小学的训育实况

（九）研究儿童情绪的处理方法

（十）研究性教育的实施方法

（十一）研究自杀、犯罪及离婚等心理方面的原因

（十二）研究个人职业适当与否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

（十三）筹设心理卫生研究室

社会服务方面

（一）与北碚儿童福利站合办儿童行为指导室

（二）协助个人或团体施行各种有关心理健康之测验，如情绪稳定性测验，内外倾测验，智慧测验以及婚姻幸福测验等

（三）应邀或接洽至各地作有关心理卫生的通俗讲演

（四）组织心理卫生座谈会

（五）倡导父母教育，如举办父母教育座谈会，设置父母信箱等

（六）鼓吹改善疯人待遇

（七）协助各校（特别是师范学校）加强心理卫生教育

（八）举办心理健康咨询部

（九）筹设婚姻指导部

编译方面

（一）搜集国内有关心理卫生的论著编辑《心理卫生论丛》数集

（二）编辑《心理卫生通俗小丛书》数套，包括心理卫生运动简史，心理卫生与父母，心理卫生与学校，心理卫生与儿童福利，心理卫生与社会等

（三）在报上出刊《心理卫生》副刊

（四）编写心理卫生通俗广播稿，接洽电台广播

（五）编辑有关心理卫生的图书目录

（六）译述有关心理卫生的论著

三、心理学刊物的创办①

（一）《心理》②

我国民国初年间，早期有关心理学的研究和论述一般都在教育方面的杂志上发表。中华心理学会成立后，1922 年 1 月出版会刊——《心理》。这是我国第一种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由张耀翔主编，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编辑部设在北京高等师范心理实验室中华心理学会总会。

此杂志宗旨，在创刊号上言明"中华心理学会是专为联络中国心理专家和素有研究的心理学者而设"，为学会的"言论机关"，要求会员"承认心理学自身是世上最有趣味的一种科学，他们研究就是要得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办这个杂志是要别人也得同样的快乐"；"承认心理学是世上最有用处的一种科学，不但可用在教育上，还可用在实业、商业、医术、美术、法律、军事、日常生

① 《心理学界消息》，载《中国心理学报》第 1 卷第 2 期，1936 年，第 175 页。

②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年，第 48～50 页。

活上，他们研究就是为求这许多的应用，办这个杂志是要让别人也得这些应用”。并且要求会员研究心理学从三方面进行：“一、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办这个杂志是要报告他们三方面研究的结果给大家和后世看。”杂志内容分类主要有：普通心理、实验心理、动物心理、儿童心理、青年心理、社会心理、变态心理、心理学史、各家心理、应用心理、教育心理、智力测验、教育测验、心理界闻等类，并辟有历史、传记、介绍、通讯、读者论坛等栏目。

《心理》杂志共出版 14 期，自 1922 年 1 月开始出版第一卷第一号；3、7、10 月各出版第二、三、四号，1923 年 2、4、6、10 月各出版第二卷第一、二、三、四号。1924 年 1、4、9 月各出版第三卷第一、二、三号。1925 年 7 月出版第四号。1926 年 10 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至 1927 年 1 月第二号为止。由于经费困难，时局不宁，书局营业大受影响，刊物不能按期排印，杂志交稿后，由半月迟至半年多或一年始能出版，已失去定期刊物的意义，终于不得不停刊。此 14 期杂志，共发表论文 150 篇，2000 余面，计 140 万字，其中创作约占一半。当时的“心理学专家如陆志韦、陈鹤琴、廖世承、谢循初、艾伟、陈大齐、曾作忠、樊际昌、赵演、沈有乾、庄泽宣、余家菊、朱君毅、邱椿、赵乃传、杜元载、吴定良、余天休、卫中等都曾参加撰述”，少则一篇，多则十余篇不等。主编张耀翔撰文最多，有 29 篇，约占全数的五分之一。

《心理》杂志除刊载论文外，还发表《中国学者心理学之研究》，是当时我国著名杂志发表的心理学著作的摘要。共有 333 篇，分刊在六期杂志上：第一卷第一号有 130 篇，第二号有 42 篇，第二卷第四号有 43 篇；第三卷第一号有 46 篇，第二号有 21 篇；第四卷第二号有 51 篇，按心理学重要分支及专题加以“分类记其题

目、出处、著者姓名及大意”。汇集者为中华心理学会会员，北京高等师范教育研究科及本科学生，对散见于各著名杂志中有关心理学诸文分途调查汇集，并征求全国心理学者补充。所汇集的心理学诸文出自二十余种杂志，有《教育杂志》、《东方》、《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新潮》、《新青年》、《少年中国》、《京师教育报》、《都市教育报》、《建设》、《大中华》、《教育周报》、《安徽教育月刊》、《少年世界》、南高《教育汇刊》、《改造》、《平民教育》、《民铎杂志》、《科学》、武昌高师《教育杂志》、《社会学杂志》、《太平洋杂志》、集美学校《师范教育》、《教育与职业》、《留美学生季报》、北高《实际教育》等杂志，其中以《教育杂志》发表得最多。所汇集的心理学诸文为“传播旧作，唤起新作”的目的外，并可作为教授心理学的参考材料，因为当时缺少国内自己的材料，多为国外材料不适于中国人用，教师有此参考，可以解决部分教学内容的困难，还可作为心理学爱好者自学研究的教材，解决自学者缺乏入门材料之苦。

《心理》杂志中有通讯栏介绍国外心理学的发展和各国心理学杂志的出版情况。如《欧洲工业心理之概况》（1922年一卷四号）主要介绍英、法、德、瑞士四国近况，言其提倡工业心理的主旨均为“改进工作状况，提高生产效率，指导年幼工人择相当之职业，以增进其效能”。但各国注重点不同：“英国重在工作状况之改良”；“法国重在提高专门效能”，兴趣多在心理学研究如巴黎拉意著《泰罗制与专门职业之生理学》；德国研究多偏重于测验方面；瑞士则倾向于职业指导问题，并将其工业心理研究机构及当事者姓名列表介绍以便于通讯联系进行交流。有对国外心理学杂志的简介，如对“美国出版之心理杂志”列表介绍20种，包括杂志名称、主编、创刊期、杂志性质、每年册数、定价、每卷页数、发行处等情况。对法国的两种心理学刊物——《心理杂志》和《心

理年报》的改组情况进行介绍。具体介绍日本 1923 年 1 月出版的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日本心理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号至第四号的题目、作者；赞扬该杂志的办刊三条方针："（1）为专门研究心理学者唯一的中枢机关；（2）传播心理学之研究与消息于非专攻心理学者；（3）利用心理学，增加做事之效率与人生的活动。"认为《日本心理学杂志》的方针与我国的《心理》杂志的宗旨"若合符节"。此两杂志皆为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由于《日本心理学杂志》后于我国《心理》杂志出版一年，故谓我国《心理》杂志为东方第一种心理学杂志，而《日本心理学杂志》为东方第二种心理学杂志。此处需要说明一下，日本在 1923 年以前已有以心理学名称出版的杂志，但内容除心理学外还有其他学科的稿件。如 1912 年在东京创刊的《心理研究》开始以心理学的普及为主，后来实验研究和专题逐渐增多，但还是以教育、美学、医学方面的稿件为多。又如 1919 年由京都帝国大学心理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日本心理学杂志》是由"原著"和"摘录"构成，发表的论文不仅有心理学的，也有邻近科学的，还有医务工作者的稿件。此杂志由于编辑和经费上的问题，于 1922 年将编辑工作移至东京京都帝国大学心理研究室用同样的刊名《日本心理学杂志》于 1923 年 1 月创刊出版，并提出了三条办刊的革新方针，成为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我国《心理》杂志于 1922 年 1 月出版后，立即引起日本的关注，"日本各教育机关、学者，纷纷来函购订或要求交换，并有数种日本杂志特别为本杂志介绍"。在《日本心理学杂志》1923 年第一卷第三号内，有海外通讯一篇，特载中华民国心理学界之活动，并摘要说"中华民国心理学界活动之消息，增田维茂氏已在本年五月号《心理研究》中介绍过了，中华心理学会杂志所发表的大作，对于理论和实践，均尽善尽美的确为吾人研究心理学的一种好帮助。我很喜欢并且很希望彼此以和衷共济

的精神贡献于心理学界，在此谨祝彼国心理学界前途的幸福”。我国《心理》杂志上的文章有的还被他们译出或摘要介绍在他们的杂志上。

《心理》杂志辟有“读者论坛”栏，自1924年4月三卷二号开始至1927年1月四卷二号止，共连载五期，共提出60个问题，解答40题。该栏“宗旨在解答心理学上一切疑问，使读者人人有自由发表之机会”。列有要求规则，如“读者人人可随时发问，但问题须简单，具体明了，有讨论价值”；“读者可择一问或数问答之，条理须清楚，文字须通顺，闲言愈少愈妙”；“读者对于一切答案均可反复辩驳，但不可稍涉谩骂”；“发问人对于他人答案不满意时，亦可自备答案”等。此栏充分表现了活泼生动、自由争鸣的气氛。提问中涉及心理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在感知方面如：“好白恶黑之心理安在？”“生路觉远，熟路觉近其故安在？”“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可能乎？”情感方面的如：“一般父母偏爱幼子是何心理？”“愤怒之时，辄以手拍案何故？”注意方面的，如：“同时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其难成者何故？”破除迷信方面，如：“扶乩果能与灵魂问答乎？”“借尸还魂为何种心理现象？”关于性教育方面的，如：“性欲知识究竟应否授与情窦初开之男女？”差异心理方面，如：“对男女两性之差异，应化之使同，抑应保持此种差异？”习性方面的如：“好习惯难养成何故？”“吾人做事，多用右手何故？”“汉学能遗传否？”社会心理方面，如：“婆婆虐待儿媳是何心理？”“骄兵必败何故？”“人何以喜见熟人而恶见生人？”心理学理论方面的，如：“心理学为精神科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何以反较物质科学晚进？”等等。问题的答案采取一题多答，各抒己见，展开讨论，形成争鸣。当然有些提问，特别是答案的内容、观点限于当时的心理学水平和没有正确的理论思想指导，不少是不正确的或非科学的。

在《心理》杂志上每期都附有插图，在这14期杂志中共有插图22种。如有著名心理学家的相片，有错觉图，知觉试验图，诵读时眼球跳动实验图，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年会心理教育测验组相片，特别是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和北京师大实行心理测验招考新生的照片(1923年)，东南大学心理系仪器陈设和进行儿童心理个人和团体测验的照片(1922年)等，现在看来是十分珍贵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我国早期的心理实验仪器情况以及开展各种心理测验活动的情况。

《心理》杂志的问世，确使"学界耳目为之一新"，在此以前，心理学在中国被认为太神秘，太枯燥，完全脱离实际生活。该杂志出版后引起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和新的认识。第一期出版后不到一月就再版了。这首先表现在杂志内容丰富多彩，结合实际，具有中国特点，自由争鸣讨论，文风也很正派。正如主编张耀翔说，《心理》受人热烈欢迎的原因是杂志内容每期都有分类，"各类的排列均有一定的次序：先学理后应用；先普通，后特殊；由个体而集体，由常态而变态，各篇莫不有其固定位置，不容任意安插，也不作任何抑扬暗示，向采认文不认人的政策，使文属平常，虽名家之作不录；使文具特点，虽学生之稿亦刊。一面求适合科学标准，一面又求通俗，偏于科学不能为一般读者了解，太通俗或不免引起专家非议。调和于二者之间颇费周折。至于内容则尽量求适合国情，形式尽量求中国化。"这些编辑原则与方法以及前面提到的办刊宗旨中要求要昌明国内旧有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加以继承吸收和创新出自己的理论和实验，至今值得赞扬和提倡。

总之，我国最早的这14期《心理》杂志，是十分可贵的，是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留给我们后世的一份宝贵遗产。由于经历战争和屡遭浩劫，它们散存于国内有关图书馆。这14期《心理》杂志是京内三个图书馆的收藏，有的卷期已经缺损不全，均为孤本

期刊，幸有1932年由张耀翔从《心理》杂志中选出较精粹的50篇编为两册，题名《心理杂志选存》，有700余页，30万字，由中华书局再版，现今尚有多册保存。

（二）《心理半年刊》①

该刊由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和心理学会编印，艾伟任主编，于1934年在南京出版，这是在我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心理》（1922年～1927年）停刊7年后才出版的第二种心理学杂志。该刊自1934年1月1日创刊至1937年1月1日第四卷第一期以后停刊，总共出版7期。其中从第二卷第一期开始至第四卷第一期均为"应用心理专号"。各期卷后有附录中央大学心理学会简章和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选课指导，在二卷一期，三卷一、二期和四卷一期的卷首登有插图照片如心理学系仪器室、研究室、统计室以及进行各种心理测验的情景数幅。封底有英文刊名（*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he N. C. Journal of Psychology, Nanking, China*）和目录（Contents）。该刊总共载文88篇，其中译文21篇。按主要心理学分支分类，其内容有：

1. 普通心理　13篇，其中译文5篇。内容包括心理学的方法、感知觉（视、触）、疲劳、动作、行为、情绪、态度、个性（人格）、意识、暗示以及审美判断等问题。

2. 儿童心理　6篇，其中译文2篇。包括正常儿童和异常儿童的智能以及心理健康等问题。

3. 青年心理　4篇，其中3篇为译文。内容涉及有关青年心理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青年期的卫生和心理疾病以及青年犯罪问题。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61页。

4. 教育心理　13篇，其中译文2篇。涉及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关系、学习心理、学科心理、品格和训练转移等问题。

5. 应用心理　22篇，其中译文1篇。论述应用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实业心理、职业指导，心理学在医学、法律、军事等方面的应用以及与航空医学的关系等。

6. 社会心理　2篇，其中译文1篇。论述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意义及其发展，儿童期和青年期的社会心理。

7. 变态心理　8篇，其中有4篇译文。评介变态心理各种学说，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对教育的贡献，精神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精神病理学的发展及心理失常等。

8. 心理卫生　6篇，其中译文2篇。涉及心身健康、情绪卫生、生理卫生与遗传、个人心理卫生等。

9. 生理心理　2篇，其中译文1篇。涉及内分泌与行为的研究以及酒精对心理的研究。

10. 动物心理　1篇。为鸟类胚胎行为的发育研究。

11. 心理学史　1篇。为巴甫洛夫年谱。

12. 测验　9篇。内容包括统计应用，测验的效度与信度，各种测验的介绍，如墨跋量表、默读测验、能力测验以及测验编制过程等。

13. 其他　1篇。是关于审查心理学名词的原则。

为该刊撰写文章的心理学者主要有：郭任远、艾伟、肖孝嵘、吴南轩、潘菽、陈剑修、王书林、吴福元、韩进之、丁祖荫、丁瓒、曹飞、张德琇、吴江霖和孙运仁等。

（三）《心理附刊》①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61～62页。

该刊是中央大学“日刊”中每周一期的二页周刊，多数为译文，由该校“心理学会同仁于研习攻读之暇所主持”。共出版45期。第1期至第9期于1934年11月20日发刊至1935年1月15日暂停，第10期至第15期于1935年5月14日复刊至1935年6月18日暂停，第16期至第38期于1935年12月3日续刊至1936年6月13日暂停，第39期至第45期于1936年12月3日续刊至1937年1月14日以后停刊。该周刊的宗旨为“促进我国心理学的正当发展，提倡心理学的研究和推广心理学的应用”。在发刊词中（1934年11月20日）阐明心理学在人类生活上的重要，而心理学在中国还被忽视，故提出该刊“第一步工作是将心理学的知识尽量传播，使任何人对于心理学都有浓厚兴趣和正确认识”，注重介绍当时西方心理学的应用，特别在实业心理等方面，辟有《实业心理论文选译》专栏。《心理附刊》共载文59篇，其中译文47篇。多数译、著文均为分期连载。其主要内容为：

1. 普通心理　4篇，其中译文2篇。论述有关心理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以及疲劳、行为和动机等问题。

2. 儿童心理　4篇，其中译文3篇。论述有关儿童生理变态与教育、不良习惯、不适应的学校儿童以及儿童绘画与心智的发展。

3. 教育心理　9篇，均为译文。有差异心理（男女、双生子）、品格心理、阅读心理以及其他有关教育心理问题。

4. 应用心理　3篇，其中译文1篇。论述现阶段心理学的应用和广告心理。

5. 实业心理　20篇，其中译文18篇。有关于时间的研究与工作的安置、管理者所居的位置。《实业心理论文选译》专栏中有15篇，包括工作环境、温度与通风、产额限制、科学管理、工作选择、事故安全以及各种测量、对工作者的分析、问卷方法等。还

有3篇译文为实业中的人类价值与经济价值、劳工罢工问题以及介绍澳大利亚实业心理学会的情况等。

6. 法律心理　5篇译文。介绍法律心理学的发展包括起源、研究范围以及感觉和知觉之差误、注意、记忆、暗示和催眠术等问题。

7. 社会心理　1篇。论述社会心理学之定义和派别。

8. 变态心理　2篇，其中译文1篇。介绍在学校里工作的精神病学者和解释“心理失常”最著名的学说。

9. 心理卫生　1篇，译文。论述心理卫生与青年的问题。

10. 生理心理　2篇，其中1篇为译文。论述甲状腺之结构、生理及其疾病，介绍身体的构造（视觉、听觉、神经等）。

11. 测验　8篇，其中译文6篇。介绍新法考试、测验历史、测验记分、因素分析、视觉记忆和心理能力测验等问题。

该刊著译者主要有：韩进之、张德琇、丁祖荫、吴福元、张义尧和王书林等。

（四）《心理季刊》①

该刊是上海大夏大学大夏心理学会出版的，为当时国内唯一关于心理科学的通俗刊物。该刊主任编辑为章颐年，编辑为钱怀刚、孙衍。共出版六期［1936年4月30日出版创刊号；6月30日出版第二期；10月30日出版第三期；12月31日出版第四期。1937年3月3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春季号）；6月30日出版第二卷第二期（夏季号）］。创办此刊的缘起和目的，在“创刊话”中首先对“发展到如今的心理学派别分歧议论纷纭”的状况作了概括分析，认为“正因为派别歧异，才显得大家研究的热烈；正因为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62～63页。

议论纷纭，才显得这门科学是在进步之中”。为了研究心理学而刊行的杂志，在欧美各国已多不胜举，但国内以单独研究心理学而编印的杂志却是凤毛麟角；因而感到当时迫切需要在国内“出版一份篇幅较多比较能持久的单纯研究心理学的杂志”，所以编印了这份《心理季刊》。办刊的目的是为了“使一般人认识心理学，使大家应用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改进日常生活以及自己的事业”。该刊的口号是“应用心理科学，改进日常生活”。其内容主要有下列七栏：

1. 理论探讨栏：刊载心理科学的理论研究文章，以供专门研究心理学者互相探讨的，共有 22 篇。

2. 生活应用栏：刊载人民大众（教师、家长、职员和商人等）的日常生活和个人事业上可以实际应用的心理学文章，内容通俗易懂，共有 49 篇。

3. 实验报告及参考栏：登载及转载国内各学校、机关或心理学会的心理实验报告、证实心理现象的小实验、制作心理仪器的方法和技术等，共有 5 篇。

4. 名人传记栏：介绍中外心理学家的生平功绩，共有 7 篇。

5. 书报评论栏：评介最新国内外出版的心理学书刊，共有 4 篇。

6. 心理消息栏：登载当时国内外心理学上的发现、研究、实验及实施等消息，共有 75 则。

7. 论文摘要栏：每季度里选取国内流行较广的杂志（如《教育杂志》、《哲学与教育》、《大众教育》、《中华教育界等教育杂志》和《心理半年刊》、《中国心理学报》等心理杂志）刊载其中主要的心理学论文提要，共有 213 篇，其中著文 165 篇，译文 48 篇。

此外，还有插图照片 25 帧。

现将《心理季刊》所载全部文章 87 篇（包括译文 4 篇），按

心理学主要分支分类如下：

1. 普通心理　12 篇，论述心理学的发展方向、视觉实验、记忆、注意、情绪（惧怕、怒、哭、笑）、个性、疲劳、行为等问题。

2. 儿童心理　9 篇，论述完形派儿童心理学理论、儿童游戏、戏剧问题、儿童心理健康、天才儿童、低能儿童以及儿童指导诊疗所等。

3. 青年心理　1 篇，关于青年犯罪问题之心理学的基础。

4. 成人教育　1 篇，关于成人学习的可能与困难。

5. 教育心理　6 篇，其中译文 1 篇。论述怎样做父母、学科心理和教师心理等。

6. 应用心理　8 篇，论述应用心理的发生及其前途；电影心理学的应用、工业心理、职业指导、人事管理、广告心理、犯罪心理以及心理学对防止战争的作用等。

7. 社会心理　2 篇，有关民族心理和群众心理问题。

8. 变态心理　5 篇，有关心理失常、精神病、心理冲突、口吃以及梦等问题。

9. 心理卫生　6 篇，论述问题儿童的心理卫生、学校儿童的心理卫生、心理卫生在学校和家庭的作用以及人格和心理卫生等问题。

10. 生理心理　1 篇，关于手性的各种学说。

11. 动物心理　3 篇，连载近代比较心理学发展史译文 2 篇，白鼠养护法 1 篇。

12. 心理学史　9 篇，论述完形派的学习理论，对完形派理论的评价，介绍冯特、巴甫洛夫、铁钦纳、艾宾浩斯、茅根的传记以及国内蔡乐生和张耀翔的自叙传。

13. 测验　2 篇，介绍应用测验选择雇员和鲍德氏迷津测

验。

14. 其他 22篇，包括文艺心理学、讲演术、算术、服装心理学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现象的解释。

在该刊撰文的心理学者主要有：章益、郭一岑、张耀翔、陈选善、章颐年、沈有乾、蔡乐生、樊际昌以及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同仁。

（五）《中国心理学报》①

该刊由北平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编印，后为中国心理学会会刊。主任编辑为陆志韦，编辑为孙国华和周先庚。在该刊一卷一期的编后语中，追念十余年前张耀翔所主编的《心理》杂志，命这次出刊“名曰《中国心理学报》亦以继往启来”。并概述当时心理学界情况：“今者鼓吹喧阗之时期已过，笔阵纵横之时期已过，主义之宣传亦渐与系统之建立划为两事。心理学盖已进入确实研究之域，不复与道闻途说之流计较得失；而其发扬光大，以树立为我中华民国之心理学，则尚待吾人之努力。”这也是该刊所以发行的原因。该刊以“提倡科学的心理学为职志”，“内容以实验研究的材料为主体”，篇幅约占1/2。还有“系统的述学，书报介绍，讨论，新闻等项”。此报“在乎提高读者之兴味，故不勉求通俗”，并为“将我国早创工作介绍于欧西，故文字不求统一”，采取中英文并用。报刊左封面为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和 Contents；右封面由蔡元培题字《中国心理学报》和目录。1937年1月中国心理学会正式成立后，该报自第三期起，出版权移归中国心理学会。编辑部由以下六委员组成：沈有乾（浙江大学），孙国华（清华大学），蔡乐生（师范大学），周先庚（清华大学），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63～64页。

陆志韦（燕京大学），肖孝嵘（中央大学）。原拟从第二卷开始，编辑出版各项事务由学会出版委员会接办，但因“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该刊共出版4期（1936年9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12月出版第二期；1937年3月出版第三期；6月出版第四期），发刊后颇受读者欢迎，被赞为“替我国心理学界放一异彩”！国内读者除订阅外，函购、托人代购十分踊跃并和其他刊物交换；也与日本心理学会、意国心理学会和澳洲心理哲学会进行心理学刊物的交换。该报所载文章篇幅不多，在当时却认为“都是成熟的作品，非率尔操觚者可比”。现将此四期学报所载文章24篇（实验报告14篇，系统论述文章4篇，书评3篇，其他有关实验仪器介绍、统计方法等3篇）按心理学主要分支分述如下：

1. 普通心理　3篇，论述视觉余像或后像问题，记忆倒摄抑制影响，目手相应动作问题等。

2. 儿童心理　1篇，关于儿童语言的研究。

3. 教育心理　3篇，有关桑代克学习心理的研究，评价格诗礼的学习心理学以及大学生能力问题。

4. 工业心理　1篇，论述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兴起。

5. 生理心理　1篇，关于大脑皮层功用之管测。

6. 动物心理　11篇，有关扁虫的食物反应研究2篇，白鼠的单眼视觉辨认、握执反应以及学习能力等9篇。

7. 心理学史　1篇，介绍考夫卡的完形心理学原理。

8. 测验　3篇，介绍试用鲍德迷津测验、订正中国比纳西蒙测验和相关系数问题。

此外该报每期后都登载国内外“心理学界消息”。

该报撰写者主要有：陆志韦、孙国华、曹日昌、夏云、周先庚、陈汉标、樊际昌、卢于道、沈乃璋、沈有乾、张民觉、郑沛缪等。

（六）《测验》①

该杂志是1932年5月由中国测验学会（1931年6月成立）编辑的杂志，专门登载关于测验的学术论文。在该刊创刊号上周邦道的“弁言”中提及“中国测验学会成立以来，将一年矣。其主旨，在研究测验之理论，推行测验之方法，扩大测验所能及之范围，确定最适宜之测量标准。求所以了解人之智力学力及性情品格，以为知人明人之张本，以为改进考试与考绩制度之基础；即求所以通人事之学术，将与通天地自然之学术，等量齐观也！兹就同人研究所得，发刊杂志，与社会相见；循其本义，名曰《测验》”。该刊最初的编译委员会有艾伟、吴南轩、肖孝嵘、陆志韦、陈选善、刘乃敬、王书林、潘菽、彭百川等9人。后来出版至1937年第三卷第一期时，编译委员已逐渐扩增至63人，肖孝嵘为主任常务委员。该刊总共出版九期：1932年5月1日出版创刊号；7月1日出版第二期为新法考试专号；1933年7月10日出版第三期；12月25日出版第四期；1934年6月15日出版第二卷第一期；1935年2月15日出版第二卷第二期；现缺第二卷第三期；②1936年5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四期；1937年1月15日出版第三卷第一期，以后停刊。总共发表文章97篇，其中译文6篇（因缺第二卷第三期，文章数未计在内）。现以《测验》的目录索引依性质分类略述如下：

1. 概论　5篇。论述测验的意义、功用、种类及编制，在教育上和国家考试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教育的改进等。

2. 历史　5篇。其中译文1篇。关于心理测验（教育测验、智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64页。

② 在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933～1949年）中，仅福建省图书馆有此期孤本，但经查询仍未寻及。

力测验、迷津测验）的起源发展、法国心理测验史和维也纳测验体系等。

3. 教育测验　21篇，其中译文1篇。包括编造小学各科（算术、历史、卫生、常识、自然科、国语默读、语顺）测验，中学、大学英语和国语测验以及其他教育测验问题。

4. 智力测验　14篇。智力定义、智力发展问题的论述、比纳西蒙智力测验、幼稚儿童智力测验、XO测验、廖氏团体智力测验、大学入学智力测验的修订以及各种测验方法、问题的探讨。

5. 新法考试与考试制度问题　14篇。介绍什么是新法考试及实行条件，编造方法，与旧式考试的比较，对官吏考试、中小学毕业会考、新法试卷、大学入学考试和学力测验等各种考试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优良考试成绩的特征、怎么考查学生成绩的论述。

6. 分数与计分制度问题　7篇。减错计算法、常态曲线、T量表的限制、TBCF制的检讨等。

7. 心理学问题　20篇。其中译文4篇。包括知觉阈度、颜色嗜好、色盲；记忆、联想；个性品质；书法练习、汉字心理学；手的动作、运动速率、疲劳、实业心理学；心理缺陷、犯罪问题；两个民族间伦理观念比较研究等。

8. 教学法问题　1篇。关于两种小数乘法教学法的实验。

9. 统计学问题　10篇。有关统计学及其方法、运算问题的论述和均差、曲线等问题的研究。

此外该杂志还刊载测验名词汉译初稿和测验学会工作计划及举行年会情况的报道。

该刊主要撰写者有：艾伟、肖孝嵘、陈选善、王书林、左任侠、吴南轩、潘菽、易克櫄、杜佐周、章益、周先庚、沈有乾、郑

丕留等。

（七）《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丛刊》①

该刊是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印行的一种不定期刊物，专门发表该所从事的动物学习和神经生理方面的实验研究报告或论文。该《丛刊》共出版第一卷四期和第二卷一册。1932年7月在北平出版第一卷第一号，内载唐钺、秦拱、臧玉淦所作《素食对于白鼠的学习能力之影响》（1）。1933年6月在上海出版第一卷第二号，内载卢于道所作《大脑皮层髓鞘之发展》；1933年12月在上海出版第一卷第三号，内载朱鹤年所作《杂食与素食白鼠的中枢神经系统研究》；1934年2月在上海出版第一卷第四号，内载唐钺、秦拱、臧玉淦所作《素食对白鼠学习能力之影响》（2）。1936年在南京出版第二卷一册，全册载文9篇。其中唐钺2篇，关于白鼠的各种位足反应的发展研究和单边耳迷路割除的结果报告。张香桐2篇，一为刺猬之一种听觉反射研究；一为白鼠视神经之连结研究。汪敬熙和鲁子惠合作研究2篇，关于动物动作电势的研究。卢于道3篇，关于动物大脑皮层神经细胞中核酸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还出版另一种《专刊》十期，现仅查见1934年在上海出版的《专刊》第六号，内载卢于道对中国人之大脑皮层研究一文。

（八）《心理教育实验专篇》②

该刊是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实验所编辑发行的一种不定期刊，专门发表心理教育实验报告。共出版7期：1934年2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内载肖孝嵘著《知觉单元形成之条件》（第一册）；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64页。

②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64～66页。

同年 3 月出版第二期，内载艾伟著《汉字测量》；1935 年 6 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内载艾伟著《中学文白测验结果之比较研究》；同年 7 月出版第二期，内载郑沛嵺著《知觉阈度之研究》；1936 年 6 月出版第三卷第一期，内载肖孝嵘、宗亮东著《机械能力测验之标准化》；同年 12 月出版第二期，载肖孝嵘著《知觉单元形成之条件》（第二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迁至重庆，1939 年 6 月由中央大学研究院师范研究所编辑出版第四卷第一期，内载肖孝嵘著《订正古氏儿童智慧测验》。

从上述情况来看，在我国从 1932 年至 1939 年期间，专门以研究心理学而编印的刊物，有《心理半年刊》、《心理季刊》和《中国心理学报》。此三刊共发表文章 200 篇，其中译文 25 篇。另有《心理附刊》发表文章 59 篇，但其中译文达 47 篇，著文仅有 12 篇。专门研究测验问题的《测验》杂志，发表文章 97 篇，内有译文 6 篇，其中关于研究心理学问题的有 20 篇。其他研究丛刊和实验报告的单行本共载文 21 篇。当时关于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也多发表在教育性质的刊物上，《心理季刊》中的论文摘要栏，即摘要刊登《教育杂志》、《教与学》月刊、《中华教育界》等关于心理学的重要论文 168 篇，其中译文 38 篇。（原为 213 篇，内有译文 48 篇，因其中包括《心理半年刊》、《中国心理学报》和《心理教育实验专篇》的部分著文 35 篇和译文 10 篇，为了避免重复，已将此篇数减除。）总计此时期所发表文章共为 545 篇，其中译文 116 篇，约占五分之一。详见下表：①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年，第 64～66 页。

表 3—1　1932～1939 年各刊物心理学文章统计

	心理半年刊 1934～1937			心理附刊 1934～1937			心理季刊 1936～1937			其他刊物* 1936～1937		
	著	译	总	著	译	总	著	译	总	著	译	总
普通心理	8	5	13	2	2	4	12	0	12	12	1	13
儿童心理	4	2	6	1	3	4	9	0	9	17	7	24
青年心理	1	3	4	0	0	0	1	0	1	2	0	2
成人心理	0	0	0	0	0	0	1	0	1	1	1	2
教育心理	11	2	13	0	9	9	5	1	6	29	6	35
应用心理	21	1	22	4	24	28	8	0	8	12	2	14
社会心理	1	1	2	1	0	1	2	0	2	2	1	3
变态心理	4	4	8	1	1	2	5	0	5	3	2	5
心理卫生	4	2	6	0	1	1	6	0	6	30	9	39
生理心理	1	1	2	1	1	2	1	0	1	3	0	3
动物心理	2	0	2	0	0	0	1	2	3	0	0	0
心理学史	1	0	1	0	0	0	9	0	9	19	9	28
测验	9	0	9	2	6	8	2	0	2	0	0	0
其他	1	0	1	0	0	0	21	1	22	0	0	0
总计	68	21	89	12	47	59	83	4	87	130	38	168

*此为心理季刊中所载其他刊物的心理学论文摘要篇数。

	中国心理学报 1936～1937		测验 1936～1937			中央研究院心理所丛刊 1932～1934		心理教育实验专篇 1934～1939		总计		
	著	总	著	译	总	著	总	著	总	著	译	总
普通心理	3	3	10	0	10	0	0	3	3	50	8	58
儿童心理	1	1	1	1	2	0	0	0	0	33	13	46
青年心理	0	0	0		0	0	0	0	0	4	3	7
成人心理	0	0	0	0	0	0	0	0	0	2	1	3
教育心理	3	3	3	0	3	0	0	2	2	53	18	71
应用心理	1	1	1	3	4	0	0	1	1	48	30	78
社会心理	0	0	1	0	1	0	0	0	0	7	2	9

变态心理	0	0	0	0	0	0	0	0	0	13	7	20
心理卫生	0	0	0	0	0	0	0	0	0	40	12	52
生理心理	1	1	0	0	0	9	9	0	0	16	2	18
动物心理	11	11	0	0	0	5	5	0	0	19	2	21
心理学史	1	1	0	0	0	0	0	0	0	30	9	39
测验	3	3	75	2	77	0	0	1	1	92	8	10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22	1	23
总计	24	24	91	6	97	4	4	7	7	429	116	545

（九）《教育心理研究》[①]

1939年中央大学研究院筹设师范研究所教育心理学部，1940年3月《教育心理研究》由艾伟负责主编在重庆创刊出版。这是一种“阐发教育心理学术报告实验研究结果，并讨论教学上之一切问题及科学方法为宗旨”的刊物。该刊“所载除心理学方面的论著而外，亦间载教育学、生理学、神经学、统计学等方面之论著”。这是我国40年代抗战后期的首要心理学学术刊物。该杂志自1940年3月创刊至1945年6月止，共出版三卷十期，刊载92篇文章。该刊各期出版时间为：

1940年3月　　出版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

1940年6月　　出版第一卷第二期

1941年3月　　出版第一卷第三期（纪念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20周年）

1942年6月　　出版第一卷第四期

1943年10月　　出版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

1944年10月　　出版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1945年6月　　出版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艾伟教授任教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88～90页。

中大20周年纪念专刊)

在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中，曾刊有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的要目预告，实此期并未出版。

《教育心理研究》创刊的起因，正如艾伟在创刊词中所道"兹值抗战建国期间，教育事业日渐发展，其需要心理学研究之切，自不待言"。他认为教育在于改变人之行为，人类行为研究是心理学之范围，心理学是教育之科学基础，教育与心理学有密切关系，心理学应用于教育，即为教育心理学。他还叙及20年前我国心理学与教育即已发生关系，其密切性似与年俱增。最近数年中，军事、实业、医务等与心理学之关系虽已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但应用普遍尚不及教育，教育心理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当时中央大学设立师范研究所教育心理部特出此刊。

《教育心理研究》杂志除在重庆印刷中文版外，还印有英文简版，与国外进行交换。艾伟在该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的卷头语中提出及英文简版，"其一、二两期于30年（1941年）在上海印刷的，印刷出版之后，当即分寄英美各大学心理学教授和心理学杂志公司，其用意在取得交换心理学书籍和杂志以获知一切创作而资观摩"。1942年上半年尚收到国外邮件，如来自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教育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系等，后因战争紧迫，运输困难，取得交换不多。

《教育心理研究》有两期专号，一为纪念中央大学心理系20周年专号（一卷三期，1941年3月）；一为纪念艾伟任教中央大学20周年的纪念专号（三卷一、二合刊，1945年6月）。这两个20周年的纪念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是我国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教育心理研究》的内容，在头两期中，分为论著、研究、新著评介和教学问答四个栏目，后面所有各期均未再分栏目。

（十）《心理建设》[1]

该刊自 1942 年 11 月创刊至 1943 年 10 月，共出版一卷五期，40 篇文章。该刊并非为专门心理学学术性杂志，乃是当时针对抗战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民心情况，直接为重庆国民政府需要而设立的“中国心理建设学会”的会刊。“心理建设”研究始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和中国旧道德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思想，并与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密切结合。中国心理建设学会的工作遵照“心理建设纲领”及“八大心理建设”。所谓“心理建设纲领”为“力行精神和民族气节”，包括三大方面：1. 精神信念；2. 行为信约；3. 生活信律。而精神信念又有三：（1）信中华民族于最近期内必能复兴；（2）信抗战终能胜利；（3）信中华民族为世界最优秀之民族。行动信约又有三：（1）扶危救难，合群共济，发扬互助之精神；（2）不存私心，不避艰险，为正义而奋斗；（3）不卑不亢，对人对事须有自尊之心理。生活信律也有三：（1）早睡早起娱乐必须正当；（2）每日至少读书二小时，运动一小时；（3）抬头、挺胸、迈大步。所谓“八大心理建设”即：1. 敌忾同仇，坚定必胜心理；2. 振衰起敝，坚定复兴心理；3. 遵守纪律，坚定自尊心理；4. 惜物节约，坚定俭朴心理；5. 吃苦耐劳，坚定力行心理；6. 崇尚气节，坚定正直心理；7. 精诚团结，坚定互助心理；8. 保卫中华，坚定民族心理。该学会要求其会员先健全本身，即先“立己”而后“立人”，以本身表现，口头或文字宣传，设讲座，组织剧团和推广心理建设文艺等办法开展心理改造运动，树立新风气。会刊《心理建设》杂志为其“心理建设的理论园地”，以“力行精神”、“民族

[1]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年，第 98～99 页。

气节”为该刊研究的主要重心。所刊载40篇文章，其中论述有关民族心理方面较多，其次为力行哲学的论述以及树立新风气等。文章作者也非当时的心理学者。发表文章最多的是该刊编辑者王寒生，如他在创刊号上首篇发表《怎样建设心理国防》一文，开头即叙述了我国抗战初的“心理战胜”的作用。他认为旧文化不是民族复兴的障碍，影响于民族复兴的乃是今日社会里许多不健全的心理，如自私自利、“商人第一”以及“自己的生活高于一切”等实是抗战的障碍，为了补救而提出：“力行精神，民族气节”。他还认为“气节是内在的动力”，“力行是外在动力”；“心理建设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改造，也可说是心理革命”。他主张心理建设的教育应从信念、行动、生活三方面入手；认为“信念是心理建设的根”，“生活是心理建设之苗”，“行动是心理建设之果”。

全刊所载文章中，关于中华民族和民族气节方面的论述主要有《中华民族的分布》、《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之统一性》、《中华民族的生命》、《从史前人类说到中华民族》、《从地质说到中华民族》、《论中国民族精神之核心》、《从心理学上的观点论中国历代民族气节》、《论民族气节》、《怎样培养民族气节》、《对民族新的认识》等文章。关于力行哲学方面的论述，主要有《力行哲学史的发展》、《行学真谛》、《何以“不行不能知”》、《行的哲学是唯一的人生哲学》，以及《力行哲学探源》。其中《力行哲学探源》一文论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和孙中山“知难行易”说。关于新风气方面，主要集中在第一卷第四期新风气专号上，如《改造中国民族性应以改造风气为中心论》、《论新风气》、《养成社会谋福利的风气》、《风气纵横谈》、《学校新风气之建立》等以及其他文章。在第一卷第五期中有一篇《儒家心理学说史略》，作者宁建功。他作此文“有两大意义，一建立心理建设之哲学基础，二整理儒家哲学史，其目的在求民族心理之建设民族道

德之发扬”。作者认为心理建设目标以民族气节力行精神为本，其理论根据为“行易知难，力行哲学，此因袭吾国固有思想，文武周公、孔子儒家传统哲学者，探本寻源研究儒家心理学说，伦理大意，孔孟之人性论道德说，即心理建设哲学之根源”。作者还对儒家心理学史作一概述：“中国儒家心理学发展史与西欧相同，先为灵魂之研究，继为人心之探讨，其次为意识思想之论说，最近心理学方为行为之研究。古代欧西哲学心理学为一物，中国哲学史亦可名为心理学史，其进展之顺序远在唐虞即有五行太极之观念，至孔子集古代哲学大全以性相近为人性之本，而倡伦理说，其后孟子性善，荀子性恶，汉代有善有恶，心理学甚为发达，已由灵魂说进为人性讨论，魏、晋、六朝为佛道世界，儒家无心理学可言，隋唐王通、韩愈、李翱又稍言之，自孔子至韩愈主要为以人性之心理意识为本，及行为者，至宋明迄今心理学与伦理开花结果，宋儒心性理气，陆王唯心论，总理心理建设，集三千年心理学之大成更加发扬光大，此为儒家心理学史大略。”从以上介绍的文章题目及例举内容，可知《心理建设》杂志反映了我国抗战期间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方面。

四、心理研究所的建设

（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①]

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6月正式成立，蔡元培任院长。该院为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它下属十三个研究所，心理研究所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第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26～28页。

一个研究心理学的专门机构。它在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以后着手筹备，聘唐钺筹备该所事务，商定计划大纲。首先调查仪器书报：计有现行心理学杂志31种，相关科学杂志26种，旧本心理学杂志25种，旧本相关杂志1种。又分别向英、美、德、法各国去订购。①1929年4月中央院决定成立心理研究所，于5月在北平正式成立。唐钺为所长。暂租民房，所址在东城新开路35号，分设实验室、解剖室、图书室、动物室、讨论室、事务室、餐室几所工作室等。开始延聘研究人员。购置图书仪器，订购心理学及有关学科的杂志，饲养动物（兔、豚鼠等）。1930年8月购得东城芳嘉园一号房屋一座，修葺后于11月迁入。前半作为图书室、事务室，后半作为实验室，东院空地添建动物室一所，规模初具。在初建时期，研究工作方面只进行了关于动物学习问题的研究，如大声对习得行为之影响及粮食种类（草食和素食）与学习速度之关系等。1930年又增加神经解剖之研究，并修订比纳的智力测验，1933年3月奉院命南迁上海，暂租巨籁达路民房为临时所址。7月搬入白利南路理工实验馆右边四楼，计有十一间房，经布置2～3个月后恢复工作。这时唐钺辞去所长职务专任研究工作；聘汪敬熙为所长。此时研究工作也有所改变，主要侧重在神经生理的研究。1934年4月又因社会科学研究所为集中工作起见，将南京部分移往北平，其所遗南京钦天山下所址，由院拨给心理所使用，乃于6月由上海移至南京。1935年心理所还与清华大学心理系合作，增设工业心理研究，在平绥路机厂及京沪一带纱厂作实地之考察与研究。1936年工业心理研究由心理所专办。当时所内图书，开办时仅有英、德、法文书籍500余部；旧杂志35种，3000余册。常年订购心理学及有关科学杂志60余种，以

① 《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1928年，第231页。

后逐年增加，至1937年时书籍已达1000余部，其中多新出贵重书籍和小部分绝版善本及珍贵名著。旧杂志完整之全套者30余种，常年订购之新杂志约近百种。还有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旧心理学杂志数种寄存心理所以便所内人员阅览。关于心理学、生理学及神经学等科学书籍杂志，均足供研究之用。这时的仪器设备有：（1）心理实验用仪器，如各种迷津、问题箱、计时器等；（2）神经学及生理学仪器，如切片机、显微镜、显微镜照相器、解剖用具等；（3）电学仪器，如电表、变压器、马达等；（4）普通仪器如蒸馏器、记动器、计数器等三百余件。后逐年增购重要仪器，如马氏示波器、兴氏照相记录器、外科手术用电刀、哈佛长纸计动器、黑地显微镜、斯宾塞摇动切片机、人工呼吸机、血液加氧机等。1935年又设一小型工作室，有车、钻、铣床及金木工用具，可以修理和自制小型仪器，如电磁记时器、马氏气动记纹器等。并自备小型发动机及爱迪生电池供直流电之用。同年，还添建猴房一座附实验室，外科手术室以及动物房、狗房等。饲养的实验动物有豚鼠、大白鼠、兔、狗、猴等。并自制各种动物脑髓切片，整套者数十，较大动物如猫狗等脑髓均作横切、竖切、平切三种切法之全脑整套切片。①从以上所述来看，由建所至抗战前夕的七八年间，研究项目和实验设备条件均有相当发展，其研究方向主要是基础研究，侧重在生理心理、神经生理方面，同时也注意到应用研究，联系当时实际，开展工业心理的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心理所与南京其他各所于8月迁往长沙，10月迁至衡山之南岳。同年，12月底又由南岳经桂林迁往

---

①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三．心理研究所（一）概况，1948年，第331～332页；樊洪业：《中央研究院机构沿革大事记》，载《中国科学技术史料》第6卷第2期，1985年，第21～28页。

阳朔。1938年12月心理所迁往三江县之丹洲乡。1940年在桂林南20里的雁山村，心理所与广西桂林科学实验馆合建一楼，于4月全所由丹洲乡迁入。同年冬，又新建图书室一间、外科手术室一间。1941年春将心理所的借于西南联大的书籍、杂志自昆明运回，排入新的图书室。抗战开始后的三年间，除在阳朔稍久外，均在迁徙途中，影响工作甚大，移至雁山后稍为安定，始能恢复研究工作。此时期集中研究胚胎行为之发展问题。如青蛙蝌蚪游水动作及动态反射发展之程序及出卵时割除中枢神经各部后，对此种发展程序之影响，中枢神经各部位之互相关系；青蛙蝌蚪皮肤变色反射之发展程序及其与脑下垂体和中枢神经系统之关系；青蛙蝌蚪内耳平衡感觉器官发展之程序。神经解剖方面就自制成的动物脑髓切片作比较之研究，如端脑之比较研究，刺猬中后脑之构造和猴小脑中皮层内一种曲回纤维之研究等。工业心理方面，仅限于整理过去所得的材料。1944年夏日军又侵湘桂，心理所仓促再迁，先由雁山迁入八步之西湾，旋复回桂林，循湘桂、黔桂两铁路线迁往贵阳。心理所大部分书籍及仪器均于此次迁移中与物理所的机件仪器等同遭炮火损失。是年冬贵阳吃紧，心理所又迁之重庆北碚。1945年1月按修正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心理所改称心理学研究所。同年夏借得教育部前实验剧队故址楼房一所为所址。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9月迁回上海岳阳路所址，始得复原。在此段期间内，曾采用移植中枢神经法研究对蝌蚪行为发展之影响，及用人工联体共生法研究中枢神经系统各部位如后脑对于脊髓，中枢对于后脑、脊髓之互相影响问题。1948年后继续抗战期间的研究和恢复战前之研究：前者主要为采用实验发生学之移植中枢神经系统法进行胚胎行为发展之研究；蝌蚪一边耳迷路切除后，中枢神经之抵补作用和采用人工联体共生法及移植中枢神经系统法进行两栖类蝌蚪脊髓内禁止作用机构之研究。后者为哺乳

类动物行为与神经系统的关系研究。①

心理所曾出有《心理学》专刊10期;丛刊第一卷4期(1932年～1934年)、第二卷(1936年)。所内论文多送《中国生理学》杂志刊出,间亦有在《美国生理学》及《神经学》杂志刊出。抗战胜利后论文除中文两篇外,均送美国杂志刊出,先后共有31篇。①

心理研究所的主要研究人员,1948年时,汪敬熙为专任研究员兼任所长,唐钺、张香桐为专任研究员,臧玉洤为兼任研究员,鲁子惠为专任副研究员。还有朱鹤年在1930年～1935年时为专任研究员,蔡乐生在1931年～1934年时为研究员,1935年～1936年时为兼任研究员,卢于道在1931年～1940年时为研究员,陈立在1935年为兼任副研究员,1937年～1940年为副研究员。②

(二)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③

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成立于1940年,正值我国抗战期间,所址设在重庆北碚,郭任远任所长。该所原为当时的教育部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合办。后因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经济困难中途停止经费补助,而教育部方面又以该所非国立机构对其经费每年也只能以补助名义协助。成立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所长郭任远适在英美讲学,因此便在外物色研究人员,在美国进行研究工作,在国内只留一办事处,工作中心及设备均在美国。抗战胜利后,1946年该所从重庆迁往上海,暂借复旦大学在北京东路中大楼四楼的一部分,作为办公处及职员的临时宿舍。复员后因运输困难及在美国研究工作不能提前结束,故仍在美国继续进行。该

①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三,心理研究所(一)概况,1948年,第333页。

② 林文熙:《中央研究院概述》,载《中国科技史料》第6卷第2期,第26页;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三,心理研究所(二)现职人员、(三)研究人员著作目录,1948年,第334～343页。

③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28页。

所图书仪器方面，在美已购得研究所必须的参考书数百册，各种与心理学和生理学有关的专门杂志40余种，并在美和印度购置各种仪器（当时价值4万、美元7000卢比）。这些图书仪器虽不够多，但为研究需要已有一些相当基础。该所研究工作中心在美国，所长郭任远1941～1944年在英美除讲学外，继续从事研究胚胎生理、民族心理及战争心理。其研究结果一部分已在国外发表。研究员沈诗章在美研究生理生化，对于蛋白质在胚胎发育时期之变化及肌肉之化学方面的各种问题有特殊的研究。研究员夏云在美研究视觉生理及同物理方面的学者合作研究视觉与甲种维他命之关系及其他问题。还有刘燕平在美专门研究音乐与心理有关的各种问题，在国内的研究工作未能充分开展，只有研究员胡寄南一人，研究语言与大脑之关系，还有研究助理员许淑莲等二人。该研究所的经费万分困难，总是东挪西凑，勉强度日。1946年郭任远在香港定居，此所也不复存在了。由于该研究中心在美国，国内未及时开展工作，存在时间不长，国内影响不大，较少为人所知。①

心理学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存在是心理科学发展的先决条件，因为心理学研究机构乃是以发展心理科学为目的而组织的。从上面叙述的两个心理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来看，心理科学的发展“已从文人笔记式的叙述而进入科学的事实研究”。“心理学注重于心理的关联及统计的研究”。② 同时，也表现了我国心理科学的研究机构，较早地就与我国其他科学研究机构同列在一起，成为“科学之林”中的一木了。但是由于战争烽火，时局经常变化，研究机构随之受影响，研究工作时作时辍，使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受到挫折。

① 《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概况》，1946年，第1～4页。

②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五十年来的中国》，1945年，第194页。

第三节　西方心理学流派的广泛传播

20世纪20年代以后，是国际上心理学各流派争鸣的繁荣时期，“构造派、机能派、完形派、心理分析派都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心理学也形成一个开始繁荣的局面”[①]。截至1940年止20年间共翻译各种心理学书籍达165种，其中名著近20种，如赵演译《社会心理学》、高觉敷译《实验心理学史》、傅统先译《格式塔心理学》、周建泽译《人及动物之表情》等。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注意当时学习和翻译国外心理学著述的基础上，着重对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一、构造心理学的传播

我国较早接触构造主义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他在20世纪初就听过冯特讲授心理学。在这个学校工作的陈大齐以及跟随铁钦纳学习的唐钺等，都深受该学派的影响，可以说北京大学曾是传播构造主义学派的重要基地。这时期翻译该派著作的有1923年吴颂皋译《心理学导言》(冯特著)，1931年金公亮译《心理学》(铁钦纳著)等。一些心理学工作者还著文对该派进行过介绍和评述，如陈大齐的《德国心理学派略说》(收入《心理杂志选存》)，概述了德国近代心理学的四大派：重视统觉的莱比锡学派；依附英国的联想学说，非难冯特统觉说的哥庭根学派；重视意识现象的分析和叙述的柏林学派；折衷纯粹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符兹堡学派。谢循初在暨南大学《教育季刊》发表的《铁钦纳的心理学》一文对铁钦纳的著作、主张作了评述。黄公觉在

① 潘菽等:《威廉·冯特与中国心理学》，载《心理学报》1980年第4期，第368页。

《心理》杂志发表了《近代心理学大家文德史略暨著述》，对冯特的学说进行了介绍。①对于构造派，中国心理学界与国际心理学界一样“也有所褒贬”，认为冯特所属的构造派“就心理学而论，它的范围是生理学、心理物理学以至于开辟了社会心理学，然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替心理学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基石，即1879年建立了一个心理实验室……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在此时才是正式开步走”。②有的认为该派的实验内省法不科学，它具有不能公开、不能重复、不精确、不可靠等缺点，但却指出它的两个价值：“可作为研究问题提供线索与工具，其结果可作为他种实验结果的旁证。”③“构造派实验室研究大部分是因袭生理上感觉的研究”，认为心理学不是生理学的一支，“心理学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不可为他种学科的观点和方法所蔽”④。构造主义学派在中国传播，对中国心理学早期建设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各种教材的体系上，“关于心理学的对象和方法就与冯特所持的看法相似”，“甚至在‘知觉’一章中还包括冯特‘统觉’”。在实验研究方面，我国早期也大多偏重于神经生理即“冯特早期所开创的生理心理学领域”⑤。

二、机能心理学的传播

机能主义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学派，它传入我国也比较早。1919年5月机能主义学派的奠基人杜威曾应邀来华讲学，20年代留美学生陆续归国，他们确信机能主义优于构造主义，从而翻译出版机能主义经典著作的兴趣大增。这时期的译著主要有：郑宗

---

① 高觉敷主编：《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②③ 潘菽等：《威廉·冯特与中国心理学》，载《心理学报》1980年第4期，第368页。

④⑤ 高觉敷主编：《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页。

海译杜威《儿童与教材》(1922年)、伍况甫译詹姆士《心理学简编》(1933年)、杜佐周译桑代克《成人的学习》(1933年)、赵演译桑代克《人类的学习》(1934年)、谢循初译吴伟士《心理学》(1933年)和《现代心理学派别》(1934年)、孟宪承译杜威《思维与教学》、唐钺译詹姆士《论情绪》(1944年)和《论思想流》(1945年)等。同时,我国不少心理学工作者如黄公觉、高觉敷、张述祖、肖孝嵘、沈有乾等都曾发表专文对机能主义心理学进行了介绍与评述。机能主义在我国心理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都发生过相当的影响。

三、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传播

行为主义学派对当时的中国心理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华生的许多著作都被翻译出版,如1925年臧玉淦译《行为主义心理学》,1928年张耀翔等译《一九二五年心理学》,1934年高觉敷译《情绪之实验研究》等。另外,我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郭任远不仅大量地介绍过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而且在自己的实验研究中,提出了不少独创性的理论见解,引起了国内外心理学界的普遍关注。

郭任远职业心理学生涯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1916年入复旦大学。1918年赴美留学,入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主攻心理学,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托尔曼的赏识。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1921年)和《我们的本能是怎样习得的》(1922年),被著名心理学家麦独孤称为"超华生"。1923年完成学业后应聘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从事行政和教学科研工作直到在香港定居。

他的主要贡献有四个方面：[1]（1）在心理学界掀起“本能问题”的大论战，虽然有“环境决定论”的片面性，但对千百年来人们的旧观念“遗传决定论”以及“宿命论”和“天才论”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同时由于他的中国人身份使得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中国成为心理学界的热门。（2）在中国本土上任教（1927～1936年）并开展“胚胎行为”实验研究。他用鸟类卵壳开窗观察的技术，获得鸟类行为在胚胎中发展的实验资料，并有多篇论文在美国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这也可以看成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3）在组织和人才队伍上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1925年，他在复旦大学先办心理学，后办生物系，我国一批脑科学专家、著名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就出身于这个科学摇篮中。（4）他认为心理学是生物科学的一部分（指最广义的生物学而言），同时十分重视心理学在社会上的应用。这也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中国影响深远、传播广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影响下，中国心理学工作者也进行过一定数量的动物行为的研究，并且对行为主义心理学派进行了批评，如在方法论上指出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机械性”，在基本观念上“源于神经生理学”等等。

四、格式塔心理学的传播

格式塔派受到当时中国心理学界的重视。1928年肖孝嵘首先把该学派介绍到国内，“格式塔”一词首先由他译出，并在国内沿用至今。这个学派的译著主要有：高觉敷译《儿童心理学新论》

① 燕国材主编：《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第4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21页。

（考夫卡著，1933年）、《格式塔心理学的片面观》（苛勒等著，1935年）、《形势心理学原理》（勒温著，1945年）、傅统先译《格式塔心理学原理》（考夫卡著，1936年）等。朱希亮在美国威斯康丁大学学习研究时，正值考夫卡在该校任访问教授，对格式塔学派也有一定的研究，曾写有《逆联想学习之量的研究》（1929年）、《完形心理学及条件反应》（1932年）等文章。此外，高觉敷、肖孝嵘、章颐年等都曾撰文研究格式塔的理论。如高觉敷著《“格式”学派的教育心理》（《教育杂志》，二十六卷六号，1936年）。作者首先叙述该学派和中心概念及其在教育心理学上的特征，提倡全体学习法，反对部分学习法，反对练习律和效果律，主张能迁移的训练是整个情境的反应。最后作者述及桑代克的学习学说是属于联接主义，而苛勒的“格式”派学说是动的分配说，研究教育心理学者宜参照格式塔学说的观点。作者还译有与此文有关内容的一篇《一个联接的效果对于此联接的影响的学说》（《教育杂志》，二十六卷八号，1936年）。该文是解释作者上文涉及的效果律及桑代克关于效果影响的解释。另外，杨同芳在《心理季刊》发表《完形心理学派对于学习之贡献》（第二期，1936年）和《完形心理学派之理论根据及其批判》（第三期，1936年）。前一文作者认为完形心理学派之主要理论，为全部不等于部分之总和，全体另有其特殊意义。其方法乃采用整体的观察，且认为人格非特性加积的总和，乃是一种有组织的整个体。完形学派深信脑的活动并非连此接彼之神经通路的活动，而是有组织与弥补缺陷之活动。它对学习问题的特殊贡献，作者综合为三点：（1）学习乃一种需要的反应；（2）学习系一种创造的历程；（3）学习与生活发生关系始有意义。后一文的主旨在将完形心理学派的一贯的理论给予系统的叙说，尤着重这派理论的根据的探讨，并将其和原子派的冲突以及否认感觉原素说的原由与完形的概念，作了申述。全文

分五部分：（1）前言；（2）完形心理是学派之理论基础，自其导源至学派成立，论述学派的理论基础建筑在“自然的完整单位”上；（3）完形心理学派与原子派之冲突。作者从两派的对立述及冲突的原因，完形学派否认机械的原子学说，排斥意识为单纯感觉所组成，行为为反射动作所组成，视知觉为整体，研究心理必以机能所应付的全境为对象是不能分析的；（4）完形心理学的“完形”概念。作者总括“完形”概念，不外为研究人类的一切行为必须注重组织的整体，不能以部分推知全体，并举基于此概念的教育实验研究为例说明；（5）对于完形心理学的批判。作者主要认为完形学派提出一种具体学说，揭破了原子派的谬说，在知觉方面，固有许多是值得采纳，而于感情意志诸问题甚少论及，是美中不足。完形派完全蔑视分析，太着重全体，也是过激的论调。再有，高荣滋著《统整的功用与完形心理学》（《中华教育界》，二十四卷三期，1936年）介绍德可乐利（O. Decroly）所谓的统整功用应用到心智上和教育上的新理论。还有陆志韦《介绍考夫卡：完形心理学原理》（《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一期，1936年）。①

五、精神分析学的传播

中国心理学界对精神分析学派相当关注，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评介该学派的著作相继被介绍到国内来，如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6年），夏斧心译《群众心理及自我分析》（1929年）等。国外学者评介精神学派的著作如赵演译《弗洛特心理分析》（B·勤著，1933年）、董秋斯译《精神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82页。

分析与辩证唯物论》（奥斯旁著，1947 年）等不下十余种。在这个学派影响下，国内部分心理和文艺工作者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编著书籍达二十余种，如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派别》(1930 年)、《变态心理学》(1933 年)；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如《中国历代名人变态行为考》等。关于精神分析学派还有两篇译文：陆贻昌译《精神分析未来之展望》(《中华教育界》，二十四卷七期，1937 年)和宗亮东译《心理分析与本能》(《中华教育界》，二十四卷八期，1937 年)，介绍精神分析说之创始、趋势、治疗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论述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对于各种本能尤其是性本能的许多观点。

综观三十年间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之外，中国心理学界对国际心理学各主要流派的研究成果都比较关注，能及时地予以翻译与介绍。这些译著当然是中国心理科学的组成部分。它的大量传播对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开展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这期间有大量的编著出版及论文发表，而且还展开了“本能论战”和“测验论战”就是明证。

第四章 中国现代心理学创立时期（下）

第一节 对苏俄心理学的初步介绍

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介绍

自1923年苏联学者叶勒索夫来华介绍俄国心理学最近的发展之后，1929年潘菽在《中央大学半月刊》上，开始译文介绍《苏维埃联邦心理学》。1934年郭一岑编译了《苏俄新兴心理学》一书。该书较为系统和全面地介绍了30年代之前的苏联心理学发展的情况。在苏联心理学的影响下，一些心理学工作者开始试图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人的心理。1937年郭一岑出版了《现代心理学概观》一书，剖析了现代心理学六个特征：由主观而客观；由分析而综合；由横的解剖而纵的追溯；由量的测量而质的探求；由静的而动的；由普遍而差异。在对未来心理学的展望中提出：心理学必须是新哲学的；心理学必须是人类的；心理学必须是社会的。这是我国最早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心理学研究的名著。

1938年刘泽如撰写了《行为研究举例》一文，探讨了人的心理活动的辩证发展规律，批判了行为主义和巴甫洛夫学说中的机械论倾向。1939年曹日昌在《读书月报》上撰文，提出心理学应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主张。阮镜清1932年之后相继写出了《心理现象的发生问题》、《学习心理学》等论文和著作，试图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说明心理的发生问题，并批判了西方的机械学习

论。朱智贤发表了《心理学上三个行为公式之批判》、《人性的改造问题》等文章，采用辩证唯物论探讨心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二、巴甫洛夫学说的介绍[①]

巴甫洛夫于1936年2月27日病逝，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曾去唁电。在此时期，发表纪念他介绍其生平、传略、年谱和学术贡献等的文章有十数篇之多。《心理季刊》（创刊号，1936年）刊有李敬妙撰写《巴甫洛夫传略》。作者概述巴甫洛夫的大脑皮质活动研究，为心理学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较全面地介绍他的交替反射研究，包括交替反射的实验方法，延宕反射（延缓反射）和余迹反射（痕迹反射），狗对于联合刺激的选择和区别的能力问题，交替反应的消灭，狗的神经疾病的实验，睡眠和抑止现象等。还有郭一岑著《纪念巴甫洛夫》、曾作忠著《巴甫洛夫》和贺益文著《巴甫洛夫的生平及贡献》，均刊于《教育杂志》（二十六卷六号，1936年），卢于道著《巴甫洛夫的生平及其工作》（《中华教育界》，二十三卷十一期，1936年），赵演著《巴甫洛夫的思想及其对于学术上之贡献》（《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三卷四期，1936年），吴襄撰《巴甫洛夫教授年谱叙略》（《心理半年刊》，四卷一期，1937年），高觉敷著《巴甫洛夫的交替反射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四卷一期，1937年），胡毅著《巴甫洛夫制约反射研究之补充》（《中华教育界》，二十四卷五期，1936年），以及陈子明译《交替刺激与交替反应》（《中华教育界》，二十三卷十一期，1936年）等。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81、88页。

三、实业心理学的介绍[1]

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在30年代对苏联心理学研究情况已有不少介绍，特别是对“苏联的实业心理学”研究和巴甫洛夫交替反射研究。在《中国心理学报》和《心理季刊》的国外心理学消息专栏中，常刊苏联心理学的消息。如刊载哥仑比亚大学赖能博士（Dr. G. H. S. Razran）对心理学论文的统计，苏俄心理学论文之数目，占全世界心理学论文至少15%，甚至高达20%～25%，除以英文发表的论文外，俄文发表的占世界第二位。

陈汉标在《中华教育界》(二十三卷十期，1936年）上，对苏联心理学有较全面的叙述，并反映出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苏联心理学所具有的特点。文中认为“苏联在心理学上的伟大贡献是铲除一万七千万人民旧习惯和风俗”。文中介绍苏联每个工厂和集体农庄设有托儿所或幼儿园以作儿童心理的各种研究，介绍巴甫洛夫用条件反射来分析学习过程，介绍实业心理学研究疲劳职业的分析；介绍犯罪心理，注重再教育，废除酷刑和威迫等新理论。丁祖荫在《心理半年刊》(三卷二期，1936年）和何清儒在《教育杂志》（二十六卷一期，1936）所译的《苏俄的实业心理学》，较详细地介绍苏联职业研究的情况，特别指明他们注重职业训练。文中叙述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人每日工作减至六小时，实业中尽力为妇女设置工作环境，不限制女子工作的机会，工资随生产增加而并进，工作最佳者，被选出给以升晋。最后介绍“苏俄国中的心理学家必须注重改变人格的社会影响，以作创造人类工作的新可能”。对苏联心理学的这些情况介绍在我国当时的社会条件

---

[1]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81、88页。

下，是很难得的。

第二节　中国心理学创立时期的主要研究

一、生理心理

（一）有关脑和神经的研究

汪敬熙是这方面的开拓者，他第一个将电子仪器引入中国用于脑功能研究。其主要研究成果有：（1）证明皮肤电反射是由于汗腺的分泌，与意识无关。皮肤电反射是由各种刺激诱发出的动作电位，它有五个兴奋中枢和抑制中枢，其最后通路为脊髓交感柱中神经元集团。（2）发现了瞳孔收缩和扩张的皮层代表区域。（3）利用麦修斯示波器记录到光影通过猫的视野运动时，外膝体内产生的诱发电位。此外，在动物心理方面还研究了白鼠活动与性周期的关系，两栖类胚胎行为等，著有《皮肤电反射和情绪测量》（1930 年）、《行为之心理分析》（1944 年）等。[①] 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开展过胚胎行为发展与神经系统发展之关系、输精管隔断的各种影响、大声惊吓对于习得能力的影响等多方面研究。1933～1936 年，卢于道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丛刊》和《专刊》上发表《大脑皮层髓鞘之发展》（1933 年，第一卷第一号）、《中国人之大脑皮层》（1934 年，第六号），1936 年在《丛刊》第二卷上发表《常态神经细胞中之核酸》、《核酸在脊椎动物大脑皮层上各神经细胞内之分布》等研究。1937 年又在《中国心理学报》发表《关于大脑皮层功用之管测》（一卷三期）。该文从四方面讨论：（1）大脑皮层上各区之分化，由形态学上的研究，知高等动物的大脑皮层上

① 高觉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心理学史》，1985 年，第 98 页。

各区各有不同，故各区之分化，在组织上为确定不易。(2)吾人所研究之功用，功用是否有一定部位，则视吾人所指之功用而定；如视觉有一定区域，而学习智慧则难以寻得一定区域。(3)皮层发达之程度，各动物不同。高等动物某区已分化，下等动物尚未分化，故某一功用高等动物属于某一区，在下等动物不限于某一区。用下等动物如白鼠试验结果不应用于高等动物。(4)由神经原之作用至大脑皮层之作用。1936 年《丛刊》第二卷还有汪敬熙、鲁子惠合作发表《物影掠过视野大脑皮层上及上叠体上所引起的动作电势》及《兔之外膝状体内的动作电势》，张香桐、唐钺分别发表《视神经之连结》和《单边耳迷路割除》等研究报告。①

20 世纪 40 年代这方面的研究还有：(1) 吴襄的《最近关于睡眠之实验及学说》(《教育心理研究》，二卷一、二期合刊，1943 年)。作者通过略述睡眠之生理特征及其变化，将近代关于睡眠之各学说，如大脑皮层机能阻遏说，睡眠或觉醒中枢说，化学说和进化说，均作简短介绍。最后作者概括为：睡眠与醒觉与吾人生活之两面，由睡眠而醒觉，由醒觉而睡眠，其间须经过不同程度之睡眠与醒觉，可得一条 24 小时睡醒起伏曲线，此曲线波与工作效率之高低及体温升降，息息相关。睡眠时内脏活动减少，可以下视丘所发生之交感神经冲动减少解释之，当下视丘区域所接受之内脏感觉冲动增多加强时，个体即由睡眠转至醒觉。醒觉生活之维持，有赖大脑之演进与距离感官（如眼耳）之发达。后者发达后，大脑在日间接受之刺激频率加多，范围扩大，于是对骨肌所发出之冲动相应增加，而肌肉之紧张度及其工作效能，亦即随之而增，体温及其他生理机能乃均渐升高。肌肉经竟日之工作后，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年，第 78～79 页。

即将发生疲劳而需要宽弛，再加夜间环境宁静、昏暗，由距离感官所传达之刺激大为减少，于是大脑之兴奋降低，个体乃由醒觉而渐入睡境。至于昼间寝寐乃系一种替代反应现象（所谓习惯），而胃肠之饱胀，肌肉活动之减少以及环境之单调，当亦有密切的关系。(2) 卢于道有《从神经学回顾心理学》(同上，一卷三期，1941 年) 和《实验室里的微言》(同上，三卷一、二期合刊，1945 年) 两篇。作者从事神经学研究 20 年。他在第一篇中，谈及他当时受行为主义影响，认为反射弧为行为的单位，精神作用可用交替反射解释，由于反射弧离不了神经系统的组织和功用，于是他走向神经学的研究，想兜一个圈子回来再研究精神现象。20 年后写了三点经验：一是认为精神活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可用客观科学方法研究。二是认为精神问题不能只从神经学的研究中得到解决，了解精神作用最重要的是脑的作用，从生理学、神经学研究可了解脑的活动，而精神活动并非脑活动功能之算术的综合，乃是脑功用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他认为应有其他种途径研究与神经学并行研究。三是认为心理学在中国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可分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理论是指探讨精神活动的本质，如大脑皮层与功用，智力的因素等；实践是指教育测验，军队测验，工作效率，群众心理等。作者的第二篇文章是为纪念艾伟在中央大学教学 20 周年而作，文中回忆他在 29 年前求学时得到艾伟所授人格心理和情绪心理两课，尤其对无管腺体之内分泌阐述，和受陆志韦等的启迪对神经学感兴趣。1926 年作者留美，从神经学家赫列克研究鼹鼠之脑。1937 年美国兰孙教授找出下丘脑上视巢有纤维通至脑垂体后部，此上视巢脑体通路为抗利尿分泌之神经通路。而作者在 1931 年述鼹鼠前脑文中即提及，便未作生理研究以明其功用。作者还谈到他在研究脑及大脑皮质与神经通路方面的成果。3. 欧阳翥有两篇关于大脑皮层定位的论述，一篇

是《Gall 与大脑皮层内功能之定位》(同上，创刊号，1940 年)。作者叙述我国和西欧关于心理功能看法的历史，重点论述了近世功能定位论开始于 Gall 著骨相学，其说认为常人之各种功能，大脑中有其固定之地位，脑之发达又足以影响头盖骨之形状。Gall 分大脑为 30 余区，各区所司不同。从头盖骨外形发达之程序可推其人之聪明才力，性行良否，Gall 据面貌以别人之贤愚善恶。作者认为“Gall 有启发之功不可泯也”。另一篇为《大脑皮层功能之定位》(《教育心理研究》一卷三期，1941 年)，分为八点论述：1. 语言运动中心；2. 语言感觉中心；3. 身体运动中心；4. 身体感觉中心；5. 视觉区域；6. 嗅觉中心和味觉中心；7. 迷道中心；8. 联想中心。①

(二) 有关内分泌的研究

1934 年吴襄在《心理半年刊》发表《最近行为研究的两大趋势》(一卷二期)，行为之生理的研究：内分泌与行为。此为作者上下篇读书报告中的上篇。文中对内分泌腺、青春腺、肾上腺、盾形腺、脑下腺与行为的研究作了介绍。另一篇为陈述惠著《人格型与内分泌》(《中华教育界》，二十四卷三期，1936 年)。该文主要讨论人格中的气质问题，详论内分泌腺的影响。①

(三) 有关生理心理的论述和介绍

如张耀翔著《关于手性的各种学说》(《心理季刊》，第四期，1936 年)。所谓手性是指某人在运动或工作时，常爱用某手，或觉某手不便利的特征。作者把国外关于左右手性的研究材料分为四类：(1) 后天说；(2) 构造说；(3) 脑性说；(4) 遗传说。雷肇唐著《心理电反射及其史略》(《教育杂志》，二十六卷七号，1936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年，第 96～97 页。

年)，认为心理电反射（或皮肤反射）的定义，是受感觉的或意想的刺激后，所起的生理活动（由自主神经系统所管辖的）而使皮肤的伪抵抗减低或使伪电动力增加。文中分析了休静曲线、心理电反射曲线和恢复曲线，并叙述了心理电反射研究的历史。另有根据国外资料的《种族间色盲的调查》（楼次善著，《教与学月刊》，二卷五期，1936年)，结果认为色盲是天生的视觉缺陷，男性较女性为多；半色盲（红绿色）占绝大多数，全色盲很少发现；以种族而论，白种人最多，中国人次之，犹太黑种人又次之，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最少。[①]

还有其他方面的文章或译文，如《心理附刊》上，张义尧发表的《甲状腺之结构生理及其疾病》（第九、十期，1935年)；邓德萍译《身体的构造》（第二十九甚至三十二期，1936年)。还有肖孝嵘著《酒精在心理方面的影响之研究》（心理半年刊，二卷二期，1935年)，介绍酒精对心理影响研究的历史、方法。作者认为一切因酒精作用所产生的变化，具有压抑和减低效能的趋向。[①]

二、动物心理或比较心理

（一）20世纪20年代关于动物心理的初步研究[②]

《心理》杂志动物心理类有文7篇。其中3篇是对鸦、鸽和蚁的活动的一般观察。如张纯一《鸦之心理》（1922年，一卷三号)，是作者在武昌文华学校时，校中旷地尝有鸦至，对其观察认为鸦有审度力、记忆力等，并认为“鸦之感情与意识无异于人”。张子和《鸽之心理》和《蚁之心理》（1923年，二卷三号)，观察记述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59页。

了鸽的雌雄间的爱情与同情，母子之恋爱及雏之记忆，对鸽的教学，鸽的认识、视觉及听觉等；蚁的触觉、压觉及抵抗觉和蚁的储蓄。其余 4 篇为译文或编译文。有萧树棠译《蚂蚁如何识别他巢内的同伴》（1923 年，二卷四号）和《红色与家畜之愤怒》（1924 年，三卷一号）。前一文介绍外国对蚂蚁嗅觉触觉的实验研究。后一文介绍美国加利福尼学校杂志上所载关于人类和其他动物情绪的研究，考察红色对家畜的影响。另一篇译文是戴应观译《动物智能》（1922 年，一卷三号），亦名动物之联合作用之实验研究，原著者为桑代克，主要介绍试验用具之说明，试验猫用之箱及对猫的试验。还有一篇为罗廷光编译，介绍国外近代动物心理学家关于《动物本能之科学研究》（1924 年，三卷一号）。该文首先论述了研究动物本能采用物观的方法，然后介绍了对玄鸟与雏鸡的本能，猫与猴的本能和黄莺与麻雀的本能的研究资料。

《心理》杂志介绍其他杂志刊登有关动物心理文章有 4 篇，为《鱼的心理》、《鸟之感情与意识》、《昆虫之记忆力》以及介绍国外动物心理学家加纳试验猴之发语等文。还有 2 篇论及植物心理的，认为植物亦有知觉。

（二）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动物心理的研究①

1. 关于白鼠学习能力的研究

有唐钺、秦拱、臧玉淦在《中央研究院心理所丛刊》（一卷一号，1932 年；一卷四号，1934 年）上发表的《素食对白鼠学习能力之影响》（之一）、（之二）。该刊（一卷三号，1933 年）还刊载朱鹤年一篇《杂食与素食白鼠的中枢神经系统研究》。《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二期，1936 年）夏云著《吗啡对于白鼠学习能力、一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年，第 79～80 页。

般活动及体重之影响》，以此试验吗啡究为兴奋剂或沉抑制。作者在给白鼠注射吗啡（按体重公斤注10公厘）后令它学习一竖式迷宫。它的成绩与另一组仅注射盐水的比较，结果它的次数错误、时间皆有逊色。注射吗啡的白鼠的一般活动减少，体重减低，但日久则二者均因适应而升进，由此可见吗啡似为一种沉抑剂。

2. 关于鸟类胚胎行为的研究

郭任远在1934年《心理半年刊》上发表《鸟类胚胎行为之发育》。该刊一卷一期刊载第三篇胚胎行为之结构与环境的因子，论及结构对于胚胎行为、环境对于胚胎行为、卵黄囊对于行为、膜位置对于行为之影响，心跳与趾抓对于头部运动之影响。第四篇胚胎动作对于孵化后行为之影响，论及鸡胎身体运动与各种器官的生理作用，食物获取之反应，行动（飞翔与栖止）头部位置的影响。该刊一卷二期刊载第六篇，心跳与鸟胎行为之关系，论及研究鸡子的脉搏速率和胚胎动作的关系。此项鸟胎行为研究早在1928～1929年前开始，1932年在美国有关杂志上陆续刊出。因第一、二篇关于鸟胚生理之发展史及其特征，内容纯属胚胎学方面，故未在心理学刊物上发表。此文原为郭任远用英文撰写，由吴襄译出发表。

3. 关于扁虫行为的实验研究

有孙国华、敦富堂在《中国心理学报》发表《暗适的扁虫对于地心吸力所表现之响动》（一卷一期，1936年）。该实验是为查明J. M. D. Olmsted所说暗适的扁虫在食物之后，对于地心吸力表现消极反应是否可信。他以为扁虫既无接受此种刺激的感官，而所以能有此种响动，是因为食物在未消化之前，有一种压力使它们向地心吸力的地方聚集。孙氏和敦氏的实验结果未能证明暗适的和食物的扁虫表现消极的地吸响动，也不能承认其解释，以为扁虫的圆瓶内之分布是陈谢状态与水之新旧二者合产的结果。1937年孙国华和张民觉在《中国心理学报》发表《无头扁虫的食物反应》（一卷四期）。该实验是为证明

Bardeen 的结果，无头扁虫不能表现自然的食物反应。他以为扁虫之所以不能如此，是因割去头，失了"脑"的功能，"脑"是调节各种食物反应的器官。孙氏和张氏的实验，认为无头扁虫能表现许多与常态扁虫相似的反应，所得结果与此事实相符。

4. 关于单眼视觉之神经机构的研究

张民觉进行了三组实验：1936 年在《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一期)发表 I《切去大脑视觉区后对于单眼白鼠辨认图形之影响》。作者训练 16 只白鼠辨认同样大小的白圆同白三角。学会后，把 13 只的左视神经切断，再让其辨认，仍能辨认二图形。再切去白鼠左边视觉区，或右边视觉区，或两边视觉区。复原后又训练辨认两图形。从其受伤后的行为和死后检查大脑得到的结果是：(1)只损白鼠一只眼或一边视觉区，仍能辨认图形；(2)损左眼后再损右边视觉区，仍可辨别图形；(3)损左眼后又损左边视觉区，不能辨认，而且再学不会辨认图形。此结果可以说明白鼠的视神经虽然有未曾交叉的，然而主持右眼辨认图形的是左脑，主持左眼辨认图形的是右脑。在同年《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二期)上，作者又发表 II《单眼白鼠对于图形的辨认及毁伤其一边视觉区之影响，又毁伤一边视觉区之白鼠对于图形的辨认及割断其同边视神经后之影响》。实验结果：(1)切去 6 只白鼠的左视觉区又切 7 只的右视神经，然后训练辨认两图形，仍能学会；(2)把只有右视觉区的白鼠的左视神经割断，把只有左眼的白鼠的右视觉区切去，重训练辨认二图形，只有 2 只学会；(3)作脑切片，研究脑损伤部位及侧膝体上神经细胞的衰萎情形。1937 年《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三期)上他继续发表 III《切去大脑视觉区后对于单眼白鼠辨认大小之影响》。作者在此实验中证明切去白鼠的视觉区，白鼠虽失去辨认图形的能力，但可学会辨认明度，又证实切去左视觉区的右眼白鼠失去辨别大小的能力，损伤左脑的右眼白鼠中，有一只学会辨别大小。可见辨认大小的功能不似辨认图形之专注在一处。

5. 关于辨别图形大小及明度的实验研究

1936年陆志韦和孙琦瑛在《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二期)发表《形和地的明度关系倒过来之后对于辨形的影响:鼠类和婴儿的比较》。该实验用两个图,一是尖端向上的三角,一是尖端向下的三角,都是白色黑地;整个实验的背景全部是黑色。要表明的是哺乳动物学会辨别这两图后,形和地和一切背景的黑白关系忽然倒了过来,动物是否还能辨别两图。结果是:(1)一男孩(16个月,尚不会说话),对此实验无一点困难。(2)试两个白鼠及两个野鼠混合种,其能力差不多,均对形与外形间的界线划分不像人清楚。鼠类能勉强学会某种形的辨别,它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早已具备辨形的基础。其能力似乎不永久,不普遍。另一篇为1937年沈乃璋所作《白鼠辨别物体大小的阈限以及其和明度的关系》(《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三期)。该实验的研究分为三大部分:(1)过度的训练是否会改变辨别反应的性质;(2)辨别大小的阈限是多少;(3)辨别大小的阈限是否为明度所规定。由实验可见白鼠的辨别物形凡能利用明度分别时,反应十分便利。凡不能利用明度时,物形的大小也可以利用,但不及明度的便利。当物形分别很小时,明度影响较大小更重要。

6. 关于握执反应和位足反应的研究

1937年雷肇唐和张民觉分别在《中国心理学报》(一卷四期)同时发表《白鼠握执反应之研究》和《伤脑后成年白鼠之握执反应》。所谓握执反应是指初生婴儿可握一横棒支持其体重达2分钟之久不掉下来。脑前额受损伤的成年人也有这种不由自主的握执反射。雷肇唐在1934年即发现成年白鼠表现握执反应甚显著,故特制一手提式握执反应器以试验此反应,反应可由计时器自动记下。用60只白鼠(雄29只、雌31只)每日试3次,共试60日,结果为半数以上白鼠之平均握执时间分配于9～15秒之间,雌比

雄为高，平均差为2.88秒。雷氏还对白鼠抓握反射用的仪器作专文（《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三期）介绍。张民觉的实验，目的有三：（1）量度成年白鼠双前趾，左、右前趾的握执时间；（2）白鼠之大脑或小脑受伤后对于握执反射的影响；（3）影响握执反射的神经机关有无一定之部位。试验30只白鼠，伤脑前作15次，伤脑后10天作10次，并作伤脑切片研究，实验结果不很一致，有8只不能握执，22只握执时间为1.97秒。

1936年唐钺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丛刊》第二卷发表《白鼠的各种位足反应的发展》。所谓位足反应即实验者把四脚向下的白鼠提在空中，使其下颏或胡须等碰在桌子边后，视其脚的反应情况。作者用45只白鼠（共计8胎）作试验，观察由初生起到各项位足反应完全发展时为止。发现各种位足反应初现年龄，大体是在生后第10天至第21天内，即前人从形态方面所看到白鼠大脑表皮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期，所以此反应的出现大概是大脑表皮有那个阶段的发展的表示。除此以外，在同一卷上，有张香桐的《刺猬之一种听觉反射》。

7. 其他方面的研究

钱怀刚在《心理季刊》(三期，1936年)介绍《白鼠护养法》，作者取材国外资料介绍了：(1)食物和饲养法；(2)白鼠的行为；(3)白鼠的生育。另有一篇，分两期连载于《心理季刊》(一、二期)，由谢长龄和卓勒美合译《近代比较心理学的发展史》。该文分为三个时期：(1)达尔文之前；(2)轶事时期；(3)试验时期，分述其发展历史。

从以上可见我国30年代对动物心理学的研究较20年代有突出的进展。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已建有动物实验室、手术室及动物房，有各种迷津、问题箱等实验设备；清华、燕京大学也具备动物实验条件；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心理系专设动物心理研究室等，其研究对后来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或生理

学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普通心理[1]

(一) 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

《心理》杂志普通心理类共有文30篇;介绍其他杂志刊载的普通心理方面的有70余篇。包括:(1)有关感觉、记忆、想象、注意、语言思维、情绪、动机、个性以及本能、疲劳等问题;(2)有关心理学对象、范围、方法、分类及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等问题。

感觉方面,《心理》杂志上刊登6篇。颜色视觉研究有欧阳湘和程俊英的《杂色》(1923年二卷三、四号)。作者搜集了古今书籍中之颜色字,多出于古诗词,"借以观察我国文字上颜色各类之大概"。作者把颜色分类为红、黄、绿、青、蓝、紫、白、黑;共搜集到463种(其中欧阳湘203种,程俊英260种)。欧阳湘认为红种类居最多,次为绿色,说明"红色刺激人之视觉最深",并认为"红色令人动兴奋之感","绿色令人生愉快之感"。还有刘作炎与何进珍合写《世界各国国旗之颜色》(1923年,二卷三号),为调查各国人对颜色美感的异同,作一种"国家心理"研究。在《心理》上介绍的其他杂志上的文章也有颜色视觉的研究,如《色觉的进化》(周建人,《东方》18卷5号)和《色盲》(英若译自日本卫生杂志,刊于《东方》杂志,15卷10号)等。说明早期心理学者对颜色视觉十分感兴趣。此外对《视觉测验之结果》(沈振声,《教育汇刊》,第三集)也有介绍。听觉问题研究有张耀翔和孙祥偈的《杂音》(1922年,一卷二、三号)。张耀翔从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文学作品中,搜集出专门形容杂音(噪音)的字词342种;孙

---

[1]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51～53、66～68页。

祥偈作第二次搜集，得 20 余种，见于赋者居多。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能搜集出 360 余种专门形容杂音的词。还有一篇介绍嗅觉研究——《韩宁嗅觉试验》(庄泽宣，1924 年，三卷三号)。韩宁是德国心理学家，于 1914 年成功地进行了嗅觉实验；1916 年在莱比锡出版嗅觉专著，他研究的结果是“气质三棱体”。此外，所介绍其他杂志文章还有对视、听、嗅、昧、触五感外的特别感觉称之“第六感”的研究（殿芳，《妇女杂志》，四卷 5 号)。

记忆方面，《心理》上刊载《人生第一记忆》(张耀翔，1924 年，三卷一号）和《记忆》(郭维屏，1927 年，四卷二号)。前一篇作者曾试验 106 人，所得结果人生能记之第一件事，以发生于 3 岁者为最多。后一篇是关于记忆的系统论述，包括记忆之要素、记忆之分类、记忆之方法、记忆力之考察及实验、记忆力之差别等。介绍其他杂志刊载的文章有四篇，主要是记忆与教育方面的研究。

想像方面，《心理》上登有《文学家之想像》(张耀翔，1922 年，一卷三号)。作者分析我国古代文学家的生平著作中的视觉或听觉字样的多少，以测验其富于何种想像。还有一篇《幻想之心理》(戴应观，1922 年，一卷一号）是美国心理学杂志上文章的节译，主要认为幻想并非“一任想像为无益的驰骋”，“幻想为儿童及青年之正当几乎普通的现象，成年后仍可有之”。该文对幻想的特点、内容与创造想像的关系以及病的幻想等均有论述。《心理》介绍其他杂志上的文章有两篇：《想像于吾人知识上之价值》(刘笑波，《学生杂志》，三卷五号）和《想像作用之陶冶》（文叔，《教育潮》，一卷七号）等。

注意和兴趣方面，《心理》上登有程俊英《诗人之注意及兴趣》(1922 年，二卷一、二号)。作者分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

150 位诗人的 2075 首诗，将诗题加以分类研究，认为诗人的注意纯出于自发，其自发注意即兴趣，如爱天然山、水、月，注意气候时令等。《心理》介绍其他杂志刊登的有关注意及兴趣问题的有 7 篇，包括关于注意的论述 3 篇，如《释注意》（志厚，《教育杂志》，八卷八号、十号）《教学上之注意和兴趣之研究》（王克仁，《中华教育界》十卷四期）等。还有关于注意与教育培养方法 4 篇，如《注意与教育》（杜元载，《教育研究》创刊）、《怎样引起学生们的注意》（陈庆瑜，《集美学校师范教育》第三期）等。

语言、思维方面，《心理》上登有 2 篇：《语言与思想》（陈定模，1923 年、二卷四号）和《行为派的思想观》（樊际昌，1925 年，三卷四号）。作者介绍"凡表示内部之反应与情绪，必借外部之行为，此种行为即是语言"，"思想者，隐而不显之语言"，"言为外部之行为，思即内部之言语，同属行为之一种，只是一显一隐而已"。"思想就是一种'隐'的动作，它所依赖的器官，最重要的就是喉头的细小筋肉。这种筋肉收缩时有机体就有语言的行为。"这是当时行为主义对思维的看法，他们把思维和语言这样复杂的心理活动也都归入反应和行为的范畴之内了。

情绪、感情方面，《心理》上登有 6 篇。汪震《情绪的发生》（1923 年，二卷二号）；张耀翔《新诗人之情绪》（1924 年，三卷二号）；陈鹤如连续 2 篇为《愤怒》（1926 年，四卷一号；1927 年，四卷二号），论述怒的生理、心理、语言等方面。另有一篇为《笑的分类及其生理》（游宇，1925 年，三卷四号）。在《心理》的心理测验类还有一篇张耀翔的《情绪试验》（1922 年，一卷四号）。作者曾致力于中国青年情绪的研究，此试验是译自美国渥德沃斯原著并按中国情况增删一部分，共有 116 个问题试验中学以上学生 137 人。后来张耀翔又分析研究当时流行的白话诗，统计其感叹词句及感叹符号，发表了《新诗人之情绪》一文，反映出当时中国

人民的困苦和哀思情绪。《心理》介绍其他杂志发表有关情绪和感情的文章有8篇。关于情绪的有《情绪试验》(葛承训，《教育杂志》十六卷六期)和《情绪控制法》等2篇，关于情感的有《智识经验与感情》(子怡，《学生杂志》，十卷三号)、《感情教育论》(余家菊，《中华教育界》十三卷十二号)和《自尊情绪问题》(胡翼成，《学艺》第四卷十二号)等3篇。还有关于“笑”的研究3篇。

本能问题的争论，《心理》上刊登了3篇。陈定模写的《释本能》(1922年，一卷四号)和李增扬写的《本能》(1925年，三卷四号；1926年，四卷一号)连续2篇。作者论述了引起本能问题争论的原因，本能是什么，外国心理学者对本能的定义以及有无本能等问题。如李增扬对争论起因的概述：“多数心理学者承认人类和动物均有本能，但有不承认者说，一般心理学者所谓本能，都是后天获得的动作，因没有细心去分析所以都误认作与生俱来的。此种论调，美国在七八年前早已有了，三四年前郭任远君也曾在美国《哲学杂志》(1921年第十八期)上发表一篇《取消心理学上的本能说》，后来有人把它译成中文，登在学艺杂志上。严既澄君便在《民铎》，李石岑君在《教育杂志》作论驳之。”李增扬同意严、李反驳郭所说：“所谓不经学习的动作，并不是先天的适应的表现，不过是新的环境以产生这种动作的机能成熟的结果罢了”，认为“与生俱来的固是本能，迟一时期开始发现的，何尝不是本能”。并认为取消本能说的理由不充足，郭并不能根本推翻本能说。《心理》介绍其他杂志上所载关于本能问题的文章有8篇，其中有5篇对本能争论的文章，如严既澄《非本能论之批评》(《民铎》杂志四卷一号)是批评郭任远取消本能的文章；胡寄南《评非本能论》(《民铎》四卷三号)是反对严的批评的文章；伍子军《保存心理学上的本能说》(《民铎》四卷三号)也是对郭的批评，他认为本能说不能废弃，应该保存。李石岑的《本能研究》(《教育杂

志》十六卷三号）是对于主张废弃本能者质疑，认为应“推重本能驾一切智识道德而上，在一切科学上居一重要之地位”。郭任远《反对本能运动的经过和我最近的主张》（《东方杂志》二十一卷一号）论述了本能的意义及其在晚近心理学上的位置，三年来反对本能运动之经过及其派别，本能派心理学者的辩护和他最近的主张。郭略述自己对本能问题的思想变化分为三期：第一期认为本能皆是学习的行业并非由遗传而来，遗传的动作很简单，郭称之“反动的单位”比不上本能复杂；第二期承认获得的行为与遗传之分别，为推翻遗传行为的存在，强调一切行为皆由学习而来；第三期认为行为不应有遗传与非遗传之分，一切行为皆是有机体对付环境的活动，认为本能派的“不学而能的行为”和“普遍的行为”两标准不能证明遗传行为的存在。并认为遗传概念是实验心理学发展的障碍，他“现在的主张一个无遗传的心理学”。此外还有关于本能问题的文章 3 篇：汪敬熙写的《本能与无意识》（《新潮》二卷二号）介绍国外亚里士多德学会，不列颠心理学会等在伦敦大学所开辩论会，题目是“本能与无意识”，对本能的性质纷说不一的情况。另一篇介绍《柯尔文氏之本能及习惯说》（天民，《教育杂志》六卷四五号）是从黄骏所译柯尔文著《学习心理》一书中择出。主要论述本能与训练的关系。陆志韦《所谓天性与所谓惊怕的本能》（《教育汇刊》第三集）大意在破除本能的迷信而重视观察儿童的动作，应当以客观试验为准，不以惊怕阻止儿童的活动。

疲劳问题，《心理》杂志上刊登有《工作与疲劳》（邬翰芳，1922年，一卷一号），是一篇节译，论及疲劳的定义、原因和测量方法等，主要应用于工场。《心理》介绍其他杂志刊载的有 4 篇：《疲劳说》（志厚，《教育杂志》六卷三号），《教育上疲劳之研究》（厚生，《教育杂志》十二卷六号），《教育与疲劳之关系》（蔡文森，

《教育杂志》二卷十二号），《学童怠倦之救济法》（子云，《中华教育》四卷九号）。此四篇研究疲劳现象、原因、种类以及测定方法和除去疲劳方法等，用于解决儿童教育上的问题。

《心理》杂志上普通心理类还有一些文章如：《人类应用数字之选择》（曾作忠，1924 年，三卷二号），研究某数字最常用，某数字最不常用。试验结果最常用之数字为 0 与 5。张耀翔写有《麻将牌之注意价值》（1925 年，三卷四号）与《拜发主义与拜眉主义》（1924 年，三卷三号）。作者兴趣广泛并“爱择怪题”作研究，他认为打麻将牌能继续维持人之集中注意之数小时，不停地活动，心理学者对它应研究出个道理。他认为麻将牌可以给人以美术的生活，以理智的生活，以感觉的生活。作者调查历代闺情诗词得知中国男子崇拜女子之发与眉而写出《拜发主义和拜眉主义》一文。其他还有汪震写的《自我与灵魂》（1924 年，三卷一号）和《概念作用之新解释》（1925 年，三卷四号）等文。

关于心理学对象、范围、方法、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在《心理》杂志上，有赵演《心理学最近的分类》（1927 年，四卷三号）和汪奠基《心理学上联锁推证数学方式》（1926 年，四卷一号）共 2 篇。《心理》介绍其他杂志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共有 23 篇，如高卓《心理学的对象与方法》（《教育杂志》十六卷九期）。作者对普通心理学、福鲁特（今译弗洛伊德）派心理学、行为心理学派就其各派的内容说明其对象和方法。朱自清《心理学之范围》（《新潮》二卷三号）言现在心理学不是灵魂的科学可释为“生物行为积极的科学”。志厚《心理学研究法》（《教育杂志》六卷八号）以分析法研究精神作用和机能派的方法等。关于心理学上知、情、意三分法的问题有宇民《心理现象略说》（《学生杂志》四卷六号），石冠英《心理的要素之分类》（《学生杂志》七卷十二号）等。关于心理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有梁启勋《论理学

与心理学之关系》（《大中华》一卷六号）、赵元任《心理学与物质科学之区别》（《教育周报》第八十期）等。此外，还有关于身心关系问题、自我分析等方面的文章。

《心理》介绍的其他杂志发表的还有关于动机、个性、气质等方面的文章 11 篇。如郭任远《动机》（《民铎》四卷二号），主要内容：(1) 近世关于动机的学说及其批评；(2) 行为心理学关于动机诸学说。关于个性问题，有巽吾《个性与教育》（《教育杂志》三卷十一号），李石岑《人格论》（《民铎》四卷一号），余家菊《个性与学程编制》（《教育杂志》十五卷七号）等。气质问题有《气质教育之研究》(天民,《教育杂志》九卷十一号),《解剖学及心理学上气质之研究》(君实译,《东方杂志》十五卷二号)。此外,尚有关于赧颜之心理、保守之心理、暗示、摹仿等问题的文章。

（二）20 世纪 30 年代的研究

1. 关于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心理学发展方向方面的研究

重要文章有潘菽著《心理学的出发点》（《大众教育》一卷二期，1936 年）；张栗原著《人类心理发展过程之理论研究》（《大众教育》一卷二期，1936 年）；季著《心理学家可放弃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解吗？》（《心理附刊》第十期，1935 年）；高觉敷著《心理学的方法》（《教与学月刊》二卷三期，1936 年）；以及 1936 年《心理季刊》创刊号上首篇刊载的章益讲，由李敬妙、孙礼银合记的一篇《心理学的出路》。由此五篇文章可大略看出当时我国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问题和心理学发展的趋向。潘菽的文章认为心理学就是一种研究“人”的科学,要透彻地了解“人”,必须从各观点去认识,例如从解剖学、生理学和医学、人类学和人种学、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等去认识。“人”有“人”的特性,最重要的是人能获得知识,人能思想,人能制作,人有言语,人有艺术的要求,人富于不适应的行为,人有很复杂的社会生活,人有历史。“心理的科学”

包括一切研究“人”的科学，是广义的。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人”的表现的种种方面所包含的共同原理或法则的科学，是狭义的。张栗原著《人类心理发展过程之理论研究》一文，从三方面论述：(1)认为行为派心理学者盲目武断地否认人类的意识作用，不能从进化的观点去理解意识的本质，因而犯了机械论的严重错误，漠视了意识的客观性，而陷入主观主义之中。行为派只局限于实验法与个别事件的观察法，不了解一切现象间联系的统一，遂以为意识是没有可经验的或证明的物质基础，而否认意识的存在，终于采用一个“行为”的笼统名词，概括全面心理活动现象，把它还原为物理现象，所以又犯还原论的错误。(2)从动物到人类心理的发展，认为了解人类的心灵生活之复杂的根源，就必须以辩证的观点去研究整个的自然体系之发展的进程，唯人类的心理状态和人类的体质方面一样的有他自己的特点。(3)人类心理发展的原因，并不是依于某种神秘的奇迹，而是有一定的因果法则存于其间。另一篇季的著文论述心理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假使某些哲学是维护“心灵”、“自我”、“立必多”等之类的概念的，这种哲学，心理学应远避它。唯物论心理学，非但没有离开哲学的指示反而更发挥了哲学与心理学问题。作者论述了人的行为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支配物，也就是生物的与社会的产品，假如放弃任何一方面来研究人类行为则是空的。并引有蔡元培的话：“有几门科学是驾于两种科学之间，像心理学就站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要研究中间一种科学又非研究其他两项科学不可。”作者认为这话确是给研究心理学者很好的指示。还从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中提出最初心理学停留在观念论的哲学拥抱中，行为主义起来革命，使心理学跑出观念论的哲学走上生物科学的道路，这是心理学进展的一段光荣的历史，然则抱住了生物科学的极端，否定了心理学的存在，又走了机械论的路，那是不合理的现象。心理学还是坚固地存在着、发

展着，再由行为派单自生物环境的研究连上社会环境的研究，接受唯物哲学指示。我们要深切地把握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物质的发展变化的某阶段，所表现于人类行为以一种新质的特性的形式现象。这些看法对心理学的发展是很有促进意义的。

高觉敷所著《心理学的方法》一文，提出心理学的方法是用直接经验及内省，并用实验补不足。反对行为主义者的攻击，谓行为主义心理学者常用直接经验或内省的指导而发现其所欲研究的事实。此外，谈到研究方法的还有龙勋著《交替反射的实验法》（《教育丛刊》，三卷二期，1936 年）和吴南轩译《心理学底方法和题材》（《心理》半年卷一期，1934 年）。龙文介绍什么是交替反射，其产生的条件、种类及研究结果等等。吴译文介绍了科学考查的特征"实验"的意义，测量方法的施用，统计方法的应用；研究的个人的型式；儿童、动物、变态、盲聋、团体的研究等。

关于心理学发展方向问题，章益讲心理学当时在中国还是一门很幼稚的科学，不受欢迎和重视，即在西方也引不起普遍的注意，它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但研究出来所得的效果很少，学者费力研究出原则定律，并未超出一般常识，心理学研究结果没有新发现。他还认为中国人研究心理学，大半是跟美国人跑，拾其争论而不能解释的问题去研究是永不会有新发展的。他提出我们研究心理学应有新路，别人忽视而不注意的，我们应该研究，不可受传统的理论束缚，应在实际需要方面去研究。他举例说明心理学上许多发明，都是由于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他向心理学界呼吁：我们现时研究心理学不应单从学理方面去追究，而应着重实际方面，人所忽视的我们更应该去研究实验，以找出新发展，跳出传统观念去研究，不应跟着人们跑入盲道！

2. 关于感知觉方面的研究

1934 年和 1936 年在《心理教育实验专篇》一卷一期和三卷二

期发表肖孝嵘著《知觉单元形成之条件》(之一)和(之二)。1935年在同刊二卷二期发表了郑沛缪著《知觉阈度之研究》。这是我国早期对知觉问题的专门研究。在视觉方面，潘菽曾对错觉问题作过实验，发表在《心理半年刊》(一卷一期，1934年)，题为《上字错觉》。他把一竖线垂直于另一同长的横线，但看起来好像竖线长一些，称之为“上字错觉”。对这种错觉的一种解释，是看竖线时眼球是上下动，看横线时眼球是左右动，因上下动较左右动困难，所以竖线看起来觉得长，并有人以此作为中文横读的依据。作者的实验否定了这种解释，得出的结论是上字的错觉不仅是一种竖线横线的错觉而实含有一部分是由于其本身那种特殊的图案而产生的，这一部分产生的错觉更居重要地位，中文横读的依据应另外去找。陆志韦曾发表过《对于视觉余像或后像的名称的建议》(《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二期，1936年)。关于这种现象的译名，廖世承曾主张用“后像”，作者主张译“余像”；认为此名称“翻进中文变成正的和反的余像(后像、遗像、续像)”，译“后”字较为没有理论色彩。他说：“中外心理学上同一的困难乃在乎所用的名词不够支配后像种类。”“正”和“反”断不能概括一切。即使不谈对暗顺应，至少还有两种复杂的情形须得顾到。(1)正和反的分别是多方面的。(2)“后像”有时无所谓正反。郭一岑在视觉问题方面曾对于奥伯特现象(由眼球回旋作用而成)作过较精密试验，其报告为《奥伯特现象之发展的研究》(《暨南学报》，一卷二号，1936年)。有关颜色视觉问题，周先庚、陈汉标曾在《测验》(第二卷二期，1935年)发表《中国学生之普通的与特殊的颜色嗜好》研究，对个人和团体用编成的颜色嗜好测验。其一，测验颜色字的嗜好；其二，测喜欢什么颜色去配各个东西。主要结论认为颜色嗜好次第为白、蓝、红、黄、绿、黑、橙、紫、灰，特别喜欢白、蓝。颜色嗜好是随物而异的；要侧重颜色辨别、颜色嗜好和颜色

联想的分别。1934年龙勋在《心理半年刊》上发表《视觉中的轮廓》（一卷一期）和《痛与触的定位及两点阈之比较》实验介绍。此外，在《心理半年刊》（三期、四期，1936年）上，还介绍了一些视觉实验的通俗文章，如：盲点的实验，反后觉实验，色视野的实验，色盲的实验，距离知觉的实验和双象的实验，以及自制心理仪器：色视野检查器与速视器。

3. 关于记忆的研究

林嘉通所作《记忆材料的相似或相同对于倒摄抑制的影响》实验研究，发表在《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一期，1936年）。该实验以记忆对偶（一字配一数目为一对，名为"字数对"）为试验材料。作者试验实现凡字与数目均相同之对偶愈多时，倒摄之势力愈小。反之，凡仅有字或仅有数目相同者，其对偶愈多，则倒摄之势力愈大。该实验又指明倒摄问题，实即为联想冲突的问题。肖孝嵘的《记忆形式发展之初步研究》（《测验》，第三期，1933年），研究了在某年龄中记忆能力（指临时的保留优劣）与材料的形式具有若干关系等问题。《测验》（三卷一期，1937年）还刊有宋季良所作《儿童记忆限度实验报告》。《心理季刊》（第四期，1936年）有沈有乾写的《学得快的是不是忘得也快?》的通俗性文章。

4. 关于疲劳问题的研究

1934年陈剑修在《心理半年刊》（二卷一期）上发表《关于疲劳的几种研究》。文中将疲劳分为筋肉疲劳和神经疲劳，并论述了工作与休息时期应有的关系，适应现象与效率的关系。1935年非非在《心理附刊》（第八、九期）发表《用差异度量出的疲劳因子》，文中对肌肉工作，心理的保护与克服疲劳，休息的价值，休息的利益，自发休息的规律性，休息期的划分等均有所论述。1936年高荣滋在《心理季刊》（第二期）发表《一个疲劳的问题》，文中论述了发生疲劳的原因，疲劳影响到神经中枢和神经有关的部

分，引起遏制自动活动能力衰退和比较复杂的心智的进程减低（视觉、记忆、联想、注意、回想等），减少心灵动作上的速度和韵律，并介绍了西方应用的测量疲劳的方法等。左任侠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心理疲劳曲线底一项实验研究》（二十六卷一期，1936 年），叙述了心理疲劳曲线的实验经过，其实验所得曲线和前人所得的筋疲劳曲线一致，认为“劳心”与“劳力”并非判然二事，作者根据实验结果主张紧张的学习应以 30 分钟为限，而后继以充分的休息。1937 年郑丕留在《测验》（三卷一期）上也发表《疲劳研究中工作曲线之分析》。此外，在应用心理类中还有一篇《怎样消除我们工作后的疲劳》（牟鸿彝，《青年界》十一卷，三期，1937 年）。作者先对疲劳详加分析，后述消除疲劳的方法：(1)一分钟疲劳预防法；(2)静的疲劳预防法；(3)动的疲劳预防法。

5. 关于动作问题的研究

1933 年肖孝嵘在《测验》上发表《手的动作之研究》。作者对手的连续动作和单位动作进行了研究。1936 年肖孝嵘和郑沛缪合作《手指与手臂动作准确性之研究》，发表在《心理半年刊》（三卷一期）。作者用“手指关节觉测量器”和“手臂关节觉测量器”测量了被试者的手指和手臂动作的准确性。1937 年郑沛缪又在《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三期）发表《几种目手相应动作之初步研究》。作者认为目手相应动作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动作，它至少包括动作的稳定性、准确性及速率等因素。在该实验中，新设计一种剪纸图型测验和图型迹画测验；另外还用了已通行的稳定性、迹画及滚球三种测验。从测验结果上作者认为目手相应动作决不是由许多较简单的或较基本的动作所组合或堆砌成的，而是自成一型，为应用起见，与其用单纯的分析测验，不如用较复杂的模型测验。

6. 关于行为问题的研究

主要有艾伟《遗传与环境的行为发展上之影响》(《心理半年刊》一卷一期,1934 年),郭一岑《行为中的环境的意义》(《心理季刊》第三期,1936 年),杨骏《论行为发展历程》(《哲学与教育》四卷二期,1936 年),以及邓德萍译《行为的历程》(《心理附刊》,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期)等文。艾文从六个方面论述:(1)本能与遗传;(2)本能学说的发展;(3)遗传因子在心理学上可否完全取消?(4)遗传问题在人的生活史上何时发生?(5)学习与生长;(6)儿童行为之发展。郭文从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论述并批判了不理解人类的行为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错误认识。作者强调人类离开环境就没有行为可言,要从历史的发展去了解环境,从社会之建筑基础上去了解环境,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杨文则系统地论述:(1)行为的涵义;(2)遗传与环境对于行为发展的影响;(3)刺激和反应——华生的行为主义——巴甫洛夫的交替反射——郭任远的行为学;(4)尝试与错误——桑代克的学习定律;(5)成熟与学习——"格式塔"派及近代实验心理学家对行为发展的理论;最后则对各派理论进行综合比较。

7. 关于暗示问题的研究

肖孝嵘的《暗示感受性和年龄及性别的关系》,发表在《心理半年刊》(三卷一期,1936 年)。作者使用的暗示材料是红色星形图上,加"↑"符号,手指图形,或手指行为,被试为 3 岁至 14 岁儿童。主要结果是手指行为的暗示影响最大,手指符号次之,"↑"影响最小;男女性别无甚差别。就整个说,人的暗示感受性 7 岁前随年龄渐增 7 岁后则渐减。关于暗示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的通俗文章,在《心理季刊》(二卷一期,1937 年)有孙衔写的《暗示与生活》,告诫家长对儿童、医生对病人等应注意不适宜的暗示。

8. 关于人格问题的研究

1936 年辛不同著有《你要知道你的人格是属于哪一类吗?》

(《心理季刊》，第三期)，认为把人格分为神经质、多血质、黏液和胆汁质四类是不科学的。他介绍当时变态心理学家容格(G.G. Jung) 分为内外向性格二类的具体特性。同年，肖孝嵘在《测验》上发表《年龄性别和内外倾品质的关系》(二卷四期)。此外，对人格问题的译文介绍也较多，如郭祖超译《个性心理学的历史背景》(《心理半年刊》，一卷一期，1934 年)，曹飞编译《人格之分析及其进步》(《心理半年刊》，二卷二期，1935 年)，吴福元译《人格的发展》(《心理半年刊》，三卷二期，1936 年) 分别介绍了环境及其他因素对人格的发展影响；人格因素的分类、形式、克勒希谟的本质型；阿德勒的弥补学说；人格的精神学说；人格对于环境的适应，人格发展的重要时期等内容。此外，还有韩进之所写《品格之分析》(《心理半年刊》，二卷二期，1935 年) 分析评述了古代解释品格的元子论、星术学、骨相学和面相学等。

其他方面还有情绪、注意问题，皆为联系日常生活，有关控制情绪，集中注意的方法等通俗文章。如《心理季刊》上，潘炳泉的《怎样消灭惧怕》(创刊号)，蒋舜年的《怎样制止你的怒气》(二卷一期)，朱汝霖的《笑与哭》(第四期) 和卓勒美的《谈谈注意》(二卷二期) 等。此外，还有一些有关语言与思想、想象与联想、审美判断等问题的文章和有关意识、本能、态度、动机等问题的译文。

四、儿童心理[①]

(一) 20 世纪 20 年代的研究

《心理》杂志上有关儿童心理文章有 8 篇，其中陈鹤琴写有 5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年，第 54～55、68～70、95 页。

篇。《研究儿童的知识之方法》(1922年，一卷一号)，作者认为儿童的知识多少与年龄、性别、智慧、家庭环境有关，这与教育关系很密切，学校的教材教法应以儿童已有之知识为基础。他根据国外调查材料设计一个知识测验，测验内容为一百件，有动物、植物、时节、天然普通物……各类，编成问句，对高小学生进行团体测验。《研究儿童的颜色美感之方法》(1922年，一卷二号)介绍国外对此研究的方法并自作试验，用无光颜色纸14种裁成长方形，问最喜欢哪一张。他另一篇《理解性学习法》(1922年，一卷二号)介绍美国测验儿童的理解力和记忆力的方法。此外，他还有一篇《研究儿童的历史》(1922年，一卷三号)，和一篇《儿童的暗示性》(1922年，二卷三号)，论述了儿童易受暗示，暗示作用与模仿的区别等。关于研究儿童心理的方法，许寿棠参考日本上野阳一著《儿童心理学精义》写有《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1923年，二卷二号)，主要是：1. 回忆；2. 观察。观察包括各种观察方法：自然、人为、个案和实验测验等。关于儿童兴趣等方面，有何熙春《儿童恐怖兴味及道德心之研究》(1923年，二卷四号)，设计一问答测验，调查儿童682人。还有朱崧毓一篇《儿童兴味》(1924年，三卷三号)设有23问，用多答自选一答的方法。作者试验的目的为编教材应与儿童旧有经验相联系，可使儿童发生兴趣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心理》介绍其他杂志的有关儿童心理的文章有42篇。涉及的问题很广泛：1. 阐明儿童所具有的好奇心、好动心、模仿心、游戏心、求知心(好问心)、竞争心、自尊心、惧怕心以及不畏难的心理、储蓄的心理等。关于教育儿童应采取的方法有6篇，如陈鹤琴《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新教育》三卷二期)，他认为“儿童有儿童的人格，儿童的好动心，必须用适当的环境使他充分发展，教育家应当利用好奇心，我们必须教儿童游戏”。陈

还写有《我对儿童的惧怕心之研究》（《教育汇刊》第三集）。他把惧怕分为天赋的、经验的和无知识的惧怕三项，主张以身作则，除去各种诱起恐惧的环境并积极予以教育。2. 研究不同年龄阶段（或时期）的心理特点和方法有5篇。如金鼎一《二岁内儿童心理的研究》（《教育汇刊》第三集），介绍包括感觉、认识、情绪、动作和语言的特点。又如和士《婴儿及少壮时代心灵上之变化》（《进步杂志》七卷五号），分述婴儿期、幼童期、童子期、壮年期之心灵的变化。还有陈鹤琴译文《研究二岁以内的婴孩之方法》（《教育汇刊》第二集），陶德怡《五岁儿童的心理之横剖观》（《平民教育》第五十期）等。3. 研究儿童个性方面，有5篇。如魏寿镛《观察儿童之个性法》（《妇女杂志》四卷一号），作者依人之血液而分的四种气质，即多血质（浮性）、神经质（郁性）、胆汁质（热性）与黏液质（冷性）进行剖析并将各质之长处短处列出。复详述儿童观察法六种，即身体、言语、行为、绘画、文章、实物等察其儿童之个性，而施之适当的教育。还有译文《儿童个性之调查》等。4. 研究儿童的道德性、说谎、喧噪、恶习等，有5篇。余家菊《儿童的道德性》（《中华教育界》十卷一期）主要论述道德性的发展与训练，并论儿童之所有权、好奇心、偷逃、谎语、反抗性、捣乱、模仿等行为。还有白文祥等的《儿童恶习惯之调查》（《都市教育报》一编四期），纪受绶《矫正儿童恶习惯之方法》（《都市教育》二十九期），程谷青《儿童之喧噪问题》（《妇女杂志》五卷四号）等。5. 研究儿童玩具与游戏问题，有5篇。如师蠡《儿童与玩具之关系》（《妇女杂志》六卷三号），作者认为"玩具必依儿童心理之喜恶及其年龄之大小为标准"。景逊《儿童的游戏及玩具》（《妇女杂志》九卷四号），作者认为玩具助长儿童个性及欢乐，增长创作的能力，玩具的分配与年龄为正比例，分A. 优良的玩具，B. 有危险的玩具。此外，还有《游戏之类

别》(巽吾,《教育杂志》四卷九号)和译文《游戏说》(天民,《教育杂志》八卷五号),解释为何儿童好游戏。6. 研究儿童读物问题,有4篇。如《儿童读物之心理》(无名,《教育杂志》一卷十二号),作者论儿童嗜书时代,动物书、传说书、宇宙万物起源书与儿童之发展。还有《儿童用书与儿童心理》(陈鹤琴,《南高教育汇刊》第一集),《神话非儿童的读物》(周毓英,《学灯》五卷十二册七号)等。7. 研究儿童身心发展问题,有3篇。如《儿童身心观察之研究》(王仲虎,《京师教育报》第九期)说明应注意观察儿童身体及姿容的发达,神经所表现之脑髓状态,平时及病时营养的关系。8. 研究儿童创造力培养问题,有2篇。如:《儿童创造力养成法》(天民,《教育杂志》九卷十号),论创造力的心理基础:(1)观察力的敏锐;(2)观念联合之确实;(3)想像力之晓然;(4)思考作用之明了;(5)构造之兴味;(6)努力之精神;(7)教授上当注意之各点。9. 研究低能和缺陷儿童,有2篇。《特殊教育之实施》(郃爽秋,《教育杂志》十四卷二号);《低能儿之情意作用》(杨祥麟,《教育杂志》八卷五号)。10. 研究儿童性教育,有1篇。还有其他儿童心理方面的研究3篇。《各国实验教育之现状》(天民,《教育杂志》四卷十号)略述德、法、美、瑞士、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儿童研究发达状况等。

(二) 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

1. 关于儿童心理学的理论、发展趋势和研究方法方面的介绍

这方面的文章较多。杨同芳的《完形派儿童心理学发微》连载于《心理季刊》(二卷一、二期,1937年)。作者认为完形派所讨论的儿童心理学,处处应用“完形”的原则,认定儿童一切的学习,或最初所有的经验都含有心理完形的作用,并介绍当时完形派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情况,如关于儿童行为发展的研究,遗传和环境的解释,婴儿的意识经验和心理完形现象,感觉运动的学习,行为和发展的过程等等。该文侧重于行为和生长方面的叙

说，重点论及完形派对于儿童的感觉的见解；完形派论儿童心理发展的方向；完形派对于儿童学习问题的研究。赵演的《儿童心理学的趋势》（《教育杂志》二十七卷一号，1937 年），介绍在当时的 20 年前，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多注重从儿童的行为中寻求解释成人行为的普通原则。后来进行心理测验并对个别儿童加以更详细的研究，设立儿童指导诊疗所等。当时的趋势是儿童心理学完全成为一种实验研究，设有儿童发展研究机构，研究变态儿童和常态儿童。赵演还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近十年来初生儿之实验研究》，介绍国外心理学者的研究。如初生儿一月内所表现的种种反应，生前的行为学习，婴儿出生十天内的交替反应，3～9 个月婴儿的交替皮肤电流反射等。此外，还有赵演译《晚近儿童发展之进步》（《教育杂志》二十六卷四期，1936 年），祝雨人译《儿童心理学的目的和发展》（《教与学月刊》二卷九期，1937 年）以及陈汉标译《苏联李生子的研究》（《中华教育界》二十三卷十二期，1936 年）等。关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付继良著《儿童心理学方法引论》（《文化与教育旬刊》第 112 期，1936 年）。作者介绍儿童心理学方法有直接和间接之别，直接有（1）观察法：偶然观察传记、系统观察法；（2）实验法：精神分析法、案由法、直接测验。间接有（1）观察法：问卷法、统计法；（2）实验法——心理测验。儿童心理材料来源：（1）个别发展日志；（2）儿童作业；（3）儿童行为；（4）儿童谈话；（5）儿童生活实传及自叙传；（6）忆述他人之童年生活；（7）测量儿童成长中遗传的、环境的及文化的背景；（8）儿童文学及童话。还有专门介绍研究儿童心理学方法：观察法、实验法和间接法的译文 3 篇。

2. 关于儿童心理发展及其特点的研究

包括知觉发展、想像、语言、思维、兴趣、行为等方面的文章，主要有肖孝嵘著《儿童知觉发展的几种实验研究》（《教育杂

志》二十六卷一期，1936年）报告了对儿童数目知觉、空间知觉和时间知觉进行了实验研究的情况。胡叔异著《儿童想像的表现》（《中华教育界》二十三卷七期，1936年）从儿童的故事、游戏和睡梦中看出他们富有想像，提出应重视儿童的想像。郭心晖《儿童语言之研究》（《中国心理学报》一卷四期，1937年），利用前人（皮阿瑞、麦卡瑟、费须儿）已收成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儿童语言进行初步探讨，侧重在：(1) 语句的长短——量的分析；(2) 儿童语言的功用；(3) 儿童语句结构的分析；(4) 儿童表现在语言中的思维等四个方面。被试为3～5岁儿童4名（男女各半），注重研究儿童自发语言。在语言思维方面还有关于儿童语法的改进和儿童思想训练的文章。罗子欣和王子璐《小学儿童兴趣的调查研究》（《教育杂志》二十六卷八号，1936年）报告了对1362名7～16岁儿童调查的结果：儿童最喜爱母亲、喜食鱼、喜玩皮球、最爱看红色、最爱听音乐、最喜欢做读书工作，尤其对于国语的一科；小猫、太阳也是乐意的东西。钟鲁斋和黄浩在同一刊物第十号也发表同样的调查文章，他们调查厦市452名高小学生，提出：(1)学科兴趣要适应社会需要；(2)利用环境发展儿童的兴趣；(3)利用教育习惯以助长儿童的兴趣；(4)学校训练应分别适应两性兴趣的差异。方东澄著《儿童行为之心理分析》（《文化与教育旬刊》第113期，1937）分析了儿童日常各种心理行为的原因，如注意力不集中在教室作业上；在教室内坐立不安、好乱动；上课迟到，作业完成迟于人，过分整洁；好自夸；孤独无伴；常幻想、不诚实、妄笑等。关于中国儿童心理与国外儿童心理比较的研究，在1933年《测验》（第三期）上刊有陆志韦的《调查中国儿童无限制联想的经过和结果》的报告。该调查使用一百个引词对六七岁到十七八岁的少年儿童进行个人测验并与成人及美国、日本少年儿童相比较。1936年肖孝嵘在《中华教育界》（二十三卷七期）发表《我国儿童的心

理》。作者用画人测验、形式板、配偶测验、颤动测量器等研究我国儿童的智力、知觉、语言能力、情绪反应、人格倾向和暗示感受性等方面与美国儿童相比较，其测验结果均各有相同和差异之点。此外，还有费景瑚继陈鹤琴研究其男孩一鸣和葛承训研究其女孩惠明之后，研究自己的孩子写《均一六个月的身心发展》（《心理半年刊》一卷二期，1934 年）。倪亮著《儿童交替反射之构成及其在教育上之利用》（《中华教育界》二十三卷七期，1936 年）。作者根据巴甫洛夫等人的交替反射的形成，研究和发现提出在儿童教育上应注意的事项，如：慎用惩罚，次序正确则学习易而有效，由简单的辨异至精微的辨别，儿童作业不可太易，致妨碍独创的作用等等。

3. 关于特殊儿童的研究

在天才儿童方面，《心理季刊》上有李日仁著《如何发现和教育天才儿童》（创刊号，1936 年）和陈选善的《天才心理》（二卷一期，1937 年）。李文总结出天才儿童的特征为：把持力很强，富有求知心，联想敏捷，推理和理解力很强，专注力和想象力很强，富有批评的能力。提出教育原则为：练习的分量应当减少，教师的解释或说明应减少，当注意儿童的判断的错误，当应用儿童已有的经验解决新的问题；尽量发展儿童的求知心，应供给儿童估计其自己与他人工作价值的机会；工作的分量宜加强。陈文提及天才儿童的家庭好、男多于女、身体健强、发育早、品行好、学业成绩好、教育很重要。在低能儿童或问题儿童方面，《心理半年刊》上有关于异常儿童的调查（曹伤千，一卷二期，1934 年），研究抑郁儿童的个案（钱苹，二卷二期，1935），谈智力不足的文章（郑丕留，二卷二期，1935 年）。另有译文《上级低能儿童的机械能力》（宗亮东译，三卷一期，1936 年）介绍国外用比纳智慧量表和明内所达的机械集合测验对一百个上级低能儿童的测验。《测验》上刊有王书林《心理上缺陷的儿童》（二卷四期，1936 年）。《心理季刊》上有钱杯

刚的《补救低能儿童的方法及其可能限度》(第二期,1936 年),何清儒的《儿童指导诊疗所》(二卷一期,1937 年)。钱文提出教育补救方法:分班教学(迟钝组、捷进组)或设助进组,在学校设立特殊班级。当时我国设立低能学校的江苏省的南京中学实验小学,在同级中实施分团教学。训练低能儿童的方法,多注重劳作工艺。文中也论及有许多心理病理学家分低能为"克汀病"、"蒙古痴"等数类,并发觉有种低能由于内分泌腺不能尽其功能所致,主张用腺疗术的方法补救,但根据生理心理及脑神经解剖学研究认为智慧高下与大脑皱纹所含的面积的关系是主要的,而和内分泌的关系是次要的。何文介绍儿童指导诊疗所是指导问题儿童生活的机关,文中叙述了诊疗所的起源及当时美国设立的情况及其趋向,并提及我国在上海大夏大学会创设的心理诊察所(1935 年 9 月成立)附设问题儿童诊察研究工作,这是我国首创的问题儿童诊察所。

4. 关于儿童心理卫生方面的研究

主要有谢循初著《儿童心理及心理卫生纲要》(《儿童教育》七卷八期,1937 年),主要内容为:(1)现代儿童心理学之中心问题及心理卫生之重要;(2)情绪之发展,包括情绪之原形、决定情绪发展之因素、情绪之变态发展;(3)思想之发展、意义及与成人思想之不同,发展进程和思想之变态发展。肖孝嵘著《家庭教育的心理基础》(《教育杂志》二十六卷十六号,1936 年),作者认为家庭教育的任务在于培植儿童的健全品格倾向并矫正品格上的缺陷和病态。《心理半年刊》上还有张义尧的译文《儿童心理健康》(二卷一期,1935 年),介绍心理健康的基础应很早建立在婴儿期,儿童初生 6 个月最为重要,并认为习惯是获得健康、快乐和效率的工具。此外,《心理附刊》刊有《儿童不良习惯》(丁祖荫,第十二期,1935 年)等译文。

5. 关于儿童游戏和戏剧方面的研究

高荣滋取材于国外著作所写《儿童游戏的意义和种类上的区

别》（《心理季刊》创刊号，1936年），阐述游戏是儿童特有的活动，是一种练习，具有预备或补充的意义；在种类上，分知觉上的游戏、动作上的游戏、模仿上的游戏、智能上的游戏、社交性的游戏和教育上的游戏等，可发展儿童的各种官能和动作。徐公美参据日本《儿童戏剧集》写成《儿童戏剧上之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心理季刊》二卷一期，1937年），论述儿童戏剧的本质目的及其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置了"儿童戏剧"课程；1936年底上海发启"我们的儿童剧社"组织起"模范儿童剧社"，认为儿童戏剧是创造新儿童的新工具，是教育儿童的强有力的武器。

6. 其他方面的研究

有阮镜清著《原始人与儿童之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中华教育界》二十四卷十一期，1937年），作者说明原始人与儿童的心理有某种程度的不同。金城有《狗心理和儿童心理》（《青年界》九卷一期，1936年）的文章。

（三）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

黄翼在《教育心理研究》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1944年10月）发表《儿童"现象的因果思想"之选择条件》一文。作者首先介绍披亚热（Piaget，现译皮亚杰）对于儿童因果观念的发展研究及其提出的"现象的因果观"。皮氏认为儿童的"现象的解释""随意造成联络"，"任何事务可以产生任何结果"。作者颇感怀疑，并认为儿童提出这种说法时，似乎不像皮氏所说完全任意组合因果，其中颇有选择作用。故作者进行两个实验：（1）试探实验；（2）"相似"因素之控制试验。其结论为：在某种情形下，儿童可以将与某一现象接连发生而实际上没有关系的事实认为现象的原因，但儿童对各种接连的事实，并不一般看待，随意组成因果，而是有所选择"相似"的因素是支配选择的重要因素

之一。

曾钟芬在《教育心理研究》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5年6月）发表《英国儿童的图画能力》。该文是作者趁在英国之便，根据美古德伊诺夫编选的图画量表对英国儿童所作测试结果。古氏图画量表用以测验4～10岁之儿童，探索幼年儿童图画能力与智力发展的关系。作者把实验结果与古氏所得结果进行了比较。还有一篇是张德琇对《儿童绘画心理之研究》(第一卷第二期，1940年6月）一书的评介。该书原著者 Helgs Eng，由龚启昌译，1928年2月出版。该书是著者对其侄女马格莱德自画第一笔直到7～8岁时画较为复杂的作品之过程的绘画心理研究。

钱苹在《教育心理研究》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5年6月）发表《儿童的基本需要》一文。作者认为安全与发展是儿童的基本需要。儿童能得到父母合理的爱护和深切的了解必能有愉快而安全的感觉。所谓发展的需求，即希望自己的壮健与独立，并能获得新经验以及自我表达的机会。作者还论述了如何供给儿童各种适当的机会，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

杨海振在《教育心理研究》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5年6月）发表《儿童做梦的研究》。作者收集和分析了222个儿童（6～13岁）的332个梦，把全部梦内事实分析为被打死、惊骇怪事、鬼、野兽、蛇、警报、敌人、战斗、家畜、平淡怪事、服装、事物、生人、亲友、兄弟、读书、玩耍、父母、吃、婴儿、花卉、顶高兴、其他共22项。作者认为梦内事实与儿童醒时生活并无不同，以玩为主要活动，可说梦为日常生活的表现或反映，还认为有些梦可用满足欲望说来解释。如梦见玩得快活，有好东西吃。男儿童多梦见野兽、敌人、战斗；女儿童则多梦见服装、婴儿、花卉。男女儿童梦见母亲比父亲多。乡村儿童多梦见家畜、野兽；城市儿童多梦见警报。有些梦的内容可看出家庭贫富情况，梦中思

想推理与醒时同。梦中事物绝少能真实应验。

此外，还有方东澄之译文《年幼儿童对代名词之引用——儿童自觉意识发展的试探》(《教育心理研究》创刊号，1940年3月)。

五、教育心理[①]

(一) 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

《心理》杂志中有关教育心理文章有艾伟《中学数学的心理》(1923年，二卷三号)。此研究为寻觅数学与其他科学之相关。作者论述了数的起源、数的界说、数之意义和数的抽象作用，认为代数的心理，须有高等抽象、对公式归纳力、释题与组织等式之能力；几何的心理须有空间知觉、经验等。另有赵乃传《学习之移转》(1924年，三卷一号)。作者认为习练的移转问题在教育上很重要，是学校科目设立的依据。文中论及该问题的研究沿革并介绍各科目习练之移转及实验室习练之移转的各种实验结果。还有姚仁寿的《性与习的调查》(1922年，一卷三号)。作者以调查表了解父母结婚后，受胎后、3岁后的状况与其他关系人的状况，研究性与习的形成。

《心理》还介绍了其他杂志发表的教育心理文章。(1)有关教育心理学和师范心理学教授等方面，有舒新城《教育心理学述要》(《中华教育界》十卷二三期)，黄公觉《教育心理要领》(《教育丛刊》四卷四集)，慈心《教育心理学之最近倾向》(《教育杂志》十三卷三号)。后者详述美国最新各种教育心理实验法。邰爽秋《新教育三大要素》(《中华教育界》十卷四期)，说明本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55、71～73、90～91、92～95页。

能、习惯和环境为教育三大要素。罗廷光《师范学校心理学教授的我见》(《中华教育》二卷三期),论及师范学校心理学教授的概况,目的与范围,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等意见。此外,还有教育上注意、兴味的研究,本能的教育、想象与教学、辅助记忆与联想方法等文。(2)有关学习心理、学科心理、教授法方面,有天民《学习之心理》(《教育杂志》八卷五、六、七号),上篇讲学习之意义;中篇讲学习之根本法则;下篇讲学习的顺应种类。李儒勉《外国语学习与教育心理》(《中华教育界》十六卷六期),主要讲利用桑达克的五大定律和利用习惯律。还有《适应季节之教授法》(巽吾,《教育杂志》五卷十二号)按儿童四季心理之变迁,施不同之教授法。《读法的心理》(杜佐周,《教育杂志》十七卷十二号,十八卷二号),讲读法心理的重要,读法的种类;朗读与静读之效率;读法的四要素:A. 速率,B. 理解,C. 组织,D. 记忆;读时眼动之情形等。(3)有关差异心理方面,有甘豫源《中学生之个别差异与教育》,作者论述个别差异的原因及分配;年龄差异;体格差异;青年期发育的差异;智力差异;学力差异;男女差异;志愿差异等。蔡文森《小学校男女儿童心身之差别》(《教育杂志》二卷十二号),包括身体高度、重量、胸围、头围、筋肉、呼吸器、脉搏上之差别;感觉、观念、记忆、想像、概念、思虑、情绪、情操、意志、注意、愿望、行为、兴味上差别。《中国儿童体格与智力之研究》(《新教育》一卷二号),此篇系译自美国《学校与社会》杂志,作者派尔将中国儿童体格与美国同龄儿童比较并对中美男女智力比较试验,结果认为中国人若与美国人得同等之教育培养,必不下于美国人。此外,关于男女差别研究的文章较多,如女子心理之研究,男女精神上特征的比较,妇女的职业倾向等,文中均有两性智力是否有差异的内容。(4)有关习惯、嗜好的培养,学习迁移与训练等方面,有《改良儿童习惯之原则》

（宗良，《妇女杂志》四卷七号），《嗜好与教育》（唐毅，《中华教育界》十四卷五期》，主要论述好习惯之养成，坏嗜好之限制方法等。还有《学力迁移问题》（罗廷光，《教育汇刊》第三集）和《精神训练与教学》（程宗潮，《教育汇刊》第三集）等文。（5）其他有关教育心理问题，如注重天才教育、异常儿童教育、德育教育、赏罚问题以及欣赏在教育上之重要等文。

（二）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

1. 概论

1934年艾伟在《心理半年刊》发表《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一卷二期），该文为作者编著中之教育心理学第一章。主要是对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解释，心理学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当时为提倡教育心理学的应用研究，艾伟在同年同刊（二卷一期）应用心理专号上发表《心理学在学科教学上之应用》，文中论述要点为：（1）心理学为教员之最初应用；（2）教育心理学之内容；（3）学科心理与教学法；（4）汉字学习之主要原则；（5）各级识字数量之增加；（6）中学生之阅读能力；（7）教学法之比较研究；（8）中学生之英语能力；（9）中美英语阅读能力之比较；（10）数字观念的发展；（11）代数观念的养成；（12）几何的学习心理。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心理学对教育实际上应用于学科教育方面的文章，引起心理学应用研究的重视。1935～1936年在《心理附刊》刊有邓德萍、王书林译校《教育心理之科学》（第二十、二十一期），介绍教育心理学之历史，叙述了科学方法与教育心理学、心理学之范围与方法、教育心理学之派别、教育心理学之贡献等。

2. 关于学习心理方面

主要有曹日昌著《桑代克学习心理的分析研究》（《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一期，1936年）。这是一篇对桑代克学习心理学说的批评研究文章。该文内容包括：（1）导言——桑氏学习心理学说；

（2）桑氏对于学习心理的研究概要；（3）桑氏学习心理研究中所根据的特殊事物；（4）桑氏学习心理研究简评；（5）结论——学习心理研究今后应走的方向。作者从分析桑代克学说所根据的实验内容进行批判，认为桑代克的学习心理理论是由其实验方法和内容所决定的；桑代克研究学习心理是抱固定态度，由少数人对于一两件事物的学习推论到一切人的一切学习，其理论基础是不稳固的，桑代克没有弄清楚学习能力是普通的还是特殊的问题。桑代克学习心理研究的材料，大半为日常生活中和教育上不常见的，所以从整体而论，是理论探讨而不是应用研究。作者认为学习心理的研究方向是学习心理理论研究应和应用研究分开；前者要严格地持相对态度，在实验室内作深入的研究；后者要在实际应用的场合，作广阔的研究。作者还强调“应用学习心理的研究要尽量地切合实际的情形与应用的目标，学习心理的应用大部分在教育方面，所以应用学习心理的研究也就要与教育打成一片”；“要把实验研究和实际应用打成一片”。这种看法是科学的。朱秉衡的《波特对于各派学习心理之综论》（《教与学》二卷六期，1936 年）介绍并分析了波特(B. H. Bode)所著《教育心理辩歧》一书。该书依据史的发展程序，论述几派影响教育最大的学习理论。徐儒著《学习上的交替反应说》（《中华教育界》二十卷十二期，1936 年），详述了巴甫洛夫的交替反应说对于学习的解释。还有樊际昌对《格诗礼：学习心理学》一书的评论文章（《中国心理学报》一卷二期，1936 年）。评者认为格诗礼提出交替反应的法则，不是一个万能的工具，它的功用是有限的。有关学习心理的实验研究方面，1934 年肖孝嵘发表《组合与区别二种方法对于学习之影响》（《心理半年刊》一卷二期），此实验根据“联络说”设计两种字偶单的排列形式，一为组合排列，一为区别排列。作者认为实验具有实用价值，德法文中冠词之学习，一物数名之学习、一种刺激情境须有数种动

作反应之学习皆与该研究之结果有密切之关系。1936年作者又发表《知动学习问题的实验研究》(《教育杂志》二十六卷九号),所得结果主要有成人和儿童动作的困难性系直接为知觉的复杂性所支配。此外，还有王凤岗著《学习的行为》(《哲学与教育》五卷一期,1936年),作者分述了学习的性质、学习曲线、经济学习法、疲劳及迁移等现象。有关学习心理的译文也有多篇，如有《心理半年刊》上载有路君约译《学习历程的分析》(四卷一期)，孙邦正译述《训练转移问题的检讨》(三卷一期) 等。

3. 关于汉字心理方面

1937年沈有乾和陆志韦有《汉字的将来》(《教育杂志》二十七卷五号) 与《中国字和中国教育》(《教育学报》二期) 等文，论述汉字问题。他们认为汉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不会突然被废弃，汉字过去已有很多显著的变迁，将来还要经过很多显著的变迁。希望用汉字教人看报、写信，提高一般文化水平。沈有乾概括出由于中国现代文字与外国文字的接触和普及教育的愿望起了突变的革命，而发生了三种文字运动：(1) 标音符号运动；(2) 简体字运动；(3) 基本字运动。他认为这三种运动利害不同，方法不同，目标也不同，是各不相干的独立运动。他提出将三种方法的优点结合起来产生第四种运动——淘汰同音字。陆志韦总结过去汉字教育的失败是基于课本的字不好、材料不好、文法不好和教育法不好而造成的教育障碍。如何对汉字进行改革问题，有艾伟著《从汉字心理研究上讨论简体字》(《教与学》一卷十二期，1936年)。作者引用汉字学习心理研究上所得的结果，并引用小学生写错字笔画的统计，说明简体字是改革汉字的最低限度，并提数条汉字改简法。也有对汉字简化持反对意见者，如周学章、李爱德著《繁体字体在学习效率上之再试》(《教育杂志》二十七卷五号，1937年)，作者对136个小学一年级学生和不识字的青年成

人试验了繁体字在认识上、较久记忆上和默写正确度上的效率，结果证明繁体字均占优势。所以作者主张文字改革改为简体的运动实属“多事徒费时间精力”。艾伟早在1934年《心理教育实验专篇》发表《汉字测量》（一卷二期），这是作者对汉字心理多年的研究结果。1936年在《心理半年刊》上，艾伟发表《国语科的学习心理》（三卷一期），这是他所著师范学校教科书《教育心理学》的一章，分述学习汉字时“形”、“声”、“义”三部分的连环关系，对儿童形错字、音错字、意错字的分析，教汉字时“释形”“同音”两法的比较，识字教学原则，常用字问题等。1934年周先庚在《测验》上还发表过《美国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二卷一期），是作者对美国大学生判断正置、倒置、右卧或左卧的汉字测验。为进一步分析是否汉字本身的特点可决定判断准确的程度，提出汉字判断的准确百分数高者可用各字本身的“格式道”特性来解释，如对称、组织、平衡、稳定性等特性。作者在文中对汉字心理研究的历史有一简单介绍和评价，曾提及蔡乐生所作《汉字的复杂与学习的难易》一文。1935年《测验》（二卷二期）上则有蔡乐生《为“汉字心理研究”答周先庚先生》一文。蔡认为周在未批评前最好先把事实弄清。

4. 关于学科心理方面

主要有英文、语言、算术（心算、笔算和珠算）等学科的研究。1935年艾伟在《心理半年刊》（二卷二期）发表《三年来中大一年级英语成绩之比较研究》。作者自1932年春开始举行大学一年级英语测验，三年足迹遍全国，据此结果求一般常模，而稍知大一英语程度。作者每年施行测验一次，积有三年成绩，测验分理解与速率二种。同年，艾伟在《心理教育实验专篇》（二卷一期）发表《中学文白测验结果之比较研究》。作者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工作，对初中文言文和语体文教学问题提出意见。1937年

艾伟与郭祖超在《心理半年刊》(四卷一期)发表《小学毕业生语体文成绩之研究》。主要结果是男女生阅读速率以男生为稍优，就理解成绩百分数而言，男女生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此外，孙衍发表过《从心理学来检讨小学读经》一文，认为儿童对于经书的学习是变态的，是痛苦的，不能达到成功的满足，必会使其心理状态失常，如因学习失败而逃避、发生口吃、自卑心理、情绪堵塞、虚伪的记忆等病象。有人认为读经可以陶铸人格一说是有错的，有不良的反效果产生。1933年《测验》(第四期)上有曹仞千、沈冠群所作《书法进步与练习时间关系》以及有关阅读研究方面的文章。在算术方面，周学章著《珠算与笔算在学习效率上之比较》(《教育学报》第二期，1936年)，实验结果是珠算占优势；因笔算包括计算能力和书写能力，笔算的数字对于小的儿童似太抽象，笔算须先用心算。曹日昌著《十二小时继续心算工作之工作效率的实验研究》(《教育改造》一卷二期，1937年)，其实验结果是：继续十二小时的心算工作的后期，工作效率并不减低，十二小时内从事心算工作的工作效率时有升降；据被试内省报告，心算除法比心算乘法运算历程较多，计算较难，工作时需较大努力；练习心算乘法对心算除法有迁移作用；练习心算除法每日练习一小时或稍多，19周后即接近学习限度。另有赵轶尘作《算术科中的训练转移问题》(《教育杂志》二十六卷二期，1936年)，王书林译《小学学科心理》(一卷十期、十二期，1936年)。后者分述语言、读法、书法、拼字、算术、社会学科、自然研究和初等科学、卫生教育、音乐、图画和艺术的学科心理。

5. 关于教师心理方面

有陈剑修所著《教师的人生哲学》(《播音教育月刊》一卷六期，1937年)，从心理方面说明，教师应有儿童性的积极乐观，彻底了解“动”的意义，训练自己的情感，同时有科学的和艺术的

修养等。王鸿益的《小学教师和儿童心理》(《心理半年刊》四卷一期，1937年)，认为身为教师者对儿童的任何行为，均应加以心理的研究，才能决定教育的方法。欧阳湘著《教师情绪的培养》(《教育学报》二期，1937年)叙述教师情绪培养的重要，提出的培养方法有：对教师作积极的辅导；给教师调剂生活的机会；鼓励教师善用假日等。还有李荷珍的译文《对于一群女教师适应困难的一个研究》(《心理季刊》第四期，1936年)。

6. 关于个性、气质等方面

有艾伟在《播音教育月刊》(创刊号，1936年)所著《个性差别与求学方法》和在《教与学》(二卷十四期，1937年)发表的《个性与志愿》一文。作者认为个性从狭义讲是指身体方面遗传的差异，从广义说是指各种粹质(Traits)发展上的差异，是遗传与环境两方面势力促成的。志愿是个人因环境训练而表现的决定，它不是天赋的，是由于教育的力量、社会的要求而产生，有时可以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则可增减迁移。作者认为个性虽由于天赋但环境能决定其发展，并强调教育方法的作用。作者认为智愚不同的儿童学习不能用同一种方法，普通的学生需要优良教师指导。钱苹在1935年《心理半年刊》(二卷二期)上发表的《内外倾之品质与智力及学习成绩之关系》，是对9～14岁的学生64人用马士通的内外倾定量表探求其内外倾之品质与个人智力及学业成绩所具有之关系。吕明甫在1936年《文化与教育》(第八十六期)上发表《人之气质及其与教育的关系》，作者认为气质可称做“人格的模式”，和智愚、身体特性的相关都极低，但和教育关系极大。要使教育发生更大的效力，非适应被教者的气质不可。此外，还有关于《品行测量》(金谢荣，《教育改造》一卷三期，1937年)以及王书林译《品格之心理》(《心理附刊》第二十二期，1936年)等文。

(三) 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

1. 关于心理学与教育及教育心理学

在《教育心理研究》的创刊号（1940年）上发表了肖孝嵘、潘菽和张德琇的论著。肖文题为《心理学的意义及其应用》。作者论述了心理学在教育上之应用，因材施教，学习者在各方面的能力必须应用心理学的方法予以确定，而且教学方法亦须根据心理学的原则才能产生充分效果，其他如课程、课外活动，皆须取决于心理学。潘文《心理学与教育》主要论述心理学与教育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教育的一种主要的科学基础就是心理学，教育是培养人的，而心理学则是研究人的基本科学，教育有待于心理学的指导，心理学也有待于教育所得的经验的帮助。他认为心理学能贡献于教育的有：(1) 心理学和教育理论：教育在理论上的许多问题是有关心理学的，教育功用是帮助人的发展，这就需了解人发生发展的步骤，条件怎样才能健全发展。凡这类问题全部或大部是心理学问题，心理学在此类问题的进步也促进教育上的进步。(2) 心理学和教学方法：教学帮助儿童学习，有学习条件、个别差异问题，教学效果，教师改进方法等。(3) 心理学和训育问题：关于课程外的活动的教育问题应是训育问题，消极性的是保持校内秩序，积极性的是社会习惯的养成，如对情绪习惯、娱乐习惯的指导以及不良习惯的改正等。(4) 心理学和教育行政：教育行政的管理，教育视察，教师训练，进修等。最后潘文论述了教育心理学的任务，他认为教育心理学是一种应用心理学，其任务是在于研究教育上种种心理学方面的特殊的实践问题和方法。张文题为《教育心理研究的贡献》，重点论述教育上的问题与心理学的应用，首先论及教学问题，包括教学应注意开始的正确，错误发生不易改正；学习的情境与应用的情境须相接近；学习材料的处理，部分法和全体法；学习时间的支配；学习迁移问题以及个性与群性的调和问题等。其次论及训育问题，包括模仿、暗示；积

极刺激代替消极刺激，注重正面教育，启发代替强迫；对补偿、躲避、幻梦、托辞的心理作用的分析。再次论及教育行政问题，人事管理等。最后论述了科学教育问题。艾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为《教育心理学问题》(《教育心理研究》第一卷第二期，1940年)，以通俗举例的方式叙述教育心理学的贡献。他认为心理学是一种生物科学，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非从片面经验而来，如用大规模的测验和统计以察知一般的或平均趋势及个人间的差异。为了探讨学习历程或特性和儿童动作或语言的发展，从事个案或举隅的研究或观察，把这些结果仔细记录以便比较出儿童有智愚，学习有迟速，而智愚之间可找出数量上极其精确可靠的差异，或迟速之间可查出其发展趋势或诊断其毛病所在，这就是教育心理的贡献。另一篇是《心理学与教育》(《教育心理研究》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1943年)，介绍国外有关书籍的情况。他说"现代之教育要更多依据于心理学说，读各教育心理学专书即可知其梗概"。他"爰检书箧，选九种，简述于后作为鸟瞰"。介绍的专著有(译名均按原始文献译法)：

崔佛 (James Drever) 著：《教育的心理》(1925年)；

瓦德(James Ward)著：《心理学在教育上之应用》(1926年)；

吴国敦 (R. M. Ogden) 著：《心理学与教育》(1926年)；

法克斯 (Charles Fox) 著：《教育心理学，其问题与方法》(1925年初版，1928年再版)；

楚克拉 (Willian Clark Trow) 著：《教育心理学》(1931年)；

蒲勒色 (S. L. Pressey) 著：《心理学与教育》(1933年)；

章登 (A. M. Jordan) 著：《教育心理学》(1928年初版，1934年再版)；

费勒其(John Miadison Fletcher)著：《教育心理学》(1934年)；

散地放（Peter Sandiford）著：《教育心理学基础》（1938年）。

这使大家了解到20年代和30年代国外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情况。

2. 关于学习、生活和训练问题

吴绍熙在《教育心理研究》第一卷第三期（1941年3月）上发表《论学习与成熟》一文，认为用学习与成熟解释行为的发生，虽比本能的概念较为进步，但仍有缺点，总括为：（1）学习之广义的意义不当，不能认为所有行为的改变都叫学习；（2）用广义的学习意义常生出笼统的毛病，把各种行为都附到学习上去，而对行为的发生不能得到真正的了解；（3）学习和成熟虽可解释一些行为的发生，但不是对所有行为都须用这种观念来解释；（4）用学习与成熟解释一种行为的发生有不知道这种行为的形成究竟何者由于成熟何者由于学习的基本困难。

潘菽在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5年6月）发表《生成的行为》，提出一个叙述动物行为的概念——“生成的行为”。过去的心理学者把动物和人的行为分为两种，一是经过学习而获得的叫习惯，二是无须经过学习就能有的叫本能。因本能概念被滥用，用本能解释一切，使心理学变成概念化的思辨而不是科学的分析研究，又因本能概念本身的毛病，曾发生反本能运动。所以作者企图把“习惯”和“本能”统一起来，不否定其存在与差别而提出“生成的行为”。作者认为动物的一切因机体的生长而形成的行为可叫“生成的行为”，动物的行为除学习过程而获得以外，就是由生长过程而形成的行为。他把这种生成的行为分为三类：A. 胚胎运动；B. 初生后的行为；C. 出现较迟而较复杂的生成行为。作者还论述了生成的行为概念与本能概念在本质上的不同。作者在第一卷第四期（1942年6月）上又发表《形式训练问题的重行考虑》，探讨形式训练这一教育理论问题。其内容要点为：（1）认为

旧时教育上的形式训练主义注重教育的整体性、一贯性和主发性是含有一部分真理的，值得重视，急图弥补现在教育上的支离破碎的现象。(2) 阐明训练的需要并未被反对形式训练主义的科学教育运动者抹杀，其主张为革新学校课程内容，去其形式主义。(3) 心理学关于学习转移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否定教育的训练价值，而证明其所应具备的具体条件，并为形式训练主义所主张的训练说明其科学意义，去掉其不科学 的官能心理学的假定。(4) 整个教育应是一学习转移过程，应把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打成一片成为一个连续发展过程，前者为后者的基础，这才有教育意义。(5) 教育所应注重训练的是应付各种特殊的生活情境所必须的特殊能力，或者说教育要养成有助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调整人生发展的各种基本习惯，只有特殊的习惯或能力才能成为训练的对象，但基本习惯也可有程度差别，愈是基本习惯，愈需要训练去养成。(6) 要得到训练效果或学习转移效果还须把学习中的共同成分特别提出来予以特殊的注意。(7) 思想能力的训练是最需要的一种基本训练，任何科目都可训练思想，可用学生的专门学习科目作材料。(8) 正确的教育应发扬形式训练主义的真理部分而抛弃其错误的糟粕。

3. 关于学习心理和学科心理的研究

肖孝嵘在《教育心理研究》第一卷第二期(1940 年 6 月)上发表《关于全体法与部分法的比较之一个实验研究》。作者首先介绍 Woodworth 和 Pechstein 所说全体法与部分法的优劣点，并阐述研究二法时应注意之条件为：(1)学习者的年龄、习惯、教育程度与记忆能力等；(2)材料之种类、组织、长短与难易等；(3)练习多少和分配情况；(4)学习时间；(5)测验学习与保留的方法。二法的实验结果是个别差异极为显著，应用部分法，个别差异较大，就两种方法之均数看，全体法的优势经过时间愈久愈见显著。

龚启昌在第一卷第三期（1941年3月）发表《中学生的错字研究》；在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5年6月）发表《书法心理研究概要》。前一篇作者以作文调查和默写测验求得重见次数较多的错字，考察其原因，作为矫正根据，探究错字发生与初高中年级的关系和小学生错字比较，从分析研究结果，阐述发生错字原因与矫正方法。后一篇作者首先叙述了书法的因素，认为书法是一种知动的学习，此种学习活动的主要现象为动作受知觉控制，思想和感情占小部分。其所包含问题复杂，如动作学习与知觉学习是否分开，支配知动学习的条件——情境的可识性与反应之可得性等。其次，介绍书法练习的各种实验研究：(1) 临写与描写之比较；(2) 说明笔顺与不说明笔顺之比较；(3) 小中大楷练习之比较；(4) 练习时间之分配与长短问题等。再次，介绍书法成绩评估之研究，谈到桑代克的书法量表。我国俞子夷于1918年仿桑代克的方法所编正书中字、正书小字和行书小字书法量表。最后提出书法教学原则：须指导学生依从最便利之笔顺次序写，一般学生以小中楷同时练习为宜，练习时间每日定时练15～20分钟为宜，对于成绩评定应采用客观方法，如应用量表更好，可使学习者知自己进步情形，增加练习兴趣。

汝若愈和闵灿西在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1943年10月）上发表《国语朗读与默读之比较研究》，卢浚在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1944年10月）发表《国语默读练习进步之实验研究（纲要）》。前一文的研究结论，认为默读速率大于朗读，在中国儿童的阅读中，大体尚能符合事实，惟各年级间差异很大，三、四年级判别不甚明显，自五年级以上开始表现进步之趋势。理解方面，至六下默读方行转优。至于朗读情形，也不够完善，尚须改革。作者认为默读是一种经济的学习方法，在实用上有其特殊的价值，建议提倡默读教学。关于朗读，作者认为循声齐读应废止。建议小

学教学采用说话式，讲演文应用演讲的声调读，故事文应用说故事的口气读，报告文应用报告方式读，使其与实际生活接近。后一篇分两部分：一为国语默读理解实验；一为国语默读速度实验，又各分控制组和练习组进行，被试为小学四、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学生，阅读白话文一篇。主要结论是国语默读能力在理解和速度两方面均可因练习而得到明显进步，以女生占优势。原来国语默读能力高的学生经过练习后所获得的默读理解进步分数不及原来能力低的学生；聪明学生理解得多，经有意练习后进步也较多，国语默读速率提高也很显著。理解和速率间有显著正相关，二者在练习后的进步也如此，国语默读能力的进步，低年级较高年级明显，建议国语教学上应及早促使学生注意阅读速率和了解读物的内容。

林风藻在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1944 年 10 月）发表《英文生字练习之实验研究》。作者以直接法（教时不用中文解释而示实物或图片）和翻译法（教时用中文解释）令儿童学习英文生字进行实验比较，结论是直接法较为有效。儿童初学英文生字时，往往注意字义而忽视拼写。影响生字拼写难易程度的因素，不仅是生字的长短，其他如字母的排列、组织、发音以及儿童的兴趣注意的程度等均为重要因素。

艾伟在创刊号（1940 年 3 月）上发表《文白衔接问题研究第一篇，儿童阅读兴趣之研究》。作者初时主张文白教学应有相当比率，后来改变意见，以为从初一起，应即全授文言，不宜再授语体。而衔接问题有待研究。此文作者对高小各级文言教学尝试之理由有所阐述，并进行实验，结论认为兴趣之浓淡视读物之特质而定。读物的重要特质分为惊异、生动、动物叙述、谈话式、幽默、情节、男性、女性、儿童、成人、静的叙述、知识灌输、道德暗示等 13 项，前 9 项为儿童感兴趣者。课本中属不感兴趣之读

物特别多。小学各级儿童对于兴趣之相关甚近。儿童对韵文不感特殊兴趣，韵文非读物中之特质。人之年龄愈长，对其家庭生活兴趣愈浓。读物深浅程度、优美程度及读物内容三者之间有相当关系。阅读兴趣与难度无甚相关。由于以文言教学只进行一学期，尚待继续研究。

艾伟在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5 年 6 月）发表《汉字心理实验中材料难易之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汉字心理的研究难于作纯粹心理的研究，因还须对文字、训诂、音韵以及诗法诸学略有门径，所应用的实验材料近二十年来计有白话、文言、律诗及无意义文字四种材料，引用是否得当常有争执。故作者对此作一比较研究，看其正确度和速率，并经统计处理，所得结论是白话最易，文言次之，无意义文字又次之，律诗最难。

此外，还有对新著的评价和译文，如陈水翱对《中等学校毕业生英语写作错误之分析》的评价。该文原系西北师院师范研究所中等学校英语教材及教法研究报告之一，以英语著成，著者金树荣、尹赞钧，该书 1939 年 8 月出版问世。陈永翱还译有《初级读法中字汇相对难度之研究》（创刊 1940 年 3 月）和节译《阅读时之眼球跳动习惯》（第一卷第二期，1940 年 6 月），在同一期上还有张德琇译文《中小学生读书习惯的研究》。

4. 关于教学、教法问题的研究

在《教育心理研究》上关于地理的教学教法方面，沙学俊在第一卷第二期（1940 年 6 月）发表《中学地理的教材教具与教法》和在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5 年 6 月）发表《摹想原则与地理教学》。作者在前一篇文中提出六条地理教学法：（1）提示基点；（2）读图观象；（3）把握重心；（4）比较异同；（5）指定练习；（6）放映照片。作者在后一篇文中提出地理教学应以摹想原则为中心，认为摹想及其内容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地理教学的

目的在于教儿童认识各个地理空间，使其能够观察空间，摹想空间及其内容。地理教学之初最基本的摹想建立于对外界（地理空间）的实地的直接观察，应从乡土地理开始，由实地观察所得的印象或原料加以补充整理与联系而成为完全的与有组织的认识，再教儿童从地图、照片、模型等进行间接观察，用语言文字去描写、叙述、说明、解释、联系、综合。

关于算术教学，曹飞在第一卷第二期（1940 年 6 月）发表《小学算术教学实际问题》，阐述了算术科成为主要科目的理由主要有：能发展固有智慧，能运用正确思想，能养成良好习惯，能应付实际生活，竟求富国强兵之道，为学科基础之基础。存在的实际问题有：学生对于理解题感觉困难，应如何设法使之了解？教科书例题少应如何设法调整？判算术成绩侧重答案或重历程？程度不齐智力不等儿童应如何补救？等等。

关于国文教学方面，左任侠在第二卷第一、二期（1943 年 10 月）上，发表《中学国文教学之管见》。作者认为国文之教学必须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交互为用，始称尽妙，并须注重选材、背诵、作文、阅读。所谓科学方法如识文字可究其形体，辨其音训。我国文字，起于象形，可归纳繁杂，入于简易。由楷隶上溯，还其本形。古重声训，重声叠韵等可以语言学之知识解之。所谓艺术方法，指对材料起共鸣，感人兴趣。传达教材之神理与情绪，还可借助音乐、图画等。还有程法泌在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1944 年 10 月）上表《读书教学中应如何指导儿童想像》。作者认为想像是文学创作和科学发明的根苗，是应设法培养，并且需要研究的问题，想像教学的目的是利用儿童的想像心理充分提供给想像资料，指导他们欣赏，满足他们心理的要求，开展他们正当的思路，以免流于妄想等弊病。作者叙述了想像教学的时间、范围、原则和方法。

关于心理学课程及其他有关课程的教学问题有孙邦正《师范学校教育课程问题的商榷》（创刊号，1940年3月），郭祖超《教育测验及统计在师范学校课程内的重要及教法研究》(第一卷第二期，1941年3月)，雷肇唐《大学初级心理学课程教学之管见》(第一卷第三期，1941年3月)。雷文对初级心理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大学课程中的地位，教学方法、教材问题，教材的分配、取舍问题及怎样增进教学效率，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此外，在《教育心理研究》的"教学问答"栏目(创刊号，1940年3月)中有艾伟答国文教学学不学文法问题；潘菽答如何教教育心理学问题。还有赵廷为在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发表《对于流行的中学教法的估评(一)(二)》。作者认为讲演法应有限制地应用，中学教师如对讲演法的缺点和效用有所认识，并努力改进自己的讲演技术，则讲演法是一种适用的重要教法；回讲式教学法，应将回讲的方式变为讨论或经验交流的方式，才适合最新教学的趋势。

5. 关于学习心理实验班教学的报告

1940年2月由艾伟主办学习心理实验班，以此班为实验室，进行新问题方法的教学尝试。在《教育心理研究》第一卷第四期(1942年6月)刊载该实验班的教学报告，艾伟在引言中叙述成立实验班的原由。早在1934年秋艾伟即在南京创办万青实验学校，自初一招生以后每年招一班，从事各科教学上的观察与实验，历时三年颇有收获。七七事变，中大西迁重庆，材料无法带出。为继续此项工作，艾伟于1939年8月在中大教育学院成立一完小，所用教学方法颇为家长称道，办半年后经济困难放弃。1940年2月设学习心理实验班，招初一或六年制中学一年级下学期之始业生以继续研究观察中学阶段各科学习之进展。

艾伟和孙邦正所写《国文教学报告》谈以先用实验心理学研究国文教学问题，在实验班的国文教学过程中又直接研究国文的

学习心理，还应用普通心理学原则以指导学习。报告首先介绍艾伟十余年来所作之研究，有初中学生作文研究、儿童阅读兴趣研究、篇幅长短与诵读速度、中学各级文白常模，以作借鉴。报告内容包括入学试验和学期测验，精读与略读，阅读兴趣问题，诵读速率问题，造句练习的研究。结果在教学过程中尚不能获一有系统的方法，在实验室中所未发现的还须根据普通心理学原则自行探讨和尝试。

陈永翱发表的《英语教学报告》谈到，作者在常态课室的情境下研究英语朗读问题，结果发现：(1) 一个人朗读速度与品质有密切关系，朗读的品质既优，自能增进速度，而速度不是朗读的一切；(2) 受试者 (4～5 人) 个别差异较大；(3) 材料长短，文体异同，对于朗读影响不大；(4) 成人朗读速度每秒 4 音节左右，初学英语一年者，最高 3.78 音节，一般 2 个音节左右；(5) 初学经若干次朗读，速度能有增加；(6) 朗读品质的决定，由教师主观评判，可用详密记录补其不足；(7) 学生朗读错误以改变母音、发音困难、字母混淆、漫不经心较为严重；(8) 错误纠正，实属困难；(9) 课室内作朗读速度及品质考察能刺激学生热情。

范冰心发表《数学教学报告》。作者对算术教学问题进行观察研究，对暑假前后代数成绩进行比较，对几何教学问题也进行了研究。由于人数过少，结果不足为一般之原则。

此外，张述祖在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1944 年 10 月) 发表《中学生课间自由活动的观察研究》。作者在该实验班的学生课间自由活动 (62 种) 时作观察研究，结果为：(1) 由课间自由活动上可诊察各个儿童的人格特点；(2) 就活动性质看，男生所爱好的活动较女生为生动剧烈；(3) 年小儿童较年大儿童所爱好的活动种类驳杂，内容亦较富动作性；(4) 男生较女生活动的种类多；(5) 活动种类略有随年龄而减少的趋势。

六、变态心理与心理卫生[①]

（一）20世纪20年代变态心理的研究

《心理》杂志中关于梦的研究：有张子和《梦的研究》（1922年，一卷二号），主要论述了“梦之诸家解释”。从古代灵魂解说至当时以生活说明（细胞堕性，脑神经反应，病之潜伏）和以心理说明（观念复记法和想象说）梦的原因。王惟英《释梦》（1923年，二卷四号）本于《列子》“昼想夜梦”和陈大齐《迷信与心理》二书解释梦的内容。他认为梦的内容不能超出个人经验范围之外。杜元载《梦》（1924年，三卷三号）对梦的意义、学说、原因，梦与经验，梦的先兆以及对梦的调查有较系统的论述。李蠡《梦为预兆说之驳辩》（1925年，三卷四号）认为“梦之构成，纯乎为过去经验之再现作用，决无关乎未来之事实”。他以“适逢其会，预期作用，占断诈伪”三项及他本人的经验分析驳辩预兆说。还有《心理》1926年四卷一号上谢循初和张耀翔介绍《佛洛特译梦》和《评 Coriat 释“317”“3990”梦》。

变态心理的一般介绍，有容肇祖《变态心理学的历史》（1922年，三卷一号），介绍“变态心理学发生的梗概，盖由魔道的概念以至生理学的概念，更进而为心理学的概念。由颠狂病的心理之研究，以推及于各种变态的心理之研究，又由变态的无意识进而发现常态行为中的无意识”。杜元载《变态心理学的内容》（1924年，三卷一号）介绍了各种变态心理内容的分类及变态心理的研究方法。

还有分两期连续刊载（1922年，一卷一号、二号）的《分析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58～59、76～78、87、97页。

心理学》，由余天休介绍佛洛特之学说及其批评。作者认为对其学说中由于幼年两性不调乃产生神经病引起批评，但无论其缺点如何，佛氏在医学及心理学史上应占一重要地位。

张耀翔的《癖》（1923年，二卷四号），认为癖是嗜好之变态，根据名人传记或列有癖者之传略，如刘伶好酒，陶渊明好菊，王羲之好鹅，叶子高好龙等等进行分析。

《心理》杂志，介绍其他杂志刊载的有关变态心理的文章中关于梦的问题多为译文介绍，如介绍柏格森精神能力说，佛洛特梦的形成以及梦的起因研究等。有关于睡眠问题的，如《睡眠之原理》（泽民，《东方》十七卷二十一号）关于美国盖次等人对睡眠原理的解释。宗良译《睡眠之新研究》介绍疲劳与睡眠，睡眠之长度、深度，鼾与梦等。有关于催眠问题的，如《催眠术概说》（仲衡，《东方》十五卷十一号）介绍催眠的原理与睡眠的分别，催眠术与医学之关系等。还有专门介绍《中国催眠术》（卢可封，《东方》十四卷二十三号）和《文学的催眠术》（罗罗，《东方》十七卷七号）。其他有关变态心理的文章，有倪文宙《异常心理述概》（《教育杂志》十三卷八号）和《变态心理之基本观》（《教育杂志》十卷五号）以及《口吃之矫正法》（西神，《妇女杂志》五卷一号）等。

（二）20世纪30年代变态心理的研究

1934年肖孝嵘在《心理半年刊》上发表《现代变态心理学说之分析及其批评》（一卷一期）和《神经病之诊断与治疗》（一卷二期）。前一篇作者介绍重要学说：（1）行为说；（2）复故说；（3）感觉说；（4）精神分析说；（5）生活力说；（6）个性心理说。并对各学说的缺点加以评论。后一篇，作者认为病之治疗视其诊断结果而定，若诊断之法不良则治疗亦难收效，二者关系至为密切，神经病诊断法包含的手续和治疗法均有详述。1936年肖孝嵘

等人发表《罪犯情绪态度和个性倾向的实验研究》（《心理半年刊》三卷二期）及肖孝嵘著《神经崩溃的预防和治疗》（《教育丛刊》三卷二期）。前一篇实验研究是作者修订美国人卜雷西编制的X—O测验，用来研究罪犯、神经病患者及异于常人者的情绪状态和研究一般人的感情状态、道德标准、情绪组织及两性或个性上的差异，并用内外倾品质量表研究罪犯的个性倾向。后一篇作者认为神经崩溃是指人的思想行为失其常态，大都因“自尊心”丧失产生神经崩溃现象，其症候表现，作者从患者的生理状况、心智和道德方面的状态进行了分析，提出预防和治疗的方法。

心理失常每引起变态的行为，神经衰弱及身体或情绪受剧烈的震撼都是产生心理失常的因素。《心理季刊》上刊有钱怀刚撰写的《心理失常的检举》（创刊号，1936年），刘南华撰写的《找寻心理冲突的出路》（第二期，1936年）。《心理半年刊》（三卷一期，1936年）有王书林译《心理失常的罪人》，原著者探求犯罪之原因时，发现在犯罪人方面有某种心理的变态、心理的失常或心理的缺陷。用统计证明心理失常和犯罪有很高的相关，并提出预防心理失常的重要。还有《心理附刊》（第十一、十二期，1935年）连载怡撰写的《人类将受心理失常的最大祸患》。作者把几个解释“心理失常”最著名学说如常奈、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作了简略介绍。

此外，还有关于“人来疯”和“梦”的形成问题，如黄翼在《“人来疯”》（《教与学》一卷十期，1936年）一文中叙述了儿童的这种心理现象，认为这是由于自觉和自炫矛盾冲突的结果，虽是极轻的性格变质，若应付不当，会有碍将来的健康，预防和对付的方法是不理会和不鼓励。朱汝霖在《心理季刊》（创刊号，1936年）发表《梦之话》，作者认为梦是暂时的心理变态现象。梦是由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刺激所促成，并就弗洛伊德对梦的心理分析、梦的预兆问题及梦的特点等有所论述。

此外，有《口吃如何矫正》（辛不同，二卷二期，1937年）、《精神病人的个案检查》（高健，《心理季刊》二期，1936年）等通俗性文章，以及吴福元在《心理半年刊》（一卷一期，1934年）发表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及其对于教育上的贡献》与同刊连载的译文《精神病理学之发展及其在医学上之位置》（一卷二期，二卷一期、二期，1934年～1935年）；还有贾玉润译之《在学校里工作的精神病学者》（《心理附刊》，第四十五期，1937年）等译文。

（三）20世纪30年代心理卫生研究

1. 关于心理卫生的意义、范围、应用、方法等

概述文章有梁甄第著《心理卫生之社会的发展》（《社会研究季刊》第二期，1936年）和陈孝祥著《心理卫生之应用》（《教育研究》六十九期，1936年）。梁文认为心理卫生是一门避免心理病态并保持心理健康的科学与技术，它和心理学、精神病学、优生学、社会学、法律与政治、道德与宗教以及教育学都有密切的关系。作者叙述心理卫生的发展经历了神学阶段、哲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并介绍了心理卫生的创始者C. M. Beers的历史，以及心理卫生在当时世界各国的进展状况。陈文主要论述心理卫生的应用，个人应用如父母、儿童、教师、雇主、雇工、医生、法官，大众、团体应用如家庭、学校、工厂、法庭、感化院、医院、人民与国家。作者还叙述了心理卫生与医药、社会、法律、实业、两亲教育、学龄前儿童教育等的关系。纪祥睦著之《青年心理卫生教育》（《教与学月刊》六卷三期，1936年）一文，也述及心理卫生的意义、重要性及其方法。如对情绪的克制，免除无益的情绪烦恼；正当地利用和发展智力，对环境要有相当的调剂与支配；注意身体心理的健康。吴南轩著《心理卫生之遗传》（《心理半年刊》二卷二期，1935年）论述一般心理特质和低能与精神病的遗传，提出防止办

法如：安死法、禁婚法、用手术绝种或减性法、生产节制法、隔离法等。此外，还有郑枢才译《个人心理卫生》(《心理半年刊》二卷二期，1935年)介绍应用心理健康原则，个人的效率可增加，心理疾病可减少，神经扰动可阻止和治疗等，以及王书林《心理卫生》(《教育杂志》二十六卷二期，1936年)，方东澄《心理卫生与训育》(《教育杂志》二十六卷四期，1936年)等译文。

2. 关于儿童的心理卫生方面

有肖孝嵘在《教与学》(一卷十期，1936年)和《现代父母》(五卷一期，1937年)上发表的《儿童心理卫生》。作者认为儿童心理卫生是心理建设的基本工作，从消极方面讲就是防止心理的不健康，从积极方面讲就是促进心理健康。还叙述了儿童行为中七个基本因素与生理卫生的关系：(1)活动；(2)模仿；(3)暗示感受性；(4)好胜心；(5)好奇心；(6)智慧；(7)人格的倾向。对这些因素利用得当，可以促进儿童的心理卫生。徐则敏在《中华教育界》上也发表《儿童的心理卫生》一文，作者认为儿童心理卫生的目的在于发展常态儿童的健康，防止心理疾病的产生，并给予缺陷儿童相当的补救。提出学校应注意心理卫生，教师应使用健康测验，探知儿童心理健康程度及其失常的原因，然后设法消除其根源。

在儿童的心理卫生中有关儿童习惯培养问题的文章颇多，如吴梅君《怎样培养儿童心理健康》(《心理季刊》二期，1936年)，认为心理健康的训练，应自幼在心理上养成良好习惯，并列举优良的日常生活习惯，如独立自治的习惯，养成成功的习惯，勇敢尝试新事物的习惯，自尊心及服从的习惯等等。浦漪人《儿童习惯态度的心理卫生》(《教与学》一卷十期，1936年)，列述了儿童应养成11种积极的习惯态度和应破除5种消极的习惯态度。另外在《教育杂志》上有孙礼成的《小学儿童应养成的卫生习惯及

其养成法的研究》（二十六卷十号，1936年），关瑞梧的《儿童良好习惯的养成》（二十六卷十二号，1936年），姚贤慧的《怎样训练快乐的儿童》（二十六卷十二号，1936年），以及方东澄的《儿童心理卫生习惯之养成与教师应有之注意》（二十六卷六号，1936年）译文等。

3. 关于问题儿童的心理卫生方面

有章颐年在《心理季刊》（创刊号，1936年）发表的《问题儿童的心理卫生》。作者认为人的行为形成，受他全部生活的影响，教师要了解儿童的学校环境，观察其家庭情况和社会环境，任何问题儿童都可改造。其行为发生问题的原因复杂，应从上面三方面找原因，然后做出有效的处置。邓家梁的《问题儿童的心理卫生》（《现代父母》四卷九期，1936年），把问题儿童分为凌弱的、骄矜的、多哭的、多疑的、善妒的、无恒心的儿童，根据其问题的特点提出应注意的方法。王柯专门有《孤僻儿童的研究》（《教育改造》一卷一期，1937年），主要论述了孤僻儿童的征象、产生和孤僻行为的影响，及对其预防与救治的方法。还有方东澄编译的《问题儿童的治疗》（《文化与教育旬刊》一、二、三期，1936年），汉铭编译的《怎样处置态度失常儿童》（《现代父母》五卷一期，1937年）。所谓态度失常主要指咬手指甲、惊喊等；文中认为是因为生理上的缺陷或某种技能特别发展，应深究其原因以治疗之。

4. 关于情绪卫生方面

1935年肖孝嵘在《心理半年刊》（二卷二期）发表《情绪之发展及其卫生》，论述了引起紧张状态之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刺激，发现情绪紧张与情绪变态的方法，情绪卫生之原则：（1）教以情绪之表现而不教以情绪之抑制；（2）培养乐观之态度；（3）教以博爱；（4）教以情绪生活而不作表示情绪之空谈；（5）教以情绪行为之复杂形式。有关儿童的情绪卫生的文章，有富伯宁著《儿童

的情绪卫生》(《教育研究》七十一期，1936年)。该文主要叙述了有关愤怒的卫生、怕惧的卫生和恋爱的卫生。王培祚著《儿童情绪的涵养》(《教与学》二卷八期，1937年)，主要论述了儿童情绪涵养的重要性，儿童情绪态度的发展，儿童情绪态度的涵养法等。还有姚贤慧著《幼儿情感生活上几个重要基本的需要》(《儿童教育》七卷二期，1936年)。该文叙述了幼儿情感生活上的四种基本需要，即安全、生长、理想、模范和友伴的需要。吴襄在《科学世界》(五卷一期，1936年)写了一篇《怕!?》。作者介绍华生(Watson)对儿童的试验，认为儿童的害怕是家庭造成的，不应有的害怕，养成习惯，消除不易。有关青年的情绪卫生方面有陈剑修著《青年的情绪卫生》(《教与学》二卷九期，1937年)。该文叙述了青年期的情绪特别重要的三个原因：正成熟趋于复杂；随经验及事变而演进；最不固定而走极端。作者还提出了青年情绪卫生的有效办法。吴南轩的《中学生之情绪卫生》(《播音教育》一卷五期，1937年)认为情绪卫生为心理卫生的一个重要问题，讲述了情绪与人生观的关系，学生情绪修养的重要及其修养方法，主张并非完全压抑情绪而是要“发而皆中节”。此外，还有吴福元的《心理卫生与青年》(《心理》附刊，第十四、十五期，1935年)和《情绪的适应》(《心理》半年刊，三卷一期，1936年)等译文。

5. 关于人格与心理卫生方面

有王凤喈著《健全人格与心理卫生》(《教与学》二卷一期，1936年)。作者认为健全人格应具备完整、一致、连续、适应之特性，以及适度之自制力，稳定的情绪和心智能力之持久。病态的人格包括早衰、狂郁、忧郁、妄想等。欲养成健全人格，这便是心理卫生问题。注意心理卫生应从教师和家长方面及学生自身方面着手。肖传文编的《人格和心理卫生》(《心理季刊》第三、四

期，1936 年）认为心理卫生的目的即是在控制组成人格的各种特性而使之相互平衡。研究人格和心理卫生最普通的方法是个案研究，建议学校应用个案研究对儿童不良行为进行矫正和补救。还有译文介绍关于《改进人格的实验》（郑文汉译，《教育与职业》176 期，1936 年）。

6. 关于学校和家庭的心理卫生方面

认为心理卫生在教育上的应用，就是为培养一个健全的人格，学校和家族必须注重应用心理卫生。如章颐年在《心理季刊》（二卷二期，1937 年）上发表的《心理卫生在学校和家庭的应用》，就是为解决学校儿童行为以及家庭夫妇间、父母和子女间的适应问题。还有译文《学校中之心理卫生》（沈子善译，《教与学》一卷十二期，1936 年）及译书《学校儿童心理卫生》（胡祖荫译，《心理季刊》二期，1936 年）等。有关教师和父母应注重心理卫生的文章，有方伯英著《教师和父母应该怎样注意儿童的心理卫生》（《教育与改造》一卷二期，1937 年）。作者认为父母对于心理卫生应负的责任有不溺爱儿童、培养独立人格、不管束过严、对儿童有正确态度、纠正儿童坏习惯等；教师对于心理卫生所应负的责任有对初入学儿童应注意之事项，改进儿童在家庭中所养成的坏习惯，认清什么是问题儿童，教师人格修养，教师处事公平，要顾及儿童智力高下等。陈鹤琴的《怎样做父母》（《播音教育月刊》一卷五期，1937 年）指出必须晓得孩子的身体状态，心理的发展，爱孩子的方法和要改正自己错误的念头。父母与儿童不良行为的关系问题，则有《母亲溺爱的危害》（冯邦彦，《教育杂志》二十六卷一期，1936 年）；《儿童偷窃与父母》（钱苹，《教育丛刊》三卷二期，1936 年）；《儿童犯过与家庭》（钱苹，《心理半年刊》三卷二期，1936 年）等文。此外，还有方东澄译《教师之心理适应》（《教育杂志》二十六卷十期，1936 年）；李荷珍、高

健译《教师们究竟懂得多少心理卫生》（《心理季刊》二卷二期，1937 年）等。以及还有关于性教育与儿童心理卫生、儿童惩罚的问题等文章和译文。

从以上可见我国 30 年代对心理卫生工作比较重视。因“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时代，当时心理学工作者认为心理卫生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工作，要复兴民族，不单是努力于物质建设，还应同时努力于心理建设，心理卫生是心理建设的前提工作，因而倡导开展心理卫生工作并侧重心理卫生在教育上的应用。

20 世纪 40 年代在《教育心理研究》上，有东方澄写的一篇《心理卫生与学校组织》（一卷四期，1942 年）。作者认为学校的组织和教师的管理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密切关系，提出：（1）课程选择、教材供给应适应学生各时期的心理的生长，过迟过早均不适于心理卫生条件；（2）按儿童心理发展差异分组；（3）改进教学方法；（4）使学生有适当的社会生活和娱乐；（5）供给良好的学习环境，注意疲劳问题。作者还介绍国外为学校实施心理卫生应注意之事项和情况，也谈到当时我国心理卫生处在萌芽时代，知心理卫生者颇少，学校未觉悟这方面的重要，要想实施，人材缺乏。心理卫生工作，因在抗日战争时期，较前 30 年代开展不多。

七、工业心理①

1934～1937 年《心理半年刊》、《心理附刊》和《心理季刊》以及其他刊物上刊载工业心理或实业心理方面的文章较多（共有 36 篇，其中译文 20 篇），特别是译文，介绍了西方和苏联开展实业心理学的研究情况。在《中国心理学报》上有一篇全面系统地叙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年，第 73～74 页。

述我国早期工业心理学发展历史的文章。关于实业心理研究的意义、范围及其背景，《心理半年刊》（二卷一期，1934年）上，有肖孝嵘著《实业心理学之功用及其背景》，王书林著《心理学与工业效率》。肖文阐述了实业心理学有雇聘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增进管理效率和货物推销等功能；并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因素说明实业心理产生的背景。王文叙述了心理学对工业方面的贡献。工业心理学的范围包括工作效率、工人的训练、工作的方法、疲劳、单调、工作环境、纪律、意外事件之预防等。还有曹飞著《环境对于工作者之影响》，作者论及影响于一般的工疲轮回（Cycle）之各种因素。张德琇的《实业心理与农业》论述：（1）实业心理与农业效率；（2）实业心理与农民幸福；（3）实业心理与农村调查；（4）实业心理与农业合作。作者还译有《实业关系中的人类因素》（《心理半年刊》二卷二期，1935年）和《实业界中一个严重问题：实业中人类价值与经济价值》（《心理附刊》第十三期，1935年）二文。韩进之在《心理附刊》（第八期，1935年）著有《时间的研究与工作的安置》和《管理者所居的位置》。作者论述管理者主要功用系推进生产者，居于重要地位；时间研究是科学管理中的中心问题。陈一百在《学术世界》（二卷一期，1936年）著有《时动经济与心理学》，介绍时间动作研究，始于泰莱设计加速搬运方法，时动研究结果使产量增加、疲感减少、器具预先安置，双手共同工作。《心理附刊》辟有《实业心理论文选译》专栏（第一期至第三期，1934年；第十一期至第十四期，1935年），介绍内容包括：科学管理法，工作者的分析及其改进，工人在工作中的需要，工人选择之标准，工作环境，温度与通风，产额限制；工厂中发生意外事故原因的分析，当事者心理状态问题卷，测验成绩与发生意外次数的实验，汽车司机肇祸倾向的男女差异，反应时间的测量，优良待遇的特性等译文15篇。关于工人问题，肖孝

崃著《实业心理和劳工问题》(《中华教育界》二十四卷二期，1936年)，以实业心理学解释工作的态度、心理状态以及关于工人监督、待遇问题等。还有非非译文《劳工的扰动和罢工》(《心理附刊》第一、二期，1934年)等。关于西方和苏联实业心理学的情况介绍，在《心理半年刊》(二卷一期，1934年)有丁瓒的《英国实业心理学在实业和商业上的研究》和丁祖荫的《英国国家实业心理研究所与各机关之合作事业》。丁瓒文介绍英国国家实业心理研究所简史及其研究：在工厂商店、行政机关等处运用人力的最好方法；各种实业和商业的职务上所必需的条件及适宜的测验的拟订与应用；决定实现各种环境以期得到工人最高健康、安全、福利、良善的人间关系；研究影响货品销售的因素，如广告、陈列等；提供讲演、讲课；有关实业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丁祖荫文介绍该研究所1921年成立至当时(1934年)13年的研究工作，与医学研究会、文官委员会、监狱委员会、邮政局、军政部等政府机关共同完成的多种工作；应海军部、皇家飞行队的咨询，向农业部、教育局、劳动部提供资料等。吴襄写有《瑞士之实业心理学》，介绍瑞士实业心理学的研究如卢骚学院华尔特教授的动作测验，以及对疲劳、单调与工人物质环境的研究。实际应用方面包括：(1)心理诊断法用于职业选择与指导；(2)学徒之训练；(3)劳工科学管理之心理；(4)工人及监工人员之心理测验。《心理附刊》(第四十三期，1936年)和《教育与职业》(第175期，1936年)刊有译文《澳大利亚的实业心理学会》(贾玉润译)和《澳大利亚的实业心理》(王馨一译)；《心理半年刊》(三卷二期，1936年)刊有丁祖荫译《苏俄的实业心理学》，介绍了苏俄早期的实业心理的观点、中央工作研究所及实业心理学中新观点的发展、职业之研究和实业训练的趋势、实业中的妇女工资和升迁、减少工作疲劳、心理技术家的训练等。1936年周先庚、陈汉标在《中国

心理学报》（一卷一期）发表《中国工业心理学之兴起》。作者追溯中国工业心理学兴起的由来，详尽地叙述了中国工业心理学兴起的前史，并附录中国心理学发展大事记。该文总结当时我国十数年工业心理学诞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为：（1）教育家之提倡职业指导运动；（2）工商界之注意科学管理人事管理和工业安全；（3）政府机关之颁布劳工法令和提倡行政效率及调查专门人才；（4）心理学家之宣传工业心理学、研究工业心理。并提出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是：（1）确立工业心理学的名称。作者认为把工业心理、商业心理和职业心理三个独立分开，而以实业心理学总括三者，这样可免去各种名词的含混；（2）联合教育家、工商界、政府机关和心理学家以谋共同发展中国工业心理学；（3）赶快多多训练富有经验及工程知识、心理生理技术，深知工厂实际状况的工业心理研究人才；（4）选择目前中国最需要的而且最能表现工业心理学之机能的研究工作。作者主张效法英、俄两国之注重工业效率的研究；（5）工业心理学的研究或应用，在工业心理尚未得到一般人之同情与了解之前，宁可避名就实，暗中进行，以求实效，不宜大张旗鼓招人反感。最后作者认为中国工业心理学已为各界所需要，若能按部就班地努力提倡研究，必有益于社会人群，发荣滋长。文中叙述了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合作进行的工业心理研究，如陈立、郑沛缪等到平绥铁路南口机厂研究试验工人建议制度及工人考勤评判制度，并到上海各大工厂参观考察，到南通大生纱厂考察一般工业效率问题，这是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到实际中去进行工业心理研究的开始。1935年，潘菽著《心理学的应用》一书，论到了工业心理学问题；同年，陈立著《工业心理学概观》出版，这是我国最早自著的工业心理学书。1937年，陈一百在《心理季刊》（二卷二期）发表《心理学与现代工业》，叙述了工业心理学的范围和它所

要研究的问题：（1）实业疲劳的减除，也就是怎样可以使工人保持其最高的效率；（2）工作环境的改善；（3）工业意外的预防；（4）工人的选择和训练。作者强调“善用人力”，他认为我国经济物质的落后，在机器方面难与欧美工作争长，应在人事方面多加改进，提高工作效率。

八、心理测验①

（一）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

《心理》杂志在1922～1924年的各期上刊载心理测验的文章较多，计智力测验类14篇，教育测验类11篇，心理测验类3篇，职业测验类和通讯栏中各1篇，共30篇。其中以张耀翔的文章最多（占10篇），次为廖世承和陈鹤琴。《心理》首期上，张耀翔论述了《智力测验缘起》和《教育测验缘起》。他从我国古代孔子对其弟子愚、鲁、辟、喭等个别差异和“量材使用”等论及“智慧测量的研究，欲求一正确量材之方法”。他还区分“智力测验是为先天的聪明，求正确之方法以定准其性质与其分量；教育测验是为学来的知识求正确之方法，以定准其性质与其分量”。并以作文、绘画、书法、数学等不同科目作评分试验，结果评分很不一致，一人有一人的测法，一人一时也各有测法。作者认为教育测验法必须统一，国家的教育才能得治。在同一期上廖世承和陈鹤琴分别论述了《智力测验的历史》和《智力测验的用处》。廖世承论述了从古代运命之学产生至18世纪的骨相学，继之而起的相术和18至19世纪流行相狱犯的说法，至19世纪末叶心理学日渐发达，心理实验日益多起来，遂产生智力测验。作者称戈尔登、皮奈等为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55～57、83～86页。

智慧测验的首创者。陈鹤琴论述了智力测验可用于教育、军事，解决社会问题，职业甄别，如何用人，以及与人种学的密切关系。他们三人还分别介绍了许多具体的国外测验方法并结合中国情况加以修订进行测验。如张耀翔《科提士之算学测验》(1922 年，一卷一号）介绍各种测验，用 16 问算学题由极简单之加法至三位数的除法为止，适用高小以上程度，此为试其运用脑力和腕力的快慢，非试算学程度。《八卦试验》(1922 年，一卷二号）是仿国外“交替试验”，以伏羲所画之八卦，与八个阿拉伯数字交替，试验全靠各卦与各数目之临时联合记忆，目的为察出人的学习能力或可教程度。他还有《识字测验》(1922 年，一卷一号)，用一部字典之缩小体，以 100 字为代表，用短时间即可测出识字多少。《见闻测验》(1922 年，一卷三号）以一人见闻多少，代表其好奇心之强弱，此测验在最短时间内，察出人之各种学问与智力程度。《果性测验》(1923 年，二卷四号）用水果及其各种性质为材料，测人的观察力，观察事物之准确性和敏捷性如何。又如廖世承《读法测验》(1922 年，一卷一号)，介绍国外默读测验和朗读测验。《团体智力测验》(1924 年，三卷二号）作者参照美国教育总局 1919 年所编全国通用的团体智力测验，自制两个量表，包括算术理解题、填字、常识、字汇、比喻等测验项目。再如陈鹤琴的《小学常识测验》(1924 年，三卷一号)，他以儿童常见、常闻或应知道的事物测验儿童对于普通事物的常识，据此测验结果观察儿童常识所缺乏的地方，来编制辅助教学的教材。由于 1922～1923 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特请美国心理学者麦柯来华开展心理测验研究（麦柯当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科副教授，美国教育联合会会员，美国科学改进社社员，美国心理学会会员，美国全国教育研究会理事)，因此刊载了介绍日本、美国的心理测验方法研究和在国内进行的测验调查报告等。如程时奎的《日本学者对于皮

奈西门测验法之研究》(1922年，一卷三号)，钱鹤的《日本国民智力测验法》(1924年，三卷二号)，均介绍日本久保英良对皮奈测验的研究。他结合日本情况又加以修订，1917年用于测查日本儿童，1922年翻译美国国民智力测验，并改订制成日本智力测验。此外，在通讯栏专门有琴一的《日本心理测验之新发展》(1923年，二卷一号)，介绍日本除在学校测验儿童较多外，在实业界和海军大规模研究和应用心理测验的情况。吴定良的《美国标准件的教育测验》(1922年，一卷四号)、《美国团体智慧测验之种类》(1923年，二卷一号)，介绍美国各种测验包括中小学各学科测验，认可为可直接使用或修改和仿制使用。还介绍了专门学校的各种测验。介绍麦柯在京协同编制的测验或试验情况的有张耀翔《大学入学智力测验》(1927年，四卷二号)。这次测验曾在北京师大入学考试时测验三次。陈光裕《中学科学测验》(1925年三卷四号)，俞子夷《小学校毛笔书法T成绩的算法》(1923年，二卷二号)和《小学算术应用题测验》(1924年，三卷一号)，还有程时奎受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委托，调查日本人在南满所进行的教育情况，写出《南满教育测验》调查报告，反映日本文化侵略奴役中国青年的情况。还有3篇翻译美国书刊杂志的译文或编译文：曾作忠《智力测验和教育》(1924年，三卷一号)，欧阳湘《美国与外国儿童在智慧测验上之比较》，罗志儒《教育测量中三种尺度(即测验性质，难易，分量)》(1923年，二卷四号)。

此外，在1922年一卷二号上，还有两篇测验文章。一为张士一的《研究注音字母四声标法的一个试验》，是1918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后，作者应用科学方法对四声进行三种标法的研究。另一篇是张耀翔的《智慧之定义与范围》，他对古代学者、西方学者和当今学者的智慧定义加以分析比较提出自己的定义。

《心理》杂志介绍在其他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测验文章有57篇。

其中3篇是对美国麦柯的介绍及其本人的演讲：钱希乃《麦柯测验编造的TBCF制》(《教育杂志》十五卷九号）介绍T量表、B量表、C量表的制造法及其理论，并对麦柯的方法提出批评。周调阳翻译麦柯“教育测验法”中有关众量数、点量数、差异量数、相关量数等，题为《应用于教育测验上之统计法》(《教育丛刊》四卷二、三集)。还有一篇是1923年8月麦柯与刘廷芳在中华教育改进社附设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的讲演，题为《教育心理测验之施行方法》。

关于皮奈西门（现译比奈西蒙）测验法的介绍有7篇，其中6篇介绍了系列式智能检查法（《教育杂志》十卷一至五号，太玄《学校儿童心理检查法》)，智能发达诊断法（《教育杂志》四卷七号，志厚)，皮奈西门智力测验法（《中华教育界》十卷二期，王克仁《测量儿童智力之必要和方法》）等。还有一篇为钱鹤的《日本久保氏之皮奈西门智力测验改订法》(《教育杂志》十四卷十号)，介绍2～10岁儿童的测验。关于其他测验法、研究法和调查法的文章有11篇，如《以相关法测定知能等级说》(天民，《教育杂志》五卷九号)；《小学新进学生之调查法》(巽吾，《教育杂志》五卷二，三号)；《儿童智力（包括记忆、想象、判断、注意）的试验》(《妇女杂志》七卷七号)；《十种测验报告》(《集美师范》第三期）所列测验项目有：立方体测验、划去余型、图形分类、谬误测验、词句重组、方形分配、比喻测验、道德判断、词类选择、模型再认等。还有《无文字智力测验的用法》(刘湛恩，《青年进步》六十四册)；《心理测验之功能及其用法》(赵惠谟，《教育丛刊》四卷四集)；《智力测验法的标准》(朱光潜，《教育杂志》十四卷五号）和《标准测验简说》(胡叔异，《新教育》第七卷第四期）等；摘译的有《幼童及成人分等之量智法》(大可，《青年进步》七卷六号）和《应用于教育测量上之表格法》(周调

阳，《教育丛刊》四卷六集）等。

关于各科测验的文章有17篇。如孙本文的《中学一二年生读书能力试验之统计》（《新教育》一卷二号），陈鹤琴的《理解性算学问题式的测验法》（《新教育》四卷三期）和《国文测验词句重组》（《新教育》四卷五期）；此外，还介绍了朗读默读测验、辨别错字测验、小学算术学力测验、混合四则测验、常识测验、英文拼字测验、手工图画测验、书法测验、入学试验与心理考察等等。还有关于廖世承等人1922年在济南所作学务调查时和1923年东南大学附中暑假新生入学考试的报告。

介绍英、美、日本、丹麦等国心理测验法有9篇。介绍英国华勒发明的感情测验器，可测知人的感情强弱；美国桑代克所发明之"平面迷津试验法"为考验人的敏捷和准确的能率；桑代克关于教育测验的演讲中所谈美国最新研究的国民智慧测验法；还介绍美国陆军适用的智力测验法、公民测验法，丹麦实验教育社所从事的生理及心理的研究和各种测验等。

关于智力测验问题的争论文章有7篇。李清悚《柏格森对于智力测验的批判》（《学灯》五卷十二册七号），介绍柏格森在美国芝加哥教授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论文，名为《平民教育与IQ》。他反对智力测验，理由是真智力测不出来，把儿童智力视为平恒不变，倾向于高者不合平民教育原则。孟宪承《智力测验之论争与教育学说》（《教育杂志》十五卷一号）一文概述了反对智力测验的言论及维护智力测验的答辩。《学灯》五卷十一册十七号所载张师石的文章对德尔满在上海对各小学校进行的测验提出异议，并对测验提出疑点。在同刊念一号上有徐剑缘等四篇文章对张师石疑点作出答复和解释。

（二）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

1. 概论

主要有董润之著《测验的意义功用种类及编制》(《测验》创刊号,1932 年);陈选善著《测验在教育上的地位》(同上);杜佐周著《测验运动与中国教育之改进》(《测验》二卷一期,1934 年)。董文关于测验意义,重点论述了标准测验时效力、可靠性、客观性、实用程度、常模的条件要求。对测验的功用概述了十条:(1)度量学生的进步;(2)鼓励学业上的努力;(3)树立工作的标准;(4)确定工作的成绩;(5)诊断学业上的困难;(6)测验报考的学生;(7)编制学生的年级;(8)促进教育的研究;(9)诊断教师的效率;(10)扶助职业及升学的指导。他把测验分为四种:智力测验、教育测验、道德测验和职业测验。陈文论述测验与教育的关系,他认为从心理学立场而论,教育目的乃在变更人类的行为。要考查教育所制造的变化,必须测量变化的方向和数量。论述了教育测量的重要和心理测量的要素。杜文重点论述改进教育、解决实际问题,非用科学方法不可。他认为科学方法即是要做研究工作,需要研究工具,测验即为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举例阐述测验在改进教育工作上的价值及我国测验运动发展的历史。此外,还有《测验》(二卷四期,1936 年)上钟鲁斋著《测验对于吾国教育改进之几个可能贡献》和史美煊著《测验法在国家考试中地位之估计》等文。

2. 历史

在《测验》创刊号(1932 年)上集中地刊载了心理测验的发展史,如:易克櫄著《教育测验之起源与发展》,黄龙先和薛铨曾著《智力测验史略》,左任侠著《法国心理测验史略》。在《心理附刊》(第三十八期,1936 年)有詹树干著《我国教育测验运动简史》。黄和薛文以 40 页篇幅,把智力测验的历史分为:(1)上古史(萌芽期),智力测验的最初发生;(2)中古史(发生期)皮奈西蒙量表之历史背景及量表本身;(3)近代史(发展期)各国智力测验发展情况,其中包括我国测验发展史。作者还概述了智力

测验的起因及其概念的形成，各国科学家对于智力测验编造的贡献。易文首先叙述了教育测验的历史。作者认为中国古代《舜典》和《礼记》上已有“考绩”和“视学”，即是考试的初步。古希腊和中古时代的大学生升学升班都要经过考试，可见教育测量起源很早。19世纪以前的教育测验只可叫教育估量，是纯主观的，不能用正确的数量表示。直至19世纪末时，才有人感觉以前教育测量太不正确，应设法觅一种科学方法创建一种正确的工具，教育测验随之而起。作者把这一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时期叙述：第一时期（1864～1894）：创始于英国费奢尔（Fisher）的量表集，至葛尔登（Galton）和皮尔生（Karl pearson）创成统计学后，教育测验开始兴起。第二时期（1894～1907）：乃士（J. M. Rice）首用科学方法研究教育，编造拼字、算术与语文测验，用以研究课程时间分配及教学法，此时皮奈西蒙智力测验成功，促进教育测验的发展。第三时期（1908～1916）：此期教育测验已有长足进展，桑代克发明了量表单位等。第四时期（1917～1924）：编造与应用均极发达，此时期我国测验运动也勃兴起来。第五时期（1924年以后）：我国开展了各种测验并设立测验机构和学会，欧美兴起新法考试和测验记分方法一致运动，并对测验本身的信度和效度等加强研究提高。杜佐周写的法国的心理测验史把比奈作为划时代的中心人物，称比奈以前为非标准时代，比奈以后为标准时代。此外，在《心理附刊》（第三十三期至三十八期，1936年）刊有路君约译王书林校的《测验之初期的实验和派别》，介绍个性差异之初期研究和测验在美国的早期试验情况。

3. 教育测验

主要有：(1)周先庚、诸葛龙在《测验》(二卷一期，1934年)上发表《定县实验区学校式教育测验》。该文是对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自1926年至1934年，9年内测验工作的介绍。作者总结

出此项测验工作的特点有：(1)为解决教育实际问题而研究；(2)以农村一般识字与不识字之男女青年与成人为对象；(3)大规模研究。有成绩测验与智慧测验，以及初级平校之千字课、注音符号、珠算等测验；高级平校之文艺测验等。自1927年至1932年共测验15～25岁男女学生27198人，陆军士兵862人，合计28060人。(2)艾伟等人编造小学各科测验的经过，均刊于《测验》(二卷四期，1936年)。有算术测验、历史测验、高级卫生测验、初级小学常识测验、高年级自然科测验、国语默读测验、语顺测验等。此外，还有龚启昌《部编短期小学课本测验》(《测验》三卷一期，1937年)等文。(3)艾伟编制中、大学英文、国文、代数的测验，如1932年发表《冀鲁豫晋四省高中以上学校英语成绩考察记》(《测验》二期)；1933年发表《大学一年级学生之英文能力》(《测验》三期)；1935年发表《高级中学英语测验之初步报告》(《测验》二卷二期)。作者曾测验14所学校一年级生英语阅读速率和了解程度。作者从英语教学考察中搜集到不少初中和高中也常见的拼字错误、文法错误。他利用此材料，参考美国所制各种英语测验作补充，自行编出初高中英语测验各两类，每类分拼字、改字、填字、消字四种，对高级中学进行英语测验。1933年，艾伟发表《五年来中学国文测验之经过》(《测验》三期)，这是关于中学国文理解程度的研究。所用材料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作者叙述了五年来进行的大规模测验的情况。还有艾伟和郭祖超在1937年发表的《初中代数测量》(《测验》三卷一期)。

4. 智力测验

主要有 (1) 1932年肖孝嵘发表《一个智力测验法之商榷》(《测验》创刊号)。作者介绍自己制订的《多方适应之测验法》，他认为“大多数智力测验的通弊是测验之成绩与知识之分量具有密切关系，知识之分量固因环境而异，被试环境各不相同，故根据知识之分量以定智力之高下未免失当”。所以作者认为“知识仍

适应的结果而非适应能力之自身，由某人适应的结果，我们不能知道这人的知识是如何得来的及费了几何时间方才得来的，但这两点正是智力测验中所应注意之事"。作者在《测验》(第三期，1933年）上又发表《智力发展之三大问题》，认为应对三大问题进行研究并加以论述：（1）关于智力发达之弧线；（2）关于发达停止之年龄；（3）关于年龄与差异度之关系。作者还对各种测验进行了修订和编制工作，均发表在《测验》上，如《修订幼稚儿童智力测验》(第四期，1933年)，即在美国很流行的墨跋测验量表，适用于18至71个月的年龄范围，内容有：（1）语言测验；（2）全是或否测验；（3）形式板和图画测验；（4）动作适应测验。又如《修订XO测验之初步》（二卷二期，1935年）。该测验为美国人Pressey所创制，用于：（1）研究罪犯、患神经病者及异于常人者之情绪态度；（2）研究一般人之感情态度、道德标准、情绪组织以及两性与个性之差异。包括成人用和儿童用两种。作者对不适用于我国的部分材料加以修订。1937年作者还发表《军官智慧团体测验之编制及其应用》和《邬马个人事实表格的修订及其结果》(三卷一期)。此外，1939年，作者在重庆《心理教育实验专篇》(第四卷第一期）发表《订正古氏儿童智慧测验》，即古纳夫画人智慧测验，这是测验幼稚儿童与小学儿童的一种简便方法。由于该测验含有颇多主观性，作者这次修订使此测验之记分尽量客观化。该文主要内容分述了测验的由来及其编制，修订经过及其结果，训练对于测验分数的可能影响，订正测验之应用方法。1934年《心理半年刊》发表郑大源撰《关于肖氏修订墨跋量表之初步报告》(一卷一期)。作者对墨跋量表所用之材料与手续作一简介，并对该测验之重要性加以阐述，认为儿童在6岁前，是人格陶冶之最重要时期，此期善为培养，以后顺其发展继长增高，将来自然成为优良国民，故须顺着儿童之智愚、能力之倾向予以适宜的

指引，使其在幼稚时期即能获充分与正当之发展，不仅小学教育因此得到莫大之利益，即中、大学生必须养成之习惯，亦可以测验为根据。(2) 1934～1935年，左任侠在《测验》(二卷一期、二期) 连载了《智力是什么》。作者叙述了当时智力测验界内混乱的情况，对智力定义十分含混，自比奈发表智力量表后更引起对“智力”解释的纠纷，各有各自的智力观。为此作者积历年来对实验心理学和智力测验法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智力测验之盲目应用时期过去了，我们要给它（智力）一妥当的理论担保。行为心理学者要振作起来，大家努力去对于行为作量的研究，以促进心理学于其他自然科学的同等地位”。(3) 1933年吴天敏在《测验》(第三期) 发表《重订比纳西蒙智力测验经过》。比西测验由陆志韦在1924年作成，从1930年开始修订，作者直接参与此项修订工作。1937年沈有乾在《中国心理学报》(一卷四期) 撰写一篇书评，对吴天敏的《第二次订正中国比纳西蒙智力测验之经过》(《上海商务》，1936年6月) 和陆志韦、吴天敏的《第二次订正比纳西蒙测验说明书》(《上海商务》，1936年8月) 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重订本比旧本适用并认为两书引起许多关于编订测验的理论问题。(4) 1936年陈选善在《心理季刊》(第三期) 发表《鲍德氏迷津测验能在中国适用吗?》，1937年又在《测验》(三卷一期) 上发表《关于鲍德氏迷津测验在中国之应用》。该测验1933年曾由上海市教育局在京沪一带（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镇江、武进各地）幼稚园及小学作大规模之试用，共测儿童7500余人，由《大上海教育》(二卷八期，1935年) 发行迷津智力测验专号报告结果。陈选善认为迷津材料不加修改用于中国缺乏事实上的佐证。1937年曹日昌在《中国心理学报》上发表《试用鲍德斯迷津测验初步报告》(一卷三期)，他共测验了定县四个小学的学生184人。在报告的结论中叙述了鲍氏迷津测验的用

途，他说："无论是办教育的，是从事教育心理研究的，都常感到需要一种简易的、非文字的、效率高、信度高，同时还能测量气质的智力测验。在乡村从事成人学习与记忆心理研究的，对于这个需要感觉得更迫切。而能合乎这种需要的，据各家介绍，其为鲍德斯迷津测验。"这次测验结果，中国儿童成绩偏低，而上海市教育局的结果则成绩偏高，原因是受测验者的社会环境、教育程度、主试受试关系以及测验手续的不同，故尚需严格照测验规则大规模测验研究。作者还指出该测验的缺点，一为时间问题，一为测验材料的形式问题。如稍事修订，求出常模，能在中国应用。(5)1932年王书林在《测验》(创刊号)上发表《罪犯之智力》，1933年发表《两个要素的理论》(第三期)。作者在前一文介绍国外关于罪犯之智力研究以说明测验的另一功用；后一文论述各测验间相关之理论。他认为各种心理测验均显示相互关联，对相关解释是研究智力的性质时一最重要问题。此外，还有杜佐周撰《根据施行廖氏团体智力测验的结果讨论国内各种测验之应修订的必要》(《测验》第四期，1933年)和郝耀东所作《一个大学入学智力测验的尝试》(《测验》二卷四期，1936年)等文。

5. 新法考试

1932年吴南轩在《测验》(第二期，新法考试专号)发表《什么是新法考试》。作者区分了新法考试、旧法考试、标准测验的定义。他认为旧法或论文式考试，比较问题少，取样狭，答案长而无标准，评判偏于主观，记分不能用机械式，费时，不足表现被试者对于某科目之整个有组织的知识。标准测验：问题较多，取样广，答案短而有标准，评判尚客观，记分可用机械式，先经若干精细实验，有常模而后编制，手续须严格标准化，不费时，可表现被试整个有组织的知识。新法或客观式考试：与标准测验不同点是未经若干精细实验，未得常模而后编制，手续未经严格控

制或标准化。简言之即是一种非标准的测验。作者反对那种认为“新法考试即是测验，测验即是新法考试”的说法，认为“殊属惑乱听闻”。在这一期《测验》上还有《旧式考试与新式考试的比较》（陈选善）、《实行新法考试之先决条件》（潘菽）、《编制新法考试题的方法》（龚启昌）等文。1934～1935年《测验》（二卷一、二期）上有龚启昌《中大实校之新法试卷——自造试卷》，沈有乾《大学入学考试中学力测验之试用》。后者指出入学考试的各科试题大部分属于论文式，其缺点为：（1）不经济；（2）不完全；（3）信度低。他所用的学力测验就是要补救第二缺点。1934年吴福元在《心理附刊》（第六、七期）发表《新法考试之实验研究》。该文分述了：（1）各种测验的相对价值；（2）新法考试中各种常用方法的实验研究；（3）机遇的修正之研究等内容。

6. 计分和统计

在《测验》上刊载了批评1922～1923年由中华教育改进社聘来的美国麦柯指导下所作的测验。如艾伟的《测验学上对减错计算法之研究》（创刊号，1932年），认为麦柯计算测验成绩的方法事实上并不公允。麦柯假定，题目做对了得一分无甚问题，若做错了则似有猜答之嫌疑，猜答者应扣一分以示惩罚。假使所用的方法为四答选一则三个错误的答案之中可以任选一个，在这里按机会分配，任选一个错的扣分数三分之一。作者认为这种计算测验成绩的方法若总得分小于或等于被扣总分则应得分数即为负数或零。从对的分数减去错的分数计算上非常麻烦，时间不经济。艾伟的另一篇《常态曲线在考试成绩上之应用》（一卷二期，1932年）和左任侠的《T量表之基本原则——常态曲线》（二卷二期，1935年）均对麦柯创之T量表在我国普遍采用提出批评意见，认为T量表之困难点，不在于单位相等与否，而在于各项能力是否确呈常态的分配。又T量表上之难度并不相等，因编制时，各单

位距离系依作对题数的百分比之顺序所构成，并未按照百分比将各题难度之顺序显示出来。如周学章的《TBCF 制之检讨》(二卷二期，1935 年)，王书林的《T 量表之限制》(二卷二期，1935 年)，则对当时我国所用测验全基于 TBCF 制提出异议和疑问，认为 T 分虽有优点，亦有限制。此外，在《测验》上还发表有关统计学问题的文章，如《均差中的差数研究》和《常态曲线公式之引申》(王书林，二、四期)；《曲线适合之研究》和《论统计》(艾伟，四期)；《统计方法杂论》、《平均差之计算》和《论平均数之取样误差》(沈有乾，四期，二卷一期，三卷一期) 等。在《心理半年刊》上刊有王书林的《相关方法之应用》(一卷一期，1934 年)。该文论述应用相关方法时应注意：(1) 相关只是两种特性之相伴的差异，毫无互为因果之意义存在；(2) 凡计算相关系数时必须计算此系数之机误，以求此数之可靠度；(3) 计算两种特性之相关时，必须将不纯之因子设法抽除；(4) 计算两种特性之相关时，必须设法将观察错误改正。另有郑大源的《测验的效度与信度》(一卷二期，1934 年)、曹仞千和杨时雨的《几种统计应用表》(一卷一期，1934 年) 等文。在《心理附刊》上还刊有译文，如徐淑洲译《多数加权项目的测验记分》和《便利测验记分的方法》(第四十一、四十二期，1936 年)。

7. 其他测验问题

有关能力测验方面，费景瑚《特种能力测验：工作中的心理分子》(《心理半年刊》二卷一期，1934 年)，作者介绍预测职业之特种能力测验，应采用分析工作的心理分子的方法。他以完成汽车轮箍工作为例，指出这项工作有分配注意、迅速反应、联合动作、判断距离等重要的因子，应就所着重的因子选择测验来测量工人。潘菽著《能力的意义及其测量》(二卷二期，1935 年)，对什么叫能力作了论述，认为人的能力是指一种行为表现而言，测量能力的方法有：(1)

抽例法；(2)分析法；(3)拟似法；(4)实证法。徐松寿译《高级心理缺陷团体中心理能力之分配和全距》(《心理附刊》第四十二期，1936年)也是谈这方面的问题。此外，在《心理半年刊》上，刊有郑大源《编造测验的过程》(二卷二期，1935年)，作者认为测验是引起人们反应之标准刺激，藉此引起反应，比较人的智慧、学业、品性、职业能力。作者叙述了编制一个可靠而标准化的测验，应注意的过程有确定测验目的、选择材料、注意效度、制题原则、预测修正、正式测验制定量表、检查效度、信度、客观性等，以及编订测验说明书。还刊有杨时雨《试编默读测验的经过》(二卷二期，1935年)。作者为了解学生默读能力、训练程度、各年级间相差程度而编造默读难度测验和速度测验。在《心理季刊》上，陈友松的《怎样知道你自己》(创刊号，1936年)介绍"内向——负向测验"。《心理附刊》上还有译文《社会与抽象的智慧之因素分析》(三十九、四十期，詹树干译)和《一个视觉记忆测验受成熟的影响吗？》(四十二期，徐松寿译)等。

（三）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

《教育心理研究》上心理测验研究对不同学科的测验有艾伟、丁祖荫、郭祖超《国语语顺测验的试验》(创刊号，1940年)。语顺是指语文中单字排列的顺序，用以测验儿童对于语文中单字顺序的认辨能力。同一期上还有艾伟、范崇德《小学国语四言词句测验编造经过》。杨清在二卷三、四期合刊（1944年）发表《小学国语默读诊断测验试编纲要》。作者首先阐明诊断测验的意义是教学方面以追本求源的探求学生某种能力方面的症结所在，并介绍国外的默读诊断测验研究。作者自行编造测验，提供我国小学教师用来诊断学生国语的默读能力。他分析默读能力应包含四种小能力：(1) 迅速浏览撮取大意的能力；(2) 经心详读，记取细节的能力；(3) 综览全章，挈取纲领的能力；(4) 玩味原文，推取含意的能力。分别编造四个小测验进行研究，其结论认为：(1) 默

读能力至少包含分析的四种小能力；（2）四种小能力的关系，彼此并不一律；（3）学生对于四种小能力精练程度，并不一致；（4）第四种小能力成绩最坏；（5）同年级儿童每一种小能力方面个别差异很大。算术测验方面，有艾伟、范冰心《小学算术应用题测验编造经过》（一卷二期，1940年）；生理卫生测验方面，有王舜山《初中生理卫生测验》（一卷二期1940年）。

警察心理方面，有丁祖荫在一卷三期（1941年）发表的《内政部普通警察测验之编制》。在三卷一、二期合刊（1945年）发表的《内政部警察心理测验之编制及推行》，作者叙述了当时认为“时代进步，社会变迁，警察任务，越趋繁复，日益特殊”，从事此工作除体格品学够某种标准外，其心理能力方面尤须具备各种特殊品质，此非考试所能测定，须运用心理测验。于1938年10月1日，内政部采用测验方法甄选优良警官，改善人员素质，增进工作效率。警政司组设“警察智力测验室”，专掌警察心理测验之编订推行事宜，并与中央大学心理系联系合作，肖孝嵘任该室技术指导。六年来，该工作一为编制，一为推行。已编成普通警察、警官、交通警察的智力测验及第一种官警品格测验、警政人员心理测验等。该报告对各种测验内容、推行情况均有详述。

儿童发展方面，有张德琇《儿童发展测验之编选》（三卷一、二期合刊，1945年）。作者编造该测验的目的在于分析儿童的发展特性，辨别其优劣，洞悉其个性差异，了解其发展倾向。它的功能有二：（1）预测，（2）诊断。是为了应社会各育幼机关的实际需要而编造。测验之内容与实施手续皆由育幼机关的实际情况考虑。测验分高低二级，低级由出生至6岁，为个别观察；高级由7岁至15岁采用团体测验。该报告为低级测验编造。编造原则有五：（1）内容依据儿童在动作、语言情绪、社会性与适应性等方面的发展情形混合编制；（2）材料依儿童的兴趣倾向；（3）测验

程度按年龄分组，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具体而抽象；(4) 年幼之测验注重自发动作，年长之测验注重语言思想；(5) 年幼之测验偏向自然情境观察，年长之测验偏向于实验情境之控制。报告中有测验项目举例。

有关智慧测验方面，肖孝嵘在三卷一、二期合刊(1945 年)发表《肖氏中学智慧团体测验之编制》。该测验是当时教育部门鉴于现代教育日趋于心理科学化，有采用各种心理测验的必要尤其是在中学的应用为进行教育指导与职业指导，委托肖氏编制。其编制原则为：(1)减少环境差异之影响；(2)顾及受试人员之兴趣；(3)避免主试之影响；(4)注意作答手续之简单；(5)防止猜度偶中之机会；(6)注意测验价值之保持。测验内容包括定向、删字、换算、分类、数序、同理、算理、概括八种测验材料。作者对测验编制的步骤、手续、常模的确定等均有详述。肖孝嵘在一卷四期(1942 年)上还有一篇关于"肖氏订正个人事实"表格第二种之初步报告。

在相关统计方面，有艾伟、郭祖超、张述祖合著的《相关心理学》(二卷三、四期，1944 年)。该文分三章共十五节：第一章介绍相关统计法之起源及其在心理学上之应用，引言中叙述到相关统计学的简史并分节介绍高尔登、魏尔敦和艾儿伟士；略述相关统计理论；高尔登和皮尔生在心理学上的贡献；个别心理和相关统计。第二章因素分析学说之发展中叙述了过去的官能心理学，能力研究在心理学上的贡献；桑代克的多因说；斯皮曼的两因说；凯莱及塞斯通的群因说以及汤姆生的取样说。并对心理因素学说作一般评论。第三章因素分析学说之比较研究中分节叙述了斯皮曼的两因说及四数相差；凯莱和塞斯通的分析技术。艾伟和孙敏在一卷四期(1942 年)上还发表了《大学入学、在学及测验三种成绩之相关研究》一文。

有关测验学方面：(1) 有郭祖超《曲线配合在测验学上之应

用》(三卷一、二期合刊，1945年)。作者主要介绍了艾伟首先运用曲线配合法于测验上的贡献并对我国20年代初麦柯来华倡导测验所创之TBCF制有所评论。(2)有曹飞两篇，一篇是《测验信度系数及其应用》(三卷一、二期合刊，1945年)。该文假定所有测验分数绝对的和相对的都可互相比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假定，倘若测验不能符合这个假定，可用种种统计方法补救。该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1)测验信度系数的断定；(2)此系数之应用。作者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一篇《论成业商数或努力分数》。(3)还有张述祖《按错计分作文测量法之研究提要》(三卷一、二期合刊，1945年)。作者假定初中以下程度之学生其作文之优劣，可以形成结构上错误之多少为指标。理由是文章为表现思想内容之工具，而非思想内容之本身，故测量作文应以其形式为对象而不应以其内容为对象。作者研究分析了初中以下学生之作文错误，共得36种情况。

九、社会心理①

(一) 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

《心理》杂志上社会心理类有文12篇；另分别在职业心理、商业心理、宗教心理、美术心理类各有文1篇；应用心理类有文3篇。现均归于此社会心理一项内，共有19篇。《心理》介绍其他杂志刊载的社会心理文章有28篇。

张耀翔的《民意测验》(1923年，二卷一号)，介绍首次利用测验法进行民众舆论的研究。该测验有8个问题，收到913份答卷。第一题：假如你有选举权，你将选举谁做下任大总统？答卷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载《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年，第57～58、76、74～76、100页。

中孙中山以压倒优势取得最多票。第二题：你赞成女子参政吗？有786票赞成。从测验结果反映了当时经过“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情况。罗志儒《“民意测验”的研究》(1923年，二卷二号）是作者继续对上述问题进行的研究。另提出“所选的总统是否即佩服的人？”“女子对于选总统问题持何态度？”等8个问题。张耀翔《国人之迷信》(1923年，二卷二号、三号）搜集了我国民间流传的迷信685条，如鹊鸣吉、鸦鸣凶、猪来贫、狗来富等等，从中分析迷信的起源和中国旧社会的心理状态。有关研究迷信方面的还有2篇：一为萧树棠《史籍迷信随笔》(1923年，二卷三号）。作者读史记、前后汉书，魏、晋、隋、唐及宋、明史与御批通鉴诸书，随录其迷信记载若干条，分纤纬、占梦经、征异三类，通过迷信，以考察中国古代人民的社会心理状况。另为李鑫铨《算命迷信的理解》(1926年，四卷一号)。

陶德怡《善恶字汇》(1924年，三卷二号、三号）汇列康熙字典，集中善（如仁、礼）恶（如奢、淫）字汇共882字，分门别类分析研究，以考察中国人的善恶心理与行为优劣，借以改进道德教育。

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1926年，四卷一号）据北京国子监各省进士题名的石刻碑（有进士的出生地），研究中国人才的产地分布。朱君毅《现代中国人物之地理教育与职业之分布》(1926年，四卷一号）根据名人录和中国年鉴所述人物共750人进行条分缕析，统计研究。罗志儒《出名与命名的关系》(1925年，三卷四号）用历代名人谱研究名字的笔画、意义、单名、双名与出名的关系。

卫中口授，由杜为笔记，杨维汉编述的《国心与国家》(1927年，四卷二号)，主要论述新心理学对于复兴中国国心的功用。

职业心理有任熙烈的《中国学生择业之倾向》(1925年，三卷

四号)，作者以问卷法调查男女学生850人，发现职业倾向：士多，商少；男生多选文、理，女生多选教、文；女对美术、医学兴趣较浓。

商业心理，有张耀翔《商人心理浅测》亦名《北京商店之招牌》(1925年，三卷四号)，作者认为“中国商店之招牌（即店之字号）实中国商店之箴、鉴、训、诫、座右铭、志愿书、祈祷文、缩小之广告也”。他利用北京电话局用户簿，借招牌窥测商人的心理，取生意较大者（如瑞蚨祥、同仁堂、文渊阁……）进行研究。

《音乐心理》(1925年，三卷四号）由林笃信译自美国《教育月报》，介绍音乐的来由，音乐与儿童生活、青年生活的关系，对音乐才能的分析，音乐心理分析等。

宗教心理，有邓萃英《儿童之宗教意识》(1923年，二卷二号）主要参考欧美、日本宗教心理书籍，采用日本学者的调查。

应用心理类有3篇：罗廷光《工作与效率》(1925年，三卷四号）介绍国外关于工作、效率、疲劳问题的研究，包括工作曲线、药物影响及男女工作效率的比较等。陆志韦的《应用心理学概论》(1923年，二卷三号）是一篇讲演记录，讲到应用心理学与医学、教育、工业、商业的关系。还有一篇萧树棠的《字相学》(1923年，二卷四号)。作者读骨相学而引起研究字相学，他对古代书法名家及今人（名人、学生、犯人）的字迹进行研究。他认为“凡写字必有想象、记忆、注意、判断、考虑、省美诸心理作用，故其字之敏捷徐滞皆可为心力强健或软弱表记”。

《心理》杂志介绍其他杂志的社会心理文章，有高卓《社会心理学概论》(《教育杂志》十八卷二期)，内容为社会心理学的问题、定义，关于集合意志说、群众心理说和组合心理说及其批评。此外有朱希祖《中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等4篇，其他均为译文。有罗素著念之译《欲望的解

剖》(《东方》十七卷二十三号)，麦陀那著乔峰译《死的心理》(《东方》二十卷十八号)，日本雀部显宜著味辛译《女性与自杀》等6篇。关于民族心理有谢普青《日本民族性的研究》(《东方》十九卷十八号)等5篇。关于群众心理有章锡琛《群众心理之特征》(《东方》十卷四号)、松山《群众的行为》(《东方》十九卷一号)、胡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一卷一号)和谢承训《洛士的群众心理》(《少年世界》一卷二号)等5篇。关于职业心理，有邹恩润《职业心理与职业指导》(《教育杂志》十七卷一号)，天民《职业适任之心理学研究》(《教育杂志》十卷七号)及译文介绍美国的职业心理学研究，失业人的心理检查与教育研究等6篇。商业心理2篇均为广告心理学的研究，为陈听彝的《广告学》(《新中国》第一卷第六号)，孙科的《广告心理学概论》(《建设》一卷二号)。

(二) 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

1934年《心理半年刊》(一卷一期)刊载陈剑修著《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意义和发展》，叙述心理学在其应用方面，心理实验可以用之于社会科学。实验社会心理学是利用实验方法以研究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如学习、模仿、感情、情绪、暗示等作用。还有与社会关系密切的心理问题，如舆论、宣传、选举以及政治运动等，他认为关于个人行为社会化的作用，把社会问题做实验研究是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新发展。1937年陈剑修还在《播音教育月刊》(一卷三期)上讲《领导与被领导的心理》，主要介绍国外社会心理学书籍上这方面内容。1936年《心理学附刊》(第三十四期)发表希撰写的《社会心理学之意义和派别》，作者从心理学的科学性质、历史来源分析了社会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并汇总了对社会心理学派别的四种分法：(1) 杨 Young. K；(2) 福尔荪 Folson；(3) 克鲁格和雷克利斯 Krouger and Reckless；(4) 陆志

韦。作者给社会心理学暂时下的定义是："社会心理学是一种科学，研究个人之行为，只要他的行为刺激他人，或其本人是对于他人的行为之反应。简括地说，社会心理学乃研究个人之社会行为，凡一个人对于他人之影响，总是行为问题，在一个人刺激而他人反应之历程中，已有了社会心理之原素。"这个定义代表了当时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看法。在《心理半年刊》(三卷二期，1936年）刊有季钟璞译之《儿童期与青年期的社会心理》，主要内容是说明儿童与青年在学龄时期受着各种的（家庭、学校、儿童社会的、成人社会的）社会压力，并举例详加分析。

关于民族心理的研究，1933年章益在《测验》(第三期）上发表《两个民族间伦理观念的比较研究》，认为伦理观念是一个人对于一件行为的伦理估价即其是非心，所认为应赞许的或鄙斥的标准。他曾对中、美大学生进行伦理测验的比较。1936年肖孝嵘在《教育丛刊》(三卷二期）上发表《中国民族的心理基础》，该文讨论中国民族与别国的民族在心理上的差异。作者用各种测验量表以中国、美国、日本三民族的成人和儿童作比较。结果表明我国人在智慧上并不弱于美国人和日本人，但机械能力则逊于美国人，在社会品质方面与美国人亦无显著差异。蒋舜年在《心理季刊》(二期，1936年）发表《中华民族的心理建设》。作者论述了"心理建设"的研究，始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以及我国旧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学说，其后相继研究的人不少，并提到当时提倡的"精神训练"与"心理建设"有极高相关。作者认为中华民族有贫、病、私、愚、弱、散六大病症，当时落伍，并不是本质上的缺陷，乃是用脑和养脑的问题，即教育训练经验的问题所引起。1936年，《文化与教育》(八十九期）刊有一篇译文《民族差别》叙述研究世界上各民族间心理差别的困难，有主观以及民族的特点改变的影响，测验也受地方性的限制，受语

言和速率等因素的影响。原著者认为如能用教育力量使各民族互相了解，则将来民族间的文化和思想将渐趋于同一，差别亦随之而减低。

关于群众心理方面，1937 年，孙礼银在《心理季刊》发表《群众行为的特性和个人在群众中的心理》一文，认为，群众是由各个个性不同而目的相同的个人组织而成，群众行为受感情支配，各分子的联系是靠社会的助长作用而存在，对于领袖命令是服从的，以及群众的态度难受旁者的劝导而改变，个人在多数人之中，有胆量增大、气魄勇敢等心理。

关于职业心理，我国教育工作者很早就感到职业指导和职业选择的重要并积极加以提倡。1929 年刘湛恩与潘文安即在《十年来之中国职业指导》一文中叙述了我国的职业指导尝试起始于清华学校及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部的工作情况。1934 年《心理半年刊》（二卷一期）刊有译文介绍《英国之职业指导与职业研究》（吴福元编译）和《比利时之职业指导与选择》（郭祖超译）。1936 年《心理季刊》（第二期）载有何清儒的《职业指导——一门基于心理学的学术》演讲，他说职业指导是帮助青年解决各种职业问题，包括职业选择、训练、就业、改业、成功诸问题，力求人与事业的适合为原则，以达到个人才能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为最后目的。职业指导的研究从两方面进行：（1）对人的研究，有个性、身体、智力、特殊能力、兴趣、性格的差异，个人已往所受的教育、环境的差别，个人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异；（2）对事的分析：职业的性质、环境、所需要的资格能力、工作的报酬等。关于职业的实际工作，有指导、训练、介绍、测验、调查、升学指导等等。何清儒还在《教育与职业》（第 172 期，1936 年）发表的《心理测验应积极推进》中论及心理测验对于职业指导的用途，测验工具不限于教育机关，许多工商机关也愿以有效力的科学方

法，使能得到适合的人才。关于介绍如何应用测验进行职业指导和选择的文章，有张文淑的《怎样应用测验来选择雇员》（《心理季刊》第二期，1936年），作者除介绍智慧测验外，还有测诚实、敏捷、可靠、创造力以及随机应变等各种行为特性的测验，单位技能的实业测验（如卡片分类测验、轻击测验、画字测验、校正数字测验等），表样部分的实业测验（用问句或其他方法把一种职业中的几个可作代表部分的技能复制出来，成为一个缩小的模型）等。肖孝嵘和宗亮东合作的《机械能力测验之标准化》（《心理教育实验专篇》三卷一期，1936年）应用“明内所达（Minnesota）机械能力测验”，以确定初三学生的机械能力作为实施劳作教育的根据和职业指导的标准。还有吴江霖著《修订塞斯通职业指导测验的预试之报告》（《心理半年刊》四卷一期，1937年）称所得预试结果，我国高三一学期学生和美国工学院大一学生在塞氏各种职业指导测验上所得分数相比较，前者逊于后者。塞氏各种职业指导测验与心理训练和高三一学期学生总成绩具有颇高相关度。此外，王书林也曾写有《职业指导与选择》（《心理半年刊》三卷二期，1936年）论述职业适合的重要性，职业心理的技术等问题；杨敏祺《马尔氏与杨氏之职业智力指数》（《教育研究》第67期，1936年），把自己所得的中国各种职业需要的智力指数与巴尔氏（Barr）的美国智力指数进行了比较研究。还有《测验》（二卷四期，1936年）发表的蒋振译的《找适宜的职业》和《教育与职业》（第173期，1936年）发表的祝雨人译的《选择测验的现况》等译文。

关于军事心理，肖孝嵘对此作过介绍，并应我国当时军队的需要，进行军人智慧测验和军官人格品质的实验研究。如他在《教与学》（一卷七期，1936年）发表《国防教育军事心理》，介绍了欧战时美、英、德、俄、日本等国的心理学团体，对于军人心

理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作者认为军人需有高的智慧，可以用“甲种军队测验”和“乙种军队测验”作检查。关于军人品质的培养，在技能和纪律方面，如研究练习的分配，学习的方法等，才能使之成为优良军人。他在《心理半年刊》(四卷一期，1937 年）发表《军官人格品质之分析》和《军官智慧团体测验之编制及其应用》。作者认为军官人格的品质与军事效率和军队中的风纪关系很大。可利用作者所订正的“勒氏内外倾品质评定量表”进行测验分析。作者认为他所编制的军官智慧团体测验，效率和信度均颇高，而且所需之时间和劳务又极经济，只需 20 分钟即可测出 150 人的智力程度。关于心理学在军事上应用的论述，一般分为战前、战时和战后之应用，以及对于防止战争的作用。如艾伟著《心理学在战争时的应用》(《心理半年刊》三卷二期，1936 年)，叶均生著《心理学在军事上之贡献》（《教育杂志》二十六卷十号，1936 年)，高翰著《心理与军事》（《哲学与教育》四卷二期，1936 年)，论述了战前应用心理学以甄别训练合格军人，采用心理测验，求得各种军事上适用人员和淘汰不适用人员；战争时期应用心理技术，发挥信仰力，强化憎恶心，精习机率论，巧合宣传战以及心理治疗术等；战后心理学则可用于伤兵处置及再施教育问题。此外，还有战争时期各界民众心理分析。大索著《战时民众心理检讨》(《汗血月刊》八卷四期，1937 年）论述了学生、农民、工人、中小商人、文化人、有闲阶级的战时心理状态。有关航空心理方面，对飞行员的选拔训练问题的研究，有王书林著《心理学和航空医学的关系》(《心理半年刊》四卷一期，1937 年）论述选择飞行员时应注意的心理因素及学习飞行时应注意的学习心理原则。

关于法律心理和犯罪心理研究，王书林在 1935 年《心理半年刊》(二卷二期）上发表《心理学在法律上的应用》，文中论述了法律心理学之范围，证词之估价，发现犯罪人之方法、原因问题

之研究及处分与预防问题。他在1935年至1936年《心理附刊》上（第十六期至三十三期）连载译文五篇；为柏替（W. F. Burtt）原著《法律心理》一书的五章，其中《法律心理学之发展》介绍法律心理学的起源、发展历史、范围；《感觉和知觉之差误》述及在估量证词之准确度时，应先考虑感觉和知觉中的各种错误，如视觉缺陷、色盲、听、触问题；《注意》、《记忆》和《暗示与催眠术》各文述及对证人的观察、证词准确度、应考虑注意的程度、适当的记忆方法以及向证人取得知识方法时特别要涉及暗示的可能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陈一百在《心理季刊》(第三期,1936年)刊有《怎样侦察别人说谎》,文中具体描述了颜色的改变,呼吸与脉跳加速,身体姿势、眼睛、口部、喉部的动作、声音等状态的变化。

关于人事心理、广告心理以及心理学在日常生活上的应用研究。关于人事心理方面，主要有何清儒著《心理学与人事管理》（《心理季刊》第三期，1936年）。作者认为凡是关于个人与工作的关系，个人与别人的关系，个人与机关的关系，一切事务的调和处理，都可以归纳为人事管理心理的范围之内。具体有：(1) 选取：什么事需要什么人才，什么人有什么能力；(2) 训练：什么能力应如何训练，什么训练方法最为有效；(3) 考核；(4) 升晋与调换；(5) 调剂；(6) 待遇；(7) 解职。关于广告心理方面，有章泳鎏的《怎样设计一幅动人的广告》（《心理季刊》二卷一期，1937年），文中提出广告学的三个基本原理：(1) 如何引起人们的注意；(2) 如何维持或把握人们的注意；(3) 如何使人们对于广告发生反应。1935年《心理附刊》上即有王人驹写的《售货术与广告》(第十五期) 和高光世节译的《广告心理之种种》(第十、十一期)。关于文艺心理方面，钱怀刚著《心理学在文学作品中的势力》（《心理季刊》第三期，1936年）。作者论述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常态、变态心理；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的心理基础。杨同芳介

绍《朱光潜著文艺心理学》(《心理季刊》第四期，1936年)，该书是从心理学的观点研究美学原理。还有《电影心理学及其应用》(向培良，《心理季刊》第四期，1936年)。关于心理学在其他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就更多了，如《从心理学来谈演讲的技术》(章颐年，《心理季刊》第三期，1936年)，《一个医生所应该知道的心理学》(潘菽，《心理半年刊》二卷一期，1934年)。《心理季刊》上有《衣服和工作效率》(章颐年，二卷一期，1937年)和《人类服装的心理》(肖传文，二卷二期，1937年)等等。

(三) 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

抗战期间，由于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需要，大力开展社会心理研究。针对当时出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情况，提出要"坚定必胜的信心，扫除萎靡颓废的风气，振作起身心，唤发起心灵，建立坚毅的意志和民族自尊心……"特别重视开展"心理建设"的研究和人事管理的研究，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出版刊物或丛书。如1942年在重庆成立了"中国心理建设学会"，出版会刊《心理建设》，以研究"力行精神"和"民族气节"为重点。又如1940年重庆成立了"人事心理研究社"，该社"任务以人事心理之知识与技术供给军、政、学、工、医各界，藉以增高各方面之工作效率，而奠定心理建设之巩固基础"。此研究社编辑丛书，有肖孝嵘著《人事心理问题》(1944～1945)和《心理建设之科学基础》(1945～1946)。肖孝嵘认为"人事心理"的目的系在应用心理学的知识技术来实现"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是目标，人事心理乃是心理建设的方法"。他在1943年已进行了六年对警政人员的选拔训练研究，以增进警政效率，为当时政治服务。此外，对民族心理研究较多，如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研究和比较民族心理的研究，进行我国人民的心理状态与他国人民的心理状态的分析比较，目的是振作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气节。

第五章 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上）

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从时间上说指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中国心理科学发展上说指的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创立时期的基础上，中国心理学在1949年10月之后近五十年来的心理学发展状况。本文将分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上、下两个部分，分别介绍中国心理学发展阶段与状况，中国台港心理学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心理学发展时期的主要研究、心理学基本理论与历史研究等。

第一节 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阶段与状况

中国心理学自1949年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来，大体上可以分成五个阶段：学习改造阶段，时间1950～1956年；初步繁荣阶段，时间1957～1965年；停滞不前阶段，时间1966～1976年；重新恢复阶段，时间1977～1980年；稳定发展阶段，时间1981～1997年。以下分述之。

一、学习改造阶段（1950～1956）

（一）心理学机构的建立、心理学研究与教学人员的调整和心理学科学规划的制定

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的最初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心理学的学习和改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视和关心。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不久，即开始筹备设立心理学研究机构。

其一，1950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计划局主持召开了一次心理学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心理学界和教育界人士，与会者一致希望早日成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同时期，丁瓒给南京心理学界（因当时中国心理学工作者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两地）去信征求成立心理研究所的意见。南京心理学工作者于1950年3月和4月两次在南京大学心理系实验室召开座谈会，交换了关于中国科学院成立心理所的意见，并对当时心理研究所如何建立提出了许多远见卓识的设想。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建立心理研究所筹备处，并将筹备处委员会名单（陆志韦为主任委员）呈报文化教育委员会备案。1951年3月，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任命曹日昌为所长，于同年12月心理所正式成立。1953年1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改为心理研究室，曹日昌为室主任。1955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第53次院务常务会议上提出1956年将南京大学心理学力量并入科学院心理研究室扩建为心理研究所。1956年3月，院常务会议通过上述决议，8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心理所，着手恢复中国心理学会的工作。全国各地心理学分会也陆续筹建和开始活动，包括1950年成立的南京、杭州、昆明、广州、武汉等分会和1951年成立的上海、福州、天津等分会。1953年10月中国心理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积极筹备改组心理学会的工作，办理重新登记会员（因旧中国心理学会很久没有活动，也未开过代表大会，会员有较大的变动），通知各地分会，准备召开代表大会等。为了加强与全国各地的联络工作，出版《心理学通讯》。随后于1954年4月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当时各地已有19个分会，批准成立心理所。1956年12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北京举行正式大会，潘菽任所长，曹日昌和丁瓒为副所长。由此标志着心理所学习改造阶段的结束，转向正式研究的开始，并由于当时其为全国

唯一的心理学专门研究机构，它代表了我国心理学界（包括以后各个时期）的心理学研究最高水平和心理学发展的趋向，成为中国心理学界的核心，起着带头和推动心理学事业发展的作用。

其二，中国心理学会的建立。1950 年 8 月在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时，出席会议的心理学代表及北京地区的心理学工作者陆志韦等 23 人于会后在清华大学成立中国心理学会。此时来自各方的信息均显示出成立中国心理学会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把心理学会总会建立起来，可以更好地加强和推动心理科学的学习改造与发展。1955 年 8 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有 70 余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把新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重新进一步团结起来，把心理学建立在马列主义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基础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大会的学术讨论中心是关于心理学的对象问题、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关系问题等几个基本问题，通过讨论初步树立对于心理现象的唯物主义理解和客观研究方法的原则。会议代表推选出理事会成员 17 人，潘菽为新中国心理学会第一任理事长，曹日昌为副理事长，丁瓒为秘书长。此时全国会员登记人数为 585 人。

其三，心理学教学机构的调整和心理学刊物的出版。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较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原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两校心理系部分合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了当时国内唯一的一个心理专业。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心理系保留，但后者于 1956 年又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其他高等院校心理系则分别并入一些高等师范院校及部分医学院、体育学院，成立心理学教研室或组。

在这一阶段，《心理学报》正式于 1956 年出版发行，为中国心理学会的会刊，曹日昌任主编，编辑部设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编译室。同时，中国心理学会在1956年至1958年还曾出版《心理学译报》，吴江霖任主编，每年6期，主要介绍苏联心理学重要论文。

1956年上半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许多科学家参加的科学规划会议。会议历时几个月，制定了各门科学的12年(1956～1967)发展规划。心理学作为基础科学之一，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参加科学规划会议的心理学家为主，也制定了我国心理学12年的发展规划。拟定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规划包括：①心理的发生和发展研究；②基本心理过程的研究，以视觉、听觉、语文和思维、记忆为重点；③个性心理的研究；④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心理学史的研究，其中心理学史以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为重点；⑤专业心理学的研究，包括教育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国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体育心理学等，其中以教育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国防心理学中的航空心理学以及医学心理学为重点。在规划中确定1956年将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而将心理研究室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这个规划在当时对我国心理学界起了一定的指导和鼓舞作用，使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明确了心理科学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明确了心理学在我国整个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和在我国积极发展心理学的必要性。这一心理学12年发展规划后来因客观情况变化，制定不久，未再适用。

（二）心理学的学习和改造工作

当时，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形成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及苏联心理学的热潮，认为学习苏联心理学就可以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提出了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在巴甫洛夫学说基础之上改造心理学的口号。这是根据1950年夏，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关于巴甫洛夫生理学说和科学会议上，指出的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是心理学的自然

科学基础。继这个会议之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又在1952年夏举行了心理学问题会议，会议决定了心理学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这两次会议之后，认为中国心理学也应和苏联心理学一样，必须依据马列主义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才能建立科学的心理学。这个阶段的心理学学习、改造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辩证唯物论哲学的学习。在这个阶段里，中国心理学工作者致力于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和《矛盾论》、《实践论》，以及参加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心理观，即人的心理是人脑的机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离开了人脑和客观现实就没有人的心理。并试图开始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复杂的心理现象。

其次，巴甫洛夫学说和苏联心理学的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巴甫洛夫的经典著作：《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和《条件反射演讲集》，及伊凡诺夫·斯莫林斯基的《病理生理学概论》和贝科夫的《大脑皮层与内脏》等四本书及有关资料。这一学习活动自1953年春先是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后于1953年夏起，在北京、天津、昆明、西安等地先后举办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参加学习会的有数千人，形成了全国性的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高潮。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对中国心理学工作者重视心理的生理机制的研究和对条件反射实验法的应用，都有积极的意义。通过学习，广大心理学工作者比较系统地和正确地掌握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解了高级神经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关系问题，且能初步地运用巴甫洛夫学说的观点来确立心理学研究的选题、内容和步骤，并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同时，中国心理学工作者也积极地学习苏联心理学，特别是教育部于1952年先后聘请了苏联心理学专家来华讲学，进一步掀起了学习苏联心理学的高潮。如1953～1955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开设心理学进修班（为全国各师范院校心理学教师）和研究班（为教育系毕业生培养为心理学研究生）的学员聆听苏联心理学专家彼得罗舍夫斯基和彼得罗夫斯基讲授的心理学课。又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也参加学习苏联心理学专家的讲课。同时，在参照其他心理学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学习和讨论苏联心理学中的各种学说理论，如动物条件反射的实验研究、巴甫洛夫分析器学说、伊凡诺夫·斯莫林斯基等关于两种信号系统的协同活动的实验研究、捷普洛夫关于类型的实验研究等。通过这些学习，对苏联心理学的一般情况及有关主要成就有了基本的了解。

再次，在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改造心理学。通过学习，广大心理学工作者初步掌握了条件反射实验方法，建立了动物和人类条件反射实验室，验证巴甫洛夫学说的经典实验。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即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一，在发生心理学方面，对动物条件反射远近差交替分化法，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类型鉴定等进行探索性实验，印证了巴甫洛夫学说的理论为研究人的心理发生和发展作准备。其二，在感知觉方面，根据巴甫洛夫分析器学说进行知觉心理研究。对运动知觉产生"似动现象"有关因素的探究，附加信号对"速度判断"的影响等问题。这对阐明运动知觉的条件和机制是有意义的。其三，在言语思维方面，对儿童第一和第二信号系统的相互动力传递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实验，在实验方法和结果上对伊凡诺夫·斯莫林斯基的以语言强化研究运动性条件反射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与补充。进而进行以听觉及图形为主要刺激的两种信号系统相互传递的实验研究及思维概

括化过程的实验等。其四，在个性心理方面，就基本神经过程的程度、高级神经活动的接通机能等方面进行实验研究，以探索对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的鉴定方法，等等。又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也建立了动物条件反射实验室并开展了有关实验研究。

最后，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在学习改造阶段，中国心理学工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苏联心理学为借鉴，开展了对心理学的对象、任务、方法和学科性质等一些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并作了试探性的研究。在基本理论方面，探讨了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关系问题，并形成了三种看法①，即同一说、对立说和区别统一说。通过讨论，我国绝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同意第三种看法，即认为高级神经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而明确了心理活动是和高级神经活动分不开的，心理活动的规律是受高级神经活动的规律所制约的，应该充分运用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研究成果来揭示人们心理活动的规律和生理机制。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研究中，试图运用巴甫洛夫学说解释说明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情感及个性特征等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问题。当时的一些关于心理的生理机制的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出发点即是上述讨论得出的这种结论。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还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心理学的几个主要流派，如构造学派、实用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特别是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心理学观点等进行了分析批判。这项工作对当时的心理学改造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① 陕西师大教育系：《中国心理学三十年》，载《心理学报》1979年第3期，第256页。

二、初步繁荣阶段（1957～1965）

（一）心理学如何联系实际问题的讨论

1957 年，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对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脱离实际的倾向开展了对心理学如何联系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的讨论，这使心理学工作者充分认识到科研工作要密切联系实际的必要性，并到各实际部门开展工作，推动了应用心理学的发展。在劳动生产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生产建设向心理学提出的主要配合任务。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与工业生产部门联合举办了操作合理化讲习班，改进了冲压工等的操作方法，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他们还在心理学理论与实际应用方面作了一系列尝试性的实验，例如，对联想和“原型启发”在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中的作用开展了研究；运用视觉心理学原理，对转炉炼钢工人操作中“掌握火候”的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对生产事故的发生和预防事故、安全生产作了深层次的心理分析。在临床医学方面，特别是预防医学领域，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与医务工作者密切合作，开展了神经衰弱等慢性病的综合快速治疗的试验，充分发挥了心理治疗的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等等。

在当时良好的心理学研究局面下，我国心理学界相应地修订了“心理学十二年发展规划”，强调了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研究。1958 年 3 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会向全国心理学界发出“苦战三年，创新局面”的号召，提出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的最低奋斗目标是：争取三年内在解决我国劳动生产和教育事业上所提出的有关心理学的最迫切、最普遍的问题方面作出显著成绩。

（二）1958 年的心理学“批判运动”

正当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刚刚踏上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道路，并准备大显身手的关键时刻，由北京师大发起了一场心理学批判运动。1958 年 8 月，在极“左”思潮的煽动下，北京师范

大学部分教师和学生发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的运动。他们把一些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相混淆，采取把科学连同科学工作者一棍子打死的极端粗暴武断的做法，不仅把我国心理学进行改造的成果一笔抹煞，加上“生物学化”、“抽象化”、“抹煞人的阶级性”等罪名，打成“伪科学”，而且把在心理学界有影响、有贡献的心理学家当作“白旗”来拔，使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积极性遭到严重的打击。在进行批判的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又通过批判心理学教材而汇编成两本《心理学批判集》交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光明日报》抢先报道了这个批判运动，从而引起了遍及全国的连锁反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批判运动无论是方向还是方法上都是错误的，它给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直接的严重的损害，是建国以来我国心理学界第一次遭受的最大的挫折。

（三）“批判运动”的纠正和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

为了纠正1958年心理学批判运动的错误，我国心理学界于1959年召开了两次由北京心理学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会议涉及到批判运动中关于心理学的几个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心理学对象、方法、任务和学科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这次座谈会以及学术讨论，为消除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思想混乱、理论混乱和低落情绪，为全面开展心理学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扫除了障碍。在讨论中，广大心理学工作者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我国心理学界在学习改造和建立中国心理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就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广泛交换意见，畅所欲言。这一学术讨论当时以一种异常迅速的势态在全国展开，演变成一次争论激烈、规模空前、持续数月的学术大讨论，从而标志着中国心理学已经进入了百花争艳的初步繁荣时期。

在这次学术大讨论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胡乔木同志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及有关大学的心理学工作者讲话，为纠正错误起了决定性作用。1958 年 9 月，胡乔木同志在与有关人员谈话时，就心理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的意见主要是心理学应研究人脑如何工作的问题。他曾说[①]："心理学搞出新局面，单纯在教科书范围内去争论，争论到后来就没有了，破产了。要开拓一个新局面……可以研究心理过程根本理论问题。机械学研究脑子作用的电模拟是否是心理学范围？心理学和生理学界线也很难划，如果机械可以按人的思想去行动，那就超过生理过程，而进入心理学范围。这种东西给心理学一种新的光线。美国研究控制论，也是类似这种方向，用机械活动模拟人类活动的特殊规律。也许将来真有电脑，用办法来帮助人保存记忆。"1959 年 3 月，胡乔木同志针对当时心理学批判中的一些问题，向心理所潘菽、曹日昌等人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心理学研究对象是心理、意识。意识的形成有生物学的基础也有社会制约，心理学不能解决阶级性的问题"，强调"心理学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基础"，"阶级性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点，说只有阶级性是错误的"，"人的心理活动是有共同规律的"。他还说"心理学的性质是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这叫边缘科学或中介科学"，"心理学应研究意识起源，要靠这些研究成果彻底战胜宗教和唯心主义"，"联系实际的工作要搞，理论研究也要搞"。他鼓励心理学工作者"不能怕一时无成绩，不要怕挨骂，心理活动是最难研究的，不能在困难问题面前退却，困难问题也就是大有希望的问题，这就是最尖的尖端"。还是在这一

① 胡乔木关于"科学简讯"的谈话记录稿中有关心理学问题的部分。转引自赵莉如著《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内部发行，1996 年版。

年的3月，胡乔木同志在听取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心理学教师汇报心理学工作时，又对心理学谈了看法，主要阐述了人有共同心理规律的问题等，认为“研究心理学是有意义的，它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缺少的”，“人的共同的规律就是心理学的对象”，“对那些把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学的同学来说，还要对他们做些工作，要使他们稳定下去”。胡乔木同志的这几次谈话，给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很大启发和信心上的支持，为扭转1958年心理学批判中的错误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中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这次学术大讨论的基础上，中国心理学会于1960年1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心理学会的正式代表61人，连同列席代表共计100余人。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报告共142篇，内容包括教育心理、劳动心理、医学心理、生理心理、心理学基本理论以及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会议制定了心理学科三年发展规划，选举了新一届中国心理学会领导班子，潘菽为理事长，曹日昌为副理事长，尚山羽为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澄清了1958年心理学批判运动造成的混乱思想；总结了1959年以来我国心理学界开展的关于心理学对象、任务、学科性质和方法等问题争论所取得的成效，如明确了心理学研究的方向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把重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上，同时不应忽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任务上，心理学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或反映的形式或过程，而不是内容；心理学的对象是既要研究阶级的特殊心理活动的规律，也要研究人类心理的共同规律；在研究方法上，心理学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因此，除阶级分析外还须使用其他方法；在学科性质上，多数人认为心理学是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自此会议后，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初步繁荣景

象已初步出现。

（五）中国心理学界的大协作

为了广泛开展教育心理学研究，充分动员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心理学工作者参加为教学改革服务，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从1959年9月开始与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20所高等师范院校开展了心理学研究大协作。他们以“全日制中小学学制改革”为中心，广泛开展儿童心理、语文教学心理、数学教学心理、劳动教育心理等方面的研究。通过一年多的研究，他们就写出论文47篇。1960年9月，他们又进行第二次协作，并把研究领域从教育心理拓展到劳动心理、医学心理及脑电生理机制的研究。通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协作，我国心理学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获得了对教学改革起积极作用的成果，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心理的研究方向，提高了研究者的科研水平，带动了全国开展教育心理学及将心理学理论紧密结合实际的研究。

（六）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中国心理学界两次大规模的协作，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组织召开的全国教育心理专业会议及成立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2年2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举行了教育心理专业会议，参加者有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心理学会的代表及北京有关心理、教育、保育工作者等200多人，会议收到论文和资料共102篇并于会后出版了《教育心理论文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儿童心理年龄特征问题，并拟出研究规划初步意见。为了加强今后教育心理研究工作的组织和活动，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组织条例，成立了以潘菽等26人组成的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推选陈元晖、朱智贤、刘静和、孟昭兰、郑俊选五人为委员会的常务小组。这一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国心理学界教育心理研究的领导力量，进一步促

进教育心理学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开展。在随后（1963年）举行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一次学术年会上，提交儿童心理学论文59篇，教育心理学论文94篇，共153篇论文占全部年会论文总数203篇的75%，这一结果便是对我国儿童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充分反映。

（七）心理学十年规划的制定与贯彻

1962年3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组织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简称科学发展十年规划，其中生物学规划中包括心理学等13个学科。心理学科成立了一个六人规划小组并负责制定心理学十年规划。规划小组根据心理学学科体系和当时国际心理学的发展情况与国内情况的需要及心理研究所以基础理论研究为首要任务的精神，制定了有六个研究领域的规划，其主要内容有：①心理过程（感觉、知觉、记忆、学习、思维、情绪、意志）；②个性（能力、性格、个别差异）；③心理发生发展（动物心理、婴儿和学前及学龄儿童心理、少年与青年心理）；④病理心理学（精神病与神经症心理、器官缺陷与智力落后心理、脑病伤心理、药物心理）；⑤教育心理学（教学心理、学科心理、德育心理）；⑥劳动心理（工程心理、特殊工种选拔训练心理、劳动操作分析）。由于我国心理学原有基础比较薄弱，仅有少数研究领域（知觉、学习、记忆）稍有基础，多数领域基础薄弱或尚属空白，故在十年内（1963～1972），限于人力与条件不宜全面发展，主要力量放在基本理论研究领域，注意掌握应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技术，探索新方法，提高研究工作水平；配合教学改革发展教育心理学；同时以适当力量从事国防及工业生产有关问题的研究。该规划还是轮廓性的，为了执行和实现，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是该规划中各领域主要执行单位之一和负责联系单位，而全国各有关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则要根据规划制定自己的规划和计划。

为了贯彻心理学十年规划，1963年12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北

京召开全国第一届心理学学术年会。参加者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心理学会代表85人及北京市有关心理、教育、保健等工作者共200余人，收到论文203篇。内容涉及普通心理、儿童心理、教育心理、劳动心理、医学心理、生理心理、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史等各方面的论文、报告。会上贯彻十年规划，明确分工和努力方向，号召心理学工作者在今后的学术工作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密切联系实际，提高方法水平，加强理论研究，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次学术年会为后来九年的心理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会后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心理学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八）中国心理学界各方面初步繁荣景象的呈现

首先，根据中宣部陆定一同志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应当发展，除调些人给心理研究所以外，要考虑指定一批综合大学和师范学院办心理系"的指示，在此时期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南京师范学院等，均设有了心理专业，培育了一批专业人员。1960年7月至1961年9月，心理研究所自办训练班，从黑龙江和江西省招收高中毕业生30人，培训一年后拟为各研究室的研究辅助人员（后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全部送回原籍黑龙江师院和江西师院就读），并积极调进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来心理研究所参加工作。至1965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已增至150人，新建了感知觉实验室、记忆实验室、思维实验室、脑电实验室等一些水平较高的实验室，配备了当时较先进的设备。在心理学研究技术上重视对信息论、控制论、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模拟的研究，吸收了当时国际上的一些先进方法。还开展了与国际心理学界的联系，在解决工业、国防、医学、教育方面的综合性和关键性的心理学问题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同时，全国已有24个省级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增至1056人。我

国各心理学主要分支的学术队伍已开始逐步形成，为我国开展心理学的学术研究作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其次，在这一时期，在1961年根据文科教材规划的规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综合性大学心理学专业及高等师范院校的心理学教师共同合作，由曹日昌主编《普通心理学》。他们以苏联斯米诺夫著的心理学教材为蓝本，参考美国波林、武德沃斯等人的心理学书，尽量采用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的材料编写而成，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编著出版的第一本高等院校的普通心理学教科书，该书上册于1963年出版。1963年潘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也是我国解放以来出版的第一本教育心理学教科书，注意吸收国内新近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教育实践的需要。朱智贤主编《儿童心理学》，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自己编著的第一本儿童心理学教材，该书于1962年出版。这三本书对提高中国心理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再次，中国心理学会为适应心理科学发展的需要，于1964年8月又创办了第二个学术刊物《心理科学通讯》，刊登研究报告、论文、经验交流、学术动态等有关文章。该刊物最初在北京编辑出版，丁瓒任主编，1965年起中国心理学会委托上海心理学会办理，主编王亚朴，副主编朱曼殊、李伯黍。此时，中国心理学会出版的《心理学报》已成为有广泛影响的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有的已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受到国内外心理学家的重视和好评。

最后，在这一时期，我国心理学界的学术研究也初步显示出繁荣景象，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基本理论方面，对心理学的对象、任务、方法、学科性质、人的心理发展的动力问题等进行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普通心理和实验心

理方面，有关于触觉、视觉和动觉定位的感知觉研究；有关于空间知觉中的大小距离知觉、深度知觉、方位知觉等研究；有关于不同感觉通道对不同识记的影响及不同记忆方法的比较研究；有图形特点对思维影响的研究。在发展心理和教育心理方面，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主要涉及儿童年龄特征和思维的发展，如儿童概念发展的实验研究、记忆能力发展的研究、语言发展的研究等；教育心理方面有小学生识字方法研究、儿童六岁入学问题研究、小学生掌握应用题结构的研究、掌握知识过程中的记忆与思维特点研究，以及德育心理的研究。在生理心理与医学心理方面，生理心理的研究主要包括应用条件反射方法对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以及应用脑电和皮电的研究。如儿童的复合刺激的条件反射的特点、正常和异常儿童的高级神经活动、人类定向反射的脑电与皮电研究等。医学心理的研究主要涉及神经衰弱、高血压和精神分裂症，如与医学工作者协作进行的对神经衰弱等慢性病以心理治疗为主的综合快速治疗研究、针刺麻醉中心理因素影响的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机能特点的研究等。在工业心理方面，有水电站中央控制室信号显示的研究、教室与工业用房的照度标准研究以及仪表工业中表盘设计的心理学研究等。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已近乎涉及心理学的各重要分支，既有理论上的探讨，也有实验室的研究，并且从成果上来看，大部分研究是针对我国实际而展开的，其结果可直接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实现了心理学学习改造之后将心理学直接应用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

三、停滞不前阶段（1966～1976）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心理学事业遭受到建国以来第二次，也是最大的挫折，心理学研究中断达十年之久，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阶段。

（一）姚文元发表污蔑心理学的文章

正当我国心理学显示出初步繁荣之时，姚文元（当时化名葛铭人）于 1965 年 10 月 28 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的文章，他诬陷心理学的研究是所谓“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反科学的”，毫无“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将心理学污蔑成资产阶级伪科学。这是我国心理学界遭受致命灾难的前奏，也是 1958 年“心理学批判”的延续和翻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姚文元攻击心理学的文章被当作批判心理学的法典，稍有不同观点的人一律被排斥打击，以前的心理学工作被全盘否定，心理学被严严实实地套上了一顶“伪科学”的帽子。

（二）心理学一切活动被迫停止

由于心理学被定罪为“伪科学”，因此“心理学必须彻底砸烂”，于是中国惟一心理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于 1970 年 7 月被正式宣布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心理学教研室被停止开设一切心理学课程，实验室被拆毁，实验设备和仪器被砸烂，心理学图书资料被禁阅甚至烧毁，中国心理学会被停止活动，《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通讯》被停刊。由此，一切心理学活动被停止，从而使我国心理学事业遭受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广大心理学工作者被迫中止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员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少数人被迫改行，更有一些人遭到残酷迫害。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心理学工作者身上也毫无二样地发生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扣在一些心理学工作者的身上，很多有造诣的老一辈心理学家被迫停止了坚守数十年研究的心理学领域的活动，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精力充沛正在盛年的青壮年心理学工作者被迫离开了正欲大展宏图的心理学阵地。我国现代心理

学发展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曹日昌同志竟被迫害致死。而这段时期的国际心理学正进入近二三十年的迅速发展时期，而我国本已有60年代初期的初步繁荣基础和继续向前良好发展的势头，却因此时被迫停顿了十多年，使我国心理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更加拉大了距离。

（三）少数心理学工作者坚持心理学研究

然而，在那动乱黑暗的岁月里，在极端困难的研究条件下，我国少数心理学工作者依然独立坚持心理学的研究工作。他们或设法参与针刺麻醉的研究，或编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心理或心理学的论述，或继续进行心理学的著述工作，或深入工厂、学校和医院等实际部门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社会对心理学的需要，从而保证了心理学不至于在那种极端的时期丧失殆尽。

（四）心理所逐步开展少量的心理学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干校劳动三年后，于1972年5月回到北京，先是参加了学习班，组织了关于心理学学科性质问题的学习讨论，并先后访问了有关单位和专家，征求他们对心理所过去工作的意见和今后工作的希望和要求。实践部门普遍欢迎心理所参加有关工作，肯定过去某些工作的成绩，给予了大家鼓励和支持。同时，还对国际心理学动态，进行了一些资料收集工作。大家还对心理所17年来研究工作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开展研究工作的初步设想，开展了少量的研究工作。当时，他们主要在感知、记忆、思维等心理过程的基本规律和生理机制的研究，以及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等两个重点课题上，首先进行研究。并且还开设了心理学理论、航空心理和针刺麻醉中的心理学问题等三个专题，以逐步恢复心理学的研究工作。

自进入1973年以后，我国心理学研究领域逐渐拓展，与外单

位的科研协作又开始得到加强，如心理研究所即与外单位协作开展了几项有一定影响的科研工作，[①] 包括与生理物理所等单位协作进行的激光的生物效应研究；与北京市妇产医院针麻组协作的心理因素与针麻效果的关系研究及临床应用研究；配合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字的工作进行了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心理学研究，对新简化字优劣的调查研究；配合教育改革进行初中学生自学数学的思维能力的发展研究，自编代数“有理数”的“启、读、练、知”教学的试验教材，等等。

然而，从1973年下半年起，我国心理学研究又被迫时停时作，出现不正常的反复。其中有1973年下半年和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对“开展心理学工作请示报告”的批判，提出对心理学要批判改造等。再就是1975年继续受“批林批孔”运动极“左”路线影响，使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任务摇摆不定，当时认为“总目标应是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心理学的反动思想体系，为建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为三大革命实际服务的心理学而努力奋斗”。在此前后，心理学的科研工作虽说一直在进行并有所发展，但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正常的心理学研究工作。

所幸的是，到了1975年10月，胡耀邦同志来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了解了心理研究所的过去和当时的科研情况及国内和国际心理学发展概况后，针对心理学工作和心理所的研究方向及组织，发表了重要谈话。他的谈话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心理研究所的方向任务问题，他认为首先是研究所自己要掌握方向，“在你们面前有心理学的珠峰，你们现在爬了多少？跌了多少跤？走了弯路，跌了跤没有关系，人不跌跤成长不起来，你

① 赵莉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内部发行，1996年版。

们登不上去，下代再攀”。“心理学我想可能是有更大发展”。“你们能向哪个方面攻击前进，你们就努力”，“从研究中、争鸣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世界上存在这门科学，就有研究的价值”，“方向任务就不要提了，从此就明确了”。胡耀邦同志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心理研究所的领导班子问题，他很关心过去的老所长，对心理所，认为要恢复所长，还要有个党委书记。最后他确定心理研究所设“一个所长，两个副所长，其中一个是副书记，一个党委书记，这四个人组成领导班子，大体上定下来，另外，设党委会，半月、一个月开一次会，讨论大政方针”。① 当时胡耀邦同志的谈话不仅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重新激发起心理学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关于方向任务上的看法，对于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然而，随后不久中国又掀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受到了批判，政治活动再次重重地影响到学术活动，也破坏了心理研究所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面，降低了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热情，这一现象一直到 1976 年 10 月止。

四、重新恢复阶段（1977～1980）

自 1976 年 10 月起，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心理科学也由此获得了新生，进入了一个重新恢复阶段。

（一）中科院心理所及我国心理学各种有关教学与科研组织的恢复

1977 年 6 月，国务院批示：“恢复心理研究所是很有必要的。”从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正式恢复，潘菽恢复所长职务。之后，教育系统的科研与教学组织也陆续得到恢复和发展，北京大学、华

① 以上有关胡耀邦同志的讲话转引自赵莉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内部发行，1996 年版。

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杭州大学相继建立了心理学系，为我国尽快培养心理学后备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外，在人才培养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及有关高等院校率先于1978年开始培养心理学的高层次人才，招收了中国“文革”后的第一批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二）心理学学科规划的调整

为了将中国心理科学的发展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科学院推动下各门学科制定新的长远科学规划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组织于1977年8月在北京平谷召开了全国心理学学科座谈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3位代表参加。会上拟定了规划初稿，后经修改作为草案，由心理研究所分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规划》草案[①]除前言外，共分四部分：其一，外国心理学概况；其二，奋斗目标；其三，研究项目；其四，实现规划的措施。在研究项目中又分为心理学基本理论、感觉与知觉、思维与记忆、心理发展、生理心理、教育心理、工程心理、医学心理研究等八个方面。在每个方面均按国内外概况、三年计划、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安排的。《规划》的奋斗目标，以三方面的研究作为重点工作：一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规律及其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对视觉、听觉、痛觉以及思维与记忆的研究等，同时开展结合实际的应用研究，解决教育、工业、国防、医疗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二是“心理发展的研究”，研究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研究学习与发展的关系，以及作为人类心理发展前史的类人猿等的智慧；三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研究教学中的心理学原则，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注意开展学生能力、品德培养中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规划》要求中国心理学工作者要认真学好马

---

① 赵莉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1996年内部发行。

克思主义哲学并作为指导思想，提高业务能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充实和完善设备条件，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如在心理过程方面，即要求三年内侧重基础较好的感知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同时解决一定的有关实践的课题；八年内继续这些工作外，在心理过程的生理机制方面积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在思维记忆方面，初步创出自己的发展道路，等等。《规划》对全国心理学各研究和教学机构，提出“可依据本身的情况在工作上有所侧重，订出自己的规划”的要求，如高等师范院校的心理学研究和教学机构肩负着为教育实践提供心理学理论依据的重要任务，以儿童和青少年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为主等。

《规划》会议结束后，各位代表即回到单位传达会议内容和精神，积极开展工作，争取已转行的同仁归队，恢复已停办的教研室，恢复心理学的教学活动，重新开展实验研究，从此心理学界开始复苏起来。现在看来，《规划》是一个比较详细和全面的心理学学科发展规划，对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它促进了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中国心理学会活动的恢复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指出“科学技术协会和各种专门学会要积极开展工作”的精神，中国心理学会于1977年11月召开了在京常务理事扩大会。这是制定《规划》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总会恢复工作和各地分会恢复活动的问题。潘菽在会上要求把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动员起来，相互配合，加强协作，落实《规划》，使心理学在23年内赶超目标中要有创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要有雄心壮志，建立起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心理学。徐联仓和赵莉如则分别介绍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中有关心理学方面的

科研任务和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对《规划》的落实情况。会议最后以简报的形式号召各地分会在本地科协支持下和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号召很快即被积极响应。

首先，中国心理学会召开全国心理学专业学术会议。1978 年 5 月，中国心理学会在杭州召开评论冯特心理学，讨论和落实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全国心理学专业学术会议。评论冯特心理学是为 1980 年第 22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纪念实验心理学家冯特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一百周年作准备，同时研究总结一百年来心理学的经验与教训。又因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在我国心理学界人力雄厚、研究成果最多、实用最广及最有条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心理学领域，会议确定了教育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公共课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等教材的编写计划，明确了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引起了与会者对心理学基本理论工作的重视。

其次，两届全国学术年会的召开。1978 年 12 月，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23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和资料 248 篇，内容包括心理学基本理论、普通心理、发展心理与教育心理、医学心理、生理心理、工程心理及体育心理。会议划分了四个分组，即发展心理与教育心理；普通心理与工程心理；医学心理与生理心理；心理学基本理论组。这次年会相距上届学术年会（1963 年）15 年，是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文革”后的一次盛大聚会。会议肯定了过去的成绩，并总结了经验教训，为心理学恢复了名誉。会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心理学，心理学一定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了适应心理学分支学科的发展，会议讨论通过了有关重建发展心理与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组建体育运动心理专业组，成立医学心理专业组及成立编辑出版委员会与进一步健全学会两

个刊物的编委会等事宜。

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心理学基本理论讨论会，并正式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会（后改为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会议上明确了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工作的方向和内容，交换了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看法。1979年4月成立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科普工作委员会，并在北京师范学院召开了北京地区委员首次会议，会上讨论了“开展心理学科普工作的初步意见”。1979年9月中国心理学会医学心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昆明召开民族心理和精神病学考察组会议，筹建了民族心理与精神病学考察组。

1979年11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天津举行第三届学术年会，有28个省、市、自治区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工作者和相关学科的工作者35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收到论文、报告、译文资料等400余篇，涉及心理学基本理论、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发展心理与教育心理、医学心理、工程心理、生理心理、体育心理。这次年会以专业分组学术交流活动为主，共划分五个分组，即发展心理和教育心理组；普通心理、实验心理和工程心理组；医学心理和生理心理组；心理学基本理论组；体育运动心理组。代表们广泛交流研究成果，讨论各种学术理论问题，研究如何加速实现心理学本身现代化的步伐，心理学工作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以及各分支学科近、远期研究规划和协作分工等问题。年会期间，在中国心理学会发展问题上，讨论批准建立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工程心理专业委员会、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等。在第三届学术年会结束后，还继续举行了三天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40余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心理学普及工作的专业会议，代表们交流了科普工作经验，讨论修订了心理学科普工作规划（草案）及现代心理学

科普工作丛书编写计划。

至第三届学术年会闭幕时至，中国心理学会从1978年起已先后分设了七个专业委员会、一个工作委员会和四个编辑出版委员会，即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心理学报编辑委员会、心理学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心理学学科名词委员会、心理科学通讯编辑委员会。同时，中国心理学会的28个省、市、自治区分会均已恢复和建立，全国已有会员1649人。各分会在组织机构建设与完善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我国心理学研究从总会到分会都出现了朝气蓬勃的兴旺景象。

最后，心理学刊物的出版发行。中国心理学会会刊《心理学报》自1966年停刊后，已于1979年8月复刊，其编辑部设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编为潘菽。《心理科学通讯》也于1980年6月复刊（1991年改为《心理科学》），编辑部设在上海师大心理系（上海师大后改名为华东师大）。编辑部设在杭州大学心理系的《外国心理学》（现改为《应用心理学》）也于1981年出版发行。此外，一些内部发行的专业性与地方性刊物，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学参考资料》（现改为《心理学动态》）以及《四川心理学动态》（现改为《四川心理科学》并正式出版发行）、福建《心理学动态》、《河南心理学通讯》等都受到好评和欢迎。

（四）积极开展与国际心理学界的交往

中国心理学事业自进入重新恢复阶段以后，还积极开展与国际心理学界的交往，从而为掌握当时心理学界的信息和最新研究动态，以及调整研究方向和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1978年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派出徐联仓、荆其诚和李心天，以中国心理学会的名义出席澳大利亚心理学会第13届学术年会。1979年中国心理学会派出荆其诚出席美国心理学会第87届学术年会，并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系协作研究一年。在这两次国际会议上，我国心理学家介绍了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和作了科研论文报告，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欢迎。参加国际会议使我们扩大了视野，与各国心理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打开了交往的渠道，交流了学术，学习了先进技术，增强了与各国心理学界的密切合作。

其次，为使中国心理科学早日走向国际舞台，197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心理学会提出加入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简称国际心联）组织的申请。1980年7月，由陈立和荆其诚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国际心联代表会议，国际心联执委会讨论并一致同意接受中国心理学会加入国际心联组织为第44个会员国成员，这标志着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

最后，1980年7月，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第22届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心理学会议上，以中国心理学会名义，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组团，陈立为团长，徐联仓、刘范、荆其诚为团员的中国心理学代表团前往参加，他们四人分别作了学术报告。其中为纪念冯特创建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00周年，陈立报告了《冯特与中国心理学》的论文。几篇报告均受到国外心理学家们的欢迎。

不仅如此，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还与世界各国的心理学工作者有着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通过座谈、会见和通信联系，相互交流心理学书籍和资料，交流研究的经验，使中国心理学被各国心理学同行所了解，也使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更多地了解了国外心理学研究的一些最新动向。

(五) 重新恢复后的中国心理学界的学术研究

重新恢复后的中国心理学界，不仅组织机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学术活动逐渐走向正常化，而且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以下我们将从几个方面作一些简单总结。

首先，在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主要研究了西方和苏联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和学派。关于西方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几年来比较突出的是对冯特心理学思想体系的研究，翻译介绍了冯特的著作并对其工作进行评价。其中评论冯特问题在1977年8月平谷会议制定的心理学学科规划即确定为全国心理学三年计划研究项目之一。1978年5月在杭州会议期间，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全国评冯工作组，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组织人力翻译英、俄、法、德、日有关文献60万字，全国共写出40余篇评冯文章，而1978年全国学术年会上即收到29篇评冯论文。特别是在这些评冯文章基础上写成的《冯特与中国心理学》一文，在1980年6月由中国心理学会和北京市心理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冯特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00周年大会和1980年7月在德国莱比锡国际心联召开的第22届心理学会议上，均由陈立宣读此文，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在苏联心理学理论方面，主要研究鲁宾斯坦和列昂节夫有关活动和意识关系的问题，分析苏联心理学有关理论问题对传统心理学进行改造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国心理学理论建设的借鉴作用。

其次，在发展心理和教育心理方面，重点研究了儿童心理发展，这项工作进行了全国性协作，在儿童数学概念和运算能力的发展研究方面获得了3～12岁儿童有关方面的系统科学资料。关于超常儿童的发展研究也组织了全国性协作，两年来以我国高考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超常儿童为研究重点，取得了一定

的经验和科学资料，并摸索出一套适合国情的研究方法。对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的"智力测验"，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开展了试验性的研究。在教育心理学方面，对各科教学的心理学问题、品德教育心理学问题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心理学问题等正在越来越被人们重视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特别是在各科教学的心理学问题上，在过去程序教学基础上，结合中国教育实际开展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实验研究已取得显著效果。

再次，在普通心理、实验心理和工程心理学的研究方面，主要把视觉和听觉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作为重点项目。如在照明视觉方面进行了制定照明标准的视觉研究，直接为照度标准的制定提供理论数据和视觉方面的数据，提出了中国人的视功能模式和制定照度标准的新方法，该研究被公认为提供了中国人眼视功能的资料，是对 CIE 可见度函数的有益的补充。在颜色视觉方面还进行了中国人眼光谱相对亮度函数、中国人面肤色标准测定、常见物体记忆色及宽容度等的研究。在听觉心理学方面，根据国家当时暂定 90 分贝为工业噪声允许标准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工业噪声听力保护标准的调查实际研究，并为配合制定噪音防护标准而进行了普通话听力损伤阈的研究，等等。

最后，关于生理心理和医学心理方面的研究。在学习记忆的神经基础和生物化学基础上进行了试探性的研究，用电损毁海马不同部位或海马内注射胰蛋白酶等手段，检查对大鼠暗箱回避式记忆的影响，证明学习记忆的早期阶段海马起积极作用，并与蛋白合成起作用。在医学心理方面，几年中心理学界主要在配合针麻原理的研究中，进行了心理因素在针对麻醉和针刺镇痛中的作用，以及暗示、注意、情绪等某些心理生理因素的个体差异和临床针麻效果的关系研究，该研究被专家评为国内先进水平。此外，在神经心理学方面，还研究了大脑两半球机能不对称性及胼胝体

传导功能、人类大脑两半球在听觉和视觉中的机能差异以及不同脑损伤病人在语言、记忆等方面的障碍问题。在病理心理方面，还进行了精神药物的研究，对国产有致幻作用的草药进行了动物行为鉴定性实验，等等。

五、稳定发展阶段（1981～1997）

中国心理学界在整个80年代和进入90年代上半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心理学事业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阶段，有了很大进展和变化。

（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已成为国内第一流心理学研究中心，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所。现有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等六个研究室（1997年改为四个研究室），包括了发展心理等十四个研究方向，共有高中级研究人员一百余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七十余人）从事研究工作。现对六个研究室及其十四个研究方向作些简单介绍。[①]

一室——发展和教育心理研究室，主要从事三方面研究：正常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特殊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比较心理。该室设有儿童行为观察实验室、动物行为实验室等。

二室——认知心理研究室，主要从事四个方面的研究：视知觉及颜色视觉、听觉心理、记忆心理、人工智能。该室设有视觉心理、听觉心理、记忆心理和人工智能专用实验室。

三室——生理心理和医学心理研究室，主要从事八个方面的工作：学习和记忆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心理药物学的研究、编制和修订各种心理量表、影响应激反应因素的研究、神经心理的研究、气功的心理和生理及生化效应的研究、睡眠心理功能的研究

① 赵莉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1996年内部发行。

及倒班对人的心理和生理功能的影响、老年人记忆特点的研究以及训练对改善老年人记忆的作用。

四室——心理学基本理论和社会心理研究室，主要开展四个方面的研究：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心理学方法学的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研究。

五室——工业心理研究室，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管理心理、工程心理、人事心理。

六室——文献情报研究室，该室由三部分组成：心理学图书馆、心理学刊物编辑部、心理学文献情报研究组。该室已建立了"中文心理学文献数据库"和"中国心理学人才数据库"等。

上述六个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从以下十四个方面展开的，即动物心理、发展心理、教育心理、视觉心理、听觉心理、认知心理、生理心理、神经心理、医学心理、社会心理、心理学基本理论、工程心理、组织管理心理以及心理学情报研究。在这些研究方向上，目前心理研究所各研究室共承担了国际、国家级合作或基金课题五十多项。

作为中国一个综合性心理学研究所，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授硕士、博士学位的单位。据统计①，至 1994 年为止，培养研究生 126 人，已授博士学位 8 人，硕士学位 75 人。现有博士生导师 16 人，硕士生导师 50 人。在研究成果上，统计表明②，自 1979 年以来，心理所共获国家、省级和中国科学院的各项奖励成果 35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2 项，三等奖 22 项。

为了使心理研究所向更高一级国际一流心理学研究机构的目标迈进，在基础设施方面，心理研究所于 1988 年建成现代化实验

①② 赵莉如：《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现状（下）》，载《心理学动态》，1996 年第 4 期。

大楼，并建有各类实验室，备有计算机、高级统计分析软件及特殊实验设备等，为科研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在组织机构上，于1994年6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合作研究中心；继后，又成立了“中科院心理所脑——行为研究中心”、“中科院心理所人类行为与发展研究室”和“中科院心理所人类信息加工青年实验室”。心理研究所为了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进行相互交流，还自办有《心理学动态》杂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

为了开展科技开发工作，心理研究所还先后建立了三个技术开发实体：心理学函授大学、心理学书店和赛克洛新技术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还建立了其他研究与开发结合的机构，如“现代小学数学研究中心”、“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材研究中心”、“广告消费与市场心理研究中心”、“普森人格评估研究中心”、“人力资源开发研究部”、“中国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和“CI系统应用研究中心”等。

除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外，有的高等院校也成立了心理研究所，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儿童心理研究所、西南师大的心理科学研究所、广州师院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江西师大的心理技术应用研究所、南京师大的心理学史研究中心等，而较多的师范大学则在教育科学研究所内设心理学研究室。以下我们简要介绍其中的一个。广州师范学院社会心理学学科创立于1980年，奠基者是已故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吴江霖教授。由于吴江霖教授也是中国社会心理学恢复重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使得广州师范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是全国公认的中心之一。1984年，广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成为全国第一个社会心理学硕士点，所含招生专业及研究发展方向有组织社会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心理学两个。十几年来，广州师院社会心理学科以重视开展基

础研究为特色，坚持定量研究和现场研究，坚持基于第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在定量分析基础上作定性分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6 年 12 月，广州师范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二）高等学校心理系的发展

中国心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主要集中于五大心理学系，北京大学（1978)、华东师范大学（1979)、杭州大学（1980)、北京师范大学（1981）和华南师范大学（1986）先后建成心理学系。它们的师资队伍充实，设备比较完善，教学和科研工作根据各自具有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北京大学的重点在普通与实验心理学，华东师大的重点在发展心理与教育心理学，杭州大学以应用心理学，尤其是工效与工业心理学为主，北京师大着重儿童与发展心理学，而华南师大则侧重在教育心理学领域。下面重点介绍这五大心理学系。

北京大学心理系属理科，课程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设有普通心理和应用心理两个专业，科研重点为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并设立心理学研究所，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该系采用四年教学制度，在一至二年级两年的必修课中，有普通心理学、神经心理学以及实验心理学等基础性课程，从三年级起开始有了主修的心理学课程，四年级则可专修变态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专题之一作为专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该系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等有较密切的合作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设有心理学专业，学生从理工科考生中录取，并招收发展心理、普通心理、教育心理、社会心理、管理心理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心理学专业内原有发展心理研究室，于 1985 年成立华东师大心理研究所，该室为其一部分。1987 年心理系又增设特殊教育专业。研究项目重点多在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

理学领域，特别是在儿童语言学习、儿童特殊能力的鉴别以及幼儿训练等方面的研究，有相当的成效。华东师大心理系同时负责中国心理学会专业学术杂志《心理科学》的编辑工作。该系与美国、加拿大、德国等的许多大学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

杭州大学心理系设有工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两个专业，并招收工业心理博士研究生和普通心理、工业心理、教育心理硕士研究生。系内建有国家工业心理学专业实验室、工业心理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室、儿童生长发育和智能发展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与美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的许多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学术交流或合作关系。杭州大学心理系还负责中国心理学会专业学术杂志《应用心理学》的编辑工作。杭州大学心理系的工程心理研究和组织管理心理学研究一直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内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设有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公共心理学四个教研室，招收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教育心理、心理测量、教育社会心理学等。该系四年制的课程包括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学史等，并对高年级学生进行教学心理学、心理测量等专题性研究的课程训练。此外，北京师范大学还建立了儿童心理学研究所，该所主要从事心理学科研工作，除独立招收儿童心理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外，还负责中国心理学会专业学术刊物（与中国教育学会儿童与教育心理研究会合办）《心理发展与教育》杂志的编辑工作。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是在原教育系心理学专业基础上，合并了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心理学研究室，于 1986 年 3 月建立的。该系有教育心理学专业和非师范性的市场营销心理与策划专业，并招收教育心理、发展心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教育心理博

士研究生。该系建有设备先进的认知心理实验室，开办广州金钥匙学校作为教育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基地。

其他院校还有东北、西北、西南、华中等高等师范院校建有心理专业（一般在教育系内），其他省、市、自治区高等院校均设有心理学教研室。90年代以来，又有十余所条件成熟的高校建立了心理系，主要有东北师大、华中师大、西南师大、陕西师大、南京师大、湖南师大、江西师大等建立了心理系，上海师大建立了应用心理系，吉林大学建立了社会心理学系，北京医科大学建立了医学心理学系，武汉体育学院建立了运动心理学系等。

（三）中国心理学会的发展及历届全国学术会议

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心理学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分支。为了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到1989年，中国心理学会按分支学科成立了11个专业委员会，即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医学心理专业委员会、工业心理专业委员会、体育运动心理专业委员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学校管理心理专业委员会和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同时，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已达2800多人，全国建有30个省级学会。中国心理学会及其所属各专业委员会与心理学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以及各省级学会，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现介绍几次全国学术会议和其他重大学术活动。

第四届全国学术会议。1981年12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纪念建会60周年学术会议（即全国第四届学术会议）。与会者450余人，还有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国际心联秘书长和国外心理学者及香港地区心理学者18人。大会收到论文、报告480余篇，其中教育心理占29%，普通心理与实验

心理占 13%，发展心理占 15%，医学心理占 16%，心理学基本理论占 13%等。其中 43 篇在会上宣读，423 篇被选入会议《文摘选集》。会议期间进行理事会改选，产生第三届理事会，潘菽当选为理事长。这次大会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的一次空前盛会，它全面总结了中国心理学会建会 60 年来心理学的发展及经验教训，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心理科学事业创造了条件，标志着中国心理学已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

第五届全国学术会议。1984 年 12 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与会人数 350 余人，并有美、英等国及香港地区心理学者 10 余人。大会收到论文 600 余篇，其中 390 篇被选入《文摘选集》。论文中，发展心理占 19%，医学心理占 18%，普通心理、实验心理和工业心理占 17%，教育心理占 15%，心理学基本理论占 12%，其他分支均在 10%以下。会议对三年来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与变化作了一次检阅，将各个分支的研究成果作了充分反映。会议期间通过改选理事会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荆其诚为理事长。理事会还根据中国心理学发展需要，对各有关专业委员会及工作委员会进行了调整与加强，共设立了 10 个专业委员会：教育心理、发展心理、体育运动心理、医学心理、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工业心理、生理心理、心理学基本理论、法制心理、学校管理心理专业委员会；4 个工作委员会：心理学科普工作委员会、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和心理测量工作委员会，并对各个专业委员会的活动提出了要求。

第六届全国学术会议。1987 年 9 月中国心理学会在杭州召开全国第六届学术会议，与会代表 500 余人，这是中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心理学学术会议。此外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心联执委会全体成员及日本、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区心理学会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会议，共计 35 人。大会收到论文 619 篇，其中 306 篇论

文被选入会议《论文选集》。在提交的论文中，医学心理学和心理测量占 21%，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工程心理学占 19%，教育心理学占 16%，发展心理学占 13%，管理心理学、法制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占 12%，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心理学史占 9%，等。这些论文反映了我国心理学界各个分支三年来的工作进展与成果，内容广泛，水平和质量也显著提高。会议期间还召开了理事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心理学会会章的修改草案及有关 1988 年理事会改选事项（在 1988 年通讯选举第五届理事会及 1989 年 8 月的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王甦当选为理事长）。

第七届全国学术会议。1993 年 10 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七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与会者 280 余人。会议共收到论文 455 篇，内容包括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测量、心理学基本理论与心理学史、社会心理学与管理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医学心理学、运动心理学、法制心理学等各个分支领域。会议除大会学术报告外，还按学科分支分成七个组进行学术报告活动。会议期间，召开了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第六届理事会是 1993 年 4 月至 7 月间以通讯投票方式选出的），林仲贤当选为理事长。

第八届全国学术会议，1997 年 10 月在苏州召开。

（四）国际学术活动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心理学发展本身的需要，我国心理学界不断加强国际与地区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不仅在国际心理学学术组织中中国心理学家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而且积极参加国际或地区召开的心理学学术会议并具体承办在我国组织召开的国际心理学会议等。以下分别作一简单介绍。

首先，中国心理学家在国际学术组织中的任职情况。1984 年 9 月在墨西哥阿卡波哥举行的第 23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上，由于中

国心理学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心理学家、当时的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荆其诚教授首次代表中国被选为国际心联执委会委员。与此同时，国际应用心理学会议也在此举行，中国心理学家、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的徐联仓教授以个人会员入会应邀出席，并当选为该会执委会委员。1992 年 7 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第 25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中国心理学家荆其诚教授又当选为国际心联副主席，为中国心理学界赢得了荣誉，有利于中国心理学的发展。1994 年，中国心理学家、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的林仲贤教授被选入亚非心理学会执委会。

其次，中国心理学会举办或协助举办国际心理学学术会议情况。其一，1987 年 7 月，国际行为发展研究会（ISSBD）中国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协助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组织在我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性心理学会议。其二，1987 年 9 月，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杭州大学心理系协助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和杭州召开国际心联执委会，中国执委荆其诚出席了执委会议。其三，1990 年 8 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具体承办在北戴河召开中国语文——认知科学第五届国际研讨会，主办单位除心理研究所外，还有香港大学心理系等单位。其四，1992 年 8 月，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心理系具体承办并协助中国心理学会组织在北京召开第二届亚非心理学大会。这是在我国首次召开的大规模的心理学国际会议，会议得到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三世界科学院北京办事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心理系等单位的积极资助与支持，使会议得到顺利进行。出席此次大会的亚非心理学家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心理学家共 184 人，收到论文摘要 500 多篇，其中有 204 篇被选入第二届亚非心理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内容涉及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

理学、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年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运动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心理测验和心理学史等心理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大会的主题是：心理学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福利服务。会议除大会学术报告外，还分成四个组分别就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及认知心理学问题，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问题，社会心理学与管理心理学问题，临床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问题，心理测验问题以及生理心理学问题等各个心理学分支的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在会议期间，亚非心理学会执委会召开了会议，选举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的王甦教授为亚非心理学联合会主席。这次大会充分展示了中国心理科学面貌，为中国心理学工作者提供了走向世界的良好机会，促进了亚非心理学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中国以及整个亚非心理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五，1995 年 8 月，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协助中国心理学会举办了中国现代心理学创立以来，特别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我国心理学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心联亚太地区心理学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世界 60 多个国家与地区的 250 多名代表。通过这次国际交往活动，中国进一步提高了在心理学界的国际地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

最后，心理学学术研究的国际或地区合作情况。自进入 80 年代后，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即开始受国家委派或以个人名义进入学术上的国际或地区合作研究。1982 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即开始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系人员交流五年计划；1983 年 8 月中美两国科学院在美国召开认知心理学双边讨论会；1985 年中国科学院聘任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西蒙教授（H. A. Simon）为心理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他对心理研究所的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管理心理学的发展给予指导和

帮助。80年代进行的国际与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还有：与美国合作研究儿童阅读困难问题；与联邦德国合作研究老年心理学问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研究业绩问题；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研究儿童发展心理问题等。90年代主要有受美国GRANT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独生子女发展心理问题；与德国合作研究儿童社会认知发展问题；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研究中国人人格量表的编写与应用问题、书写心理学问题等。

（五）中国心理学其他学术组织的建立

中国心理学界除中国心理学会外，还于1982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下设若干专业委员会，并于1990年创刊出版学术专业刊物《社会心理研究》。1985年心理学界与医学界等共同建立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并分别于1987年创刊出版专业学术刊物《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和1993年创刊出版专业学术刊物《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85年心理学界与企业界共同建立了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并于1987年创刊出版专业学术刊物《行为科学》，以及与工程管理学界共同建立中国人类工效学会，有关省市政府建立的北京市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沈阳市心理研究所、鞍山市心理测量研究所等，为提高心理学在中国的学术地位及将心理学服务于社会和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六）稳定发展阶段的中国心理学界的学术研究

稳定发展阶段的中国心理学界的学术研究是取得成果最多的时期，无论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应用研究领域里，我国心理学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些研究或属于世界领先水平，或填补了国际学术界的空白。以下我们作些简单介绍。

其一，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除继续对视觉心理学及听觉、触觉问题等心理过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外，逐渐转到认知心理学的方向，汉语的信息加工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此外还有

记忆、问题解决策略、决策等问题。我国的认知心理学工作者是较早将计算机技术引进心理学研究工作中来的，其中的一项“机器理解汉语的研究”获得了好评，被认为是国内外首创。

其二，教育心理学。为了适应教育改革形势的发展，教育心理学工作者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工作。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小学生数概念的掌握、小学数学教改实验、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等中小学数学教学心理和中小学语文教学心理、品德心理等问题。如“初中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即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提出了九条学习心理学原则，编写了初中数学自学辅导教材。这种教材能够明显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成绩，效果显著，目前已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五千多个班进行推广试验，从而取得了较高的社会效益。

其三，发展心理学。在整个稳定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心理学研究取得显著成绩。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即儿童的认知发展，包括儿童概念的掌握以及记忆、思维、言语发展的特点。另一重点即为超常儿童及中国独生子女的心理特点的研究，研究结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特别是朱智贤领导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协作，对我国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其四，医学心理学。我国的医学心理学除了继续进行病理心理研究之外，心理卫生研究、临床神经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心理学工作者的注意，而且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都发生了变化，既提高了研究的水平与质量，又提高了研究的应用性。

其五，生理心理学。从 80 年代起，围绕着学习记忆的神经机制、学习记忆的神经化学过程、人类心理活动的电生理、睡眠生理心理等问题，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我国的生理心理学水平一直在国际上较高，也使这项属于基础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分支领域对其他心理学分支领域以及对人类心理实质的

理解，提供了更多的科学支持。

其六，体育运动心理学。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以及从事体育运动的主管领导、教练员和运动员，已经愈来愈充分意识到心理因素在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中的作用，从而使我国体育运动心理学得以迅速发展，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其七，工业心理学。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心理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迅速发展，既有传统的工程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也有计算机技术发展而引起人们注意的人——计算机界面的研究。管理心理学是又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研究中不仅很好地承继了西方及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和研究，而且使管理心理学在与我国国情的结合中得以健康地发展起来，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心理学的观点、理论和管理方法。

其八，法制心理学。法制心理学是我国的一个新的心理学分支，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以犯罪心理学为起点和重要的研究内容，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九，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在我国是一个较新的分支学科，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从研究对象和学科建设出发，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在该学科的应用问题上作了大量研究，从而使其成为我国目前较大的分支之一。

其十，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心理学史。这是目前我国心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性质、方法、实质等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上，以及西方心理学史、苏联心理学史和中国心理学史方面一如既往，不断取得研究上的突破。

第二节　中国台港心理学发展状况

一、台湾心理学发展状况

（一）台湾各大学的心理学系

台湾地区大学心理学系主要分布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师范大学、中正大学、辅仁大学等十余所大学里，并且在实验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辅导与临床心理学、心理测验、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等领域有较强的实力。其中，台湾大学居于台湾心理学界领头军位置，侧重实验心理学、心理测验等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则侧重教育心理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在工商心理方面比较强些。

1. 台湾大学心理系

台湾大学心理系及心理学研究所是台湾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心理学教学及研究机构，也是台湾地区各大学心理系中唯一设有大学部、硕士班到博士班的心理学人才培养机构。台湾大学心理学1949年创系，苏芗雨为首任系主任。1958年11月创刊《台大心理系研究报告》(每年一期)。1961年台湾大学心理系成立研究所并设博士班。

台湾大学心理系设系初始的主要目标旨在从事心理学基础研究及培养心理学专业研究人才。其毕业的学生除在各大专院校相关专业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外，亦有相当数量的人进入医疗、卫生、辅导、人事、工商等机构，担任与心理学有关的实际工作。同时，台湾大学心理系也是整个台湾地区心理学学术活动的主要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几乎台湾地区所有重大的心理学学术与普及活动均由台湾大学心理系发起。

台湾大学心理系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其中主要的研究有：杨国枢和李本华的成败归因及其随后情绪的研究，价值系统的文化

比较研究，中国人的他人知觉之基本向度的因素分析研究，CPI 修订工作等；刘英茂的学习国语生词和句子理解过程的研究，拼字测验的编制以及记忆系统的研究等；黄光国的企业组织中员工对工作环境的知觉及工作士气的研究等；李清泽的早期荷尔蒙对生理行为分化的影响，费勒门的行为、生物、化学研究等；柯永河的大中专学生智力测验（语、数图关系测验），性格量表的信度、效度、常模研究，独生子女心理需求研究等；黄荣村、黄明宏、吴英璋等人的噪音研究，意外事故的心理分析、触觉与视觉在高速扫描作业中的比较研究等。

2.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系

1946 年，台湾师范大学即在教育系内设置心理实验室，后又成立心理学组。1958 年台湾师范大学正式成立教育心理学系，1969 年成立辅导研究所，1980 年又在夜间部成立教育心理学系，下设辅导组及特殊教育组。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系的主要目标，旨在开展和推动心理辅导等教育心理学和学校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并开设教育心理学、心理辅导、心理咨商以及特殊教育等课程，以培养各类各级学校心理辅导和特殊教育的专业师资，并在心理辅导研究所开设暑期进修班，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提供在职进修的机会。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系的主要研究有：黄坚厚的中小学生内外控制信念的研究；陈荣华的学习层次与增强因素对智能不足加算学习成效之影响；吴武典等人的资赋优异儿童的智力与焦虑之评量研究，中小学生学业成就归因的研究，小学班级气氛的因素分析与追踪研究，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及家长教养态度与儿童学习效果的关系，以及幼儿人格测验与儿童智力量表的编制与修订，儿童、青少年体格与基本技能、基本情绪、自我概念、智力等的发展研究，“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发展”及“高中学生升学辅导”实施办法专题研究等。

3. 台湾政治大学心理系

台湾政治大学心理系成立于1972年，旨在“培养行为科学人才，推广心理建设”。后于1982年成立心理学研究所，培养硕士研究生。

台湾政治大学心理系侧重研究老人心理学、女性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工商组织及消费心理学。其主要研究有：黄国彦、林邦杰等人的中学生学习成就之测量与研究和技艺性向测验编制之研究，高中学生皮亚杰认知发展研究；黄国隆的大学毕业生离职行为之研究，中小企业人事甄选之现状研究，以及观看电视习性、亲子关系与儿童攻击倾向的关系，工作满足调查——行为计量管理研究等。

4. 台湾辅仁大学应用心理学系

台湾辅仁大学1972年成立教育心理学系，后为顾及发展潜力及学生就业需要，于1978年改为应用心理学系。台湾辅仁大学应用心理学系以心理学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为基础，特别强调工商及临床咨商两大范畴，工商心理学的课程，则兼顾人事、广告、消费者行为三个方向。

1988年辅仁大学又设立应用心理研究所，除继续完成教学目标外，更加注重基础理论及方法学之训练，尤其是专业实务能力培养。为了进一步达到“实务与学理相互为用”的教学目标，从1993年起进行分组招生，招收在教育领域（乙组）、咨商辅导领域（丙组）及工商领域（丁组）中具有专业工作经验者，以期通过理论与经验的对话，帮助学生能用更敏锐的眼光对本身的实务经验作系统性的整理；另一方面，实务操作的经验也可成为检验、评判理论的一个角度。

台湾辅仁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的主要研究有：丁兴祥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初探，多元方法取向；黄月霞的家长对升学方案的选择意愿之研究；朱瑞玲的EPPS修订；翁开诚的故事性思考与同理心的养成等等。

（二）台湾的心理学会、测验学会及心理学刊物

台湾心理学会成立于1964年，主要成员为台湾各大学心理系及心理研究所的教师、研究人员、研究生及毕业生。每年举行年会一次，年会活动以学术论文的宣读与讨论为主。从1973年起，将1958年开始出版的《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研究报告》改为《中华心理学刊》，刊载心理学研究报告。自1982年起，该会设置“苏芗雨教授心理学学位论文奖”，奖励杰出的博士学位论文与硕士学位论文；另筹集大笔资金，同年（1982年）起设立心理学会残障者心理复健基金委员会，以推动有关之实务及学术研究。此外，台湾心理学会经常视需要推动各种不定期的学术活动。例如，1981年8月，举办“国际文化比较心理学会与国际心理学家协会第一届亚洲区联合会”。这是在台湾地区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性心理学学术会议，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190位心理学者参加，共宣读近70篇论文。1983年12月，台湾心理学会又与台湾地区有关学会联合举办“社会变迁中的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研讨会”，并由文崇一、杨国枢、李亦园主编出版了论文集。[1]

台湾测验学会1951年建会，1953年起出版《测验年刊》，刊登有关统计技术与各类测验常模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并于1982年出版《测验的发展》专刊，以志三十余年来心理测验在台湾地区施行的成果，并提出未来努力方向。此外，从1973年起出版的《测验与辅导》双月刊，协助中小学推行心理测验及辅导工作。台湾测验学会的会员大多为各级学校的教师，会员们致力于各种测验的修订及推广工作，对于心理测验在台湾地区教育、医疗及工商机构中的普及应用，有相当大的贡献，从而使心理测验成为心

① 有关资料引自黄光国《四十年来台湾心理学的发展》一文，原文载《中国论坛》（台）1985年第1期，第120～136页。

理学中广为人知的项目之一。

台湾心理卫生协会1955年建会，这个协会的中心任务是从事心理卫生的普及工作。会员包括精神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专业辅导人员等。协会于1955年创刊《心理卫生通讯》年刊，后于1984年改为《中华心理卫生学刊》，主要刊登研究论文和交流心理卫生工作信息。该协会曾草拟“精神卫生法草案”，希望以之作为将来推广心理卫生活动的法令基础。1979年2月，该会曾与世界卫生协会及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合办“西太平洋区心理卫生研讨会”，有来自太平洋地区10个国家及地区约50位代表参加，共宣读论文20篇。1985年4月，该会还举办了“青年问题与心理卫生研讨会”，并由《中华心理卫生学刊》出版专集。台湾心理卫生协会近年来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拟订心理（精神）卫生法草案，明定本法应同时涵盖：①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处理；②心理健康之维护与促进；③有关专业人员之培养。在草案中还拟订应设置心理卫生局、心理卫生研究所和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若干个；心理卫生设施之业务，应择用专业人员办理之（临床心理师为其一），其资格标准另定之。①

就学术刊物来说，目前台湾地区出版的心理学学术刊物，除了前述台湾心理学会的《中华心理学刊》、台湾测验学会的《测验年刊》、台湾心理卫生协会的《中华心理卫生学刊》之外，尚有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出版的《心理与教育》，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心理系与教育研究所的《教育与心理研究》，台湾省立教育学院辅导学系的《辅导学报》，以及1993年由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本土心理学研究室创刊出版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本土心理学研究》是

① 黄荣村：《台湾地区心理学的发展》，载《台湾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第一本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专门刊物。该刊一年出两期，发表来自两岸三地及其他地区的有关学术论文。该刊对理清中国人心理及行为之本土化研究的观念及理论，对探讨从事中国人心理及行为之本土化研究的方法及策略，对发表中国人心理与行为之本土化研究的成果及经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台湾地区心理学界的主要研究

据台湾地区一项关于心理学科人力资源的现况调查表明，截至 1993 年底，台湾地区心理学专业人员的总数为 1055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达 195 人。这些专业人员有 70%的人在大专院校服务，有 40%的专职工作内容以教学与训练为主，主要的教学领域、教学科目与教学专长分配于各领域。但以“方法、测量与一般原理”、“发展与教育”、“辅导、临床”三者最多。研究计划主持者所服务机构多为大专院校专任教师，而学历多具有博士学位。

从心理学研究成果“量”的角度来看，1965～1985 年的二十年间，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心理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已经在千篇以上，未曾发表的学位论文，也有近三百篇之多。而就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也较为广泛，但主要集中在教育心理学等领域中。现以 1993 年的一项统计予以说明，在 1988～1993 年的 5 年内，台湾地区心理学界发表的研究论文以“教育心理学”、“辅导、临床心理学”最多，各占了 25%以上。其次是“测验、方法与计量”方面，约占 16.5%，“人格与社会”则约占 10%，其他各领域所发表的研究论文都在 8%以下。

其中，“教育心理学”方面，“中小学生的心智行为”、“教学法”、“教学应用问题”、“教师工作心厌或倦怠”等主题有较多的研究。

“心理测验”的研究成果，以各种测验的编制、修订、介绍、解释或应用为主。这类测验多以用在人格、社会、教育与辅导的

居多，至于神经心理、临床与工商业的测验不多见；“方法与计量”的研究成果中，近年来新兴的研究为“IRT 理论及其应用”，此外还有“统计方法的检讨”与“各种测验的信度、效度研究”等。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在各类主题的研究相当分散，但以中国人的性格、文化与生活等方面的研究为主，显示台湾学者相当重视在中国文化影响下中国人性格与行为独特面的研究。

“辅导心理学”的研究集中于“辅导效果的研究”，探讨各种辅导方法的效果；另外，其他的研究都是与学生的心智、态度、行为或相关问题有关，显示辅导心理的主要应用以学生为主。“临床、治疗与心理卫生”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有关“压力刺激与健康”发表了最多的研究成果，这可能与工商业社会时代导致现代人须承受愈来愈重的压力，所以相关的研究也增加有关。

而“实验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则以“文字的知觉历程”、“句子和文章的阅读与历程理解”、“视知觉”等主题发表较多的研究论文。

以下即综合有关资料，选择台湾地区的几个研究强项作些简单介绍。

1．实验与认知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是台湾地区心理学研究的发端。刘英茂在台湾大学心理学系（1980）的报告中，将该分支的发展阶段分为：①1949～1959 年，以郑发育在深度知觉上的研究为主。②1959～1969 年，以从事条件化历程研究为主。③1969 年以后，以从事基本学习历程、问题解决与理解历程为主。在这个领域内，郑发育和刘英茂是台湾地区心理学界最早为国际学界重视的学者。郑发育早期从深度知觉开始研究，并进而研究驱力分辨学习、惩罚的功能、遗忘等问题。他在一项探讨何种机制可以使老鼠停止饮水的研究中（1965），发现胃部扩张乃是一重要机制，但在动物抑制饮水中，究

竟系因胃部扩张所引起的不舒服而引发的自然反应，或者确为一正规的抑制因素，则尚不清楚。该项研究曾被 Morgan（1965）引用于其生理心理学的标准教科书中。另一项探讨遗忘量受记忆时间长短影响的研究，则被 Underwood（1966）引用于其流传广泛的实验心理学教科书中。60 年代初刘英茂从美国至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任教，并以新行为主义为基础，研究学习与记忆现象。刘英茂在 1968 年和 1963 年提出正统条件化为刺激类化的一个特例；工具性学习中也含有正统条件化历程的成分，可用正统条件化历程来加以解释。这种独特的见解，引起了当时国际心理学界的重视。由于上述两位学者的工作，实验心理学成为当时台湾心理学研究的最主要分支，并为日后心理学科其他分支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70 年以后，由于受“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台湾的实验心理学研究重点也跟着改变，以“人类信息处理”理论为基础，以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探讨人类心智运作的历程，显现在各种不同能力如学习、记忆、认知、思考、知觉与决策等上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语文为材料所作的心理学研究。1961 年之后，台湾地区的林清山、初正平、张春兴等人开始研究儿童学习汉语的行为，1967 年，台湾编译馆编辑出版《国民学校常用字汇研究》；接着，刘英茂、庄仲仁与王守珍于 1975 年编辑出版《常用中文词的出现次数》；同时还有许多人先后研究汉字、词，或形容词的意义度、熟悉度等，为日后的中国语文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素材。从此以后专题性和系统性的中国语文心理学研究在台湾地区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世界各地的心理学者对人类的语文行为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2.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

自 1969 年起杨国枢、文崇一、李亦园等人合作，在台湾地区

开展了有一定规模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涉及的基本问题有十四类之多[①]：(1) 家庭对人格形成的影响，尤其是父母的教养方式。(2) 价值观念、态度与兴趣，多半运用现有测验加以测量。(3) 心理需要与动机。特别是关于成就动机，用投射测验或纸笔测验。(4) 自我概念。(5) 焦虑及其有关现象，如压抑作用，知觉的防卫。(6) 自我控制，如攻击性行为研究，诱惑的抵抗力。(7) 认知方式。包括场地独立性或场地依赖性；还有知觉节奏是冲动强或弱，还是内省性强或弱。(8) 归因历程。(9) 内控—外控的信念或想法。(10) 关于认知失调。(11) 个人现代性。(12) 涵化的研究，研究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受了当地文化的影响，怎样适应与改变。(13) 人口心理学，包括理想的子女数目，生育控制及施行结扎输卵管的心理后效的研究。(14) 政治行为。这些问题不仅涵盖了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而且研究的结果也较具社会现实意义，因而其时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

在这当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是杨国枢对中国人性格及其现代化所作的研究。杨国枢所作的研究内容涉及人格及社会心理学各个不同领域。1970 年瞿海源与杨国枢编成“个人现代性量表”之后，杨国枢及其学生即以此为工具，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1974 年，杨国枢与瞿海源曾经回顾有关个人现代性的研究，撰成《中国人的现代化》一文。其后，杨国枢提出了“社会取向”的看法，他将社会取向定为一种行为倾向。这个概念整合了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能够适合描述中国人的行为。80 年代，杨国枢更综合以往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模式，说明中国人在传统的农业生态环境中，如何发展出一种重秩序及和

① 赵莉如：《台湾省心理学情况》，载《心理学报》1981 年第 3 期，第 366 页。

谐的严密社会结构。中国文化中主要的儒家道德及宗教思想，又如何经由一套强调和顺、服从和自我压抑的教养方式，而传递给下一代，培养出个人“社会取向”的性格。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取向”的性格又逐渐转变成为“个人取向”。这篇论文不仅引证丰富，而且兼顾到理论发展，是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经典之作。[①] 此外，黄光国于1983年提出了一套“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式，并一面回顾以往各种有关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理论模式，一面整合过去的实验研究，写成《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一文。该文是研究中国人社会行为较重要的文献。

3. 心理测验

5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台湾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军队系统与教育部门需充实、补充大量人员。人员的选拔、配置与安排则成为一个综合性的重要问题，为此，心理测验应运而生并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由台湾地区各大学编制了各种心理测验量表，如台大心理系编订了“加州心理成熟测验”、“基普两氏气质测验”、“卡氏十六种人格因素问卷”等。师大教育心理系编订了“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测验”、“韦氏成人智慧量表”、“艾德华个人兴趣量表”等。政治大学教育系编订了“孟氏行为困扰调查表”、“多元性向测验”、“白氏职业兴趣量表”，等等。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地区路君约、程法泌主持修订的“比西智力量表”和师大教育心理系修订的“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R)，对台湾地区的教育和辅导工作，有相当大的贡献。

除了实际编订心理测验的工作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在《测验年刊》上撰写学术论文，介绍西方的测验理论，或以出版著作的方式介绍西方的测验理论、方法及统计分析技术。

---

① 黄光国：《四十年来台湾心理学的发展》，载《中国论坛》(台)，1985年第1期，第128页。

4. 临床心理学

在台湾地区，临床心理学的发展，和心理学其他领域的发展颇为相似。大体而言，这方面的实际工作以1953年在台湾大学医院神经精神科开始进行，1960年则开始临床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整个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以某些特定群体为对象所作的心理健康调查，其中最为人所注意的是精神病罹患率的调查。早在50年代，林宗义便曾在台湾南部地区开始了上述问题的调查研究。第二类是研究中国社会中某些特殊的异常行为的病理，像1958年林宗义比较太保和流氓的行为模式，曾炆煋研究童乩及心因性疾病，以及1978年黄光国研究人际冲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等。第三类是研究台湾社会中精神医疗的现状，如吴就君（1981）、文荣光（1985）分别调查台湾社区居民与精神病患者的求助行为；陈永兴（1981）报道台湾地区精神科医院与精神医疗的实施情况，曾炆煋（1976）研究台湾的民俗医疗，等等。第四类是以纯粹西方的理论概念为导引，在台湾社会中研究心理压力、心理适应与心理治疗的问题。例如，张苙云与吴英璋（1985）测量700多位社区居民与精神病患者的生活压力；黄光国（1980）研究生活压力的知觉向度；吴英璋（1985）研究中学生的考试焦虑，等等。

综合台湾地区临床心理学研究来看，研究范围很广和研究数量也多，但是理论层次的论文却不多见。为此，自80年代之后，柯永河于1982年提出了一项心理卫生的定义，并据此定义将现有的心理治疗技巧加以分类。他的研究反映出台湾学者试图在心理治疗的理论上有所突破。

5. 本土心理学　在台湾地区，首开“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或“本土心理学研究”这一先河的，是台湾大学的杨国枢教授。1982年，杨国枢发表了《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一文。全

文由四个部分组成：①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②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③修改与创立概念理论；④改变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随后，为了使更多的人明确什么是本土心理学和什么是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杨国枢教授又提出了“本土性契合”的标准。“本土性契合”是指，特定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因素一方面会影响到当地民众（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到当地心理学者（研究者）的问题、理论与方法。那么，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可以而且应该在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契合状态。这样一种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本土性契合”。杨国枢教授将本土性契合看作是衡量本土心理学或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标准。他指出：“我们所说的本土心理学，重点即在使心理学研究能够达到本土契合的标准。”

与此同时，1982年台湾地区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召开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强有力地推动了本土化研究的进行。其中叶启政先生以激烈的言词发表了“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瞿海源发表了“问卷调查法在国内运用之检讨”等，由此正式拉开了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序幕，并进而成为80年代以后台湾心理学者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向，并成为90年代以后台湾心理学发展的重要走向。

台湾地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主要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国人的人格、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中国古代心理学等内容上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研究的组织方面，为了促进本土心理学研究，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从1985年开始，以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为主，结合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台北附近大专院校的心理学家及研究生二十余人组成了“本土心理学研究小组”。1991年，为了进一步推广有

关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正式成立了“本土心理学研究室”。该研究室在1993年还创刊出版了《本土心理学研究》，成为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本专门刊物。该刊一年出两期，发表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有关学术论文。该刊对理清中国人心理及行为之本土化研究的观念及理论，对探讨从事中国人心理与行为之本土化研究的方法及策略，对发表中国人心理与行为之本土化研究的成果及经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为了做到台湾地区本土心理学研讨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于1989年冬天在台湾举办了第一次“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科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杨国枢和黄光国主编出版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1989）一书。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紧接着于1992年春天在台湾又主办了第二次“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科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杨国枢和余安邦主编出版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念及方法篇》（1992）和《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文化、教化及病理篇》（1992）两书，大大推动和助长了台湾地区心理学本土化或本土心理学研究的进展。

二、香港心理学发展状况

（一）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

早在1939年，香港大学文学系的教学计划中第一次安排了心理学课程。1948年起，香港大学哲学系也开了一门心理学课程，并于1952年扩充为三门课：普通心理学、差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后改为实验心理学、心理学的一般（包括社会）方法、心理学的哲学方法。香港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教学活动则是香港大学成立心理学系以后的事。

1967年，香港大学成立了心理学系，并于1970年培养出了首

批毕业生。该系第一任系主任是澳大利亚人J. L. M. Dawson。他把香港看作是开展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自然实验室。他欢迎国外来访者到心理学系周期性休假并作研究。他的这一愿望到了80年代得以实现，由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访问心理学系的学者络绎不绝，有的在研究班上讲讲课，有的则呆上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便有充分的时间考证研究的可能性。1972年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学会成立，由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在同年8月主办了第一届学术会议。1979年召开了第一届亚洲地区学术会议。在教学工作方面，由于Dawson是第一位到香港任教的社会心理学教授，与此相关的课程，在心理学系成立之初，一直是重要的课程为学生所学习。

80年代中后期后，自1975年接掌香港大学心理学系的高尚仁教授，不仅长期担任心理学系主任，而且力邀一些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心理学家到港大心理学系任教，并逐渐将港大心理学系的研究中心，从Dawson时的重跨文化研究转为本土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港大心理学系开设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多达40门左右，涉及了比较广泛的心理学各领域以及与地理、人文、历史背景有关的独特领域。心理学系的毕业生若继续深造，还需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如哲学硕士或博士课程、教育心理学硕士课程、临床心理学硕士课程等。

香港中文大学是1963年9月由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合并而成的一所联合大学。心理学起初只是其他系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选修课。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在Jennie Lee-Ng任系主任的崇基学院社会学系设立了一个“心理学教研组”，此时心理学只是选修课。1979年，该校请了台湾大学杨国枢教授来港任教一年。杨国枢在港期间，不仅做了大量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而且为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心理学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82年，上述心理学教研组被确认具备建系的条件，依此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

正式宣告成立，原国立台湾大学的刘英茂教授担任第一任系主任。目前，该系开设了范围很广的心理学课程，有哲学硕士学位课程和临床心理学社会科学硕士课程等研究生课程，并有数位从欧美留学返港的心理学博士担任主要课程，使其与香港大学心理学系一起成为香港地区两个重要的心理学教学与研究中心。

（二）香港心理学会与《香港心理学报》

在香港心理学会成立之前，在香港地区先行成立了香港卫生协会。1953年在香港大学担任心理学教学工作的丹麦人 Erik Kvan 和香港大学教育系讲师 Marie Clements 一道，联合当时任政府教育署监察员的 Irene Cheng 博士及一批对“大众心理卫生”领域感兴趣的光明中学的知名教师，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并于1954年1月成立了香港心理卫生协会。它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促进“香港心理卫生计划在涉及心理疾病和智力落后所需的最广泛的医学、教育和社会方面的发展”。后来，在提出成立儿童指导诊所的建议的同一年，Marie Clements、Kenneth Priestly、Beryl Wright 等人被准许进入诊所从事咨询工作。从此，香港心理卫生协会进入实质性活动阶段。

香港心理学会于1968年2月成立，至1970年即有会员40人，目前已有会员300人左右。学会成立之初至60年代末期，香港心理学会完全是在香港大学心理系内开展工作。进入70年代后，由于香港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生的不断加入，以及心理学本身逐渐涉及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使会员不断增加，学会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在学会发展的早期，香港大学心理系一直是核心并负领导与组织职能，并给予学术上的支持，80年代后学会逐步加强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香港地区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组织。

根据会员的专业资格和经历，香港心理学会设置了多种级别的会员形式，包括毕业生会员、会员、资深会员和名誉会员等。此

外，长期对心理学感兴趣或从事与心理学有关的职业的非心理学专业人员，还可申请成为附属会员。1982年初学会还成立了临床心理学分会，会员的入会资格之一是必须接受过研究生训练。

作为香港地区最重要的心理学组织，香港心理学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有：第一，促进会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为会员提供学习与交流的机会。包括，对香港心理学家的私人开业活动进行业余指导；主持召开学术年会和一些专题性会议；每年邀请一些本地区专家和海外访问学者开研讨会和专题讲座。第二，维持心理学在香港的专业水平，帮助政府及其他机构审定心理学家的专业资格和工作性质。学会编印了《心理学专业守则》，明确界定了"心理学家"一词的含义，以确定何种资格的人能以"心理学家"的名义提供心理服务。这一工作表明，香港的心理学家已充分意识到维护道德与专业标准的必要性。第三，编辑出版心理学专业刊物。香港心理学会办有《香港心理学会通报》，一年两期，所载文章都是论述香港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有关问题。此刊物现改名为《香港心理学报》，成为香港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心理学专业刊物。

（三）香港心理学界的研究情况

香港地区的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及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心理学相关系科里。从研究领域来看，主要在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职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与心理测验、中国人的心理学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和较高的水平。以下择要介绍一二。

1．临床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是香港心理学研究的发端。早在1969年，香港大学心理学系、香港心理学会和一些政府部门人士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研究小组，对香港地区的心理服务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查，以了解根据本地区现已培养的人才，政府在将来对专业人员会有什

么样的需求。调查显示，在香港地区临床心理学专业人才最为匮乏。因而自 1971 年起，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制定了临床心理学研究生培养计划，每两年招生一次。1973 年首批 5 人毕业并为社会服务，临床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局面由此打开。

此后于 1982 年香港心理学会成立了临床心理学分会，此举不仅有力地提高了临床心理学在香港心理学界和社会上的地位，而且对于加强对临床心理学工作的领导和协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临床心理学家占应用心理学家的大多数，并受雇于高校的心理咨询机构、社会康复服务机构、医院和精神病诊所或普通诊所，以及医疗保健、社会福利、警务、心理矫正服务等政府部门，从业人员一般都拥有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从研究及应用工作本身来看，香港地区的临床心理服务已有由注重治疗转向注重预防的趋势，并与心理测验工作做一定程度的结合。①

2. 社会心理学

香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工作起步于 60 年代中期。纵观近 30 年来香港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进程，大致存在三条主要的线索或路线。②第一条线索是以早期研究为代表的。当时心理学在香港尚未有独立的系，几位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都是外国人，他们主要是将在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用于香港社会，以期验证理论的普遍性。第二条线索始于 80 年代初，是在香港本地学者从欧美留学返港后才开始的。代表人物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妙清、梁觉、马庆强等，以及香港大学心理学系的许志超。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承继了在欧美攻读博士学位时形成的兴趣与课题，用国外的理论

① 上述有关资料引自郑龙、石方颖著：《香港心理学发展概况》，载《心理科学通讯》1986 年第 2 期，第 57～59 页。

②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研究香港社会。如张妙清从美返港后继续其修订“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量表（MMPI）”的工作；梁觉和许志超都是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著名跨文化社会心理学家 H. Triandis 的学生，他们返港后继续从事有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跨文化研究；留学英国的马庆强则继续进行道德发展的研究。第三条线索是基于对前两种跨文化研究的反思而掀起的本土化运动。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香港大学心理学系的何友晖、高尚仁、杨中芳，受到 70 年代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界出现的批判运动的影响，开始考虑如何使用本土的概念及研究工具进行相应的研究，以使社会心理学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生长在中国文化中的华人的社会行为。

香港社会心理学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几项。

Dawson 作为在香港任教的最早的一位社会心理学教授，来香港后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两项：(1)继续沿着其博士论文《一西非社区社会变迁的心理后果》的思路，研究香港社会的现代化对香港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化中较为严厉的社会化过程对人的认知历程的影响。(2)他曾以香港船民为对象，研究船民这种独特的亚文化对社会化的方式的左右。他提出航海的经历与环境要求人们在个性上具有变通性和独立性。因此，船民父母较之其他华人能够容忍孩子的独立与反抗，甚至也不强迫孩子用右手。①

英国学者 M. Bond 80 年代初到香港中文大学时，以“中国人较具集体主义倾向”为基本假设，完成了一连串比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基本心理历程及社会心理的研究，其中涉及中国人的分配行为、中国人的自我及中国人的归因行为。1986 年，他集台湾学者和自己的实证研究之大成，写成《中国人的心理》一书。他

① J. L. M. Dawson 等：《遵从和左撇子的生态与文化压力》，载朗勒主编《跨文化心理学读本》，香港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

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将中国人较为重视的儒家思想制成价值观量表，拿到世界各国进行测验，然后再进行比较。此外，他还致力于去找出一套能适用于全人类的有关价值观的理论，[①] 并于1988年出版了《跨文化研究向社会心理学的挑战》一书。

何友晖从70年代中期起，即围绕孝道（1974）、面子（1976）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并对社会心理学中有关中国人的社会化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1986）。有关香港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下文专述。

3. 中国人心理学或本土心理学

自70年代中期起，以何友晖为代表的香港心理学家即将当代中国人重要而且独特的心理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加以探讨，其中包括中国人的"面子"、"仁、义、忠、孝"、"缘分"、"怨"、"报恩与复仇"、"自我"等。随着上述诸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进行"中国人心理学"或"心理学本土化"或"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逐渐成为香港地区心理学界研究的主流问题。但是，本土心理学在香港地区真正开展研究，则是80年代以后的事。其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和新亚书院于1983年在香港主办了"现代化与中国化科际研讨会"，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共同继续讨论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会后在香港和台湾两地各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在香港出版的是由乔健主编的《现代化与中国化研讨会论文选编》（1984），包含了香港、台湾和大陆两岸三地学者的论文。在台湾出版的是李亦园、杨国枢和文崇一主编的《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1985），只包含了台湾学者的论文。其二，时任香港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的高尚仁教授，于1984年春聘

① 参见M. Bond：《在有关价值观的多种文化研究中发现个体差异中的普遍因素》，载《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1988年总55期。

请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杨中芳回港执教社会心理学，并联合何友晖共同推进本土化运动。而杨中芳至港后确实为推动香港地区的本土化及促进大陆与台湾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她除竭力倡导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并身体力行外，在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方法问题上，在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方法体系，而她却坚持主张因素分析法和测验法等客观性较强的方法，指出了滥用自评式“评定量表”的许多弊病，提出“必须脱离用量表为唯一测量工具的困境”，这些为心理学本土化的深入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三，于1989年年底，香港大学心理学系邀请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学者在香港举办了一个“迈向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新纪元：认同与肯定”研讨会，讨论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会议的主旨是希望从回顾、反省及展望中，认同中国心理学有本土化的必要，探索并肯定今后朝本土心理学努力的方向，借以使中国心理学更进一步迈向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学科的道路。会后由高尚仁和杨中芳主编出版了《中国人·中国心》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文集共分三卷，分别为“传统篇”、“人格与社会篇”和“发展与教学篇”。

第六章 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下）

第一节 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的主要研究

一、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

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分支学科，众多其他的分支学科都是在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和展开研究的。因此，我国心理学界在这两个分支领域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鉴于普通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在论述时将两者并在一起进行。

（一）研究概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首先即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从有关运动知觉的初步研究开始。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工作者在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开展了有关动力定型与技能形成等方面的初步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在1951～1957年期间进行，它是我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普通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有关工作都是属于基础理论性的实验研究。1957～1961年是第二阶段，由于当时的形势和需要，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开始转向于联系实际方面。上述的基础理论性的实验研究工作都基本上停顿了，大部分研究题目都是属于工业或劳动心理学的范畴。此外比较接近基础理论性研究的也有"视觉幻觉错觉"及

“不同方位刺激的观察实验研究”等问题。这些研究的成果对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材的设计及其临床应用方面都具有实际的意义。在1962～1966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实验心理学与普通心理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时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及高等院校的心理学工作者在感知觉、记忆、思维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工作。这个时期主要的研究侧重在空间知觉方面，如大小、距离、深度知觉及视觉方向定位等方面，特别是空间知觉和听知觉在这个阶段都有较大的进展，获得一些较好的成果。我国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第四个阶段应该从1976年底开始，由于一些心理学研究机构的恢复和重建，以及高等院校心理学教研室开始恢复活动，短短几年内便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如颜色、视觉、深度知觉、听觉等方面都先后有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有的成果被列入国家标准采用。

（二）研究内容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研究在这数十年中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1）感觉和知觉的研究；（2）记忆过程研究；（3）汉字的信息加工研究；（4）思维心理研究；（5）语言心理研究；（6）个性研究。以下就上述有关问题展开一些说明和介绍。

1. 感觉和知觉的研究

感觉和知觉是心理学的重要领域，从心理学的早期历史来看，它的建立最早也正是从感知觉的实验研究开始的。我国心理学界则从1951年起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开始进行感觉和知觉的研究，并且在以下诸多方面均有较为突出的成果。

（1）关于感受性。李家治等人曾探讨过闪光信号的频率选择以及闪光频率的辨认和等辨量表问题，认为快闪频率（周/分）在160左右，慢闪频率在55～60范围内；快闪的亮黑比为2：1，慢闪的亮黑比为1：1是最合适，适合人对闪光频率辨认的规律性。

他们证明了等辨量表曲线和差别阈限的累积曲线是一致的，在频率 5 至 182 周/分的范围内，闪光频率的可辨性是频率的幂函数。实验结果支持了费希纳的概念。封根泉则进行了低负荷下信号察觉效率的研究，发现低负荷条件下出现长时间不能察觉信号的现象，只有信号间隔时间全距 5 分钟以上时出现，可以把信号间隔时间全距 5 分钟视作正常负荷与低负荷的临界时间。李家治及赫葆源等曾对光坪条件下同时性闪光信号及相继闪光信号辨认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发现光坪对同时性闪光信号辨认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它一般地对辨认有干扰作用，但光坪对消灭两个闪光之间的似动现象，却有不容否认的结果。对相继性闪光信号辨认的结果表明，无论是简单反应或是选择反应，光坪对于闪光信号的辨认产生干扰作用等。70 年代末喻柏林则探讨了照度变化及不同光源对视觉辨认的影响问题，荆其诚则对中国青年观察者的视功能特点进行了研究，着重探讨了视觉辨认中的照度视角、对比度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焦书兰探讨了视场亮度变化对视觉对比感受性的影响。在触觉感受性方面，王极盛等发现针刺能明显提高两点阈限。80 年代末期，王甦等则对触觉超锐敏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2）关于颜色视觉。我国对颜色视觉的研究，无论是基础方面还是应用方面均有较丰硕的成果。就颜色视觉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来看，我国心理学界分别在中国人眼光谱视亮度函数和基础色度学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 在颜色视觉的应用研究方面，就中国人肤色色度的测定、记忆肤色与喜爱肤色、颜色标准化及应用等作了积极的探索。[2]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几项研究成果有：

①② 参见王甦、林仲贤、荆其诚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3～90 页。

陈立关于儿童色、形抽象的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对形状的抽象能力发展先于对颜色抽象的发展。陈立对儿童和大学生的色、形爱好的差异从发展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儿童对颜色爱好的差距大，大学生的差距小。荆其诚等根据色度学原理，设计了一台名为“双积分球目视色度计”的色度学的仪器，这是利用人的视觉测量颜色的一种仪器。这种仪器既能在两个相邻视场上产生所要求的颜色，也能测量两视场的颜色。利用这台仪器，荆其诚等研究了 CIE 标准照明体 A、D_{65}、D_{75}色度点的颜色匹配和允许范围，喻柏林则在同一颜色匹配问题上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朱祖祥对低亮度的四种色温白光和四种单色光下 11 种色标的绝对辨认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说明了光源显色性对颜色辨认的影响。在中国人肤色色度的测定这一颜色视觉应用研究领域里，林仲贤分别以中国成人、儿童、青少年为被试作了测定，并根据实测数值制成了中国人肤色板，对彩色评价、测量和定标都具有实际意义。林仲贤等还在颜色标准化及应用方面，进行了电视彩色肤色测试卡的研制，它用于彩色电视系统的彩色调整与评价，并可供调整各摄像机的色调平衡，直接观察彩色再现的效果，是电视演播中的直观性的标准验测工具，因而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此外，在颜色视觉的工效学方面，许为等也作了一些探索。但就荧光屏(简称 CRT)显示颜色编码的视觉工效还有待于研究，并且为了适应计算机终端彩色显示技术等高科技发展的要求，颜色视觉研究尚需作进一步努力，以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3）关于空间知觉、时间知觉与运动知觉的研究。在空间知觉研究方面，我国心理学家主要就形状、大小、深度与距离以及空间定位等知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彭瑞祥等就形状知觉问题探讨了两组离散度不同的图形和取样规则不同的两组图形的视觉辨认问题，表明无限制组的三个距离上的正确反应时的平均

值，无论在慢速或快速条件下，均比有限制组的短些。同样，小离散度组的三个距离上的正确反应时的平均值也均比大离散度组的短些。张厚粲等、张增慧等、马振华、方俐洛等在形状知觉方面均作过一些较有特色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霖从 80 年代初便开始对视知觉拓扑结构和功能层次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实验研究，并提出了“视知觉拓扑结构和功能层次的理论”，为“什么是视觉信息处理的基本单元问题，提出了独到而有创见的研究方向”。[①] 而在大小知觉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荆其诚等的距离、观察姿势对大小知觉影响的室外研究；方芸秋等的双眼辐合对大小知觉的作用的研究；王甦等的刺激的绝对大小对视觉长度比例辨别的影响研究；林仲贤等的视觉和触觉在长度知觉中的相互作用的研究；韩凯的被动触觉长度知觉及工具触觉的研究；王甦等的图形结构及框架对直线知觉长度的作用的研究以及王甦的曲线两端点距离的触觉辨别的研究，等等。在时间知觉方面，早在 60 年代张增杰等即作过儿童与青年时间知觉的比较研究，比较了不同年龄组在有标尺和无标尺时再现时距的差异。70 年代末黄希庭等进一步探讨了 5～8 岁儿童使用标尺问题，发现儿童时间知觉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众多因素的影响，并且黄希庭等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的活动是影响知觉的一个重要因素；孙文龙等则发现个体的各种心理能力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林仲贤等也发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如年龄、不同感觉通道（视、听）或不同呈现方式（连续或空白）等。

（4）其他。围绕着听觉及言语知觉、错觉及后效、痛觉等问题，我国心理学家也作了大量的研究。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讨论。

① 参见陈霖（1986）：《视知觉的拓扑学研究》等文章，载于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 页。

2. 记忆过程研究

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关于记忆过程的研究始于1959年张增慧的“有关神经衰弱者记忆问题的实验研究”[①]。进入60年代后，我国心理学界即开展了以信息论为背景的短时记忆研究，从而迅速赶上了当时国外心理学界在记忆领域里研究的总体趋势。而80年代以后我国在记忆领域里的研究可谓是遍地开花。以下将择其一二对我国关于记忆过程研究作些介绍。

（1）关于教学实践中的识记的研究。为了将心理学知识有效地运用于社会实践当中去，早在60年代初，我国心理学界即就识记方法和过程与识记材料的关系作过较为系统的探讨。段惠芬、赵莉如和曹日昌等人即就“初中学生的识记方法”作了系列探讨，并根据研究所发现的累积式识记过程和纲要充实式识记过程，对改进学生的识记方法提出了建议。对此朱滢撰文[②]称“这组文章在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的深度以及研究方法的特色这三方面堪称榜样”。

（2）关于短时记忆的研究。我国心理学界在80年代关于记忆研究的一个重点，即是短时记忆。其中，喻柏林、陈辉、张武田等研究了短时记忆的容量问题；喻柏林、莫雷、张武田等研究了影响短时记忆的容量问题；曹日昌和陈舒永则探讨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的关系，等等。

（3）关于记忆年老化的研究。由于受毕生发展心理学思想的影响和现代社会逐渐变成老龄化社会的趋势，关于老年人记忆特点及记忆年老化等问题，自80年代起也引起我国心理学界的重

① 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② 朱滢：《记忆过程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视。许淑莲等人在这一问题上作了较多的探索，研究表明图像自由回忆中记忆成绩随年龄而下降的趋势很显著，年龄越大对逻辑性故事的回忆越差，以及 70 岁是老年记忆发展的一个关键期。龚耀先等人也持相同观点。由于此类问题的实际存在，围绕着记忆年老化的机制与干预，许淑莲等、吴振云等和孙长华等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

3. 汉字的信息加工研究

当现代认知心理学刚刚在美国兴起的 60 年代，我国心理学界即用信息加工的观点研究汉字问题，并得到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其中，曾性初等通过句子中汉字笔画的省略与恢复，研究了汉字的部位信息的作用，这一结果为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在简化汉字工作方面，提出极有建设性的建议。彭瑞祥则通过对汉字结构的统计分析，研究了汉字信息的空间分布和汉字的不同部位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发现了汉字的部位效应现象。曹传咏和郭德俊等则通过研究发现了汉字（词）的频率效应问题和汉字的笔画数效应问题。此外，围绕着汉字的空间关系、方位关系和配合关系等内部结构关系，笔画和部件等汉字字形的结构单元等问题，胡裕树、彭瑞祥、曹传咏等作了几项研究，表明了汉字的字形结构效应和笔画效应的存在。喻柏林则重点考察了汉字识别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舒华等在形声字的语言提取方面，以形声字的读音为对象，用命名法研究了汉字读音的加工方式及知识、策略在读音加工中的作用。研究表明，高频字的读音以直接提取为主；低频字的读音以声旁推理和类似推理策略为主。张厚粲等则用启动作业研究了汉字读音中音似与形似的启动作用。彭聃龄、谭力海等则研究了语言在词汇通达或字词识别中的作用。在汉字字义的提取方面，张积家的几项研究发现了义符分别在单字词语义提取中的作用和在双字词语义提取中的作用。而《汉语心理词

典》、汉字识别与大脑功能的关系以及汉语失读症等问题，也为我国心理学界所关注，并作了一定的积极探索。

4. 思维心理研究

在概念形成和问题解决等问题，研究也比较多。陈家麟在研究中发现了不同的策略对概念形成有明显影响，这一结果与杨治良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杨治良发现了人类概念形成的一般规律，即概念形成的发展过程为先渐进，后突变，无明显的高原现象。冯忠良等人通过对概念的控制掌握进行研究，发现了教师指导的意义和学生的积极活动的作用，这一结论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富有一定的启迪性。在问题解决的研究问题上，重点探讨了数学领域中学习和问题解决的关系，在这一领域作出突出成绩的是卢仲衡等人。早在60年代，卢仲衡等人即对中学生几何问题解决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了几何领域中有很多因素影响几何问题解决，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破坏图形的知觉结构，使学生难于辨认出隐蔽的目标图形而影响思维过程的。这些结构为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几何教材设计和教法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进入80年代以后，朱新明等人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对此类课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80年代，在问题解决研究方面，另一个引起我国心理学界注意的问题即是认知策略在问题解决中的作用。王林通过研究发现，问题解决有三个要素，即问题解决、策略建立和策略变换，其中策略变换在问题解决中有重要的作用。吴鸿业等人通过研究提出在问题解决中主要有整体策略、单一策略和混乱策略等三种不同的策略。傅小兰研究了被试在问题解决中的启发式策略，发现无论是“前进”策略还是“倒退”策略，都与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知觉搜索深度有关。

5. 个性研究

在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领域中，关于个性的研究，严格说来应该是70年代末开始的，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当中，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个性的因素、本质和测量等问题，有大量的研究成

果问世，而且也有数本较高质量的个性心理学专著出版。以下重点围绕个性特点与类型，以及有关权威性个性量表的修订作些介绍。

（1）关于个性特点与类型的研究。宋维真以MMPI为工具测试了中国被试，发现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性格的抑郁成分比较明显；龚耀先则发现，在EPQ（成人）测试中，中国人的P分高，E分低，这一结果与上述宋维真的研究是一致的（指的是E的得分及其含义）；而这两项研究又与李铮关于大学生的一项个性调查结果是较为吻合的。这些研究都分析了中国人个性特点形成的原因，指出了文化历史背景、生活方式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郑日昌、祝蓓里、洪德厚等人重点研究了创造性人格特质，发现创造力高的学生具有某些共同的人格特征，如独立、富有幻想、大胆、好胜和自信心强等。在个性心理差异性方面众多的研究发现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不同学业成绩的中小学生、不同职业或人群等，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个性心理差异性。除了个性特点以外，个性类型的研究也为我国心理学界所关注。通常，我们对个性类型的划分和表述，有内向与外向、场依存性与场独立性、A型与B型等。陈仲庚等通过研究北京地区8所中小学370名被试，发现男生与女生内外向性格的不同表现。张厚粲等发现，其一，场依存性——场独立性是人格的两种不同维度，它们在人格表现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共同存在于人格这样一个统一体中。其二，场依存性——场独立性的认知方式与年龄、性别等有一定的关系，即场独立性有随年龄而增长的趋势；场独立性分数初中男生高于女生；理科大学生比文科大学生场独立性分数高等。张伯源等发现，冠心病人中A型性格多，正常人中B型性格多、A型性格少。

（2）关于个性测试量表的修订。为了对不同个体在个性研究上作量化分析和客观比较，为了提高个性测试的信度和效度，我

国心理学界从80年代初期起修订了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一些通用性个性心理测试量表，保证了我国个性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有效性。

首先，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的修订。我国的MMPI全国协作组从1979年开始对该量表进行修订，历时三年完成。整个修订过程分为四个步骤[①]：第一步，初步试用。经过1979年在京津地区试用，表明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较高，可以引用，但需要作必要的修改。第二步，初步修订。通过分析550个项目中正常人回答的情况，对被试不愿意回答的项目、无法回答的项目和理解上有困难的项目，酌情进行了修订。第三步，进一步试用。共测了全国六大区年龄在16～55岁、文化程度多在初中以上的1791名正常人和1301名精神病患者，检验了修订后中国版本的适用性、信度等问题并得到了肯定。第四步，进一步修订。对试用中发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修订。重修后试用表明，MMPI的信度和效度都很理想，在中国有一定使用价值，对精神病临床诊断有特殊的意义，但在分析测试结果时，务必以本民族的常模为标准。为此，MMPI在中国试用三年后，MMPI全国协作组于1985年又对中国人使用MMPI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常模。

其次，卡特尔的16种人格因素问卷（16PF）的修订。祝蓓里等1988年修订了16PF的中国常模。具体过程大致如下[②]：第一步：抽样。在全国12个省市依分层取样的原则，抽取了全国成人（男、女）团体样组、全国大学生（男、女）团体样组、全国中学生（男、女）团体样组。第二步，修改测试，以增加可读性（题

① 高玉祥：《个性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② 祝蓓里、戴忠恒：《卡氏16种人格因素中国常模的修订》，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意保持不变)。第三步，信度检验。第四步，效度检验。第五步，常模的修订及编制成计算机程序。全国的常模共制出 9 种，即成人(男、女)常模、大学生(男、女)常模、中学生(男、女)常模、产业工人常模、专业技术人员常模和国家干部常模。

最后，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的修改。陈仲庚和龚耀先分别对 EPQ 作了修订。其中龚耀先主持的全国协作组，通过施测 13 省市 6458 名正常成人和青少年，对 EPQ 的成人式和青少年式进行了修订，制定了中国常模，提出了划分人格类型的方法，计算了信度。

二、教育心理

教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它也是中国心理学界最为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心理学工作者不仅在教育心理学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上作了大量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出发，作了许许多多有价值的应用性研究，为我国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提供了扎实而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 研究概况

中国的教育心理研究自解放初期即开始了，但由于 1958 年“批判运动”的影响，教育心理研究尚未体现出它的应用价值，即又重新回到了原先的低起点上。1959 年后，在教学改革实践的推动下，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深入教学第一线，就教学改革中一些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如朱曼殊关于小学生理解应用题的研究，赖昌贵关于小学生掌握算术应用题的分析方法的研究，以及卢仲衡在几何教学等数学教学心理的研究等，为当时的教育界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思路。特别是 1962 年中国心理学会召开教育心理专业会议之后，教育心理研究在全国范围

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卢仲衡在数学学科教学心理领域中又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万云英在语文学科教学心理领域里作了大量的研究，我国解放后第一本《教育心理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由潘菽主编出版的。我国教育心理研究的飞速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心理学工作者在教育心理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全面展开了研究。例如，"八五"计划国家教委成立的重点课题与青年专项课题中，就有学习与全面发展、自学能力培养、学习过程研究、学科教学心理学实验、创造能力培养、学与教的心理学培养、数学思维能力和课堂等12项教育心理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目前均已取得了研究成果，并有大部分成果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被加以扩大和应用。目前，我国教育心理研究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并有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趋势。

（二）研究内容

我国教育心理研究的范围较为广泛，研究内容众多，诸如基本心理过程、学科教学心理、品德心理、学习心理、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以下我们将着重在学科教学心理和品德心理等方面作些介绍和说明。

1. 学科教学心理

学科教学心理涉及的内容较多，本文将侧重语文和数学两个传统学科的教学心理，并主要将介绍的范围框定在中学和小学两级。语文教学心理学是研究学生在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第一语言）过程中的心理特点和规律，探讨语文教学与学生心理发展的相互作用过程的一门学科。数学教学心理学则是研究数学教学过程中心理活动及其规律，探讨数学教学与学生的能力的个别差异、性格特征的相互影响的一门学科。

（1）语文教学心理。我国心理学界关于语文教学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识字、阅读和作文等有关语文教学的内容与形式上，以

期通过心理学研究，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

首先，关于汉字学习心理与识字教学的研究。我国关于汉字学习心理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艾伟在1923年到1948年间在这一领域即作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他就汉字的辨认与默写间的关系、汉字"形"与"音"在学习上的区别等问题均进行过实验，其《汉字问题》[①]一书即包括他的研究的主要成果。解放后，沈晔首先探讨了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语文课中识字问题，研究发现当时小学生识字的总体效率较低，存在不同程度的少、慢、差。因而他明确提出字形的掌握是初入学儿童学习汉字的难点。从此，关于汉字教与学的心理学研究；进入了实验和理论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几项研究，即沈晔、万云英、朱作仁、沈德立等，采用自然实验法和系统观察，探讨了初入学儿童熟记汉字过程中字形的掌握、字音掌握和字义的掌握的心理过程。朱作仁还研究了儿童识记汉字时采用的方法，发现儿童一般通过偏旁标声或标义，通过赋予字形本身以某种意义等联想方式识记汉字。而围绕着识字教学方法，我们心理学工作者和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分别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了积极的探索，比较了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两种方法的优劣。张积家和张必隐则研究了识字过程的心理机制。

其次，关于语文阅读心理和教学。早在60年代，赵莉如等即对初中生识记短句的方法和特点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学生平时阅读理解水平和实验中采用的识记方法密切相关，优、中等生运用意义分组者占优势，单句识记法效果最差，而差生中却多用单句识记法。黄仁发在研究中小学生理解单句的特点时发现，中小学生理解和掌握最困难的是连谓句和变序句，而在分析单句时，则存在着对词性、词序的明显依赖。在探索中小学生阅读文章的心

① 艾伟：《汉字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

理过程方面，万云英揭示了中小学生理解文艺性课文的心理特点和分析文章结构的特点，李丹研究了小学生理解寓言和比喻词的年龄特点，时蓉华探索了影响儿童概括段意的因素，万云英等进行了小学生课外阅读兴趣培养的实验研究，张建华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语文阅读的类型和阅读能力结构，以及莫雷对中学生阅读能力结构进行了因素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最后，关于作文教学心理。万云英等长年研究学生写作过程的心理特点和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初步揭示了小学生作文的一般特点及发展趋势，并且对写作兴趣的激发、写作技巧的训练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如万云英在其关于作文能力培养的一项研究①中，提出了以下几条关于作文教学指导的建议：在拼音、识字教学中引导学生观察、思考，把丰富知识，发展观察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训练结合起来；采用发现法，指导学生观察图片，提早看图作文；创设情境，进行命题作文；加强课外阅读指导；激发写作动机等。为了更加客观而有效地研究作文教学心理，朱作仁尝试性地编制了《小学生作文量表》，包括了《小学生作文标准化测验》、《小学生命题作文测验》和《小学生作文自评、互评量表》三个分量表，经修改后已于1990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数学教学心理。我国心理学界在数学教学心理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关于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和"现代小学数学"教学实验，在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引起相当的重视和高度的评价。

首先，关于一般数学教学心理的研究。小学生掌握数学概念和运算技能心理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心理学界的一个研究重点。

---

① 万云英：《小学生作文用词、造句和构思特点初析——作文能力培养的追踪研究之一》，载《心理发展与教育》1988年第2期，第9～15页。

1978年，刘范领导的幼儿数概念研究协作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表明①，6～7岁儿童数概念已达到一定水平，已具备进入小学系统学习数学知识的基本条件。林崇德的一项关于初入学儿童的调查也取得同样的结果。孙昌识和吕静等人则侧重作了小学生掌握数学概念的心理分析。而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如何培养小学生算术运算技能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肖前瑛通过研究发现，学生掌握运算技能经历实物运算——出声言语——内部言语三个环节，按照这三个环节进行教学和训练，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林奇芸在研究中用心理模拟法所创拟的“智力活动模式”进行教学，加强了学生掌握运算法则的各种智力活动。算术应用题教学一直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难点，为此，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试图在此方面通过心理学研究，为广大的中小学数学教师提供理论依据。早在60年代我国心理学界即意识到此类问题的重要性，朱曼殊的几项研究就儿童理解应用题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儿童理解应用题的特征、发展过程以及解题时的思维活动特点。赖昌贵则重点探讨了小学生掌握分析应用题的方法。茅于燕和陈沛霖等人对小学生掌握算术典型应用题的过程和复合应用题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80年代，冯忠良等则研究了小学生解题活动中解析技能形成的问题，赖昌贵分析了小学生解答整数应用题困难的原因，肖前瑛进行了定期对学生进行思考性应用题练习的实验，刘电芝就解题思路策略训练在提高小学生解题能力上的作用进行了实验研究。代数教学心理的研究是又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59年，周准水即探讨了初中代数教学中的两个重要的心理学

① 刘范等：《3～7岁儿童数概念和运算能力发展的研究》，载《心理学参考资料》第17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情报资料室，1979年。

问题[①]，即代数教学中发展学生的语言的问题和直观性在代数教学中的意义的问题。周淮水在1960年还探讨过初中学生接受高中代数知识的可能性问题，提高学生学习代数的潜能或接受能力问题。在此前后，周淮水多次分析了中学生代数运算错误和困难的原因，这些研究对于代数教学中的各种可能存在的心理因素以及如何提高代数教学的质量与水平，提供了非常有建设性的理论依据。为此，刘静和、冯振声和茅于燕在60年代即尝试过在小学进行代数初步知识的教学。研究表明，可行性是有的，但是究竟代数下放的适宜年龄是多少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后来，郑俊杰在80年代的几项实验表明，只要代数教学内容和方法得当，哪怕是小学低年级学生也可以学习并掌握一定的代数知识。此外，几何教学心理研究，在我国心理学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其次，关于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的实验研究。我国心理学者和一些数学教师在小学数学教学改革方面做过大量的成功的实验，既有刘静和主持的"现代小学数学"教学实验，孙昌识和郑俊杰分别进行的有关小学数学结构及其转化方面的教学实验，也有小学教师马芯兰以培养学生思维品质为起点和目标的小学数学教学改革，以及50年代即从江西开始并发展到80年代遍及全国28个省的，包括口算、笔算和珠算的小学数学"三算结合"教学改革实验。以下着重介绍其中的几个。先看"现代小学数学"教学实验。这个实验是刘静和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儿童数学思维发展"课题组长期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这个实验有以下几大特点和重要成果：一是教学实验的总体设计科学而严谨，如将小学数学知识内容的建构与学生的认知特点相结合，自然教学活动

① 参见周淮水：《初中代数教学中几个心理学问题的初步商榷》，载《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第45～56页。

与心理学实验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等。二是编写的实验教材科学、合理而有效，如编写的指导思想立足于提高人的素质，教材的体系以构建知识结构为目标，教材的编排着力于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和能力等。三是实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理论上看，探索了学生认知结构与智能发展，数学教学与发展辩证思维，数学思维训练与智能发展等理论问题的可行性和理论支撑点；从实践上看，不仅实验班的学生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数学能力等方面均比普通班学生要好，而且实验班教师自身的素质也得到了提高，他们科研意识增强、科研能力提高、教学水平逐步提高。再看马芯兰的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实验。马芯兰的实验前两轮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上，在此期间，林崇德介入实验，从心理学角度来提高实验的科学性。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围绕学生思维的敏捷性、思维的灵活性和思维的深刻性、思维的独创性等思维品质来改进教学方法，就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之后，在教材改革和小学数学能力的培养方法方面，她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良好的设想和具体做法。

最后，关于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中学数学自学辅导实验开始于1965年卢仲衡编写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材》，后于80年代经过扩大实验并正式出版了这本教材。这里我们将围绕这本教材及其实验本身作些介绍。卢仲衡在编写这本教材时，充分考虑到教学方法的实验，他提出了“在教师指导、辅导下以自学为主”的观点，即“自学辅导”。为此，他在编写教材时遵循了适当的步子、铺垫、直接揭露本质特征、按步思维等九条原则。并且指出在自学辅导时，作为教师应当班集体与个别化相结合，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学为主，利用现代化手段来加强直观性等事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学辅导教学的顺利实施。通过多年的实验，实验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自学能

力及其迁移等方面均明显优于普通班，而且实验班学生在创造性思维、分析应用题能力以及各学科的均衡全面发展方面，均有了良好的发展。对上述的实验及其成果，我国心理学界、教育理论界和广大中小学教师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将其称为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典范。

2. 品德心理

品德心理是教育心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心理学家早在建国初期即作过一些初步的实验研究，如章志光的"个性鉴定与教育"和"小学生课业责任心的形成"等，李伯黍等的"少年儿童道德行为动机特征的心理分析"，以及谢千秋、聂世茂等人的研究。直至进入 80 年代后，品德心理的研究才掀起了一个高峰。李伯黍等人就我国儿童和青少年学生有关道德判断发展及教育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相关研究，不仅发现了品德发展的年龄特点，表明了教育对促进儿童道德判断水平的意义和作用，而且通过皮亚杰研究成果的比较，发现了我国文化传统和教育性质对儿童品德发展的影响。章志光领导的研究组则在品德形成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在一些品德形成的动态实验研究中，就榜样教育的有效途径、情绪在儿童品德形成与教育中的作用，以及中小学生的责任行为、利他观念、集体观念、道德信念等的形成、发展与教育进行了探讨，并且将价值观的作用、社会影响等内容，也分别从其与品德形成的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围绕着品德心理的结构、品德心理研究的方法等理论问题，也有人作了积极的探索。如陈琦曾参照认知理论的生成学习模式，提出了一个道德行为准则学习过程的模式。①在这个模式中，他将个体的道

① 参见陈琦：《认知结构理论与教育》，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 年第 1 期，第 73～79 页

德认知结构看作是道德行为准则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内容，认为它不仅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前提，而且对道德需要的产生和道德行为的形成来说，都会起一定的作用。林崇德则将品德结构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整体与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了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方式系统、品德心理特征系统以及品德的定向、操作和反馈系统等三个子系统。章志光则于 90 年代提出了一个“品德形成三维结构”的观点，即品德结构涉及到生成结构、执行结构和定型结构三个维度，而这些结构则在个人道德行为的发生上作为一种动力机制而存在，因此由于某种因素的作用，则会引发三种结构的连动作用而最终导致特定的道德行为的发生。

3. 其他

在教育心理研究领域中，除了学科教学心理和品德心理两个基本而重要的内容外，学习心理学、问题行为、教育社会心理学和特殊儿童的心理与教育等内容也为我国心理学界所重视。鉴于有关问题在前文略有涉及，这里主要简单介绍特殊儿童的心理与教育研究。在我国，特殊儿童的界定通常是指智力落后儿童和盲、哑、聋等残疾儿童。在智力落后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茅于燕曾经作了大量研究。80 年代末期，茅于燕在其“学龄前智力落后儿童早期干预的教学研究”中，不仅发现了智力落后儿童的心理特点，而且就这些儿童的教育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特殊教育的教学效果的评价不能仅仅以智商是否提高为唯一依据。而张宁生则在“教学实践中耳聋儿童学习语言的某些特点”和“对聋哑儿童进行口语训练的心理学意义”等研究中，对耳聋或聋哑儿童的心理特点、学习能力与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研究结果与其他众多研究者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即在聋哑儿童的心理发展中，思维发展、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是两个核心问题。因此在教育方面，就应当根据这些特殊儿童心理发展上的特殊性，采取相对应的教育教学方式。

三、发展心理

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一样，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时期一直是一个很受重视的研究领域，而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均有所突破，获得了较大的成绩。

（一）研究概况

建国初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处即建立了一个以刘静和为首的儿童心理研究组（后发展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心理研究室），并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一项统计表明，1965年之前，我国发展心理学工作占整个心理学工作的10%[①]，这些研究中，主要内容涉及儿童思维发展、儿童道德品质、儿童入学问题等。但这个时期的一个重大成果，即是朱智贤《儿童心理学》的出版。[②]而心理学恢复之后，我国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据统计[③]，1979～1988年，在有关期刊上发表的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的论文达2274篇，研究被试数量共362665人，内容涉及儿童认识的发展、儿童的语言发展、儿童思维特点、儿童个性和道德品质的发展、超常儿童等。以下将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介绍和说明。

1．关于儿童认识的发展

儿童认识发展的研究是发展心理学的一项基本内容，本文侧重介绍儿童感知觉发展和儿童记忆发展两个方面。我国关于儿童感知觉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0年代这一个十年当中。其一，在感觉研究方面，张增慧研究了儿童的颜色感知能力，发现了儿童

① 刘范：《中国的发展心理学》，载《心理学报》1982年第1期，第2页。

②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③ 石绍华：《十年来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一般水平》，载《心理学报》1990年第3期，第314页。

同色配对能力、颜色命名能力和颜色再认能力的一些特点，并且发现了儿童在对颜色进行辨认时是有一定顺序的，其他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张增慧、林仲贤还发现了教育、环境与文化等因素对儿童颜色感知能力的影响，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会导致儿童颜色感知能力的发展的差异性。范有仁、李惠桐等人还分别研究过儿童的听觉能力和视觉能力的发展，研究表明，儿童的听觉能力和视觉能力都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发展的特点。在听觉方面，儿童的听觉能力主要有判断声源能力和分辨能力；在视觉方面，儿童的视觉能力一般是按照注意静止的近物到运动的物体到手眼协调最后到形成“客体永久性”的顺序发展的。其二，在知觉研究方面，李文馥、张增慧、茅于燕等人分别围绕大小、形状、方位、立体等空间知觉问题，探讨了儿童空间知觉发生和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如茅于燕的研究发现了85%的24.4个月的婴儿即能认识图形大小。方格等则研究了儿童时间知觉的发展特点，结果表明，我国儿童对时序认知发展通常是一日、一周、一年的顺序，而关于一年之内时序的认知，一般要到7～8岁才有较准确的表现。方格、方富熹、林仲贤等还研究了儿童运动知觉的发展，不仅发现了儿童知觉发展的年龄趋势，而且发现了运动表象、认知策略在其中的作用。其三，在观察力研究方面，张晓东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3岁儿童在观察客观事物时，不仅能正确判断自身在一定条件下对客体的认知结果，而且能根据他人所处的不同条件下，正确判断他人在不同情况下的认知结果。姚平子研究了3～6岁儿童观察图片的进程，发现了儿童观察的有意性、组织性和精确性的特点，并且明确地将幼儿观察的有意性分为四个阶段：不随意性起主导作用，主动观察，能分解出子目标，持续和反复观察。吴凤岗则通过研究幼儿的绘画过程，注意到训练提高儿童的观察能力，有助于提高儿童的绘画水平。

关于儿童记忆的研究。80年代以后，我国心理学界关于儿童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智贤主持的一项全国性研究当中，研究结果也大多反映在其主编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1]一书中。关于儿童记忆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其一是形象记忆等记忆类型的研究。1982年李铮等的研究表明，小学儿童的识记效果以视觉记忆为优，这种现象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改变，一年级时占绝对优势，三年级时发展到高峰。1985年沈德立等的几项研究表明，幼儿视觉图形的记忆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发展的趋势，听觉、嗅觉、味觉甚至触摸觉的记忆也是如此。这些研究都充分反映出儿童形象记忆占主导地位的年龄特征。儿童在发展形象记忆的同时，语词记忆也在发展。1985年沈德立还研究了儿童语词记忆的发展，并将其与形象记忆相比较。研究表明，幼儿也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语词记忆能力，但从效果上来说，幼儿的形象记忆比语词记忆效果要好，差别随年龄增加而加大。这一结果与其前后的刘荪钜、杨治良和钱含芬等关于小学儿童或青少年的语词记忆的研究结果是趋于一致的。有关学者还研究了儿童有意记忆和无意记忆的发展以及意义记忆和机械记忆的发展，发现了记忆方式存在由无意记忆向有意记忆、机械记忆向意义记忆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年龄特点，同时也发现了在一定的年龄阶段无意记忆或机械记忆为主的现实状况。其二是记忆编码特点与记忆策略的研究。早在60年代，赵莉如等即在研究中发现了初中学生在记忆时会适当运用意义分组、等量分组等识记方式。而80年代关于此内容的研究则更多，李山川等的研究表明，小学儿童识记效果取决于儿童所采取的编码方式，通常，以材料意义联系为线索的识记方式效果最好。赵俊杰则发现小学生在识记汉字的短时

① 朱智贤：《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

记忆中，信息编码的主要形式是视觉形式。左梦兰等人则侧重研究了儿童的记忆策略，表明儿童在他们知识和经验范围内，能够选择适当的记忆策略，5 岁时即进入了记忆策略发展的加速期。其三是影响识记效果的研究。沈德立的研究发现，系列位置效应在儿童记忆时明显存在，王承忠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钱含芬则发现了复习对小学儿童识记效果的影响，李山川发现了情绪状态与识记效果之间的关系。

2. 关于儿童思维的发展

我国心理学界关于儿童思维发展的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儿童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二是儿童思维过程的发展。先看儿童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概念是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儿童理解和掌握概念的过程本身，必然反映出儿童思维和认知的水平和特点。我国对儿童概念形成发展的研究是从 60 年代初，并且在 1977～1983 年达到了一次高峰。在这段时期，一个全国性的协作研究组，他们先后研究了 3～7 岁和 7～12 岁儿童数概念的发展[①]，把我国儿童数概念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数概念的起始约相当于 3 岁左右。第二，儿童能口头数到 10，有点数 5 个以下的物数 10～40 个物体的能力，并能懂得 10 以下的数的组成。第三，数的运算约在 6～8 岁出现。儿童有 3～4 位数的概念。有用数进行运算的能力，并有了 10 以下的数的稳定概念。第四，约在 9～12 岁，逐步发展出形成数概念系统的能力。儿童能够掌握万以下的数，并能用数进行推理，逐步形成整数、小数和分数的概念系统。上述两个研究及其成果，是我国进行儿童概念形成发展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该研究协作组还对儿童数

---

① 幼儿数概念研究协作组：《国内九个地区 3～7 岁儿童数概念和运算能力发展的研究》，载《心理学报》，1979 年第 2 期，第 108～117 页；刘范等：《国内 10 个地区 7～12 岁儿童数学概念和运算能力的发展》，载《心理学报》1981 年第 2 期，第 135～149 页。

概念发展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3～7岁儿童计数能力的发展，数群概念和加减运算的发展，系列概念的发展以及基数与序数的关系，数的守恒，各种认识活动在数概念发展中的地位问题，儿童数概念发展的转折期。还就数概念的形成发展提出了若干重要的理论观点。除了这些研究外，刘范等人的全国儿童认知发展研究协作组还就儿童数学概念稳定性的发展和儿童数学概念发展中认知结构的变化，作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不仅发现了4～11岁儿童数学概念稳定性发展存在随年龄而上升的趋势，而且发现了儿童在掌握数列概念、长度概念、面积等分概念、容积（体积）概念、概率概念、交集概念等数学概念过程中认知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认知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再重点介绍一下我国心理学界关于儿童概念发展的几个理论观点。上述有关儿童数学概念以及自然概念、社会概念的研究表明，年龄等因素是影响儿童概念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儿童概念形成发展存在随年龄增加而不断提高的必然趋势，表明了儿童概念形成和发展的渐进性。其次，儿童概念的发展是由近及远、由偏到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是直接认知与间接认知此消彼长的过程，是连续又分阶段的过程，以及存在着快速期和相对稳定的时期。最后，儿童概念的发展，就其机制来说，就是认知结构动力变化的过程。① 关于我国儿童概念发展的研究，沈家鲜特地撰写专篇作了总结。②他提出了以下几条经验的可借鉴性，即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的问题、复杂研究与基本研究、评定研究（鉴别法）与实验研究（实验法）、因素型实验与函数型实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计算机的应用与常规方法的应用等。这些经验对于从事心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同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①② 沈家鲜：《儿童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583页。

关于儿童思维过程发展的研究。其一，关于儿童概括、比较和分类过程的发展。80年代初期，林崇德（1980，1981，1983）对数的概括能力发展进行了系列研究，将0.5～7岁儿童数概括能力分为直观——行动感知概括、直观——表象笼统概括、直观——言语概括和表象——言语概括共四级水平。他还发现，到了小学，儿童的数概括能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其概括能力共分为五个等级：直观概括水平、具体形象概括水平、形象抽象概括水平、初步的本质抽象概括水平和代数命题概括水平。另外，他将中学生的数概括水平分为四个水平：数字概括水平、形象抽象概括水平、形式抽象概括水平和辩证抽象概括水平，等等。其二，关于儿童掌握判断过程和推理过程的发展。何其恺等曾对学前儿童因果判断的发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学前儿童即具备了初步理解因果关系的能力，并按照实践动作、表象动作到内部简约的顺序发展因果判断思维。而方富熹等则进一步发现了学前儿童中迅速发展着一种依据因果系列事件的时序关系或空间关系作出因果判断的能力。古茂盛研究了3～6岁幼儿推理的发展，发现了幼儿明显存在着推理活动，这种推理活动是以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实物为中介推导出未知的实物来，但在推理过程中，直观思维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周镐等曾更进一步研究了小学儿童直接推理、演绎推理等不同推理方式的特点，并于1989年又进一步研究了小学儿童关系推理发展的特点。董奇则通过测定小学儿童概括杠杆平衡的条件，研究了小学儿童掌握思维规则，即推理原理的特点。而关于推理过程发展的又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则是1985年全国青少年心理研究协作组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1]，即在校青少年形式推理的发展存在年龄特征，青少年形式推理能力是随

① 全国青少年心理研究协作组：《国内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在校学生青少年思维发展的研究》，载《心理学报》1985年第3期，第286～295页。

年级递增而逐步分化的，青少年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青少年掌握各种推理形式存在着不平衡性，等等。其三，关于儿童青少年思维能力培养的研究。林崇德曾经成功地进行了中小学生思维品质培养的研究，他指导实验班的教师通过思维发展心理学的学习，定期集体备课，统一实验的指导思想与具体措施，搞教学观摩课，不断改进教学计划，突出教学方法的改革，以培养中小学思维敏捷性、思维灵活性、思维深刻性和思维独创性等四种思维品质，取得了显著效果。实验班学生在思维品质方面经过训练和培养后，均有了明显提高。所以说，我国心理学界关于儿童思维的研究是很有成效的，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我国儿童思维发展的基本规律，有利于我国思维心理学的体系建构和学科建设，而且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思路。

3. 关于儿童的语言发展

儿童语言发展是我国心理学界所注意的重要课题之一，特别是由于汉语是属于世界上的一个特殊语言。概括起来，这方面的研究有儿童的语音与语词发展、儿童的句子发展和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等。其一，儿童的语音与语词发展研究。吴天敏等、张仁俊等和李宇明都研究了婴儿的发音，他们观察到婴儿发音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如从出生到四个月，婴儿所发的音绝大部分是单音节音。四个月以后，婴儿能发的音大量增加，有辅音加元音，也有单独的元音和辅音。到一岁左右，儿童近似词的音增多，且能正确地模仿成人的某些发音。刘兆吉等研究了3岁以上儿童的语音发展情况，发现了6岁儿童对声母、韵母的发音正确率随年龄的增长逐步提高，而且对韵母的发音比对声母的发音容易，错误较少。另外，在儿童词汇发展研究方面，幼儿口头语言研究协作组（1981）等的研究发现，2岁幼儿的言语中已包括了几乎所有的词类，但名词和动词占主要地位。吴天敏等和吴鸿业

等的研究也有类似结果。朱曼殊等还专门研究过儿童对代词的掌握情况，发现儿童对指示代词或人称代词的掌握各存在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当儿童成为交谈的第三者时，儿童很难理解别人说的“他”就是自己，即常常以为别人说的“你”是指自己。此外，围绕着儿童掌握空间方位词、形容词、量词以及动词的情况，也有较多的研究。其二，儿童的句子发展。朱曼殊等曾集中研究过2～6岁儿童的口头语言和句子结构的发展，研究表明，2～6岁的儿童简单陈述句的发展是从混沌一体到逐步分化，句子结构是从松散发展到逐渐严谨，从压缩、呆板到逐步扩展和灵活。对儿童复杂语句的分析表明，这类语句的发展也遵循上述的规则，并受儿童思维发展的影响。至于句子的长度，则从2岁时的两个或略多的词发展到6岁时的平均8个词。还有一些研究者则专门研究了一些特殊的句法结构，如李向农等研究了“把”字句的发展，周国光等研究了介词“给”及其相关句法结构的发展，孔令达等研究了儿童结构助词“的”的发展，等等。而儿童对句子的理解也是研究者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缪小春研究了3～7岁儿童回答特指疑问句的发展情况和理解特点，发现在回答“什么”、“怎样”和“为什么”等问题时，儿童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发展得最迟。朱曼殊在一项个案研究中发现的现象与缪小春的研究结果稍有不同，她的研究表明儿童的产生顺序依次是“什么”——“为什么”——“怎样”。朱曼殊等还分别研究过儿童对否定句、被动句和复合句的理解，结果表明7岁可能是儿童理解双重否定句的关键年龄，6岁是理解被动句的关键年龄，而对复合句的理解水平呈明显的随年级而上升的趋势，但又深受句子的复杂程度所影响。缪小春等则专门研究过儿童理解句子的策略，发现儿童在理解简单句时主要采用语义策略，而朱曼殊等和王益明则发现儿童多使用以语义为根据的事件可能性策略。其三，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儿

童语言能力的发展，除了体现在词语和句子的掌握之外，还体现在连贯性语言能力和运用语言能力的发展上。范存仁等早在60年代即研究过4～7岁儿童连贯性语言的发展，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情境性语言的比重逐渐下降，连贯性语言的比重逐渐上升。武进之等通过分析幼儿看图说话时的语言特点，发现他们在讲述故事时语言的连贯性表现出四种水平，即不连贯、部分连贯、基本连贯和连贯。但是从年龄上看，上述两个研究结果略有不同，前者表现出7岁时连贯性语言才占较大优势，而后者表明6岁儿童已大部分达到连贯水平。对语言适当运用的能力是衡量儿童语言能力水平的重要方面。张璟光等（1989）研究了6岁左右的儿童在游戏过程中的语言运用状况，发现这些儿童已能根据不同对象（教师、同龄儿童或比自己小的儿童）的需要、知识能力的特点，来确定话语的内容和方式，以达到谈话的目的。而华红琴的一项研究则发现五六岁儿童在比较简单的情境下能调节自己的言语，而7岁可能是根据情境调节言语表达的一个转折期。

4. 关于儿童个性和道德品质的发展

我国心理学界在实际研究中都充分认识到此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心理学中的重要性，而且大家都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从内容上它涉及到了认知、情感、意志、社会性发展等方面，从学科上又是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共同研究的课题。鉴于前文我们分别在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教育心理中已有专篇介绍有关个性和品德心理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侧重在儿童社会性发展方面展开论述。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就是儿童社会认知和个性形成的过程，也即儿童在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获得其所属集团的行为、信念、情感和动机的过程，它包括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道德判断和道德观念的发展等。总体上看，我国关于儿童社会性的发展从1997年起进入良性阶段，特别是近十年的研

究成果最为丰富。许政援曾撰文[①]分析了我国近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认为有代表性的研究集中在韩进之等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研究，李伯黍等人、章志光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观念的发展的研究，朱智贤等人、韩进之等人、黄希庭等人的价值观、理想、动机和兴趣的发展的研究，李长岷等人、李百珍、傅安球、许政援等人的独立性、意志和自控能力的发展的研究，万传文等、茅于燕的独生子女的社会化以及章志光、许政援、董奇等人的家庭、班集体、榜样、同伴等诸因素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的研究。以下介绍其中的几项。其一，自我意识的发展。我国关于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的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几乎是空白，60 年代中期曾有过零星的研究，80 年代之后方有一些系统研究。韩进之等在 1983～1987 年 5 年间组织全国协作，分别考察了我国学前儿童、中学生和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并结合当时的同行同类研究，就自我评价、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等自我意识的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论述和总结。这些结论反映在他们的《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与教育》[②]一文中。其二，道德判断和道德观念的发展。李伯黍领导的儿童道德发展研究协作组自 1978 年起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关于中国儿童道德发展的一系列研究，主要有以下一些研究成果。一是小学生从二年级起，绝大多数已能根据行为原因或从行为的因果关系上作出判断，而且半数以上的人能把行为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判断。二是儿童行为责任的道德判断有特定的年龄时期，一般从客观性判断向主观性判断的转折年龄在 6～7 岁之间。三是儿童公正观念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公

① 许政援：《儿童社会性发展》，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26 页。

② 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与教育》，载《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433～463 页。

道的公正判断取代平等的公正判断的转折年龄在8～9岁之间。此外，结合我国的道德品质教育，李伯黍领导的协作组还在公私观念、集体主义观念、分享观念、利他观念、公益劳动观念以及友爱观念等具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特点的儿童道德观念的发展方面，作了系列性的研究。其三，儿童个性倾向性的研究。黄希庭等调查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发现我国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观总的来看相当一致，他们将有所作为、真正的友谊、自尊、国家安全看作为四个最重要的价值观（终极性价值观），而且我国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观体系，存在着团体的和个体的差异。朱智贤指导下的全国"青少年理想、动机、兴趣研究协作组"对青少年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就当时中学生的理想、学习动机、学习兴趣等个性倾向问题，发现了发展上的总体趋势和个别差异。与此同时，韩进之的研究组就青少年理想形成和发展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中学生理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些新情况。其四，关于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因素。我国心理学界就家庭、学校、同伴、奖惩等社会因素的作用，作过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有许政援等的家庭教育方式的影响的研究，吴凤岗的家庭结构影响的研究，茅于燕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行为特点的比较研究，章志光等的班集体作用的研究，张吉连的榜样作用的研究，以及周国韬的奖赏和李伯黍的研究协作组的惩罚作用的研究等。众多研究为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5. 关于超常儿童心理

我国心理学界关于超常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研究始于1978年。二十多年来，主要的研究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一是对数百名超

① 查子秀：《超常儿童心理与教育研究15年》，载《心理学报》1994年第4期，第337页。

常儿童进行了7～15年的追踪研究和教育，从中总结了超常儿童的类型、特征及成长因素；二是对数百名超常儿童和数千名常态儿童进行了认知、个性倾向和心理特征等的比较研究，探讨了超常儿童与常态儿童在这些方面的主要差异；三是编制了《鉴别超常儿童认知能力测验》及个性心理特征问卷，使鉴别和研究超常儿童有了我国的常模标准和工具，等等。以下我们从超常儿童的认知发展、个性发展和鉴别三方面作些介绍。其一，超常儿童认知发展。查子秀等多年来对智力超常与常态儿童认知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反复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超常与常态儿童认知的不同方面有差异明显程度不同、构成模式明显不同和发展趋势不完全相同等特点。通常，超常儿童智力水平较高，且有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如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观察敏锐、有独创性、求知欲旺盛、自信好胜、有独立性等。特别是他们在创造力方面，无论是思维的独创性、灵活性还是流畅性，均比常态儿童明显成绩要高，而这种创造力的特点表现在学习活动中，有联想丰富、思路灵活、善于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等特点。其二，超常儿童的个性发展。多项研究表明，超常儿童在理想抱负、求知欲、独立性、好胜心等方面明显优于常态儿童，而且这些良好的个性特征（或非智力因素）与其学习成绩有较多的正相关。在智力优等的学生中（智商130以上），学习成绩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性特征，智力优且个性优的学生，学习成绩也优，这种三优型（优优优）有时会占到超常儿童的40%～50%。其三，超常儿童的鉴别。这是对超常儿童心理进行科学和深入研究的一个必备条件。我国心理学界对此也非常重视，查子秀等人在1978～1983年完成了《鉴别超常儿童认知能力测验》的编制，这套测验经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信度和效度都较高。洪德厚等则编制了《少年非智力个性心理特征问卷》，用于测试超常儿童的非智力个性。此外还有陈帼眉编制的

《幼儿性格特征问卷》和王骧业等人编制的《小学生个性特征问卷》等。

四、医学心理

医学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心理学分支学科，我国心理学界与医学界，特别是与精神病学专家充分合作，作了大量的研究，不仅完善了医学心理学的知识体系，而且为临床医学研究提供了充分而重要的心理学素材。

（一）研究概况

我国关于医学心理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即有过一些初步的探索，上升期应该始于1973年心理研究所的重建。当时曾与有关医疗单位协作，联系医学界的重大科研项目——针刺麻醉中的心理学问题进行研究。而快速发展期通常有两个标志，一是1978年12月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二是1979年6月在一次医学心理学术座谈会上决定成立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从此，我国医学心理学研究全面展开，并在以下几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二）研究内容

1. 关于心理治疗的研究

1949年以后我国在心理治疗方面进行了比较大量、系统的研究。1953年起首先对心因性疾病——神经衰弱进行了集体和个别的心理治疗。1958年，心理研究所与医学界有关单位协作，又对患神经衰弱的病人进行贯彻心理治疗原则的综合快速疗法，取得了痊愈和显著好转达80%左右的疗效。1959年和1961年他们又将综合快速疗法加以推广和深入研究，效果也很显著。[①] 为此，我

① 李心天等：《医学心理学三十年》，载《心理学报》1980年第2期，第135页。

国医学心理学界普遍认为心理治疗的疗法以综合疗法比较有效。综合疗法有三部分，即集体与个别心理治疗，药物和物理治疗，以及气功、太极拳等调整机体机能状态的活动治疗。在综合治疗中这一心理治疗的特点是：改变病人对病因和由疾病引起的躯体各种变化的错误认识活动，使病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出来，等等。通常，在综合疗法中，心理治疗部分的贡献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由于政治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快速综合治疗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即从心理治疗的舞台上消失了。接下来我们再分述我国学者在心理治疗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

（1）疏导心理治疗。这是 80 年代由鲁龙光提出的一种治疗方法。这一治疗方法是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吸收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精华，结合现代科学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思想设计而成的。它通过治疗者在与患者诊疗交往过程中产生良性影响。所谓"疏"，就是有序地将患者阻塞的心理疏通；"导"就是引导患者变得合作、主动、积极，从而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促进心身健康的目的。疏导心理治疗分个别、集体治疗两种形式，其一般程序包括诊断、治疗和巩固三个阶段。[①]这一疗法经临床使用已有一定成效。

（2）认识领悟心理疗法。这是 80 年代末期，由钟友彬在其临床实践并作过大量研究之后总结出的心理治疗方法。1981 年至 1987 年，钟友彬在 60 年代初的初步探索基础上，围绕强迫症、恐怖症等神经症或性变态症状的治疗，在心理动力学原则基础上逐步发展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治疗方法，并于 1988 年正式提出了认识领悟疗法的治疗方法。[②]据钟友彬的一些报道，一般经过 5 次到 12

① 鲁龙光：《疏导心理疗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62 页。

② 钟友彬：《中国心理分析——认识领悟心理疗法》，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次左右的治疗，不少病人的症状就已有了好转，或者显著好转甚至症状消失。

2. 关于心理咨询的研究

我国心理咨询的工作基本始于80年代初，主要有综合医院心理咨询门诊、精神科心理咨询、临床病人心理咨询和大学生、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赵耕源等曾对214例神经症病人进行心理治疗的疗效观察，并报告了在综合医院进行心理咨询门诊1000例的情况，不仅发现神经症病人为综合医院心理门诊的主要对象（这一点与国外的报告是一致的），而且说明了心理咨询的意义和作用。心理咨询的作用在临床病人心理咨询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说明。赵友文等曾对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女性病人进行心理咨询，发现凡有心理咨询介入的女性中，术后1年内无不良心理反应，而未咨询者术后1年内新发的不良心理反应占19.4%。我国心理咨询界工作最多的是关于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咨询。据目前来看，我国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有专门性的心理咨询机构、活动或专业人员，他们围绕大学生的学习活动、交往与恋爱活动、入学与毕业就业指导，以及神经症等问题开展心理咨询，提高了大学生的心理卫生水平，对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小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也受到我国心理学界、广大中小学教师和家长的重视，但有关文章却不多见。张世吉曾报告了在精神病院开设儿童心理咨询门诊的情况①，在其报道的200例咨询对象中，以学习困难为多，占46.5%。咨询中发现，与学习困难有关的疾病是儿童多动症、学习技能障碍、精神发育迟缓和边缘智力等。由此作者认为学习困难问题应当被作为儿童心理咨询的主要

① 张世吉：《精神病院儿童心理咨询门诊200例》，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0年第1期，第40页。

内容，并在咨询过程中也要给家长和教师进行心理指导，以保证咨询的效果。

3. 神经症高血压病的心理研究

这个研究把对人发生致病影响的心理因素分为工作或学习不当的长期紧张，工作与家庭中人际关系失调，生活中重大的不幸事件等。王景和等认为病人对工作、学习、生活事件的认识在神经衰弱等神经症的发生发展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而认识又是和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密切相关的，如多数病人具有急躁易怒或敏感多疑、易生闷气等性格弱点，这种性格和他们患病有关。王景祥等则在分析和研究中又引进了两类恶性循环的概念①，有80%～90%病人认为这两类恶性循环影响着自己的病情，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病人分析出病因和个性弱点影响着自己的病情。通过心理治疗，80%病人基本上消除了两类恶性循环因素，部分病人消除了病因，但个性上的弱点则大多数未消除。王景和在研究高血压病的心理病因和病前性格特点时则发现了与神经衰弱一类神经症类似的情况。

4. 精神病人的病理心理研究

我国对精神病人病理心理的研究，以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障碍方面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多半采用图片或文字分类、物体分类和其他方法来分析病人的抽象概括过程。龚耀先的一项研究即发现病人的抽象概括成绩差，完成实验的时间比正常的健康人差，并且出现特殊的分类。陈昌惠等则进一步发现病人概括质量不高、概念混淆模糊，带象征性质，甚至形不成概念。部分病人则在判断、推理及创造性应用思维能力方面有较严重的障碍。在

① 王景祥等：《神经衰弱综合治疗原理的探讨》，载《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64年第1期，第96～98页。

其他方面，龚耀先研究了病人的短时记忆特点，发现他们对回忆的材料缺乏组织能力。严善明等进行了精神分裂症病人对体积、重量、错觉的反应的实验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错觉显现率以晚期病人为最低。由此研究者认为，错觉的缺失可能是晚期精神分裂症感知觉障碍的一种具体表现。当然，上述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的研究结果目前尚不能进行综合的比较与分析，为了提高此类研究的质量或水平，今后的研究趋势应该是将临床观察、心理测验、实验心理和神经生理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5. 针刺麻醉中的心理学问题研究

针刺麻醉是我国传统医学中针灸止痛应用到外科麻醉方面的一个新尝试，我国心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突出。许淑莲等、王极盛等研究了情绪紧张状态等心理因素在针刺麻醉中的作用。一方面不同的情绪紧张状态会干扰针刺效应的正常发挥，另一方面情绪状态和多种心理生理机能密切关联，情绪紧张对针麻效果的影响可能是和它使机体多方面机能处于不良状态有关。陈舒永等、许淑莲等和李开桥等还研究了某些心理生理特点在针刺麻醉中的作用，表明人的痛觉特点、触觉敏感性、暗示感受性等都与针刺麻醉效果有关，从而表现出针刺麻醉效果上的较大的个体差异性。

6. 临床神经心理学研究

临床神经心理学是神经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最早介绍临床神经心理学研究情况并作初步研究的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汤慈美等人的研究，并在70年代末期即有李心天等我国医学心理学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在神经病临床中开展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进入80年代后即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有众多的研究成果问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室神经心理学研究组，于1978年将言语认知的大脑机制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作为重点

内容，与医学界进行了有效的协作。这个研究组的研究工作主要有：其一，胡超群编制了《临床汉语失语症测评法》，这套测验既可用于探讨言语认知的脑过程的理论研究，也可用于临床诊断和指导言语康复训练。其二，进行了言语障碍和失语症的综合性神经语言学研究。李心天等根据对123例急性脑血管意外病人的言语行为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不仅发现了病人所存在的7种不同类型的言语表现及其特点，而且探讨了各类型言语障碍和失语与脑损伤部位的关系，等等。我国进行临床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研究，即是大脑两半球不对称的研究。李心天等曾经领导全国协作组进行了一项“大脑两半球机能偏侧化与左、右利手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右利手占到91.51%，左利手仅为0.23%，而在利手的表现及形成问题上，年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李鸣杲等（1985）则进行过裂脑人的研究，他将两例裂脑患者手术前后的心理变化作了对比研究，发现患者因癫痫发作减少其脑功能有了明显的恢复。郭可教等、李心天等也在同一领域作过相类似的研究。此外，关于半脑人的研究、手指技巧运动与两半球协同的研究等有关课题，李心天等、郭可教等、秦震等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这些工作与前面的有关研究一道，填补了我国在临床神经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特别是为临床医学界提供了一些可贵的理论依据。

五、生理心理

生理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生理和生物学基础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它对理解心理过程与活动本身，对发展心理科学是十分重要的。

（一）研究概况

我国关于生理心理学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

段（1949～1958年），恰逢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热潮，这对于以探讨人类心理活动生理机制为内容的生理心理学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因此当时我国在与心理学有关的较多的研究机构中，以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和方法来进行生理心理学研究，成为当时我国心理学界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阶段（1959～1965年），在当时全国心理学界的总的气候下，生理心理学的研究在心理过程生理机制研究的必要性、心理与生理及大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阶段（1966～1976年）的研究基本是零星的，而且在研究中有关课题是与其他机构（如生理所、医院）协作完成的。第四阶段（1976年10月～1986年），心理学学科本身重新焕发出生机，生理心理学的研究重新走上正轨，从研究本身来说，课题涉及面广而深入，研究成果显著。第五阶段（1987至今），这是我国生理心理学的稳定发展时期，其中匡培梓、邵郊、沈政分别编著出版了“生理心理学”教材，将我国当代生理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就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二）研究内容

1. 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心理的研究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心理学界因为学习心理学，从而将一部分力量用于集中研究心理现象的神经或生理机制，即把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及条件反射方法，运用到心理学的研究工作中来探讨心理活动或行为的生理机制。吴江霖等用言语强化法，观察了儿童第一和第二信号系统相互动力传递的过程，并从被试的按压反应及口头报告中分析了各种不同的实验结果。许淑莲等则研究了8～10岁儿童条件反射接通机能类型的特性；季楚卿用同样的方法观察了儿童对复合刺激物形成条件反射和分化的年龄特征；匡培梓观察了儿童延续抑制动力学的年龄特征。在临床方面，

宋维真还探讨了神经衰弱患者大脑皮层的动力特点分析。1960 年以后，条件反射法不再被看作是研究心理学的唯一方法。徐联仓、曹日昌和陈元晖则提出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有必要进一步结合当时国际上出现的尖端科学理论与技术，譬如控制论、信息论、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技术，从多方面去开展心理的生理机制或心理的物质本体的探讨。

2. 以脑电和皮电为主要指标的生理心理学研究

60 年代由于新兴科学理论与技术的引入，我国心理学界开始有人以脑电与皮电反应为指标从事生理心理的研究活动。其中比较突出的研究有中国人脑电图的系统性研究。刘世熠对 4～7 岁、8～20 岁儿童脑发展的年龄特征及智能发育不全儿童的脑电图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发现脑电节律在 5～6 岁、13～14 岁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一种“飞跃”状态。此外，刘世熠等也探讨了某些智能活动，如心算与脑电波的关系以及注意分配与脑电波之间的关系等有关的研究。在临床方面，龚耀先、陈仲庚结合了神经衰弱症的治疗方法，并探讨 α 节律与患者皮层兴奋过程的关系、情绪状况对患者脑电图的影响。然而这些重要的研究及其成果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做的，在“十年文革”中它的进一步研究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3. 学习和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

进入 80 年代以后，我国生理心理学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开辟了新的领域，学习与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即是其中的一个。其一，海马结构与学习记忆。临床观察证明[①]，颞叶及海马受损或病变，常导致近期记忆丧失或倒逆性遗忘，或短时记忆转为长时记

① 匡培梓等：《生理心理学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2 页。

忆困难。刘善循等（1982）观察了电损毁海马不同部位对大鼠不同巩固水平的暗——电击回避条件反射的影响。结果表明，记忆愈巩固受海马损毁的影响愈小；损毁海马后，条件反射愈巩固所受影响愈小。这些结果基本上与以往文献报道相一致。邵道生、张祥镛等、刘善循等在此方面还做过其他课题的研究。种种结果表明，海马受损或被干扰都导致学习记忆的障碍，特别是学习早期更为敏感。其二，关于海马在学习记忆中作用的电生理学研究。邬勤娥等观察了家兔在学习时海马与皮层的电活动变化，实验以经典条件反射法与脑电图描记技术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结果表明，以脑电变化为指标的条件反应符合一般条件反射的规律，即它既能被形成又能被消退。但是随着条件反射实验的进行，其条件反射的出现率又逐渐下降的事实，是否说明学习进入不同的阶段，抑或海马在学习早期更活跃。匡培梓等和陈双双等以皮层电图（ECoG）的变化为指标观察了损毁双侧海马背部、腹部以及隔区对家兔探究条件反应的影响，证明了隔区和海马在维持皮层正常的机能以保持机体与环境的统一中，可能起着相似的重要的作用。其三，学习和记忆形成的神经化学过程。我国心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神经肽——精氨酸加压素及脑啡肽对学习记忆的影响。萧信生等以大鼠为对象，研究了皮下注射精氨酸加压素对大鼠记忆巩固过程的影响及脑内游离氨基酸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脑内r-氨基丁酸能神经元的活动可能是加压素易化记忆巩固过程的必要条件之一。陈双双等则以家兔为对象，观察了家兔皮下注射加压素后皮层及海马自发电活动中，δ波与θ波成分的比值及自发电活动的主频率功率的变化，也同样发现了有关肽类物质在学习记忆中的作用。沈政等和匡培梓等则集中研究了学习记忆过程中某些脑内物质含量的变化。沈政的研究表明了以光导纤维导入脑内的氦-氖激光对尾核作用的特异性，但是作者认

为，氦-氖激光对尾核的作用究竟是对学习过程的促进作用还是对运动环节的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①]匡培梓通过研究则认为，成绩不良组动物纹状体亮氨酸脑啡肽含量较高，可能是它释放和降解速度减慢，因而削弱了纹状体控制肌肉运动和植物性神经系统功能，继而降低了机体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稳定内在环境的能力，从而使学习记忆功能减弱。[②]

4. 其他研究

我国心理学界在生理心理学领域内的研究内容涉及到的课题还是比较多的，除了上述几类以外，还有80年代以后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而进行的有关认知过程与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其中的事件相关电位（简称ERP）目前被认为是分析人脑信息加工的有关手段而用于心理学各个领域中。我国学者魏景汉等即曾就ERP与汉语语义认知进行了系列的探索和研究。再就是睡眠的生理心理学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刘世熠从70年代起即开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关于致幻药等药物对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管林初等人在此领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如最先报道樟柳碱对动物的分辨学习、记忆行为和电活动的影响，在国内首先提出促智药的概念等等。

六、体育运动心理

体育运动心理学是一门重要的心理学应用性分支。它通过针对训练和竞赛中的问题开展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以及在竞技领域对优秀运动员进行心理特征的评定和对青少年运动员进行心理

① 沈政等：《氦-氖激光对大鼠躲避条件反应的影响与纹状体神经介质的变化》，载《心理学报》1983年第1期，第122～127页。

② 匡培梓等：《大鼠作业成绩与脑内亮氨酸脑啡呔含量变化的相关性研究》，载《心理学报》1988年第2期，第205～211页。

选材，从而提高中国体育项目的竞技水平和中国体育运动的总体水平。

（一）研究概况

中国的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起步于80年代初。中国心理学会体育运动心理专业委员会（1979）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会（1980）的相继成立，使我国的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这以后的十几年中，我国心理学界和体育界开展了大量的应用性研究工作，研究几乎涉及所有奥运项目，围绕着心理训练、竞技心理、心理选材和心理咨询等开展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二）研究内容

现参照《中国心理科学》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进行介绍和说明，主要从两个侧面进行。

1. 运动训练与竞技心理的研究①

（1）对我国优秀运动员心理咨询和心理品质的调查研究。这是马启伟主持的一项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课题。整个研究分三个子课题进行："对我国部分运动员进行心理咨询的研究"；"运动员临场比赛的心理咨询与心身调整"；"对我国部分优秀运动员几项心理指标的测试研究"。丁雪琴等专门对运动员的心理咨询问题进行了跟踪性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运动员的心理障碍和结合运动员的特点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以帮助他们顺利地做好大赛前的心理准备，争取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同时，通过实践探讨有效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的方法和手段，以便推广应用。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的主要方法有

① 丁雪琴等：《运动训练与竞技心理的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8～1088页。

认知训练法、催眠放松训练法、系统脱敏法、放松—表象训练法等。结果表明，通过心理咨询和训练，受试运动员的身心状态和机能都显著改善，主要表现有：神经活动能力增强，情绪好转，心理健康水平提高，自控能力提高和表象思维能力提高等。黄翔岳等则作了关于运动员临场比赛的心理调整与咨询的研究，他们采用认知训练、语言暗示，能够分析对手情况，正确对待比赛；采用人工按摩放松暗示，对于神经紧张、失眠、焦虑、四肢乏力、肌肉僵硬的运动员能产生良好的调整效果；在临赛前用配套音乐调整以及想象训练法等，都可以使运动员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增强对完成动作的信心。上述结果从多方面证明了临场比赛时进行的心理调整与咨询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2）运动员心理训练方法的研究。谢三才等专门对运动员心理训练方法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阐述，试图通过外部语言和内部暗示来调节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常见的心理方法有心理稳定训练、注意力集中训练、回忆训练等。这些训练方法可以针对运动员的类型和特点加以训练，从而达到对大脑进行训练和调节到良好准备状态的目的。此外，在心理训练方法研究方面，王惠民等利用生物反馈技术对心理控制训练进行了研究；丁雪琴等对功法调治与心理诱导放松训练法及其应用进行了研究。

（3）运动竞赛的战术心理手段的研究。谢三才等专门研究了运动竞赛的战术心理手段，他主要根据集体性运动项目竞赛时的心理活动变化规律，综合我国古代兵书的心理学思想，就如何取得一场比赛的胜利和教练员的临场指挥，总结了几个较适宜的心理战术手段，如知己知彼，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发制人；给对方以心理负担；等等。

（4）几种项目运动员心理训练的研究。丁雪琴对跳水运动员实施心理训练的研究结果表明，结合技术训练进行长期系统的心

理训练是提高运动员心理能力的有效途径。语言暗示放松训练、集中注意力训练、念动表象训练以及心理诱导、心理监督和心理提示等手段和方法是适用于跳水运动员的心理训练方法。邱宜均等对优秀击剑运动员开展了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提高了运动员的认知水平，帮助运动员做好了赛前的心理准备，并促使他们进入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如果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能与整体训练计划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刘淑慧等对高级射手比赛发挥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进行了研究，发现射手们在表象技能、技术水平、心理耐力、对比赛的适应能力、比赛心理定向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此外，丁雪琴等在研究跨栏、跳高等田径运动员的心理训练问题时，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

2. 优秀运动员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选材研究[①]

（1）不同运动项目优秀运动员的心理特征与心理选材的研究。我国体育运动心理学工作者在国家科委和国家体委的大力支持下，在较多的运动项目上进行了优秀运动员的心理特征与心理选材的研究。以下我们以几个运动项目为例进行介绍。其一，球类项目。邱宜均曾研究了优秀排球运动员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选材，结果表明，在对 7 个指标构成的认知心理特征测试反应中，优秀的甲级男排运动员成绩最好。这一结果既反映了优秀排球运动员的心理特征，也说明了可以将上述 7 个指标及其优秀排球运动员的测试反应作为选材的参考指标。詹美莎等研究了优秀篮球运动员心理特征与心理选材，欧阳孝等研究了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心理特征，研究结论均反映出优秀运动员具有良好的心理特征，以及

① 邱宜均，《优秀运动员的心理特征与心理选材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89～1112 页。

进行心理选材是完全可行的。其二，其他运动项目。黄向东（1983）对我国优秀短跑运动员几项心理特征与选材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所测8个指标中优秀短跑运动员均优于一般人和一般运动员，而且测试结果可以为短跑运动员的心理选材提供若干参考指标及数据。何桂麟对我国优秀体操运动员几项认知心理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表明测试中假设的8项心理指标能够描述优秀体操运动员的某些认知心理特征；研究者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体操运动员心理选材模型，从而在心理选材方面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此外，关于优秀射击运动员、优秀水上运动项目运动员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选材，毕龙树、朱翠源、刘立新等分别作了研究。

（2）运动员的个性特征与心理选材的研究。第一，80.8神经类型与选材研究。我们先介绍80.8。80.8是指“80.8神经类型测试表”，由我国的王文英编制。这一量表在运动员的神经类型与选材方面的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80.8神经类型测试表是从巴甫洛夫的神经活动类型学说出发，假定发现特定运动项目或项群具有其独特的神经活动类型，就可以运用神经类型评定工具作为选材依据，根据这一思路而编制的。编制后，王文英等用此表对我国部分优秀运动员的神经类型与选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优秀运动员的神经类型具有灵活、稳定等共同的趋势和较为明显的专项特点（即不同的运动项目者，神经类型有一定的相对应性）。而运动员的选材与训练则与运动员的神经类型有较紧密的关系，不同的神经类型者有不同的运动行为表现。

第二，运动员个性特征与选材的研究。张厚粲研究了认知方式特点与心理选材，发现运动员中个人项目的运动独立性比集体项目的运动员要求更强，而且场独立性较强者应激能力较强，在比赛中也容易将注意力引导到运动感觉和动作表象上。所以说，场

独立性作为竞技运动所必备的心理品质，应当是心理选材的一项必要的指标。邱宜均、孟庆茂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此外，陈舒永等用精神运动特性测定法研究了运动员精神运动的特性与心理选材的关系，陈香凯研究了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特性与心理选材，詹美莎等采用卡特尔 16 项人格特征测验（16PF）研究了运动员的个性特征等等。

七、工业心理

工业心理学是一门重要的心理学应用分支。中国的工业心理学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即工程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主要研究人——机系统中的人的心理的规律性，管理心理学主要研究在管理系统中人与人相互作用时人的心理的规律性。关于工业心理学，也有看法将劳动心理学、人事心理学和消费心理学与工程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共同包括在内。

（一）研究概况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中国心理学界在推动应用心理学的前提下，即开始起步对工程心理学和劳动心理学方面几个具体的研究课题进行研究，1962 年以后才展开比较系统性的研究。而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则是从 80 年代介绍和翻译美国的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开始的，并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在学术组织与教学和科研机构的建立上、专业人员的训练上、教学资料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研究内容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工业心理学研究，主要侧重在满足工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展开有关心理学的研究。进入 80 年代不仅一如既往地进行上述一些工业心理学传统内容的研究，更多地还在现代科学发展下的工业、生产与管理问题

上，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1. 工程心理学

（1）信号传信效率研究。60年代初，信息论的概念与方法已被应用到工程心理学的研究中，徐联仓等即运用信息论的观点与方法，研究了刺激——反应适应性的问题，证明对信号刺激的反应时随信号包含的信息量的增大而延长，两者呈线性关系；水平等间隔排列信号的不同组对传信效率是有影响的，通常信号分组排列可以提高传信效率，等等。

（2）闪光信号研究。中国工程心理学者在60年代曾对铁路灯光信号的显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包括闪光信号频率的选择、闪光信号的语义干扰、光坪对闪光信号辨认的影响等。李家治等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即就闪光信号频率的选择向铁路部门建议作如下规定：快闪灯光频率在160次（每分钟）左右，慢闪灯光频率在55～60次的范围。快闪的亮黑比可定为2：1，慢闪的亮黑比可定为1：1。他们还根据实验的数据，制定了闪光信号频率的等辨量表，为应用部门选用闪光信号提供了方便的手段，等等。与信号显示有关的另一项工作是铁路信号灯颜色的研究，崔君铭等在60年代铁道部门的一些实验基础上，于1973～1979年进一步开展了铁路信号颜色部标准的研究，实验先后在7个铁路局进行，大多数为司机和信号工充当被试，为完善铁路部门制定信号颜色部标准提供了一些科学实验数据。

（3）关于电站中央控制室信号显示的研究。发电站中央控制室信号的设计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技术，曹日昌等从工程心理学的角度作了一系列的研究之后，提出了如下几条设计原则：其一，信号显示应该有较强的直观性；其二，信号显示应当集中，缩小屏幕台的面积；其三，信号显示与操作元件要密切配合，要符合刺激——反应合适性的原则。这些实验或设计不仅为我国某些

电站中央控制室的设计提供了参照，而且为我国有关工作环境的研究开创了新例。

（4）人—机界面研究。人—计算机界面研究包括硬件界面和软件界面两个方面。80年代，我国开始计算机显示终端的工程心理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张华忠等曾在不同照明水平条件下研究终端不同对比度的阅读工效，结果表明，阅读时间随着屏幕照度提高而延长，照度愈高，字符与屏幕背景的亮度对比值愈小，视觉效果越差。朱祖祥对计算机视觉显示终端对比度和屏幕亮度因素的工效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证明对比度越趋向高、低两端，作业绩效越差，视疲劳度越大。朱祖祥等还进行过视觉显示终端色度研究，他们比较了红、黄、绿等六种颜色字符的视觉作业效果，发现一方面黑色屏幕上显示彩色字符的效果略优于白色屏幕；另一方面六种颜色字符中绿色字符显示的效果最优，它引起的视疲劳度最轻，作业速度最快，主观评价分最高。

（5）关于照度标准问题的研究。彭瑞祥等曾对中小学普通教室的照度标准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结果，综合建筑费用和保护中小学生视力等因素，他们建议课桌面照度80勒作为一般教室采光设计的依据，在人工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数据。而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我国工程心理学界在这一领域内进行了更多课题和更大范围的研究。如喻柏林等所作的“照度变化对视觉辨认的影响”的研究，焦书兰所作的“视场亮度变化对视觉对比感受性的影响”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所提供的数据，都为当时有关部门制定我国工业企业照度标准提供了视觉心理学的重要的依据。进入90年代后，有人又在照度水平的心理满意度方面进行了研究。心理满意度是评价照明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庞蕴凡等用心理量表法研究了室内照明水平与满意度的关系，发展了儿童和少年在白炽灯与荧光灯两种照明光源下阅读不同大小汉字时对照

明明度变化的满意度的年龄差异性，通常儿童比少年的照度满意值高。

（6）交通心理学研究。中国自80年代起围绕着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业开展了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管连荣等曾研究过车速与辨认交通标志距离的关系，结果表明，驾驶员对各种标志的正确辨认距离均随速度提高而缩短。孟庆茂等对公路标志牌汉字尺寸要求进行了实验，就汉字字高、字体、笔画特点等因素对辨认的影响，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数据。张殿业等曾对驾驶员的视觉特性与交通事故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事故组驾驶员与非事故组驾驶员在夜视力、立体视觉、图形和数字速视力三项视觉特性上有明显的差异。李忠等参照国外有关材料，编制了安全驾驶性向测验，对我国汽车驾驶员进行施测，发现个性、态度、注意力、判断力甚至年龄对安全驾驶有很大影响等。

2. 管理心理学

从事管理心理学的研究的机构，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工业心理研究室，另一个是杭州大学的工业心理专业。这两个机构与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在管理心理学的众多课题上展开研究，并有许多有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

（1）激励问题的研究。陈子光、陈小萍对企业职工的需要、动机和工作满意感进行了调查研究；吴谅谅等研究总结概括了我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物质激励方式；许小东、郑全全则分析了不同奖励方式影响职工工作积极性的效果；邹静探讨了企业中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之间的关系；徐昶等、何晓云则从组织水平上探索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问题等。因此卢盛忠指出，我国关于激励问题的研究，从发展的趋势来看，逐

步从微观的个体水平向较宏观的组织水平发展。[1] 以下我们重点介绍俞文钊关于激励的研究。俞文钊多年来在激励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进展，并以《中国的激励理论及其模式》[2] 一书对这方面科研成果进行了总结。在这本书中，归纳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宏观激励模式、激励与去激励因素的连续带模式、物质与精神同步激励论、有效奖励与惩罚的模式、公平差别阈的理论模式、中国的民主与参与管理等，并就这些激励理论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2）人员测评的研究。为了更有效地使人事管理走向科学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有关人事部门与管理心理学工作者合作编制了对各级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员的测评量表，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主要成果有吴谅谅等的《人员素质测评》；凌文辁等的“CPM 领导行为评价量表”等。进入 90 年代后，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力量，一些管理心理学工作者采用电子计算机模拟方法，成立人事决策系统模型，使人员测评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3）领导行为的影响。中国关于领导行为的一项重要研究便是对 PM 调查表的研究及其改进。徐联仓等、陈龙分别就 PM 量表的修订及应用作了大量的研究，从而使 PM 量表在我国得以广泛采用。凌文辁等则改进而发展为 CPM 量表，即在原有测量领导的实现目标或工作绩效的职能（P）以及团体维系职能（M）两种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在领导行为中处理公与私关系的评价（C），从而使 CPM 量表更具使用上的适应性。

---

① 卢盛忠：《中国管理心理学发展的回顾和展望》，载《应用心理学》1995 年第 1 期，第 8 页。

② 俞文钊：《中国的激励理论及其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4）管理决策研究。在管理决策权力与参与模式的研究方面，从1987年起，陈立、王重鸣等便与英国学者合作，进行了长达6年的跨国研究。结果表明，其一，参与决策具有显著的积极效果，我国企业的决策集中化程度，与英国企业的决策模式相似；其二，不同行业或不同决策类型之间，显示出不同决策模式；其三，在中国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始终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起主导性影响力等。王重鸣等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管理决策的研究，即围绕决策任务特征、信息结构、认知加工策略和决策利用方式等领域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决策辅助心理模型。这些研究发现，管理决策信息结构特点对于决策加工方式与认知策略有显著的影响，等等。在此基础上，王重鸣等于1992年构建了人力资源决策心理辅助模型，并开发了相应的决策支持系统（HRDSS）软件，为企业人事决策优化提供了具有适应性的决策软件。

（5）组织心理研究。陈立在80年代初即从开放系统的观点出发，对组织改革和组织发展等问题作了阐述。王钢就企业基层管理的组织变革策略进行了研究，表明了群体参与式的组织变革的受欢迎性和实效性。王重鸣等于80年代中后期就企业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特点及其对组织发展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调研和案例分析，提出了一个“人—计算机系统—组织”的界面层次模型，[①] 并根据这一模型又提出了系统开发与组织发展中应采取技能对策、系统对策和参与对策等三种管理心理学策略。从而为企业的组织改革和管理现代化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原则与对策。

① 王重鸣：《计算机系统开发的界面特征和心理学对策》，载《应用心理学》1986年第2期，第7～11页。

八、法制心理

法制心理学是一门很受社会各界重视的心理学应用分支学科。发展和壮大法制心理学是心理学界、教育界、社区和公检法多部门、多方位的任务，从学科上来说，则必须与法学、犯罪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发展教育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相互协作才能达到目标。

（一）研究概况

我国的法制心理学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它的兴起大体是以其分支学科——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为基础的，而犯罪心理的研究又是从青少年犯罪心理的研究开始的。大体上说，这一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为兴起阶段，时间是1979～1982年。这一阶段是法制心理学的起步阶段，通过教材的编写、研究人才的培训和国外理论或中国古代思想的借鉴，以及坚持为社会服务，为全面开展法制心理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二阶段为全面展开阶段，时间是1983～1985年之间。这一阶段主要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在法制心理学几乎所有分支学科中全面展开，将我国法制心理学研究提高到一个相当的水平。第三阶段为深入与拓宽阶段，时间是1986年以后。这一阶段的法制心理学研究不仅更加深入，而且不断拓宽新的研究领域，并通过研究方法的改进，使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二）研究内容

中国的法制心理学是在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而且目前我国法制心理学的研究依然主要集中在犯罪心理学的问题

① 罗大华：《法制心理学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70～872页。

上，因此本文关于法制心理学研究内容的介绍，将只涉及犯罪心理学的一些主要问题。[①]

1. 关于犯罪原因与犯罪机制

在犯罪心理学中，犯罪原因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兴起就是从分析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开始的。十几年来，我国心理学界在犯罪原因论的问题上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原因还是影响因素。武伯欣的观点是，犯罪因果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两个前后相继的现象之间并不一定都具有因果关系。因此把客观外界因素同犯罪心理产生理解为“前后相继”的现象，进而使用“原因”和“因果制约性”的概念，是缺乏理论的客观性、严谨性和逻辑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客观因素与犯罪心理产生之间纵然存在着某些关系，也不一定就是简单的一对一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以某些“犯罪原因”解释某种“犯罪现象”或“犯罪结果”，在逻辑上是不甚严密的。从上述两点出发，武伯欣即认为应当加强普通心理学基本概念的引进，用“因素”而不用“原因”这一概念。其二，聚合作用抑或综合作用。李世棣等提出“聚合效应”论，认为犯罪心理的形成是一种聚合效应，即“可能影响犯罪心理产生的诸种因素的作用（包括主要因素的作用、次要因素的作用、主要因素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增效作用等）聚合在一起而产生犯罪心理活动的效应，进而导致犯罪心理的萌发、产生和发展”。罗大华等则提出“综合动因论”，认为形成犯罪心理的诸因素是一个整体系统，构成这个整体系统的诸因素——无论是主体或主体外各因素间，或是主体因素与主体外因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其三，犯罪心

① 罗大华等：《法制心理学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页。

理原因论与犯罪行为原因论。罗大华等认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尽管关系密切，但不是一回事，犯罪心理要外化为犯罪行为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原因和条件。因此，研究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和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分别属于犯罪心理学的两个课题，应分别对待。

犯罪的机制是犯罪的心理机制的简称，如果说犯罪原因是探讨某些个体为什么会形成犯罪心理和发生犯罪行为，那么，犯罪的心理机制则是探讨某些个体怎样形成犯罪心理和发生犯罪的行为的。罗大华等在给犯罪的心理机制定义时，认为它是指犯罪心理的内外化机制，即犯罪心理的内化机制和犯罪心理的外化机制，包括过程和规律。同时，他们还就此提出了犯罪心理机制的模式，模式共分四种：渐变的犯罪模式、突变的犯罪模式、机遇性的犯罪模式和无意识犯罪动机模式。吴宗宪对此问题也作了研究，认为犯罪的心理机制就是犯罪行为的心理机制，它是犯罪心理特别是犯罪动机引起犯罪行为的工作方式与心理过程的总称，它包括犯罪行为产生的动力源泉、不同心理模式和心理过程三方面的问题，而在不同心理模式中又以有意识地实现犯罪动机引起犯罪行为的模式最为常见。

2. 关于犯罪心理结构与犯罪类型

在犯罪心理结构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肯定者认为犯罪心理结构是客观存在的，是科学的概念，是犯罪心理学的主要的基本理论课题之一。如王传孝即认为：“所谓犯罪心理结构是指犯罪人的心理现象、犯罪心理活动过程、犯罪心理的特殊状态、犯罪人畸形异常的个性品质的形成发展变化规律及其特点。”方强认为：“我们把影响和支配一个人发生犯罪行为的种种心理因素和成分的有机而相对稳定的结合称之为犯罪心理结构。”罗大华等更是深入地研究了犯罪心理结构。首先，

他们阐释了犯罪心理结构的概念，认为它“是指行为人在犯罪行为实施前已经存在的、在犯罪行为实施时起支配作用的那些心理因素的有机而相对稳定的组合”。其次，他们分析了犯罪心理结构的构成成分，认为它是由三个亚结构和一个心理状态组成，即犯罪心理的动力结构、犯罪心理的调节结构和犯罪心理的特征结构以及犯罪人的心理状态。最后，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犯罪心理结构模式，把犯罪心理结构分成一般犯罪心理结构、不同类型犯罪心理结构和个体犯罪结构三种不同层次的模式，对于分析和把握各种犯罪行为的复杂的内部心理原因和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罗大华等还明确提出“犯罪心理结构有故意犯罪心理结构与过失犯罪心理结构的区分”，认为犯罪心理结构有时主要存在于故意犯罪人中。

再看犯罪类型问题。犯罪类型就是把犯罪进行类型划分和使之类型化的问题，这也是犯罪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目前我国在进行犯罪类型研究时，一般包括犯罪类型的概念、该类型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该类型犯罪的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等内容。在进行犯罪类型划分时，常因标准不同而不同。常见的标准有：性别、年龄、犯罪经历、精神正常与否、心理状态、组织形式、犯罪行为实施形态、犯罪动机等，依此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犯罪类型，并对之进行心理研究。

3. 关于犯罪预测

犯罪心理预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某些个体犯罪或再犯罪的可能性所作的有根据的估计和推断。犯罪心理预测是犯罪行为预测的前提条件，只有预先测知犯罪心理的存在或可能形成，才能预测和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我国心理学界在定性预测法和定量预测法等主要的心理预测法上均有过一些研究。就定性预测法来说，罗大华等认为，人与人的关系、物质追求、精神

状态、性的追求以及日常学习、工作和劳动等，均可能是犯罪前的预兆，从而成为定性预测的基础。而李世棣、乐国安等则认为犯罪心理在下列诸方面表现出来的资料或征兆方可作为预测的基础，即被预测者对客观世界和对自己的认识情况、被预测者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追求、被预测者的个性心理特征、被预测者的既往生活经历以及被预测者当前所处的环境特点等。当我们用观察法、问卷法、测验法等了解了被预测者一些有助于预测的资料后，即可采取特定的方法进行定性预测。为此，李世棣、乐国安等提出了“全面系统分析法”，罗大华提出了两步推论预测法，依此法可综合各种资料，作出是否可能犯罪的预测。而就定量预测法来说，国内较有影响的是方强和赤光的“指数评估型预测”。方强认为，犯罪心理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犯罪心理结构的预测。当某种犯罪心理结构在一个人的个性或人格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成为支配力量时，这个人就具有了可能犯罪性格。根据方强的这种可能犯罪性格的假设及其估量指数，刘向弘、陈绍彬分别将其发展并加以量化处理，而设计出一个数学公式，在公式中被测者的犯罪人格的指数的值越大，发生犯罪行为的主观可能性也就越大。赤光则根据犯罪行为是由犯罪心理意识支配的，犯罪人的主观因素是他们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原因这一原理，主持设计了测定犯罪心理意识结构的公式。他设计了 200 个试题，以 9 个指标进行测试，可以准确而有效地将被测人的犯罪心理意识加以客观反映，从而达到预测犯罪的目的。

4. 青少年犯罪心理的研究

青少年犯罪心理的研究是我国法制心理学研究的起点和核心，也是出成果较多和较为集中的领域。以下我们分别介绍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较有影响的几项研究成果。罗大华、石起才主编了一本《青少年犯罪心理学》，这本书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充

分运用心理学原理，在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规律，青少年犯罪的一般心理特征，各种类型犯罪青少年的心理，以及青少年犯罪的预测、预防和教育改造方面，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论证。王国新等的《青少年犯罪心理学》则重点介绍了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征与违法犯罪的关系；分析了青少年犯罪主客观原因；剖析了犯罪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与心理结构；分析了青少年犯罪的动机、犯罪活动的特点；探讨了青少年犯罪的预测和预防，等等。另一本《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主编，它通过绪论、犯罪心理的形成、类型特征和对策共四篇 17 章内容，完整阐述了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特别是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在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进行了必要的探讨。

九、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学是从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研究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个体或若干个体心理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不仅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基础学科，更是适用性很广的应用学科。

（一）研究概况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心理学是 1979 年重建并开始自己的研究的。1979 年 5 月 3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王极盛的《建议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短文，预示着这门历经 30 年不公正对待的学科将要获得新生。1981 年，中国社会心理学开始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召开了“社会心理学学术座谈会”，发行了第一本《社会心理学》（苏联 E. C 库兹明和 B. E 谢苗诺夫主编，卢盛忠翻译，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内部向全国发行）。1982 年成立“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翌年年底更名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和吴

江霖在北大讲授社会心理学（这是1949年后社会心理学在我国大陆地区首次步入大学讲台）等，由此中国社会心理学快速而健康地发展起来。在这之后的近20年里，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是学习与初建期。这一阶段主要是恢复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的基础，以在最短的时期内把握住当时世界范围内社会心理学的动向。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第一阶段的主要成果便是大量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书籍和社会心理学知识的普及。第二阶段（1985～1990年）是发展与研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学术活动的增多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大量问世。第三阶段（1991年之后）为稳定发展与创新阶段。这一阶段中不仅将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成为中国心理学中最具实力的分支之一，其知识也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富有意义的创新意识给了社会心理学发展以新的生命力，“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即是首先从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开始的。

（二）研究内容

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丰硕，不仅表现在其自身的理论与体系的建构上，而且更多地还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应用与科学指导等问题上。以下我们分几个专题对此作一些基本介绍和说明。

1. 关于社会心理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探讨

（1）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对象与内容。无论是社会心理学形成之初，还是社会心理学被介绍到我国之初，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对象与内容的研究，都是一个基本问题。社会心理学的定义，曾经多达一百多种，中国学者即有过三十多个定义，但是具有代表性的是吴江霖的观点。吴江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或若干个体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心理活动的变化发展的科学。”后来又修正为：“社会心理学应该是研究个体或若干个体在特定社会生活

条件下心理活动（内潜的和外观的）的变化发展的科学。”这一定义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为我国部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所采用。其中，为便于社会心理学的教学活动，时蓉华下了一个较为简洁的定义，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从社会与个体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研究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个体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规律的学科。”这一定义有三个特点：其一，它强调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正确理解与把握社会心理的实质的出发点。其二，它重视关于社会情境的探讨。社会情境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确定了一个基本的研究立场。其三，它重视个体的内在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学虽然强调情境的影响，但在相同的情境下，由于人们的内在心理因素不同，一个人的社会心理活动必然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2）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潘菽认为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有两个：“一是从社会科学出发面向着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另一种则与之相反。前者主要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心理社会学，至于后者则主要是属于一种心理学的研究，即名副其实的社会心理学。”他又进一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心理学应该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吴江霖和时蓉华着重介绍了西方社会心理学是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三种人从不同的侧面来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即存在着三种倾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比较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而周晓虹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综合探索》则是我国心理学界第一次走出单一的心理学取向，明确地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综合取向出发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从而表明了作者对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的观点与态度。

（3）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杨倩曾研究了社会心理学

实验方法的有效性和现实性，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是可以获得有效性的，而且提高实验的现实性也是提高有效性的最佳途径。而余丽琳研究了社会心理学中使用欺骗技术的问题，认为使用欺骗技术带来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严重，社会心理学中人为制造的许多情境也是每个人生活中常碰到的，再碰一两次也无所谓，无须征得被试同意了。因而她认为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应当对被试或公众负责，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也有权利去追求知识和真理。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周晓虹研究了实验法，在充分肯定了实验法优势的前提下，指出了实验法“割裂了社会心理学同现实社会的关系”和“价值中立”等两大弊端，认为有时实验法非但未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反而由于其所造成的天然的价值中立的假象，倒可能使社会心理学离科学更远。白红光研究了调查法，指出了运用调查法应当遵循的几条基本规律，肯定了调查法的长处，并就“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和“从文字材料中发现”两种典型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设想。此外，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编制与修订了大量的问卷与量表。

2. 关于社会知觉与归因

社会知觉与归因问题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普遍关注的基本问题。其一，关于社会知觉途径的研究。李庆善从汉语谚语出发研究了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目标和策略，认为中国进行社会知觉通常有五种途径或方法：观语言、观行为、观相貌、类化和省察己心。其二，关于社会知觉基本过程的研究。此领域的研究以印象形成较为集中。孙健敏曾作过两项研究，一项研究发现，印象形成中存在着启动效应，即先前的活动内容对印象形成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若被试先前记的是褒义词，大多对知觉对象形成积极肯定的印象；记贬义词的被试大多对知觉对象形成消极否定的印象。另一项研究是关于刻板印象的，他通过对中美大学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社会刻板印象

是客观存在的，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但中美大学生的刻板印象在形成和特点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归因研究方面，林钟敏和孙煜明等人不仅介绍了维纳的归因理论，而且作了一定的实证研究。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刘永芳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当前西方心理学关于归因理论研究的最新结果，为我国此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作出相当突出的贡献。现简单列举刘永芳的几项研究："white 的'原因加工理论'述评"；"一种新的归因模型——'异常条件聚焦模型'评价"；"'原因'和'理由'在归因活动中的不同使用"；"归因过程'背景效应假设'的初步实验研究"；"经典归因理论的最新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等。

3. 关于社会需要和社会动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关于青少年需要、动机、理想和价值观的研究，据石秀印的一项统计，80 年代重要的研究报告有一百多篇[①]，其中 1986 年 26 篇，1987 年 17 篇，1988 年前 10 个月 29 篇，表现出一种递增的趋势。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有协作组(1982)的"国内十省市在校青少年理想、动机和兴趣的研究"，吴增基的"大学生择业倾向调查"，张聪沛等的"对临床医护人员心理需要的研究"，以及张宛丽的"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变化"等。进入 90 年代以后，我国社会心理学者在社会动机方面研究较多的是成就动机和成就归因等问题。如王辉曾评价了成就动机与归因的一些理论，比较了用 TAT 及自陈式量表测量成就动机的优劣。李宁宁则用自陈式量表编制了测量中学生学业成就动机的测验，依此测量中学生的学业成就需要、学业成就目标和学业成就行为。而孙煜明等人对学生学习成功或失败的归因特点作了

① 石秀印等：《中国社会心理学十年回顾与展望》，载《社会学研究》1989 年第 4 期，第 47 页。

大量的研究，其中，孙煜明发现低龄学生对考试成败的判别是明确的，努力、能力被认为是导致考试结果的主要原因。孙煜明还发现，中学生在成功和失败结果信息的原因知觉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预料和意外结果信息的归因上的差异也很明显，男生与女生、初中生与高中生也显示出各自的归因特点。此外孙煜明等还发现了成败归因倾向与学习焦虑水平的关系。

4. 关于人际关系的研究

金伟等对大学生的人际吸引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合作期望、交流期望及补偿期望影响着对交往对方的选择。孙荣根的实验研究表明，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性别的人对空间距离的需要是不同的。余国诚等人研究了影响青年择偶的吸引因素，结果发现，对方的内在因素是更多为青年人所考虑的。程刚等也有类似的发现。除了人际吸引以外，在人际关系特点的研究上，黄希庭等采用社会测量、访问与观察等方法，作了一项大学生班集体人际关系的研究，发现了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特点。而翟学伟则重点研究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得出了以下的重要结论[①]：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由人情、人伦、人缘这三位一体的结构构成的，它们彼此包含但又具有各自的功能。在这三位一体的结构中，人情是核心，它表现了传统中国人以亲亲（家）为基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人伦是这一基本模式的制度化，它为这一模式提供了一套原则和规范，使人们在社会互动中能够遵守一定的程序；而人缘是对这一模式的设定，它将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限定在一种表示最终的本原而无须进一步探究的总体框架之中。

5. 关于群体的研究

① 翟学伟：《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特质》，载李庆善主编《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论集》，香港时代文化出版公司 1993 年版，第 248 页。

围绕着群体的类型、决策、凝聚力等问题，我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作了大量的研究。陈宜安研究了企业中非正式群体对生产者个人的影响，发现企业中非正式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对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有一定的作用。袁方研究了中国企业的凝聚力，发现中国职工比日本职工表现出更强烈的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工作责任感更强；中国企业职工的“满足感”略胜日本职工等。但沈德灿等指出①，这些结论是否可靠还需进一步验证，因本研究未控制社会赞许性反应倾向，也许中国职工比日本职工更容易以社会赞许的方式来回答提问，所以才造成这种结果。关于中国人群体心理方面的内聚或内耗，吴鹏森认为“差序”和“隶属”分别反映了一种横向或者纵向的人际关系，中国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关键看他们之间是否形成高强度的隶属性人际关系。当若干个中国人是孤立的，又没有情感性关系时，那么由于他们之间缺乏合作精神，肯定造成窝里斗或内耗；但如果他们之间能够形成一种高强度的相互隶属关系，那他们就能具有极强的内聚力量。②而翟学伟的观点是，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是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宗法人伦对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走向起着指导作用，而权威集中、血缘关系、“礼”的规范和平均分配是构成中国人群体意识的四种基本要素。在这四种基本要素中，第二种要素即血缘关系自身兼有亲密和敌对的双重可能，而第三和第四种要素即“礼”的规范和平均分配的控制和平衡会导致前两种要素的稳定，形成内聚；如果第四种要素发生倾斜，会造成第三种要素的失控，第二种要素的不稳定和第一

① 沈德灿等：《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心理研究》，载王甦等《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64页。

② 吴鹏森：《差序和隶属：中国社会的潜结构》，第二届中国人社会心理研讨会论文，1994年。

种要素的降低甚至瓦解，从而产生内耗。当这四种要素进入社会运行时，由于第二种要素在心理上产生排斥力，第三种要素缺乏宗法人伦以外的规定，会使这种排斥力具有一定的伸缩性，甚至造成一盘散沙的格局。①

关于群体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大型群体或公众的研究。一项统计表明②，从 1979 年到 1988 年 10 月，全国报刊发表此类研究报告 92 篇。其中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报告有吴少春等《改革时期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雷涛《对贫困地区农村青年几种心理的调查分析》，王俊群《生育观的社会心理态势分析》，朱国钦等《海南岛缩阳症流行的社会心理因素初探》，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等。

6. 关于应用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自 1979 年恢复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后，我国关于社会心理学实际应用的研究占了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十分之九之多。内容涉及分支或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学科介绍与体系构建、消费与广告、家庭生活、人际交往、教育社会心理学、环境与都市心理学等。以下我们择要介绍几项工作和研究。郑龙介绍了一种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环形模式，将应用社会心理学定位于研究改善生活质量的问题等五个操作命题上。这项工作对于我国开展应用或分支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思路。张少波等则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以《应用社会心理学》为书名的书籍，内容涉及学校、组织、卫生、资源保护等。在研究方面，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所从事的有关成就动机、成败归因及品

---

① 翟学伟：《内聚抑或内耗：中国人群体意识新论》，载《社会心理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9 页。

② 石秀印等：《中国社会心理学十年回顾与展望》，载《社会学研究》1989 年第 4 期，第 47 页。

德形成等方面的课题，是教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开端。除了我们前面的介绍以外，章志光（1993）等借鉴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研究学生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金盛华和张志学则研究了教师期望对学生的影响，证明了期望的心理效应的存在。此外，在消费与广告领域、宣传的社会心理问题等方面也有众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问世。

第二节　心理学基本理论与历史研究

一、基本理论

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任何科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该学科的诸如指导思想、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策略、主要的研究范畴等等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如果对近现代的西方心理学发展史稍作考察，就会发现：西方心理学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是模糊的，有的是只注重实验室的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因而忽略了对基本理论的探讨，有的是出于害怕涉及政治立场问题因而回避研究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还有的则是对唯心主义指导思想的错误坚持因而拒绝对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些对基本理论的态度导致了西方心理学界长期以来处于纷争不断四分五裂的局面。百年来，西方心理学学派竞起，各种体系、理论和模型层出不穷，不但相互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让人（甚至让自己）也感到无所适从。面对心理学的如此混乱不堪的局面，许多学者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感叹：西方心理学已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其前途堪忧。所以，统一西方心理学各派，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已属势所必然。

我们认为心理学不是要等到已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时候才来考虑如何统一和摆脱的问题，而是要在各项具体的研究展开之

前就必须研究基本理论问题，在具体研究过程的进行之中也必须不能停止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更要将之推向深入，这样，心理学自然就会成为一个统合整肃的科学体系。可幸的是，我国心理学自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初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时候，基本理论问题就同时受到了重视，尤其如潘菽等心理学家对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自始自终都保持了敏锐的关注，并在自身的自觉研究和人才的组织与培养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天，基本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心理学界已蔚为大观，心理学基本理论已成为我国心理学中的重要分支学科。

（一）研究概况

我国心理学界关于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经历了数个历史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

第一期：解放前至新中国成立。该时期以蔡元培自德国留学归来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 年支持陈大齐在北大建立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作为我国的科学心理学成立的标志，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几年时间。该时期心理学的发展主要在译介欧美与苏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方面的努力较大，也有少量的独立研究。关于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更少，只有潘菽、郭一岑、曹日昌、刘泽如等都曾撰文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心理学的指导思想进行研究，他们对某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尤其是潘菽 1945 年在前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心理系开设了《理论心理学》课程，自觉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考察了心理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该时期涉及基本理论问题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是有一些心理学者已经主张心理学的研究要结合我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如早在 1922 年，我国第一种《心理》杂志创刊号上谈到办刊宗旨时就主张心理学家们要依据国内外资料以创建自己的理论和实验，号召“内容则尽量求适合国情，形式尽量

求中国化"[1]。这表明我国心理学家已敏锐地注意到了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这比西方心理学界明确主张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要早。我国心理学界后来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一主张的响应。至1980年，潘菽明确主张"中国心理学"，则可以视为是这一早期思想的一种复归。

第二期[2]：从1949年到1957年。该期是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真正展开的初奠时期。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心理学工作者也积极投入到了这一运动之中，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着重学习了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结合心理学研究的现实，展开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武器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自1952年，教育部先后聘请四位苏联心理学家来华讲学，讲授关于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在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苏联心理学和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我国心理学界展开了对心理学的对象、性质、任务、研究方法和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这次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心理学与高级神经活动、心理学与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关系问题。讨论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1) 认为心理活动就是高级神经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可以取代心理学。(2) 与第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大脑活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心理活动不受高级神经活动规律的制约。(3) 大多数心理学者认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绝对对立，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在承认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

① 转引自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② 关于我国现代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第二期至第六期，主要依据车文博的分期，参见《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6页。

对心理学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应当反对以生理学取代心理学的错误。关于巴甫洛夫学说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不仅在当时，而且延续至今仍然是我国心理学界基本理论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该时期还做了一些对西方心理学各流派理论的介绍、研究和批判评价工作。

1956 年，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心理学也制定了 1956～1967 的 12 年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中，基本理论研究被作为一个重要的项目列入。同年，中科院心理研究室扩为心理研究所，由潘菽率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心理所。

通过学习、讨论、组建以及一些具体的实验研究工作，该时期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在指导思想、哲学理论和生理学理论基础等方面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并提供了基本理论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园地。

第三期：自 1957 年至 1959 年。这两年由于国家政治局势不稳的影响，心理学界也颇不平静。一是全国整风运动的展开，心理学界对心理学应否联系实际的问题展开了辩论；二是 1958 年 8 月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心理学被当成“伪科学”批判，几乎遭受扼杀的命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王甦称此时期为“整风和批判阶段”[①]，车文博则称之为“波折时期”[②]。在整风运动中，中科院心理所于 1958 年 3 月就心理学联系实际的问题的辩论在整个整风辩论运动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一部分人认为心理学先要建立巩固的理论基础才能谈得上去联系实际的问题，所以主张今后仍然要以理论研究为主；另一部分人认为前一阶段通过学习马

① 王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年来的心理学发展》，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 页。

② 车文博：《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5 页。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巴甫洛夫生理学，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初步具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掌握了一些从事实际研究的方法，所以心理学现在就应加强与实际的联系，研究和解决一些现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脱离实际去单纯地从事理论研究，心理学应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求发展。大多数人赞同后一观点。这在实际上是“以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发展心理学的新方针取代了在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改造我国心理学的方针，从而为我国心理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①。这次讨论之后，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下，一股扼杀心理科学的逆流涌起，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打着“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旗号，借口在我国心理学中存在将人的心理“生物化”、“抽象化”、“抹杀人的阶级性”，诬蔑心理学是“伪科学”。这场批判来势迅猛，很快波及全国，致使许多心理学家受到不公平的批判。所幸的是1959年5月，北京心理学工作者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对1958年所批判的心理学的对象、任务、方法和学科性质问题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时在全国其他地方城市的心理学工作者也纷纷集会讨论，形成了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学术讨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1958年大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关于心理学的对象问题，我国大多数心理学者认为心理学主要研究的是心理活动的形式和过程，即人类心理的发生发展规律，而不是心理的内容，即不是知识、观点和思想体系本身，所以心理学与哲学、伦理学等是有区别的，因而心理学不存在研究不研究阶级心理的问题。关于心理学的方法，大多数心理学者都认为阶级分析方法虽不失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但不是一种普遍有效方法，尤其对于心理

① 王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的心理学发展》，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学来说，因为人类有许多心理过程是共同的，不受阶级的限制，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心理现象就会歪曲事实。心理学的主要方法是实验法，由此也决定了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或跨界学科。潘菽、朱智贤均持此论。

由于这次讨论的及时和深入，使得我国心理学界在遭受挫折之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令人难忘的丰收。丁瓒曾经指出，仅 1959 年，《心理学报》就发表有关基本理论的论文 20 多篇。

1979 年 4 月，教育部正式发文，指出 1958 年对心理学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应彻底平反。[①]

第四期：从 1960 年到 1966 年，是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有所建树的时期。自 1960 年，在全国性的和各省区的学术会议、协作会议和年会上，大量论文宣读，并发表了 60 余篇基本理论的论文。有的单位（如河南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还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论人的心理》等有关基本理论的专集。但是，1965 年，反动文痞姚文元先后在《光明日报》上以"葛铭人"的笔名发表"黑文"《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外行读报谈心理》等，趁着心理学界讨论人的心理的阶级性和心理学的实验法之机，打着强调阶级斗争的旗号，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我国心理学的方向和研究方法。姚文元说，在我国战争时期，有的战斗英雄在脑部严重受伤的情况下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这说明人的心理活动是可以不受大脑支配的，由此，姚文元认为，阶级性才是人的心理的唯一特性，阶级分析方法才是研究心理学的唯一方法，所以心理学不需要研究人的心理的生理机制，实验法也不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姚文元的论调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谬论，这

① 《光明日报》，1979 年 4 月 17 日。

种谬论不但是科学思想上的倒退，也是对心理学研究实验法的错误理解和对人的心理的阶级性的极端片面夸大的结果。姚文元的胡说当然是为了哗众取宠并达到其险恶的个人政治目的，但是这也预示着，我国心理学界以至整个科学界即将遭受到更大的打击。

第五期：从1966年至1976年，即“十年文革”时期。刚刚有所建树的我国心理学尚如一个处于襁褓中的婴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遭到了灭顶之灾，差点就被扼杀了，所以车文博称此时期为“重创时期”[①]。自1966年始，我国心理学界就以姚文元的“黑文”作为“站队划线”的标准，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些早年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心理学者还被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而受到非人的待遇。这时的心理学也被诬蔑为“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伪科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被迫撤销，各高校的心理学课程被迫停止，实验室被拆毁，心理学的图书资料被焚烧，心理学者被迫改行，有的还被当作“阶级敌人”关进“牛棚”或被监禁接受“劳动改造”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即使在如此政治淫威之下，仍有部分学者敢于抵制，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正直良心。有的学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致力于心理学的理论思考与研究。外在的迫害可能残损心理学家的身体，但不能限制他们对科学真理的思索。潘菽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数十万言的《心理学简札》就是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对心理学的科学真理努力思考的结晶。《心理学简札》涉及的心理学内容非常广泛，仅基本理论问题就达21项之多，计有：(1) 关于心理学的重要地位以及心理意识对人的活动的重要性问题；(2) 关于心理

① 车文博：《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学的哲学指导思想（辩证唯物论）问题；（3）关于心理学的对象问题（详细探讨了对意识问题的认识）；（4）关于心理活动的分类问题，在此潘菽提出了著名的“二分法”理论——将心理活动分为认识活动和意向活动两个过程；（5）关于心理学的任务、方法和学科性质问题；（6）关于身心关系（即心理与生理的关系）问题；（7）关于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8）关于西方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流派以及心理学家的心理学思想问题，涉及的心理学家达二十多位；（9）关于心与物的关系（即主观能动性与环境制约性的关系）问题；（10）关于心理、意识与生活实践的关系问题；（11）关于个性与心理发展的问题；（12）关于心理学的概念、术语问题等等。[①] 潘菽的思考为我们从事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六期：从1976年至1990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心理学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组织上也得到了恢复，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1979年，成立了全国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会（现为心理学基本理论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潘菽、陈元晖任正、副会长。一些城市也相继组建了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组，为基本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奠定了基础。

据车文博的总结，这个时期十几年间，共召开了13次学术年会和会议，交流论文1000余篇，论文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比过去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该时期有重点地讨论了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评冯问题，心理和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心理活动的基本范畴和身心关系问题，心理学的方法问题，个性问题，意识和无意识问题，通过改革开创我国心理学新局面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心

① 参见潘菽：《心理学简札》（下册）“主题索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37～443页。

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战略问题，中国本土心理学问题，加强评判弗洛伊德主义的问题，潘菽心理学思想的问题等等。[①]在该时期，心理学者们对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的认识，并组成了一批强有力的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专业队伍，出版了一批有影响、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如《潘菽心理学文选》、《高觉敷心理学文选》、《刘泽如心理学文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胡寄南心理学文选》以及车文博的著作《意识与无意识》、荆其诚的著作《现代心理学发展趋势》、赵璧如主编的《现代心理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和《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另外《心理学报》、《心理科学通讯》、《心理学探新》上还发表了有关基本理论问题的论文 300 多篇。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由于自觉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科学道路的结果。

1980 年，潘菽发表了《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文。这是一个对于我国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具有指导性和纲领性的文件，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潘菽对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思想。该文概括阐述了下列几个问题：(1)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上长期以来都是主要照搬国外的东西，我们应当脱离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心理学的束缚，使心理学能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服务；(2)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足够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认真地学习国外的研究成果，并要有所批判；(3)心理学基本理论应研究的问题是：心理学的方法问题、意识问题、心理学的辩证法问题、心理与生理的关系问题、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人和动物的关系问题、心理学的学

① 车文博：《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5～226 页。

科性质问题、智力问题、整理和阐述古代心理学思想问题等；(4)肯定“中国心理学”这个提法的意思是要有我国自己的特点，指出心理学的未来是大有发展前途的。①

第七期：1991 年至今，是 20 世纪 90 年代往 21 世纪过渡的时期，也是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取得辉煌成绩的时期。出现了几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在组织上，相继建立了以基本理论研究为主要方向的数个博士、硕士点，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研究队伍；二是基本理论研究越来越与各分支领域密切结合，产生了数个新的分支研究方向，如理论与史的结合成为史论；三是适应时代要求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元认知问题，心理学的现代化与后现代问题等等。

（二）研究内容

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在这数十年中主要是围绕着如下几个问题展开的：(1)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性质问题；(2)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问题；(3) 关于心理的实质问题；(4) 关于心理发展动力问题；(5) 关于心理与活动和实践的关系问题；(6) 关于心理活动的基本范畴的划分问题；(7) 关于智力的发展的问题；(8) 关于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问题；(9) 关于人格发展问题；(10) 关于心理学的本土化与现代化问题等等。现对其中的 (1)、(2)、(3) 三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作一些介绍和说明。

1.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性质

在西方心理学中，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意识与行为之争。我国心理学界对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说法也不太统一，主要表现为对如下几个问题的争论：一是关于心理内容与心理形式的争论。持内容论者认为心理的规定性是由心理内容决定的，如知

① 参见潘菽：《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载《心理学报》1980 年第 1 期。

识经验、文化价值观念、民俗习惯、经济地位和阶级立场等等；绝大多数的人是持形式论，认为形式和内容虽然是统一的且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相对于内容又有其独立性和稳定性。曹日昌认为任何一种心理活动都可以区分为内容、过程和机制三部分，心理学主要研究的不是内容，而是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即研究人如何认识客观事物，形成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形式，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个性特征。另外如彭飞等研究者也指出心理内容主要应属于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和思想史等学科的研究范围，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的反映形式和反映过程，但并不等于心理学就不关心心理的内容，心理学也要研究心理内容形成的条件、发展的途径以及对心理反映形式的影响。二是关于心理的共性与个性的争论。曾经有人认为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应将主要的目标放在研究“我国现实社会中新型劳动者及其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个性的培养”上面，这就是说心理学应当研究人的心理的特有的阶级性和个体性，因为所有的人都具有的一般的心理特征是不存在的，人的心理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张述祖和沈德立等认为心理学主要应研究“人的心理的共性知识”，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共性总是在个性中表现出来并起作用的，而研究共性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个性。在进行心理学的研究的时候必须树立心理的整体观，既要注意揭示共性的规律又要注意揭示个性的规律，不能片面地强调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三是关于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争论。主张心理学以个体心理学研究为主的人以苏联心理学为参照，主张研究心理活动在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此相反的观点是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心理整个的就是社会心理，因此心理学要研究的实质上就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多数人认为心理学既要研究社会心理又要研究个体心理，两者都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如

彭聃龄认为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主要是研究个体心理或意识（存在于个体的动机、心理过程和心理特性），但是，作为社会实体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团体之中并与他人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因此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离不开个体心理，社会心理又直接影响个体心理的形成与发展，所以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均可以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心理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性质，中国心理学界曾经有五种看法，即认为心理学属于：(1)社会科学；(2)思维科学；(3)偏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4)偏于自然科学的中间科学；(5)不偏不倚的中间科学(或称交叉科学、跨界科学、桥梁科学、综合科学等)。目前，绝大多数人认为心理学是属于中间科学，这一看法最先由潘菽于50年代提出并在60年代给予了进一步的论证，陈立、林凤藻等心理学家也都持此说。他们认为：(1)人既是自然的实体，也是社会的实体；(2)人脑是生理的器官也是心理的器官，具有自然性，又因为它是在人的长期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又具有社会性；(3)人的心理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客观现实中既有自然的成分也有社会的成分，都是人脑的反映对象，所以在人的心理中就既有社会性的内容也有自然性的内容；(4)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是人类共同的，对此的研究主要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人又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具体角色，其心理也就是对于其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对此的研究主要应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5)人的心理同时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制约，因此我们既要掌握人脑的生理机能，又要懂得社会现实转化为人的意识的机制，人的心理不是自然和社会两者的机械混合，而是一个完整的整合体，所以对人的心理的解释就不能只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概念；(6)又有人对这个论证作了补充，认为总的说来是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心理学偏向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但心理学的分支学科却可以

是有偏向的。[①]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看法是“人学”的兴起，有许多的人学学家将心理学放在人学的核心位置，表明了心理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对我国心理学界如何看待心理学的学科地位问题颇有影响。[②]

2.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心理学的方法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上层是哲学方法论。我国心理学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潘菽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应坚持如下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生活实践的观点；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研究广大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分支和主干兼顾统一的原则；辩证唯物的决定论；坚持认识活动的反映论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建立我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在西方心理学中主要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与现象学的方法论，这对我国心理学来说也是可以批判借用的。符仁芳[③]、申荷永[④]、刘翔平[⑤]及陶宏斌、郭永玉[⑥] 等都曾著文对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的方法论给予讨论，总的看法是认为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在心理学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实证主义已有渐趋衰落的趋势，而现象学方法论的思想实质是唯心主义的，但不妨借用。中间层次是一般科学方法

---

① 上述均参见车文博：《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8 页。

② 参见（俄）B.r. 安纳耶夫著，龚浩然等译：《人学——未来世纪的热点》，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③ 见符仁芳译：《论心理学与实证科学的衰落——对现实的正名》一文，（美）莱昂·拉波特著。（1988 年中国理论心理学年会论文）

④ 见申荷永：《实证主义与心理学》，载《社会科学学刊》1988 年第 1 期。

⑤ 见刘翔平：《论西方心理学的两大方法论》，载《心理学报》1991 年第 3 期。

⑥ 见陶宏斌、郭永玉：《实证主义方法与现代西方心理学》，载《心理学报》1997 年第 3 期；又《现象学方法论与现代西方心理学》，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论。大家已取得共识的是认为对心理学有指导意义的一般科学方法论主要是“三论”,即“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与“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对“新三论”尚有争议,而且对我国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来说尚不能完全认同,对“老三论”的运用已比较熟练。另外也有人认为在一般科学方法论中还应包括传统科学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方法论体系的最下层次是具体由方法形成的序列。就心理学而言,有观察法(包括潘菽提出的“自我观察法”以及借用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临床观察法)、实验法(包括自然实验和实验室实验)、调查法和测验法等是心理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另外数量统计法、数理模型法、产品分析法等也是心理学上可以运用的方法。在这个层次,有争议的是关于阶级分析法的问题,不管过去存在什么样的争论,我们认为阶级分析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用于分析心理现象的(主要是用于分析人的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尤其是面对世界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或面对国家与种族冲突问题的时候,人的心理的阶级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运用阶级分析法需要慎重,不可搞扩大化。

3. 关于心理的实质

这个问题讨论的焦点是两个:一是对“心理是现实的反映”命题的争论;二是围绕心身关系问题的探讨。苏富忠和邱仁宗认为前命题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在对人的心理实质的规定中引入“控制”和“建构”等概念,即人的心理是现实的反映和控制或对现实的重新建构,既表达了人对现实的主动性一面,又表达了人受制于现实的一面;也有的人认为“反映”一词的外延过于宽泛,主张对其用法给予限制。李铮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对“反映”一词的表面化理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因为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多方面、多层次、多水平的,如投射性反映、折射性反映、评价性反映、决策性反映、创造性反映等;赵璧如则

认为随着科技进步和对人的心理的认识的加深，反映理论也会随之有进一步的深化。在心身关系问题上，潘菽的独到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潘菽总结了古今中外的10种心身关系理论（唯心的心身一元论、唯心的心身二元论、唯物的心身一元论、唯物的心身二元论、典型的心身二元论、两面论的心身二元论、等同论的心身二元论、副现象论的心身二元论、同型论的心身二元论、一元转化论的心身二元论），指出了这些心身关系理论各自的优劣，进而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唯物论的心身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心身关系理论，主要是：（1）心身关系是体用关系，身是心之体，心是身之用。心理活动是人体（尤其是人脑）的一种运动、作用和机能；脑和感觉器官是心理活动的主要器官。（2）人体（尤其是脑）有两种机能，一是生理机能，一是心理机能；心理机能是在生理机能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物质性的演化的高级机能。（3）人的心理活动是由客观世界的种种事物引起的，在人的生活实践中产生的。（4）心理活动也是一种物质过程，是一种心理性质的神经活动过程，因而能与身体活动的其他过程和客观世界相互关联、相互作用。（5）任何具体的心理活动过程都是有时间性和空间性（位置性）的。[①]

二、心理学史

与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心理学史的研究。理论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思，而理论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史与

---

① 参见《潘菽心理学文选》中《所谓心身问题》一文；又参见车文博《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241页。

论常常结合在一起，没有离开历史的理论，也没有无理论支持的历史，这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理论的研究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可称之为“论史”，而由研究历史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即如何对历史进行研究的原则、方法等理论，可称之为“史论”。我们认为这两个层次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大英百科全书》中对“历史”一词所作定义如下：“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①] 对于心理学史而言，可以说这两种含义都包括在内。历史 1 指的是我国心理学界所从事的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活动，历史 2 则指的是心理学史的编撰与对心理学史本身所作的思考和研究。英国史学家阿特金森认为历史 1 与实体性的历史哲学相关，历史 2 与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关。[②] 后者显然应当包括论史和史论两个方面。按照《大英百科全书》和阿特金森的说法，历史 2 又显然是比历史 1 处于更高的层次上，因而“心理学史论”是比“心理学史”更高层次的研究工作。

（一）概况

我国对心理学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由于各种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发展比较缓慢。早在 1935 年，高觉敷就注意到对心理学史的研究，翻译出版了美国心理学史家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波林原著出版于 1929 年)。80 年代又重译此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解放后，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对心理学史的研究在我国

① 《大英百科全书》第 8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61 页。

② R. F. Atkinson,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p. 9.

才受到充分的重视，以高觉敷为主，形成了心理学史的专业研究队伍，展开了对西方心理学史、苏联心理学史、中国心理学史以及其他国别心理学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对西方心理学史和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成果最丰。

1. 对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

中国对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的真正开始自80年代初算起。借纪念冯特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00周年的机会，我国心理学界展开了对西方心理学史的系统研究，编著出版了一大批有关西方心理学史的著作和教材，如高觉敷主编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史》和《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杨清的《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主要派别》，唐钺的《西方心理学史大纲》，刘恩久的《现代西方心理学史》，叶浩生主编的《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翻译了数种西方心理学史家的著作，如美国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墨菲和苛瓦奇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黎黑的《心理学史》，以及苏联的《国外心理学的发展和现状》等。同时发表了大量的评述西方心理学流派和心理学家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内容涉及到西方心理学史上的几乎所有流派和心理学家，包括最近的结构主义的新精神分析流派和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流派。

总起来看，中国对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如下几个理论问题与方面展开的：一是关于西方心理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心理学史的编撰原则问题。如同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一样，中国对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仍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一点已成为我国学者的共识，即使未曾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也都在不断的反省和自我批评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诚如高觉敷曾经在其《自传》中所作的自我批评那样，过去在解放前由于未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学术观点摇摆不定，“时至今日，已经显得落后于形势了”。高觉敷总结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的心理学研究应坚持的几条主要原则是：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存在的反映；坚持外因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决定论；采用客观的方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于是在研究西方心理学史的时候要注意处理好三个问题：处理好身心关系问题，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正确处理好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评价心理学家，要区分其世界观与其专业成就的关系，不能因为其世界观的错误而将其“一棍子打死”，要一分为二，避免简单化倾向。高觉敷于是在此原则的基础上论述了心理学史的编撰原则：(1) 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正确处理心理学的过去与现在的辩证关系，既不能有“厚古”倾向，也不能有“厚今”倾向，不能割断历史，把过去与现在对立起来；(2) 在论述心理学的发展时，既要分析社会历史条件和其他外在因素对心理学的影响，也要分析心理学内部的矛盾运动，应内外兼顾，反对内外割裂；(3)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应统一，两种方式都是必要的，但由于心理学史材料主要是理论文献的多而数量的材料相对较少，所以心理学史的研究似乎更偏向于质的研究。这些原则实际上不仅对研究西方心理学史具有指导意义，对于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和其他国别的心理学史同样具有指导意义。① 二是关于西方心理学史中的“伟人说”与“时代精神说”的问题。“时代精神说”在西方思想史上大概最先由黑格尔提出，后来马克思也曾论述过这个问题。西方心理学史家波林、墨菲、舒尔茨、黎黑在其心理学史学著作中也都利用了“时

① 参见《高觉敷心理学文选》；叶浩生《高觉敷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孙名之《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学习高觉敷编纂心理学史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等。

代精神”来解释心理学史现象。波林认为科学的新发现“受当时当地文化和习俗的限制”；墨菲说“思想必须与时代精神相和谐”；舒尔茨说的是“时势造英雄”；黎黑将时代精神当成“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巨大的非人力量”等等。这些关于“时代精神”的说法大都来源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即从所谓超历史的“宇宙精神”或“世界理性”去寻找历史发展动力。与“时代精神说”相对的是强调“伟人说”，即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高觉敷对此问题的看法在我国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高觉敷认为黎黑的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他先偏爱“时代精神”，后又对“伟人说”难以割舍，并最终选择了“伟人说”；波林和舒尔茨看似倾向于马克思的观点，但实质上是把马克思的“时代精神说”歪曲为“自然说”了，因为他们都逃避经济问题，便只好托庇于“自然说”，但是“自然说”是否定个人作用的，所以是不能坚持的，最终又会找回“伟人说”作为“补偿”，因此波林和舒尔茨实际上与黎黑走上了同样的唯心主义道路。高觉敷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我们从事心理学史研究的真正正确的选择。高兆明、刘恩久、郭本禹、孙名之等亦都对西方心理学史上的“伟人说”和“时代精神说”作过分析评论，总的看法与高觉敷的观点是一致的。三是关于西方心理学的发展趋势问题。在西方心理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上，学派林立，纷争不断。高觉敷认为各派的争论和更替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原则的，西方心理学史上各派的论战至目前看似趋于和缓，“貌似统一，实则折中”。西方心理学史上的共同倾向表现为如下的几种观点：机能主义、动力观点、整体观点、文化观点和实用观点。车文博的看法是从心理学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表现为从封闭的意识研究到开放的机能、行为的研究；从元素分析的考察到整体综合的研究；从表层的心理现象和外显行为的研究到深层的需要、动机、人格的探讨；从心

理静力学的研究到心理动力学的研究；从低层次的研究到高层次的研究。但西方心理学缺少一个正确的哲学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荆其诚认为西方心理学可以分为两大阵营：机械主义的和人本主义的。前者沿着行为主义的心理生物学路线发展，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性和能动作用。两者并存，各有千秋，说不上谁是主流或支流。① 叶浩生认为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分裂现状”表现为三个方面：思想上的分裂、学派的隔阂和学科内部的恶性分化。心理学的统一需要确立正确的哲学基础，心理学家应重视对“心理学元理论”的研究，探索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心理学问题，采用生态学的方法、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方法以促进心理学的最终统一。②

中国对西方心理学史研究的最大成绩是表现在对西方心理学流派和心理学家的评价与比较方面。由于这方面涉及的内容太多，故本文不欲作具体阐述，读者可参看有关论著。这里只拟对中国关于西方心理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和心理学家的思想的研究情况略加排列：(1) 对冯特、铁钦纳、屈尔佩、麦独孤等心理学家及构造主义心理学和意识与策动心理学的评论；(2) 对詹姆士、安吉尔、杜威等心理学家及机能主义心理学的评论；(3) 对华生、斯金纳、托尔曼、班杜拉等心理学家以及行为主义的评论；(4) 对布伦塔诺、胡塞尔、维特海默、苛勒、勒温等心理学家及现象学心理学与格式塔心理学的评论；(5) 对弗洛伊德、荣格、艾里克森、阿德勒、霍妮、弗洛姆、拉康等心理学家及精神分析与新精神分析和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想的评论；(6) 对马斯洛、罗杰斯等心理学家及人本主义的评论；(7) 对皮亚杰、凯利、乔姆斯基、

① 孙名之：《西方心理学史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2～363 页。

② 叶浩生：《心理学的分裂与心理学的统一》，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

西蒙等心理学家及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评论；(8) 对比纳、卡特尔、斯皮尔曼、吉尔福特等心理学家及心理测量学理论的评论；(9) 对其他心理学家的评论，如麦克莱兰、哈特曼、斯登伯格等等。

2. 对苏联心理学史的研究

中国心理学界对苏联心理学的关注是比较早的，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就被介绍到了中国，最早来华讲学的国外学者中就有苏联心理学家叶勒索夫，介绍了“俄国心理学之最近发展”。1929 年，潘菽在《中央大学半月刊》上发表译文介绍《苏维埃联邦心理学》；1943 年，郭一岑编译了《苏俄新兴心理学》；1936 年，陈汉标著有《苏俄的心理学研究》，比较全面综合地介绍了苏联心理学的发展情况；何清儒、丁祖荫亦翻译了《苏俄的实业心理学》，重点介绍了苏联的职业心理学和心理技术训练的研究情况。[①] 1938 年，刘泽如著《行为研究举例》，大概是最早介绍巴甫洛夫学说的，而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了人的心理活动的辩证发展规律，对巴甫洛夫学说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作了批判。巴甫洛夫学说被系统介绍到我国是 50 年代，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心理学和巴甫洛夫学说的热潮。除此而外，许多苏联心理学家如列昂节夫、维果茨基、安娜列耶娃等的心理学思想也都被陆续介绍到我国心理学界。30 年代在《中国心理学报》和《心理季刊》的“国外心理学”专栏常有关于苏联心理学的消息刊登；近年亦时有关于苏联心理学的译介和评论文章发表。1998 年，南京师范大学普通心理学专业博士点还设了“苏俄心理学”方向的博士学位。

① 参见赵莉如、许其端：《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8 页。

中国对苏联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的焦点问题是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评价问题。对巴甫洛夫学说的性质问题，5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争论，共有四种看法：(1)“文化大革命”前，大多数人认为，巴甫洛夫学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可以作为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因为它“牢固地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彻底粉碎了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学说，坚决否定了神秘主义的意志自由论和活力论。因此，巴甫洛夫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是同各种唯心主义心理学作斗争的思想武器”。(2)以刘泽如等为代表一直持巴甫洛夫学说为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巴甫洛夫因袭了旧神经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把神经活动看作是单一的、没有矛盾的传导活动”，“比如，他把条件反射的形成看作是神经通路的接通，把后来刺激引出条件反射看作是后来的刺激引起的神经活动沿着这条接通的神经通路行进的结果”。这种没有外界刺激、没有内因的单一的无矛盾的神经传导论“正是巴甫洛夫学说的机械唯物论性质的暴露”。(3)“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巴甫洛夫学说被完全否定，被认为是“早已过时”和“有害无用”，因为巴甫洛夫学说主要建立在动物的高级神经活动研究的基础上，其中有不少臆测的成分，因此以巴甫洛夫学说来指导心理学就会出现心理学的生物学化倾向，甚至“把人当成狗”。(4)80年代以来，巴甫洛夫学说被重新讨论，多数人认为，不能对之全盘否定，而要学习、研究、运用，尤其是对于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巴甫洛夫学说更应该采取吸取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①当然上述的第四种观点在我国心理学界是具有代表性的，也

① 参见车文博：《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245页。

可以说是我国心理学界的共识。

3. 对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

对中国本土的心理学史的研究是我国心理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成为心理学史研究的主流之一。自1996年，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点，近两年来，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果。

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在我国经历了数个发展阶段，杨鑫辉等学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共28年的历史。本时期在各种报刊上共发表关于中国心理学史的文章18篇，主要刊于中华心理学会的《心理》杂志、《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及一些大学学报、教育杂志上面。张耀翔发表于《学林》上的《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略》是最早全面论述中国心理学史的论文，算是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开山之作。该文考察了古代心理学，指出："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几乎全由哲学家及伦理学家兼任。最著者先秦有老聃、墨翟、杨朱、荀卿、孟轲、庄周、尹喜、韩非、管仲；汉有董仲舒、王充；唐有韩愈、杜牧；宋有朱熹、陆九渊、杨慈湖、程颢、程颐、王安石；明有王守仁；清有戴震、颜元诸子。"该文同时考察了我国古代在应用心理学方面的贡献，如养生养气、治气养心对心理卫生学的贡献，"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品行才情测验在心理测量学方面的贡献以及中国古代催眠术等等。文章同时考察了心理学的现代发展情况，并瞻望了我国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前景，提出发展中国心理学的九条建议。1923年6月3日，梁启超还为中华心理学会发表了题为《佛教心理学浅测》的演讲，首

① 以下均参见杨鑫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273页。

次对我国佛教心理学进行了研究，运用了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和术语对某些佛教教义作出了初步的阐释，如色＝客观性的事物，受＝感受，想＝记忆，行＝作意与行为，识＝心理学活动之统一状态等等。该阶段对我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个人式的和分散式的，而且不能明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当然在那样的时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阶段：从1950年至1976年的26年时间。该时期，我国心理学界先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也未能引起重视。该时期共发表和交流论文约20篇。最为突出的是潘菽和高觉敷的研究。潘菽于1964年至1976年“在频繁的‘批斗’和‘交代’情况的空隙之间或劳动之余”写成《心理学简札》一书，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内容50余条，谈到了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三个方面：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必要性、指导思想、步骤和方法；研究涉及到的古代思想家有孔子、荀况、韩非、公孙龙、王充、范缜、贾宜、刘禹锡、柳宗元、李翱、王安石、欧阳修、李贽等；提出了中国心理学史的几个范畴，有人贵论、形神论、六情论、性习论、知行论等。潘菽的研究为建立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拓展了道路。高觉敷毕生治心理学史，解放后更能自觉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其编著的《心理学史讲义》突破了只讲西方心理学史的偏向，把我国心理学史也列入进去，其中有《我国自春秋战国至清初哲学中的心理学说》专章，分五节讲述了荀况、王充、范缜、王安石、王夫之五位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高觉敷的研究为后来我国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范例。

第三阶段：从1977年至今。本阶段可以说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勃兴时期，表现为：

（1）“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出版了一系

列研究论文、教材、专著、资料选编及工具书，如论文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大学统编教材有《中国心理学史》；专著如燕国材著《先秦心理思想研究》、《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唐宋心理思想研究》、《明清心理思想研究》、《中国心理学史》；杨鑫辉著《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史》(1994)；资料选编有四卷本《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工具书有《心理学大词典·中国心理学史分卷》等；设立了数个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点，如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点）、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点）、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点）和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点）；有了中国心理学史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教材编写组，如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的心理学史研究室及“中国心理学史编写组”。1996年，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史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我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明确了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学科体系等问题。我国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大块，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学史，前者指散见于各种古代的哲学、医学、教育、军事以及文史、类书等典籍之中的论述心理现象的著作、文章等，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时间上包括自上古至清末，这一部分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后者则是指自1917年北京大学建立第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实验室开始至今。在研究对象方面，我国学者认为需要注意的是划分心理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以及逻辑思想等之间的关系，以保持中国心理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独立性。对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学者们作了很多探讨，其中又以杨鑫辉的有关论述最具代表性。杨鑫辉认为我们在研究工作中至少应当贯彻三条原则：一是以心理实质

为主线的原则，从心理实质入手去探讨基本观点，深化专题和分支研究；二是古今参照、古为今用的原则，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体系作为参照系进行对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发扬其中对于今天仍然有用的符合科学的东西；三是科学的历史主义的原则，即将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去考察，给予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与评价。[①]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有的人认为可以将一种称为科学逻辑（或外在逻辑）的原则与内在逻辑的原则分开，前者指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体系为参照的原则，后者指完全以中国古代的概念和思想来建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体系的原则，中国心理学史主要应运用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对于我们在建设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完整体系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一则，科学逻辑本身就是内外相统一的，否则就不具有科学性；二则，所谓按照完全的内在逻辑建构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学科体系是不具有操作性的，考察我国已经发表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都是以古今参照相结合进行的，迄今未见以完全的“内在逻辑原则”的研究成果发表；三则，对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发掘和整理，必然涉及到一个如何解释古代思想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以古代语言再去解释古代思想，我们只能用现代的语言去解释，这就一定要参照现代的概念和体系才有可能。关于中国心理学史的具体研究方法，杨鑫辉提出了归类排比法、史料考证法、纵横比较法（古今中外纵横交错的比较方法）、系统分析法（运用逻辑思维推理分析中国心理学史系统内部问题的各个方面，也包括综合归纳，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的方法）和实证检验法（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设备和统计

① 杨鑫辉：《关于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心理学探新》1996年第3期。

分析手段以检验古代提出某些思想的合理性，如利用“电脑经络探测系统仪”测查与五脏相对应的经络、穴位在静息状态下和发音状态下信息值的变化等），最近又将根据研究的进展和需要提出一种新的诠释研究法。关于中国心理学史的内容体系，杨鑫辉设想为六个方面：一是方法学，包括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和编撰学；二是范畴学，包括基本范畴、术语和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里特有的范畴；三是专题学，包括单个人物、著作、专题、分支学科的心理学思想研究；四是系统学，包括历史顺序、对各个时期主要思想家的系统研究，和按范畴、专题、分支作总体考察的系统研究；五是文献学，包括专篇、专著和散见思想挖掘、考证、注释、整理汇编等；六是历史学（或称史学史），即建设这门学科发展的历史研究。

（3）范畴研究走向深入，从该学科创立之初就对范畴问题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如1981年，杨鑫辉首次提出了“五范畴说”理论，认为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主要出现了五个范畴：先秦的人性说、汉晋的形神说、唐代的佛性说、宋明的性理说和清代的脑髓说等。该理论认为这五个范畴都是围绕人的心理实质这条主线而展开的，在1994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即是按照这个范畴体系构建的。1982年，潘菽提出“八范畴论”，即人贵论、天人论、形神论、性习论、知行论、情二端论、节欲论和唯物论的认识论传统；在1985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潘菽又将节欲论并入情二端论，将唯物论的认识论改称为主客论，这样成为七范畴论。1985年，高觉敷在其主编的第一部《中国心理学史》“绪论”中提出了五个范畴（专题）的说法，即天人、人禽、形神、性习、知行，认为这五个范畴所讨论的问题代表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基本特点。1987年，燕国材又在潘菽和高觉敷的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八对

对偶范畴的学说，即形与神、心与物、知与虑、藏与壹、情与欲、志与意、智与能、质与性；1988年，又将这八对对偶范畴改为七范畴，即心身（形神）、心物、知虑、情欲、志意、智能、性习，把原来的藏与壹纳入知虑范畴，将原来的质与性改变为性习。①

（4）展开了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比较研究。如高觉敷将王充的“太阳错觉”与英国许尔的“月亮错觉”进行比较，证明了我国王充与英国许尔所谈的实际上是同一种错觉现象，但王充却比许尔的研究要早1800年。杨鑫辉将荀子的“心理阶梯”说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阶梯”说作了比较，更见出荀子的全面性；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的“情二端论”与冯特的“情感三维度说”比较，说明“情二端论”不仅包括了情感的两极性，而且指出了“好”、“恶”两种欲望是产生喜、怒、哀、乐情感的基础；将王清任的“脑髓说”与俄国谢切洛夫的“脑的反射”比较，更让我们认识到“脑髓说”是“中国医界之极大胆的革命论”（梁启超语）；杨鑫辉还比较了中国古代心理学中的“渐染说”与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个体社会化理论，比较了《管子》的欲求理论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等等。赵莉如在其编写的心理学函授大学教材《心理学史》中还将西方心理学史和中国心理学史的分期相对应，采取中西同时并行混合编排教材内容，并且编制了中西比照的心理学史年表。②

（5）建立和发展了中国心理学史学术界与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的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尤其近几年来，联系更加密切和频繁。

① 参见燕国材：《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载王甦等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② 参见杨鑫辉著：《中国心理学思想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273页。

结　语

在前面各章中，我们已经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思想。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的开端，如果从龚自珍活动时期算起，距今约一百七八十年了。中国现代心理学，如果从1921年成立中华心理学会前后算起，约八十年的历史。在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形成发展的历程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教训，可用来作为中国心理学继续发展的借鉴。这一百七八十年形成的中国心理学的现代基点，又可以用来瞻望中国心理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一、历史总结

历史的总结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重要的，且有推动作用。1981年12月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暨纪念建会60周年学术会议，对我国心理学发展的60年作过总结。潘菽教授发表重要文章《中国心理学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心理学会成立60周年》。[①] 该文归纳了十条基本经验教训：①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指导心理学的全部工作。②进一步提高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水平。③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④扩大与加深应用的研究。⑤加强专业教学工作，提

① 载《心理学报》1982年第2期。以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会署名发表。

高专业队伍水平。⑥加强科普工作，积极提高科普质量。⑦做好国际学术交流工作。⑧贯彻双百方针。⑨加强科学仪器设备和出版工作。⑩加强团结协作。1997年出版的《中国心理科学》里，王甦教授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心理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六条[①]：①心理学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②心理学应当紧密结合我国国情。③加强心理学的基础研究。④广泛开展应用心理学研究。⑤大力培养心理学专业人才。⑥积极开展心理学的普及工作。

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总结是复杂而困难的工作，总结的视角也是多方面的。笔者1981年曾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中国心理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是："必须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辩证法处理好五个关系。"[②] 现在仍以此框架进行总结，即应辩证地处理好哲学与科学、本国与外国、现代与古代、理论研究与应用普及、心理学科学学与具体研究工作五对关系。

（一）既要坚持以辩证唯物论为理论指导，又要不断地吸取自然科学的新成果

心理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独立出来，而它的独立又是运用了自然科学方法得以实现的。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不管哪一个时期，任何一种学派，任何一位心理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某种哲学思想的支配，同时受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的影响。以冯特为奠基者的构造派心理学，采用化学观点，提出"心理要素说"，从哲学思想体系看这属于唯心主义。以安吉尔为代表的机能派心理学利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哲学思想体系上是实用主义。

---

① 王甦、林仲贤、荆其诚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页。

② 杨鑫辉：《必须用辩证法指导我国心理学的发展》，载《心理科学通讯》1982年第3期。

行为主义心理学则利用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在哲学思想体系上是机械唯物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考夫卡、勒温根据现代物理学，提出了“场理论”，在哲学思想体系上则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等等。这种情况表明，任何一种心理学派受哲学理论支配和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客观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心理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重性。当然心理学学科性质的二重性主要是由人既是自然实体又是社会实体所决定的。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应当自觉地将我国的心理学建立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论基础上，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全部旧的心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这是我国心理学工作中应该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不这样，就与唯心主义的心理学分不清是非，同时也就不可能完成我国心理学应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是唯心论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新中国建国初的十多年在强调唯物论指导的同时，出现了一切向苏联学习的片面性，有贴政治标签的倾向。“文化大革命”期间说什么“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心理学”，这种“代替论”是极“左”的错误。拨乱反正以后和改革开放之初，在有些人中出现了忽视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取消论”错误，这是今后应当防止的。特别重要的是要把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具体贯彻到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去。“要研究好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任何部门，都要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站稳辩证唯物论的立场。单纯强调实验研究而不问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那是很容易走错方向的。”①

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同时告诉我们：心理学必须不断吸取脑科

① 潘菽：《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1980年学术会议开幕词（提纲）》，载《心理学探新》1981年第1期。

学、认知神经科学、遗传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进一步探索心理的物质本体和机制，以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甚至应当关注“克隆”技术对心理学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纳’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运动。”[①] 很显然，1958年的心理学批判运动，把引进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来研究心理学，简单地斥之为“生物学化观点”的教训是应当记取的。

（二）既要立足本国，又要正确对待外国心理学

立足本国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而不能一切照搬外国的心理学。一切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人的心理实际出发，在引进和学习外国心理学时，要进行中国化或本土化，要“洋为中用”，吸取外国心理学中一切有用的东西，为建设中国心理科学所用。

在对待本国与外国，对待外国的这一学派与那一学派的问题上，我们过去也有过形而上学的偏差。解放前，我国基本上是照搬式地学习欧美心理学。50年代为了改造旧的心理学，大力学习苏联心理学，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却又完全抛开了对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认为苏联心理学也不行了，以至整个心理学都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心理学获得了新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恢复了对西方心理学的介绍、引进与研究，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切向欧美心理学学习的倾向，似乎苏联心理学又无可取之处了。

我们认为，这种摇摆就在于没有坚定地坚持立足于本国的思想，也在于不是辩证地看问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从总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26页。

的说，苏联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较强，西方心理学的技术方法先进些，它们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对西方心理学派也要作具体分析，既不对某一学派全盘肯定，也不要对另一学派全盘否定，对它们正确的实验材料，可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纳入和融化到我国的心理学体系中来。

最最关键的还在于我们应当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应当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广泛的调查、测量与实验，有自己的实验材料和数据，并且进行自己的理论解释。可以借鉴但不照搬外国的量表和方法，更要设计自己的方法和编制自己的量表以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科学地反映出中国人的而不是外国人的心理行为特点。人类有共同的普遍的心理规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的心理也有其差异性和特点。因此一定要将心理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辩证地统一起来，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都不能全面地反映人们心理的客观实际。

（三）既要着重研究中国现代心理学，又要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

心理学从经验性的、描述性的、思辨性的学问，变成一门实验性科学，只有120年的历史。西方近代心理学是清朝末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自己的第一个心理实验室是1917年在北京大学建立的，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于1921年，这样算来中国现代心理学只有约80年的历史。很显然，认真总结80年来我国心理学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加速我国心理学现代化的进程，使心理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着力加强心理学的现代化建设，要学习、借鉴和创造现代研究技术手段，使用现代心理实验仪器设备，采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开展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并进行基础理论和基本理论的探讨，才能建立我国现代心理学理论。

但是，同样也要看到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重要性。这一点过去是被忽视的，以至使不少人误以为心理学完全是一种“舶来品”，而不知中国是世界心理学思想最早的策源地。古代中国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心理学专著，但是有散见于其他著作中有极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及专篇，并且引起了外国学者的研究兴趣，例如日本的黑田亮（1890～1947）曾著有一部400多页的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1920年美国的鲁格尔（Ruger）就曾将我国战国时已有的连环试验采入他的心理实验内，并著有《中国连环的解脱》一书。

我们应当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理论体系的高度，认识研究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重要意义。应当全面深入地整理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精华，将其纳入、融化到中国现代心理学中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两大特点，一是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一是必须反映我国作为世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文化历史继承性。现代心理学理论是包涵着过去历史上许多仍富科学性的心理学思想的内核的。

（四）既要重视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又要重视心理学的应用与普及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的理论问题，否则不成其一门科学。心理学的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和基础理论两个大的部分。前者是关于整个心理学的理论，是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后者是关于各个心理过程、个性特征和各个心理学分支的理论，是特殊的、各不相同的东西。我国现代心理学发展的情况告诉我们：每个心理学实验都在得出某些理论结论，多系列的实验研究才有可能完成某种心理学理论的构建；就是引进外国心理学，也应纳入到一定的理论体系。这里既要求做建立在实验和实证基础上的心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也需要关乎整体的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近二十年

来，由于潘菽教授倡导重视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心理学会下设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1989年更名为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创办了《心理学探新》理论刊物，对我国心理学的理论建设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就是明证。

我们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应用、提高与普及的辩证关系。理论要与应用结合，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下普及。在我国现代心理学建立阶段，主要是引进外国心理学，后来才开展自己的心理学实验与研究，对应用与普及注意很不够，因而造成了心理学发展的缓慢，在人民之中未扎下根。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心理学难于抵制极“左”思潮摧残的一个内部因素。历史促使我们认识到：心理学的应用与普及，是心理科学发展的生命力。得不到应用与普及的科学，也就得不到深厚的群众基础并将失去它存在的社会价值；得到广泛应用与普及的科学，就能为提高理论研究提供广阔基础，并发挥其社会作用。所以，“心理学要解决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必须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用更大的精力去扩大它的应用与普及方面的工作”①。近二十年来，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实际部门对心理学的迫切需要，而我国心理学的应用、普及比以前有较大进步，促进了现在心理学事业的繁荣。

(五)既要脚踏实地进行心理学具体研究，又要建立和重视心理学的科学学

一门科学的发展是由它的各个分支领域的具体研究汇合而成的，心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脚踏实地的研究也是心理学发展的根本所在。但是历史又告诉我们：仅有各门分支的研究本身是不完全的，还必须有制定本学科发展战略、策略和政策的科学学的帮

① 杨鑫辉：《略论心理学的应用与普及》，载《江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助，两者紧密联系，都很重要。没有对各个分支的踏实研究，所谓科学学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反之，不建立和研究心理学的科学学，对心理学各个分支的研究又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心理学科学工作的开展，将使整个心理学的发展更有目的性和预见性，心理学的各个分支和各个方面的心理学工作者的工作将会更加和谐与协调一致。潘菽教授1956年亲自拟订了《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草案，确定了发展战略、重点研究方向及工作原则。虽然后来情况在不断变化，但总的说这个方案对后来有很大影响，并逐步得到实现。例如其中提出设置心理学理论与心理学史研究组，提出“心理学史的研究以中国心理学史为重点。外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以重要学派和重要个别心理学者的学说的研究为主。关于系统的世界心理学史先进行编辑工作”①。最近二十年的中外心理学史研究工作是实现了这个计划的，没有这种规划与计划，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也难于在80年代创建。

心理学的科学学应研究心理学的发展史、心理学的现状、心理学的方法学和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四个方面，以制定我国心理学发展的战略、策略及各项政策，迅速发展和提高心理科学，使心理学更好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实际上，心理学的科学学的内容，也是心理学基本理论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过去已经做了部分工作，今后要更加明确和更加重视。

当然，总结我国心理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并不只是上面我们所列举的五对关系。在我国心理科学发展这个事物中，它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上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侧面，需要辩证地历史

---

① 转引自赵莉如：《悼念敬爱的潘老》，载《心理学探新》1988年第2期，第6～7页。

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这里列举的只是被认为较重要的五个关系。我们相对地对当前仍比较薄弱的一个侧面多作了一点论述，并不是说另一个侧面不那么重要。这些关系处理不当，都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地影响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我们应当强调运用辩证法则作方法论指导，以促进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① 这完全适合于我国心理科学的工作。

二、未来趋势

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就是一种事物的运动变化。事物变化虽然纷纭但也有其规律性，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心理学应当把握它的发展动向，也就是发展趋势。对中国心理学发展趋势的分析，应当建立在已有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赵莉如在《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中指出，解放前的 30 年中，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已出现不少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倾向。这就是：要求心理学中国化；注重心理学的实际应用和理论研究；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难于获得科学成果。现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又向前发展了 50 年，即将迈进 21 世纪的新时代。总结我国心理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把握趋势，对于发展和繁荣我国今后的心理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当前至少有下面三个趋势要引起重视：

（一）心理学的综合化

科学由综合走向分化又上升到一种新的综合，这是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心理学作为科学的一门，当然也是如此。世界心理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61～362 页。

在20世纪初是学派林立相互对立的，三四十年代以后不断发生变化。现在心理学各流派的尖锐对立早已消除，相互吸取、融合发展已占主导地位，所以，美国的舒尔茨指出："今天的心理学家已不再集结于格式塔心理学、行为主义或机能主义的旗帜之下。就理论和概念来说，已有走向折衷主义的一个较强大的趋势了。"① 在此情况下，国内外都有学者企望探索一种较统一的大心理观理论。② 有的学者认为要建立统一范式与理论的心理学是一种幻想，有的学者认为在大心理观下就可以统一。尽管这种发展的前景尚难完全肯定，但它与综合化的趋势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我国心理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除了学派之间的互相吸取与融合，还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一导多元"的方法学趋势，即多种多样的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结合。在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指导下，实验、实证的方法与理论思辨分析的方法都在受到广泛的运用与重视，各执一端的取向态度在改转之中。多种方法、多种维度研究人的心理问题，更能全面揭示心理的实质与规律，已经成为更多心理学研究者的共识。应当看到方法学上的综合趋势，将是整个心理学综合化趋势的推动力。其次，是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结合。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自然现象而且社会现象以至最复杂的心理现象，都置于科学主义的审视下开展研究，依赖实验与数据作出结论，当它被推至极端时必然陷于不可能脱的困境。于是被逐渐忽视的人文精神又重新为人们所看重，描述与解释的方法又得到肯定与上升。人的心理现象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独特现象，

① （美）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1975年英文版，第313页。

② 参阅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中西心理学传统跨文化解析》，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心理学不仅要研究各种心理过程，而且要研究整体的人性，这就决定了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必须与人文精神的研究取向相结合。所以，当前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长足发展前景很好，学者们还是呼吁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要重视人性的整体研究。再次，为了发展我国的心理学，也出现了综合吸取外国心理学的认识与态度，在综合化的趋势下，学习和借鉴外国心理学时，不要左右摇摆，而应立足本国博采众长，面对当前偏重西方心理学的倾向，应当加强苏俄心理学的研究与学习。

心理学的综合化并非统一化或一致化。"吴伟士和舍汉指出，学派虽已解体了，如果我们问一个心理学家，'你对精神分析有什么意见呢？'或'你是一个行为主义者吗？'他的答复表明他对学派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学派的分歧是依旧存在的。"[①] 对于我国心理学来说，心理学的综合化应当包容各种方法取得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应当通过"百家争鸣"进行学术讨论与交流，更多地取得共识。

（二）心理学的本土化（或称中国化）

我国和世界各国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人既是自然实体又是社会实体的二重性，决定了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心理学也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社会人文科学性质的二重性。不同的国家民族有其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背景，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全世界完全按一种范式建立起来的一种"统一的"心理学，而产生了心理学的本土化和本土心理学的问题。东西方及各国心理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的方面就是心理学的世界性问题，异的方面就是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当前，在西方心理学占据世界心理学主流的情况下，心理学的本土化主要是指一种社会文化取向的

① 参见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 页。

问题，每个国家的心理学所采用的概念、理论及方法要能切实反映本国民众的心理与行为，这个原则适合于每个国家的心理学。

我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就是中国化。潘菽教授早在1939年就发表了《学术中国化问题刍议》，当然这也是包括心理学在内的。80年代初他又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问题，认为这是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认为，我国心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就是要抵制全盘西化（当然过去也有全盘苏化的教训），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将心理学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之中，我国心理学的事业就得不到真正的发展。心理学的中国化，要求我们以辩证唯物论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理论基础，要求我们进行中国人的心理实验研究，要求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心理量表和研究方法，要求继承和发扬祖国心理学的优秀遗产，也要求我们学习和借鉴欧美苏俄等外国心理学一切有益的东西（心理学不中国化就不可能使心理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心理学不中国化就不可能满足社会对心理学的切实需要）。我们必须把握心理学本土化这个趋势，建立好中国的本土心理学，也就是要建立好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

心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与心理学的世界性并不是互相对立不相容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的。我们既重视社会文化取向的本土化，也承认进化遗传取向的世界性；既探求本国人的心理行为特点，又探求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所以在认识和掌握心理学本土化趋势时，不是与心理学的世界性割裂开来，而只是要突出出来。

（三）心理学的实用化

中外心理学的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心理学应当面向社会生活，基础研究的成果要应用到社会实践领域中去，心理学的应

用与普及是心理学发展的生命力。在西方心理学史上，强调实用的机能主义战胜了主张纯科学的构造主义，昭示了心理学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应用才能有新的发展。从现实看，世界各国尤其是心理学发达的西方国家，心理学应用分支研究及其机构都占主要地位，心理学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如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教授早在五十多年前指出的："从历史发展过程看来，理论都是以应用为基础，理论是由应用发展而来（因为应用上有许多问题需要更进一层的解决）。故研究理论科学者应把这根植在应用上……在中国研究心理学的人尤应注意理论和应用携手……我们应该用心理学的研究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把所研究的知识应用到社会上去，一方面帮助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帮助自己科学的发展。"①

心理技术学的名称出现于20世纪初。一个世纪以来，心理技术学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推动了心理学更广泛的应用，但是离社会的需要仍然显得不足。所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去世前曾在有关文章中呼吁要形成强有力的心理技术学。俄罗斯近几年在高度重视维果茨基心理学理论的同时，要求心理学工作者"到社会的大课堂中去"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心理学者中也早已提出重建心理技术学新体系的构想，以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心理学应用的广泛而迫切的需要。近两年，国家教育部在心理学专业调整工作中，已将应用心理学列为心理学三个二级学科之一。我们必须正视和把握心理学发展的这方面的趋势。

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应用呼唤理论，理论要植根于应用。心理学应用化趋势并不意味着基础理论研究将被忽视，因为"没有事实基础的理论是沙堆上的建筑物，而没有

① 《潘菽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1～92页。

理论的事实则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资料，不能用于建设井然有序的科学大厦。因此当代心理学和当代一般科学都是一种事实与理论的混合物”[1]。应用是生命力，理论是指南针，两方面缺一不可，我们强调应用化是因为理论最终还是为了应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共识。

① （美）查普林、克拉威克：《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页。

后　记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是五卷本《心理学通史》的第二卷，也是杨鑫辉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外心理学通史研究”的成果之二。中国心理学史是创建不久的心理学史的分支学科，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者尤少，它更需要心理学工作者的关注和投入力量加强研究。本卷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它既要反映过去作过较多研究的赵莉如、马文驹教授等的已有成果，也要反映作者们和其他研究者的最新成果，力求达到一定的新高度，让心理学工作者在历史的回顾中，得到借鉴与启示，更好地发展当代的中国心理科学。由于是草创之作，企望得到学界的批评与帮助，以期更好地实现我们编著的初衷。

通过五年的努力，三易其稿才完成本卷的编著工作。1995年3月制定《心理学通史》五卷本的编写计划书，旋即被山东教育出版社纳入重点出书计划。1995年10月在长沙召开《心理学通史》编委会，初步讨论了编写大纲。1996年10月在南京又召开编写工作会，进一步对两位主编提出的编写提纲进行调整修订，并落实了编写任务。1998年12月中旬在南京召开本卷统稿会议，杨鑫辉、赵莉如、赵凯以集中或分散的形式进行了统稿工作，赵凯协助主编做了不少具体工作。责任编辑温玉川编审出席了上述各次

工作会议，给予具体的帮助。最后由杨鑫辉于1999年7月上旬完成定稿工作。

本书由杨鑫辉、赵莉如任主编。各章执笔人如下：绪论，杨鑫辉；第一章和第二章，赵莉如；第三章和第四章，王坚、赵莉如（其中第四章第一节的“蔡元培”，杨鑫辉）；第五章和第六章，赵凯；结语，杨鑫辉。四名编著人员中有两名年轻的副教授，说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后继有人，但还需继续增添新生力量。

编著《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关心与支持。感谢心理学界同仁的热情关切，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积极支持学术著作的出版，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将其纳入“211工程”科研规划，保证有关编著人员的工作条件，感谢有关参编单位的协作配合。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史，对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也是“其利甚博”的；大家共同努力把这门学科史建设好，也是心理学界的“急务”与“要道”之一。我们企望心理学界的重视、批评与帮助，以期提高这门分支学科的理论水平，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编写组

1999年7月25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未命名图书
作者＝
页数＝４９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